

司徒德譯

# 麥克唐納傳

獨立出版社印行

司徒德譯

麥克唐納傳

獨立出版社印行

55320

「公正的矛槍還握在良好的正直的男女手上」

偉大的將來還在我們人民的前頭！

我看見我自己的地平，我自己的天涯，

但當我的兒女到達那裏的時候，將另有一個天涯，一個地平，

一個黎明，一個天上的光明招手！」

——麥克唐納——

## 序

工黨(Labor Party)在英國政治上，得到如此長足的進展，以至於今日的地位，有兩個決定的因素，其影響却不是當時所能預期的。第一是以『勞工』為新黨的命名，把全國勞工羣衆的傳統與希望，猝然地集中在它的身上。

第二，是從社會主義者的隊伍中，出現了一個足以與現代政治家並駕齊驅的國會議員——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 Donald)。

在英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能把自己的人格深深地印在政治運動上，像這個莫利舍(Morayshire)的鄉童一樣，他曾在敦倫的屋頂室上，(譯者按：屋頂室Rooftop是一種租錢較便宜的房間)忍受饑餓，後來却為全世界知名的英國內閣總理。從那天他草擬那通過於一八九九年工黨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底創立工黨的決議案起，直至他寫勞工與國家(Labor and the Nation)的綱領時止，他一手領導工黨，使它日漸鞏固。

從只有三個勞工議員起，直至為政府的反對黨，乃至後來首次執政的時候，麥克唐納實為工黨命運的建築者，政治漩渦中的把舵者。他曾計劃那到達目的地的坦途，就是現在，他還是跑在勞工旗幟的前頭。六十五歲的高年了，却還是工黨的無敵的領袖。

著者以爲本書最少有兩點好處。第一書中引用麥克唐納的演說甚多，因此對於他的政治信仰之發展，貢獻出一個較前真確的紀述。第二，附錄中轉載了麥氏的演詞及論文。（譯者註：此種附錄，大部已在書中引用，故不詳。）

書中所述的事件，許多還是在政治論爭的階段中，因此著者對於麥克唐納先生之允許轉載其某些演說，及特許自由選用許多別處得不到的材料這種厚意，深致感謝，但願聲明所有紀述及緒論，應全由著者負責。書中尤無麥克唐納先生鼓舞或暗示的地方。

最後，著者願引用（著者沒有比此更好的話）麥克唐納先生本人，在前進雜誌所發表的，哈定的生涯，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話，以表明著者在寫這書時所懷抱的精神。

「傳記用途甚廣，惟其主要目的，則在把書中的主人翁，描畫出來，說明其品格。這個目的，如能忠實地做到，作傳者便可把他的作品，付諸流水，聽任風向波潮以獻於讀者之前了。」

這本書企圖對於那個非凡的事業，貢獻一部充份以文書爲證的公平的紀述。（著者相信這還是第一次。）其惟一目的，在述說關於麥克唐納的事實，看他在一個非常興味的人生涯中，講些什麼，想些什麼，和做些什麼。工黨首相的成績，後人自將予以最後的批判，因此書中的描畫，盡力避免任何個人的觀察或非難，更不欲使它有一點模糊。

## 譯者言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英國舉行大選，結果工黨獲得壓倒多數的議席。不但戰後英國的建設將操於工黨之手，就是全世界也要受到它的影響。

麥克唐納是英國工黨的創始者，領導者。他由攝馬鈴薯的卑微地位，進而於一九〇〇年組織「勞工代議委員會」，一九〇二年正式成立工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組閣，一九二九年第二次組閣，連任首相。因此他的生平便構成了英國工黨史的骨幹。

現任首相阿特里，於一九二二年曾任麥克唐納國會私人秘書，一九二四年任麥克唐納內閣陸軍次長。

這本書詳述麥克唐納的出身、家庭、思想、工黨的創立、發展以及第一第二工黨內閣時代，英國外交內政的設施。讀這本書，足以使我們知道：麥克唐納數十年艱苦奮鬥的政治生涯；英國工黨的歷史；第一次大戰後，英國對內怎樣應付失業、罷工、住宅等問題，對外怎樣企圖建立世界和平，乃至英國溫和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

我於這個時候將這本書貢獻給讀者和我國的勞動界，有三個理由：第一，英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社會問題尚未求得圓滿解決，但是英國却未因社會問題釀成社會革命。學者多歸因於英國的政治水準高，民主制度完

備，勞動者有其政治地位，社會立法完善的緣故。我國戰後政治要民主化，經濟要工業化，則英國的經驗可爲我們參考借鏡者不少。第二，麥克唐納是在英國民主制度之下從事政治生活的，我們看他奮鬥的經過，便可從側面增加對於英國議會制度的認識。第三，麥克唐納在英國貴族及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一個出身卑微而有改造社會志向的人，他艱苦奮鬥卒獲成功的生涯，足以鼓舞與他有同樣志趣的人們，使他們知道怎樣迎接失敗，怎樣把握勝利。

這本書祇敘述到一九二九年麥克唐納組織二次工黨內閣爲止。沒有包括一九三一年保守黨再起以後，麥克唐納脫離工黨，參加聯合政府，以迄逝世的紀述。麥克唐納晚年這一段歷史，頗爲同黨所不諱，其在英國政治史上的功過，則有待於史家作最後的論定了。

這譯稿是我在立法院勞工法起草委員會任事，研究各國勞工運動及社會立法的時候翻譯的，譯完的時候，正值抗戰開始，未克及早出版。現承獨立出版社代爲印行，特此致十二分的謝意，并感謝代我抄寫全稿的勤。

# 麥克唐納傳 目錄

譯者言

原著者序

|                  |     |
|------------------|-----|
| 第一章 祿錫之恨         | 一   |
| 第二章 貧乏之年         | 一三  |
| 第三章 社會主義運動       | 一九  |
| 第四章 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   | 三七  |
| 第五章 工黨之誕生        | 四九  |
| 第六章 一九〇六年        | 六九  |
| 第七章 國民之喉舌        | 八三  |
| 第八章 麥克唐納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 一一五 |
| 第九章 餘波           | 一五五 |
| 第十章 反對黨          | 一八七 |



麥克唐納傳

二

- 第十一章 大試驗——第一次組閣……………二二二
- 第十二章 間斷及第二次組閣……………二五九
- 第十三章 麥克唐納與大不列顛帝國……………三二一
- 第十四章 國際主義……………三四一
- 第十五章 麥克唐納之性格……………三五三

## 第一章 祿錫之氓

一九二四年正月的一個早上，一輛街車駛過巴京汗皇宮（Buckingham Palace）宮門，在英皇的門前停止着。

宮前並沒有歡迎的羣衆，除掉值班的警察和職員而外，全沒有人留意這個身軀高瘦，眼睛威嚴，長着鉄褐色鬍子，行將入見皇上的人。

但是幾小時之內，全世界即已轟傳着，英皇佐治五世，召見國會議員麥克唐納底消息，並且說他奏呈了首任工黨政府內閣的名單，以支配大英帝國的命運。

雖然勞動者在政治上的勢力，必將較此更勝。但是無論英國工黨（British Labor Party）未來的遭遇怎樣，他們老年的或青年的黨員，要想再經驗一九二四年時看見——「皇上召見麥克唐納」——的大標題，和知道勞工實際企圖統治英國十八年後，果真實現了一個工黨內閣時底震顛，那恐怕是不會有的了。

那是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和政治的勞工凱旋的時候，上自快要上台的閣員，下至卑微的選舉羣衆，都一樣地「興高彩烈」。然而此外尚有一人，其勝利還要偉大——在強勁的肩膀上，他負荷着引領新政府安全地渡過前途「窮險阻」的責任。那些險阻，沒有人知道得比他更明瞭。

六年前的麥克唐納，在英國不過是一個最受憎厭的人。大戰期內他的和平運動，不僅使他受盡全國人的少有的咒罵。甚至他在議會裏代表了十二年的勒司特 (Leicester)，也不留餘地却棄了他，而以一四，〇〇〇威紀錄的多數擁護他的反對者。這巨額的多數，乃是全國對他不信任的表徵。

要戰勝這樣的私仇，必須具有無瑕的人格和卓絕的才能。麥克唐納却獨能當此。並且，一九二二年當他回到下議院一兩天之後，復被選為國會工黨組 (Parliamentary Labor Party) 的主席，恢復了一九一四年被黜免的高位。

今日愛說麥克唐納不足稱為政治領袖的人們，請好好地記着：當一九一四年在最危急好像一切都失敗了的時侯，他所表現出的能力——也許對了或錯了——和他那甘願受人呢罵，而始終不肯讓他所崇拜的真理的精神。

要述說他從貧困中，如何堅苦熱誠地邁進，以至於成為演說家，英國領袖的政治家地位之歷程，無異描畫現代最出眾的事業。

我們要描畫的乃是一個幾淪為農業勞動者，結果却創造出一個新政黨的兒童；在倫敦會瀕飢寒，後來却當內閣經理的兒童；自己教育自己，而其淵博的學問，却為衆人所尊敬與仰慕的兒童；一個後來成為我們歷史中擁護勞工最力的兒童。

這個代表着八百萬以上英國選民演說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六十三年前，一八六六年十月，他生在摩利海港 (Moray Firth) (譯註) 的一個漁村，名叫祿錫矛斯 (Lay

Wainmouth) 的地方，那兒北海的狂風與惡浪，造成一道正如住於其上的人一樣地崎嶇強硬的堤岸。

譯註：摩利海港在蘇格蘭北部。

「兩樣聲響，一樣雄：

是山的碎削，是海的波湧，

年代復年代，使你歡騰鼓舞，

「自由」；這是你所祈望的福音。」

那兒天然的景色，好像不斷的誘惑人們冒險的勇氣。要描寫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從這個地方生長，原屬不可能。格蘭扁 (Grampians) 的山脈，從陸地上高聳着，山峯積雪半年，復從四崖的森林中，高插入雲霄，「正如古代的巨大動物，在岸上蹲伏着一樣。」(註) 與此正對着的，還有那永無靜寂的海！苦，是那兒的住戶，然而那種生活却是合理善良的；沒有近代工業的搔擾，然而他們却生氣活然。

註： "Scottlands, Hills For Me," by J. Ramsay Mac Donald, Forward, September, 9th, 1920.

島北滿目荒蕪，民情嚴酷，正宜於長養推苦受難，建功立業的偉人。早在麥克唐納之前，它已貢獻出不少航海家，剛毅的墾荒者，意志堅強與仁慈的牧師，和致力於真理的科學家。那實在是這嬰孩理想的出生地，因為他的生命要融化在政治的旋渦中，並且需要那種蘇格蘭族遺傳下來的勇敢。

一個熟知摩利州 (Morrisshire) 的人這樣說：「摩利州產育出色特勒 (Celtic) 與斯堪迪納維亞 (Scandinavia)

混合的種族。這蘇格蘭之州郡，再無比摩利州有更可誇耀的歷史光榮與英雄的神史奇談了。」（註）

註：The Man of To-Morrow, "Iconoclast", Leonard Parsons, 1924.

麥克唐納不僅生於祿錫矛斯，他並且還是祿錫矛斯的人，其祖宗聚族於斯，垂二百餘年。父親為蘇格蘭的農業勞動者，母親更是非凡的女人，從麥克唐納出生乃至長成的長期窮苦中，她從來「畏命運而感頹。」

建功立業的人，罕有如他少時那樣不幸。家道貧寒，親友中復無顯貴。少時既需調養，長後復常為一往無前的精神所驅使，至身疲力竭，健康之幸福，也隨是而歸於烏有。

初他寄居於其祖母雙間式僅有二扇門通進的房子，房子上面用茅草為蓋，背向鐵道。這內閣總理的搖籃，如今依然存在，土人尤喜指示遊客，引以為榮。

現在離這小茅舍不遠之處，另有一所房子——國會閉會期間，麥克唐納偶回鄉時所暫駐的。這所房子，乃是麥克唐納於戰前幾年為他的母親建築的，而她也就於一九一一年壽終在那裏。

「破偶像者」(破偶像者Iconoclast係明日之人作者的筆名。——譯者)曾這樣地描寫那祿錫矛斯底簡陋的家庭：

「他祖母的茅舍極為簡陋，但她却是非凡的女人，其學識與曠昔之美麗，至今仍為人所紀念。她原曾過過好的日子，縱使在最窮苦境遇中，她依舊保持着溫文女人的行為與寬大威嚴的態度。」

「她能記憶許多古代的民間故事，女巫與神仙及一切千里眼和冒險的故事。她熟習一切民歌，妖精與幻想醜

織了麥克唐納童年時家中粗糙的食品，也就補足了糧食的缺乏。祖母的談話對於他，正如圖書館對於他的好處一樣；她引領他與過去的成人的人物和偉業接觸，及其一旦能自讀的時候，他便盡量地飽覽當地一切僅有的書籍。』（註）

註：The Man of To-Morrow, pp. 62—63.

自從那很早的時期，麥克唐納便屢屢提及他從書本中得來的幫助與鼓舞。當他每被問及成功及如何達到成功的問題時，他總拿文學名著中激勵人們思想和鼓舞人們觀念的話回答。

他在一個淒慘的境遇中，初次和書本接觸。那時祿錫牙斯歸來了一個曾移居倫敦的製錶匠。這個製錶匠雖以患肺癆瀕於危。但仍樂意地以其所藏的少許書籍，借給這學而不倦的兒童。

由於製錶匠的這種恩惠中，麥克唐納乃得讀撒母耳斯邁爾的一個蘇格蘭自然主義者傳 (Sarguel Sniles' Life of a Scottish Naturalist)，多瑪愛德華滋的多瑪狄克及忒索塔克耳 (Thomas Edwards' Thomac Dick, Thurso Baker) 和司各脫 (Scott) 與狄更斯 (Dickens) 的作品。

你能想像得在那窮苦煎迫的茅舍中，肺癆的製錶匠盡其風燭餘年，對同坐的熱誠的兒童，開展文學上底奇蹟的情形嗎？能想像得出麥克唐納一本復一本地鑽研，隨着偉大作家的力量，展開了眼界，透視了令人驚愕的燦爛的飄動的世界的情形嗎？或者愛護勞苦人們的種子，這時便已印入他底潔白的心中了。

影響他最早的人中之一就是休密勒 (Hugh Miller)。他所著的學校與教師 (Schools and School-Masters)

一書，也就是麥克唐納罕有的購書之一。他既早具有蘇格蘭人對教育的真誠，或者暗地裏便伏了一個將來做教師的觀念。不久他確然做過那樣的夢。

他對於學問的興味，可於其中學時如學者樣的豪勇中反映出來。那時，麥克唐納的驚人的才能業已顯露出來，雖然窮苦，他依然獲得較好的教育，為當時除蘇格蘭之外，任何地方的窮苦兒童所得不到的。

論及他的學生時代，麥克唐納給我們一個不易忘記的當時蘇格蘭寄宿學堂的情境：

「現在看來，那時學堂中的工作已屬舊制了；不斷的苦讀以窮事物之原。將一切事物翻來倒去，撕毀成許多碎片，復重新砌疊起來，分解辨析，以把握其根本。對於英文也揉成碎片，然後再配合起來，如中國的字謎一樣。一切均比比燕 (Bain) 的十六便士文法 (Sixteen Penny Grammar) 做根據——這書正如前問答書一樣，為蘇格蘭教師 (Domnie) 的學生所背誦的——並作文法上的分析。因此把我們的腦筋弄得很緊張。教師的通則之一就是「你必須精通；那就是教育；當你精通一事之後，你便容易精通一切別的事。」(註)

註： Scottish Educational Journal, September 26th, 1919.

那種教練，必然是驚人的。因為少年的麥克唐納，那時便打下了清明的思想及精通英語的基礎。的確，僅祇讀過他時時給報紙撰述的偶成的稿件底人們，必領會到麥克唐納做了政治家之後，文學界便失了一個近代作家中特出的人物。

窮苦人的在學時期是不會過度延長的，麥克唐納十二歲的時候，和別的祿錫矛斯的兒童一樣，差不多也走上那

條通常的路；跟隨那些士人們底簡單生活的漁船去航海。實際上他已棄學，從事搖馬鈴薯的工作以換取他最初的幾個先令。

然而，在他初遇到生命危途的時候，却有一人看出了他前途有比掘薯者更偉大的事業在等候着他。祇要他能  
把貧窮的煩惱除去。

這便是他的教師，這個年老的教師早已視麥克唐納為其最有希望的學生，他任他為學生教師並減免他的學費，希望他能由此進而為一個教師或傳道人。

此外，他還鼓勵少年的麥克唐納去博讀，引他研究數學及古典文學的作品，當他的學生教師表示喜歡科學和對任何事物必窮究其真理的時候，這個忠實的朋友還繼續盡其力所及的幫助他。

二人間的友誼這樣地開始，一直到他死的時候。即在今日這最特出的學生依舊帶着他老師遺下給他的金錶。這老蘇格蘭教師，工作之地既在遙遠的鄉村中，所有的工具，又那樣地不完備，終竟育成當內閣總理的人才，必然是一個值得注目的人物。今日不少利用現代的學問與方法從事教育的人，却遠不及他。那麼他究竟怎樣成功的呢？讓麥克唐納自己回答吧：——

「什麼是他的奇才呢？並不深奧的，更不需分析才能理解。他那種純樸的仁慈，或許就是他所能給與學生最珍貴的禮物。憑藉那種仁慈，他讓他們在他的膝前圍繞着，用手環抱着他們，這樣使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註）

註： Scottish Educational Journal, September 26 th, 1919.



那位教師的工作并不容易，麥克唐納說過，夏天時金雀花中有鳥巢，海濱又那樣地引人入勝，於是時兒童們便永不想踏回學堂裏去。他們避在樹身的後面，偷看教師含着叫人的口笛，巡察空無一人的遊戲場，既而又轉回去還是空無一人的課室。麥克唐納回憶說：「翌晨因為童年好玩的心情，大家都受了懲罰。每人打手掌的次數，也就按照各人好玩的程度而不同。當他站立起來，手裏拿着刑具的時候，他真寧願說：『我願昨天與你們同在一塊，但你們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以代替他對我們的講授。」

他的學生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夏天過去，當那種記憶模糊了以後，他們，連麥克唐納也在內，又去探訪他了。

「我們多半在夏天的時候探訪他，他在花園中椅上坐着，看見他真使人快活。那時他已掉去了課本生活，把哥兒夫球棍也掉在一旁，只在等待我們了。他在陽光下晒浴。摩利海港的涼風柔和地吹着他灰白色的頭髮，越海的遙遠的青山，綠林中靜默如睡的白屋，近旁的海的繚繚之聲，這些一切構成了一個和平美麗的世界給他。我們追述過去，談論外邊他從未履足的大世界和我們各人的盛衰，他快樂，我們也快樂，他覺着佔有了我們，我們也愉快地給他盡弟子應盡的職份。」

光是說麥克唐納祇興趣於學習和書本，別的絕無興味，也是不正確的。固然學習與書本佔了他生命的首要部份，但祇是部份而已。天賦的領袖才，早在十六七歲之前便已顯露，他底豐富的精神，更使他在蘇錫矛斯同輩中，占了一切競技與遊戲的優勝席。

當時祿錫之儀的考驗試，乃是一種松鼠樣的棍擊戲，以能攀援跳過十九樹的連環才算合格。完成了這個遊戲的兒童，也使『得入衆英雄的壁龕中。』他們從前站立的場所，如今雖荒蕪了，然而當時曾參與遊戲的兒童，至少會成功了。兒童，必還不會忘記那森林中的步哨。

麥克唐納誠然忍受了窮苦，但他並不接受它。他盡全力以反抗它。科學傾向的頭腦，使他喜歡科學過於古典的舊作。同時科學浸染了他的性情，使他對什麼事都不苟且，要把一切事物都加以實驗，這樣驅使他，即早在學生教師的時代，他已洞察現存的經濟制度而加以非難。由那時起他便開始注意當地的政治情況，寫點關於政治問題的稿子，給當地的報章。

大概是在這個時候，青年的麥克唐納也就行了政治的洗禮，幫助地方選舉的競爭。當然，那時還沒有工黨或有組織的勞工候選人，麥克唐納無以自名，於是便自稱爲急進者。他代急進候選者遊說，這樣，他初次擁護的人乃是一個『失敗者』，因爲選舉的結果是保守黨得勝了。

在初期的政界經驗中，麥克唐納不曾作任何演說——演說乃是後來的事。但，他的活動已建立了『有理想的青年人』之讚譽。這樣使他全部的熱誠獻於政治，定型了他的前途。

他讀了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乏（*Progress and Poverty*）之後——這書出版不久便行銷到祿錫茅斯——更增強了他以爲一切均不應如此的信念。

如果說有任何一本書能幫助英國工黨產生的，那就是這本書了。進步與貧乏一書燃起了無數人理想的火焰。

這隔重洋的祿錫矛斯，此書與此人初遇，便產生了改換歷史行程的結果。

麥克唐納更確信現代的藝術家，假如他要對人類有貢獻，他必須拿人生做題材，也必得人類的世界重建之後，創造的精神，才得解放，才有成果。

他不知道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已在英國努力宣傳社會主義，但，在他的思想上，却與威廉莫里斯同途。

他有一個朋友曾說：「直接的經驗使他透視了罪惡，透視了貧窮的殘酷。他的想像——不是統計家的死的想像，乃是藝術家的活的想像——照耀着光明的出路。即在年青氣盛的時候，他已不相信有任何捷徑可達到希望中的境域，唯一的途徑祇有如在登山的長途中繼續不斷的努力，在勤勞與苦鬥的程途上，依靠些微的閃光前進。」

麥克唐納就這樣地踏步向那既長且苦的前路邁進。有時希望沒有了，只有絕望。但在他看來，正如無數的年青蘇格蘭人一樣，以為必得到了倫敦才算踏上了長途的第一步。祿錫矛斯已再無可學的了。他相信要達到能幫助別人的地位，使人注目的地位，他得先完成科學的教育，獲到學位的銜頭。

在沒有說到他走上延互的長途之前，尚有一影響他少時的事須在此介紹，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這個瘦削的熱誠的蘇格蘭青年，猶向倫敦與名譽出發的影像，那就是教會。

蘇格蘭教會，在許多方面上，較近於威爾斯（Wales）教會，與英吉利的不同，它與蘇格蘭的民情較近，於

他們生活上的影響，也較為重要，故其形態多為南方人所不知。

他在祿錫矛斯加人的教會，把它的教義深印入他的心坎，至今猶存。雖則在別的事情上，他改變了許多往日所持的意見，然在宗教方面，今日的麥克唐納實與曠昔無異。他是一個宗教的虔信者，整個人格深深地浸染在宗教的熱誠裏面。

在他未克完成的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傳記的野心上，便明顯地可以證明這個事實。這本書在祿錫矛斯自修時間他便開始寫的。假如有一天他有工夫完成它的話，世界也定可以發現另一個麥克唐納。

這樣由教會與教師的培養，由專心致力於科學與政治的努力，年青漂亮，目光炯炯而烏髮蓬蓬的麥克唐納便開始他前途的搜尋了。

他並不逕赴倫敦，他先赴布里斯拖 (Bristol)。在那兒為一個社會改良家服筆墨之勞。

就在布里斯拖，這未來的內閣總理發表了他第一次的政治演講——聽講者只有三人！我們不難想得：那異鄉的英吉利人，也正與這蘇格蘭的十八歲鄉童一樣地難堪。

其後他回祿錫矛斯，不是為的思家，乃是為的發覺了那雇主的社會改良理想與自己的不相合。他回到蘇格蘭，在希望上自然不能不說受了一個打擊，然而回來是回來了，回來後並且豐富了，豐富在經驗，不在貨財。而且更堅決地要直赴倫敦，那世界的中心，那一切要被現代注意的人所不能不佩服的倫敦。

大概在受一個廣告招聘之下，他得到了某種職業，祿錫之氓也就重復開始了他追求聲名的前途。

他袋裏只有一兩個先令，也沒有一個朋友。但，他有一方讀書，而一方藉工作以自活的機會。並且有信心。這信心對於他很是需要，因為所謂職業者，原屬虛無之事，到達倫敦以後，他馬上便受經濟壓迫了。

雖然遇到了這個新的不幸，他還是不失望。卽在那黑暗的，在朝不保夕的，在與飢餓面面相覷的時候，他還是不讓祿錫矛斯家裏的人曉得他的困苦情形，不讓他們爲他憂慮。

他決定不論在這個寂寞與繁華而冷酷的城市中，是死是活，他決不再回去了，他只有一條向前的路。否則他只有跟着許多抱着同樣熱望而遠離蘇格蘭的人們的覆轍，在這大城市裏面的閣樓中，在寂寞與孤獨裏完結了他短促的生命。

## 第二章 貧乏之年

一個漂泊者在一個繁華的大城中，舉目無親，其所感受的寂寞，通世中恐怕不會再有了吧。麥克唐納常常都是靜默寡言的，甚至對他親密的朋友也是如此。他從不和人說及那些窮苦日子，和踽踽倫敦街頭漂泊覓職時的情景。他以一個近代狄克喜亭吞 (Dick Whittington) (譯註) 的精神從蘇格蘭冒險出來，而社會對這些尋求幸運的窮苦無告的人們，總是殘忍地要求必需的代價。

譯註：據說狄克喜亭吞是倫敦的一個貧童，在一個商人家裏充當廚役，除掉一隻貓兒外，身無長物。後來他的主人到外國營商，狄克把他的貓兒交托主人帶去發賣。他主人所乘的船途遇暴風，漂流至巴巴利國。國王宴請該船的船主。當酒宴已備的時候，却跑來許多老鼠在桌上搶食。衆人只呆着驚訝沒有方法。船主便對國王說，他的船上有一貓兒，能除掉那些老鼠。後來國王拿出許多金銀珠寶換了那隻貓。

狄克喜亭吞便一變成爲一個有錢的人。一三九七年，一四零六年和一四一九年三任倫敦市長的狄克喜亭吞，傳說就是他。如今倫敦市府常舉行的宴會中，還有狄克喜亭吞的插幕。

然而麥克唐納却與千百的別人不同，他不是尋求幸運，他只求能在粗衣糙食中研究學問，以達到精通科學與從事政治活動的雙重野心。他是要改造社會，不是要克服社會。說倫敦街上墮地黃金，引不起他的興趣，反而引

起他的憎恨。因為他所記掛着的乃是離城中富區不及一里的許多街道上那些過着憔悴生活，長年在飢餓中掙扎底無千無萬的人們。

倫敦之陋巷，正向這來自祿錫矛斯的十八歲少年挑戰。然而這些反而堅定了他改革社會的信念。什麼地方錯了？他後來回憶說：『社會正如天秤，一方過于奢侈，一方却過於貧乏。』

當時同具這樣思想的人還有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海德曼（H. M. Hyndman）布拉察福耳德（Robert Blatchford）哈定（Keir Hardie）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衛布（Sidney Webb）諸人。那個時候麥克唐納還未與他們相遇。在歷史的行程尚未聚集這些先驅者於一起，從事建造工黨工作之前，麥克唐納只好隨着命運，做痛苦經驗中長期的學徒。

從祿錫矛斯出來滿擬赴任的職位，既未實現。麥克唐納在倫敦的生活，也就如一般失業者一樣，與災難相隣，只有幾個先令間的距離。他於是終日僕僕道途，尋找職業：投函廣告的聘請，遍問一切的窗戶，以期發現『招請小工』的張貼。

明顯地，即在當時，也是人浮於事。因此在某一個時期間，他便只能過着絕對的飢餓生活。

在那種朝不保夕的情況底下——他擬入夜校考取科學學位的計劃，自不可能——真的，假如不是在最後的一剎那間，找到了一個短期的書記工作的話，這未來內閣總理是會當公共汽車的售票員的。

那工作——書寫信封的工作，叫它做『窮苦者最後的庇護所』算是最恰當了。那是一間新開的自行車者遊行

會 (Oxley's Touring Club) 辦事處裏的一件薪水微薄的工作。麥克唐納自己從未坐過自行車，對於會務也無特別的興味。但在當時他却很高興，因為每星期拿到的幾個先令，也就免得他徒步跑回老家。他很明白：假如再回去，一切也就完了。

因此，他努力書寫會裏無限的信封時，也就表示着感謝之意。在此，讓我們說說這卑下工作的尾聲吧，因為這工作幫助了他翻身，做了他以後進階之石。一九二八年自由車者遊行會舉行五十週年聚餐。榮譽的上賓就是國會議員麥克唐納。他對這有長久歷史的繁榮發達的團體底到會會員演說，述及他最初與該會的關係，驚訝了不少聽衆。

做了書寫信封工作幾星期之後，他在倫敦找到了第二個位置。在城裏任庫柏箱公司貨倉 (Cooper Box & Co.) 的發票員。每星期薪金十二先令六便士。這樣微薄的工資，在生活程度甚高的城裏，使他無錢用午膳。午餐的時間，他便移用在大裁判所圖書館 (Guildhall Library) 裏去讀書。他的「午餐」通常就只有一杯清水，那簡直是荒年中的食料！這樣的食料，爲任何自強的人所常養乎回憶，而不願再嚐一次的。

「那些可怕的日子，能如透過這酒宴之華堂底烟霧裏的看法一樣地愉快麼？假若在烟霧大部消散之後，再來看時，我們中那一個能不先戰慄呢？」(註)

註：Speech at Newspaper Press Fund Dinner, April 23rd, 1929.

詹姆士巴栗爵士 (Sir James Barrie) 說的上述的話，不僅爲他自己少時在倫敦做窮書記時底寫照，并且是



一切會痛成寂寞與飢寒，敢在鉄面的倫敦冒險的人們底寫照。

凡曾在年青時受過透底的窮苦與寂寞的人，必會知道：麥克唐納是如何常常地希望回去祿錫矛斯，再聽本土的聲音。但，他的夢鼓舞着他向前。假若他被逼着要「餓其體膚」，他還是不稍放過其離鄉別井，以尋求學問的機會。晚間他總在他加入兩校的波克貝克學社 (Birkbeck Institute) 研究，盡讀一切可能借貸的科學的書籍。

好學好問的精神，使他與一個解析派化學家接觸，那化學家以其勤懇感人，也就願將其私人的實驗室借給他用。

這蘇格蘭青年，藉此得以實行煤的分解，不久日有心得，使他能够掉棄城中貨倉的工作，轉而就別的更有趣的職務。

既工且讀，其睡眠的時間也就常在早晨二三時，六七時又得起來，從事工作。任誰的體力也不能長耐這樣的勞苦。正將取得南翠星芬 (South Kensington) 皇后學位的時候，病魔也就踏來毀其希望。結果他的健康損壞了，他的工作也被阻了數星期。

其時他的命運似乎受了殘酷的打擊：他既不克參與考試，原擬致力於科學的志願也就不得不放棄了。

今日麥克唐納之担任大學校底永久監督 (Life Governor of University College) 及任波克貝克大學執行部員，頗為可異。(波克貝克大學是他四十年前工作後匆忙赴學的地方。)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他便在倫敦受政治火花的洗禮。是月十三日，一羣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在特拉發加廣

場 (Trafalgar Square) 舉行集會，反對禁止在那廣場及其附近集會遊行的告示。

是日下午巡行者與警察大衝突，許多人受了傷，這未來的工黨首領，也就是不畏被捕企圖集會之一人。

關於這回事件，麥克唐納說：『那不幸事件之發生，顯與失業者的煽動有關。當時工業很不景；失業者首次被「他們不應忍氣吞聲地受飢餓」的宣傳所喚起。穿着他們的破衣出來，失業者與警察相抗，旁觀者總認為警察是對的。』堪林干格累安 (Canninghame Graham) 約翰不滋 (John Burns) 都因為在那禁城內，領導遊行被捕。當時的秩序極混亂，直到軍警到場彈壓方才恢復，跟着一個長官出來宣讀暴動法 (Riot Act)。

人們驚疑，麥克唐納當時對此究竟怎樣想？

在這關鍵的時候，麥克唐納和當時西易茲令吞 (West Islington) 自由黨候選者多瑪拉夫 (Mr. Thomas Lough) 相遇。他正物色一個私人書記，他知道了這疏懇的青年會研習經濟，曾在蘇格蘭從事選舉競爭的運動，對本國政府也有相當的認識，并且又能執筆為文，於是便以每年七十五鎊，後來增至一百鎊的薪金許聘了他。

麥克唐納事後說：『現在我有錢了』。其實他有的不僅是錢，他底事業也從此便開始了。自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一四年間，他愉快地和拉夫合作。雖然那個值得稱譽的急進者沒有以自由主義黨染了他年青的書記，而麥克唐納也無能使他變遷西易茲令吞議席，(後來麥克唐納說：『我離開他以後，他才獲選，』) 然而這些年的經驗，却使他對於政治上各方面實際的情形多些了解。

麥克唐納來倫敦，不及一年便已加入了最近逝世的先驅社會主義者海德曼創組的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當他和拉夫合作時，復加入了費賓社 (Fabian Society) 并任該社執行委員數年。

費賓社當時相信：社會主義和勞工的理想，在自由黨之內善為傳播，較另組獨立的政治團體為愈。一八八八年哈定初為中拉罕爾特 (Mid-Lanard) 候選議員時，雖為『勞工』的候選人，却持自由黨的政綱，并請自由黨的幫助。

以一個蘇格蘭自治者的地位，麥克唐納擁護哈定之候選。當時，他任蘇格蘭自治會倫敦委員會的代理秘書，他以這資格從翠替士鎮 (Kentish Town) 的寓所中，寄了一通代表委員會祝賀哈定的函件。

這是二人間首次的通信。他們二人可以說是工黨的創建者。

充任一個自由黨的候選者底書記，最少，他也就和一般仍相信可任與自由主義攜手，達到社會主義國家之實現的人們往來，那末，麥克唐納在某一時期中，也具同一的觀念，自不足怪。

迄一八九三年，獨立工黨成立，并且不斷地主張在議會中另立社會主義者和勞工的代議團後，麥克唐納才讓他對自由的全國工黨底內心的熱望與信念無拘束地奔放。

從此他完全拋棄了自由主義，轉而成爲一個英國國內主張鬥爭的社會主義政策最有力的人。

## 第三章 社會主義運動

麥克唐納現在來到分歧的路上了：一面，勞動階級政治思想的潮流轉回到自由主義那方面，大家都相信自由主義可以使英國快樂與繁榮；另一面却趨向社會主義的新哲學——自然所謂新只是從其事實上的發展而言，因為拉薩爾（Lassalle）馬克斯（Marx）歐文（Robert Owen）諸人，及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早已夢想社會主義國家之出現。在『祿錫之氓』尚未從祿錫矛斯跋涉出來倫敦之前幾年，社會主義已成爲一個蓬勃發展的力量。它的信條也就深入了麥克唐納的腦海。他的腦海是注定要把社會主義從一個理想轉爲實際的政策，從幻夢的領域中轉爲吸引選票的材料之用的。

說麥克唐納自讀了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乏一書之後，便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大概不是妄言。他曾說：『它使財產共用，價值共創，積財共享的觀念家喻戶曉。更使人們知道：貧窮問題不是個人的缺點底結果，乃是社會結構中某制度底形象之一。』

誠然，亨利佐治的書對英國政治思想上，較之前世紀中任何書籍更有驚人的影響。它之支配自由黨急進份子之思想，正如它激勵了那些素傾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起而行動一樣。它甚至成就了使馬克斯成爲知名作者底無疑義的功業，因爲資本論中許多章底編排與文氣，一如進步與貧乏底積篇那樣。

要明白在這個蘇格蘭青年腦海中發芽的理想，我們必須轉過來研究他獻身致力的社會主義運動底初期歷史和目的。

聖西門伯爵 (Count de Saint-Simon) 是這個運動的首倡者。這令人驚愕的法國貴族之後裔，在牙買加，(Jamaica) 戰役時曾為英國的俘虜，可是他却利用發俘虜的時間去思索能否在中美洲掘一運河的問題。一八一七年，當法國尚受拿破崙戰爭的影響，瘡痍未復的時候，他便刊行了他著的社會結構第一冊：工業 (L'Industrie) 并附以如下的副名：自由人的和實用的與獨立的工作底政治、道德、及哲學的討論 (Political,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Free Men and of useful and Independent Work)

聖西門的信條，簡言之乃謂：「人們相互間應以兄弟相待」。他的目的與其說是要創造新的政治學派，無寧說是要提高道德思想。

麥克唐納在一九〇七年著的社會主義一書中說：「聖西門與其謂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無寧謂為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創始者。他祇教人作系統的思想，自己却沒有實在的把它供獻出來。人們贊成他對社會的理想，却反對他所提議的實現理想的方法，雖然如此，人們却把社會主義建立了起來。把握着財產的管理權較把握着立法機關的管理權更為重要，這是他教導人們的要點。」(註)

註：Socialism, H. C. & E. C. Jack, 1907c

十九世紀初期法國工業的情勢，貧富極為懸殊，助長了民主運動的發展，一八三〇年以後幾年間，別的人起

來繼續推進，一八二五年聖西門死後遺留下的社會主義信條，也就無可驚異。

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布蘭克 (Louis Blanc) 蒲魯東 (Proudhon) 都是法國社會主義思想萌芽期中的領袖。麥克唐納以爲：假若我們要稱任何一個人爲現代社會主義的鼻祖，則布蘭克與任何別的競爭者，實有同樣相競的資格。

「資本和大工廠，他都認爲是必需的。但，他主張國家做資本案——「貧窮人的銀行家」，不是私人。因此，他計劃一種「社會工廠」(Social Workshop)，由國家予以補助，漸漸地代替私人經營的互相競爭的工廠。」

布蘭克不是幻想家，他爲世界創造了預一個社會主義實際的試驗。所以一八四八年他僱員臨時政府的時候，他便實際地開辦了一些他所主張的社會工廠。麥克唐納說：「雖然過了若干時候——其中一間存在了大約三十年——都關閉了，但它們底一般的成功和它們與最不順利的環境奮鬥的能力，在在都表示出那個計劃的實行性。」(註)

註：Socialism, T. C. & E. C. Jack, 1907.

關於這個創始的國有試驗，我們只有一句話要說，即是：在我們適當地判定其成功的程度之前，必須研究它試驗時的實際情形。

歐文爲英國公認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者，可是在這個「怪僻的慈善家」(eccentric Philanthropist) 開始

他的社會試驗前幾年，人們已集中起來，向着財富底生產交換與分配的新制度前進。

葛德文 (Godwin) 底理論，在法國革命後幾年間，頗為英人所注意。麥克唐納說：『他詳究事物之根本』，按之葛德文、則：『既不受立法的束縛，復不受任何影響的限制，只按着它本身急需的刺激底英國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重建工業旅行程和改變社會底關係的時候，便已開始侵略人類的幸福。』（那些侵略為當時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隨着這種情景而誕生。』

此外如亞伯丁的教授 (Aberdeen Professor) 奧格爾維博士 (Dr. Ogilvy) 也宣傳着為葛德文所完全贊同的意見，說，人類的災難乃是由於土地之私有。因此，這些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與亨利佐治和工黨間，實有很明確的連環性。

所有英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者，都同意一個事實——罪惡與貧窮乃是所謂『文化』的產物。

麥克唐納在他初期的某著述中，曾引佩因 (Paine) 的政治正文 (Agrarian Justice) 書中說的話：『在自然的狀態之下，社會原無貧富之分：要成全社會富，要成全社會貧。不過事實上文化却是向兩方面運行的，一面使社會中一部份更豐富，一面使社會中一部份更悲慘。』

在英國最初企圖將社會主義施諸實行者乃是歐文。他的試驗雖沒有結果，但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却把政治思想推進了一大步。

歐文乃是一位才智卓絕的人。因為他最初說明：以人看待工人，不以奴隸看待工人，不僅在道德上看來是有益

的，同時在商業上看來也是有益的，這句當時被認為革命信條的話。所以在前世紀中，他底成功的歷史，便一再深入英國政治思想裏面。

因為麥克唐納的活動，無疑地受了歐文行事的影響，在此讓我們一過其著名的新拉罕爾克（New Lanark）的試驗。

歐文明顯地有一個『精明的商業頭腦』：十歲才開始在一家布店裏做工作，十九歲便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一個紗廠當經理。

一八〇〇年，他在克來德（Clyde）海角的中央地方底新拉罕爾克紗廠廠主的女兒結婚之後，又邀請他的同事把那紗廠買受起來，然後親自北上任經營的責任。

麥克唐納說他：『共雇用了兩千人，其中四分之一是格拉斯哥愛丁堡一帶工場中招募來的幼童。前廠主雖然也曾有點慈善的設施，那紗廠簡直成爲惡劣的習慣，野蠻狀態匯聚的陰溝。那便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初期的標本。』（註一）

『歐文主義的根苗便是從這種墮落的情況裏發生，從這些根苗纔長出許多清新而能醫病的植物。他就是頭一個人指出，對勞動者的人道的待遇可以使得商業經營者自己得到更多的物質利益；他就是頭一個人主張：社會應利用牠的立法的權力去保護自己，去抵抗那只顧目前利益不管將來損害的資本主義，假若社會能實行那樣辦法，被限制的資本主義本身反而會可以得到利益，出乎那一般只見物質利益的人的意想之外。』（註二）



「歐文總是頭一個人從經驗上看出：慈善行為除別的益處之外，從商業的見地來看亦是有益的，并且政府對於工業中的人道待遇問題應深加關切，應自動製定保護的法制。這種運動是可以被資本主義好意接受的，因為雖然那運動和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思想行為相抵觸，但是歐文證明那種思想行為不但無關大體，并且實際上可以被損效能，所以是不利於工業的。這樣看來，歐文主義運動並不是實現較高秩序的運動的開始，（雖然後來演變成了那類的運動，）而只是資本主義本身裏的改良運動，是使得資本主義更加賢明的運動，那運動是要替經濟學聯絡兩個盟友：倫理和人道，這兩者在當時被那些研究生產分配的財富之學的人看做漠不相干的東西。」（註三）

那些願意更詳細地研究歐文主義的人，請看麥克唐納著的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書中（上述數節乃從該書錄出）第三章：社會主義的組織和思想。歐文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麥克唐納認為是：

「他說社會主義是要把社會的物質經濟力量組織起來，用人類力量去支配，這是再好沒有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定義；他說資本主義要把社會的人類的力量組織起來，用物質經濟的力量去支配，這是再好沒有的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在一八一七年，歐文便已確定了目的和理想。」（註四）

一八二四年威廉湯卜遜（William Thompson）繼起，發表他那對財富分配各原則的考察（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書。湯卜遜力謂財富乃是勞力的產物，并題論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所謂工資，只限于衣食費——全部剩餘價值都歸到地主和資本家手裏。麥克唐納批評他說：「他承認對於土地和資本的使用應當支付相當的報酬，但是他主張對於地主或資本家的酬報不應超過工人的最高工資。」（註五）福克

思衛爾 (Forsyth) 教授論湯卜遜說：『他是第一個著作家把財富正當分配的問題，提高到它在英國政治經濟學中，不會估過的最高地位。』（註六）麥克唐納更謂：『他確實給社會主義經濟批評的理論按下一個牢固的基礎，以後關於這問題的著述，故意地或無意地，都從湯卜遜說起。』（註七）

註一：麥克唐納著，彭學沛譯：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面四十四。

註二：同上書面四十四。

註三：同上書面四十四、四十五。

註四：同上書面四十七。

註五：六、七、同上書面五十。

湯卜遜關於實行方面的計劃，除掉擴張了歐文式的自治團體，以試行社會主義而外，沒有多大的效果。歐文主義雖不成為政治上的信條，但歐文和湯卜遜二人的宣傳，却都有其具體的結果。假如最初的社會主義者無能使歐文等幻像中的新世界實現，無能運用他們的理論于自由主義時代（特別是那認國家對工業問題應立法保護的理論），無能壓制工業革命所派生出來的顯著的罪惡，這樣，『革命種子』（Revolutionary Brooding）之傳播，必將停延十年，而大多數的國民也必向新的自由主義中，求他們所希望的改造，把社會主義放在腦後。

麥克唐納說：『隨這政治潮流并行的，是感情的人道主義。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工廠裏工人所受的痛苦，文藝界的人道主義者，以喀萊爾 (Carlyle) 和納斯欽 (Naschin) 為領袖，復謂財富者只是犧牲于商業主義

中的生命，此外便無所謂財富。」（註）

註：Socialism, 1907, P. 40.

憲章主義者的努力，沒有成就什麼，反而破毀了社會主義在英國另成獨立運動的事業。在這個被忽略的時期中，社會主義從未有過出頭的機會。直至工會主義合作運動起來，和自由派勞工（Liberal-Labourites）所持的毀毀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a），與壓迫愛爾蘭的政策爲人所不滿的時候，它才重新得到活潑的力量與刺激。然而在那個英國社會主義被忽略的時期中，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却因拉薩爾，馬克斯和恩格爾三位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宣傳家——他們的名字將永與社會主義運動連在一起——之喚起，長足地進展。

三人中尤以馬克斯爲最努力。一八四九年當他來至倫敦時，社會主義仍在像百納衣那樣——當時好意的改良家（他們確曾以他們的觀點，正確地診斷過社會的病源，獨惜他們只欲坐待以建設性的救濟計劃，去剷除他們所欲剷除的罪惡。）拿出一套『雜然紛陳』的理論。

馬克斯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問題。他乃是頭一個主張國際主義的人。在去世之前，他更完成了對於社會病理和治療方法底科學的正確解釋。

麥克唐納說：『現今馬克斯的名聲，幾乎和耶穌基督與摩罕默德一樣地廣播于世。』這話或許是真的。『他的地位和那幾位教祖任何一位都差不多可以并駕齊驅。』（註一）但是，除去宣傳方面的工作而言，不論馬克斯在現今國際中底影響的程度是怎樣，其地位決然不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信條說得明瞭中得來。

雖然社會主義者的領袖人物曾對我說：馬克斯的著作已被認為經典。但，除了那些因為對於他的著作解釋上不同，長年從事派別上的激烈的內訌的人之外，他的著作大部份仍為人所未讀。

馬克斯和列寧在這一點上是相近的：從他自己一個人的思想中，構成一個縝密周詳的哲學；這個哲學包括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底一切智能，為他的擁護者所公認。然而，列寧在這一點上却勝過馬克斯：列寧所採的以共產主義征服全歐的方法，非常簡明，——假如實行時沒有那樣容易——而馬克斯之資本論，對於資本主義如何剝削工人底科學的解釋，其中包含關於價值的定義和價值產生的法則，便用三本厚冊去解釋，還是未能令人得到滿意地明瞭。

麥克唐納認為「他的（指馬克斯）經濟學說是很可疑義的，他的歷史哲學也在同一的地位。」（註二）然則在其死後將五十年（著者作此書時係一九二九年。譯者註）的今日，他還能支配社會主義的思想，其緣何在什麼地方呢？

麥克唐納企圖答覆這個問題說：「他是第一個人給各種工人一個希望，說只要採取某一種方略，他們便可以得到自由；而他替他們制定的方略又非同尋常，能够煽動他們的精神，能够迎合他們的知識，他們的作戰計劃一方面使人期望豐富的戰利品，一方面煽動對敵人的背目裂髮的激憤心，所以能够激動工人們最大的戰鬥熱度。」（註三）

這使那個在英國圖書館裏博覽羣書，以致面皮日漸黃皺底卑微的異邦人博得世界榮譽的新理論，究竟是什麼

呢？（英國圖書館，的確是選擇來計劃世界革命最適宜的地方。）

馬克斯底資本論的基本理論是說：『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但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不能得到它所創造的價值做報酬，只是勞動力在市場上當做一種商品的價格。』（註四）而那價格的決定，『據馬克斯說，『又是依現存的經濟法則，總是剛够維持工業所需要的勞力。他叫做『工資的鐵律』（Iron Law of Wages）。這樣，資本便侵蝕了那原屬大眾的工業剩餘產物，富者愈富，越更使於剝削窮苦的人，勞動者愈貧，越更無能防禦剝削。』（註五）

與此剩餘價值說平行的，還有一個馬克斯叫做『經濟定命論』（Economic Determinism）的理論。

麥克唐納說：『馬克斯和其他許多非社會主義思想家一樣，發現出這樣一個道理：一切歷史現象，不論牠們的表面性質是怎樣，終局是要歸源於經濟的原因。馬克斯用這個理論和那剩餘價值的經濟理論，來解釋現存制度的歷史的經濟的進化。資本私有制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決定了各種國家制度的產生和進化。戰爭的起源是資本主義，宗教改革一類的宗教運動，究極也是由於經濟的原因；世界和世界上人民的生活，都是受這種經濟力量的束縛；工資奴隸制和家奴制只有種類的不同，沒有性質的差異。』（註六）

註一：麥克唐納著，彭學沛譯：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面五十二。

註二：同上書面五十二。

註三：同上書面五十三。

註：四、五同上書面五十五。

註：六同上書面五十六。

這樣，馬克斯便把這事件，要求以國際運動的方法，去推倒各種基於私有財產而來的阻礙，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這包括無遺的國際主義，和相信不論在英國、在日本或在中國的人們，都被同一樣的經濟問題及其濫用所壓迫的信仰，同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裏，用着煽揚的語調，用着集合出發的號聲發表出來。

馬克斯說：「人類已往的歷史便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現今是無產階級起來反抗那從推倒封建貴族主而奪到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時候，資產階級要維持它的政權，它必須壟斷世界一切的市場，不斷地去變革工業的生產秩序。

「它的工具就是資本的集中，它的方法就是自由競爭。它沒有感覺，也沒有文化，」——我現在抄述麥克唐納寫的一段結論——「它使人類與死板的物質環境相對敵，以求他們的生存。但，無產階級的勢力隨着資產階級的勝利伴進。小資產階級跌下來與勞動階級攜手；勞動階級一羣一羣的趨集都市，知道了自己人數之衆多，力量之偉大，進而組織起來；在政治方面和產業方面，和資產階級相碰撞，愈發顯見出階級之衝突；這樣時候逐漸到來，資產階級的一部份，受了思想上的推動，離開了他本屬的階級，歸隊到無產階級裏面；結果，這無產階級的運動，愈漸明白它自己和它存在的意義，勝利便不可避免。就全國說來，它的勝利便不是一階級的勝利而是階級鬥爭之完結。」（註）

其 Socialism, 1907, pp. 44-150

宣言裏繼續確定一個如下的綱領：私有土地權之廢止；漸進之所得稅；財產所有權之變更，例如：國家信用之集中；運輸工具之國有；生產，分配上國家支配之擴展；全民強迫勞動；改造工業，使城市與鄉村溶為一工業單位；免費教育；童工之廢止等。

宣言裏還有數段，這裏不便牽及（有興味的讀者，最好找全文來看）。結尾的幾句，用奔放的詞藻，深入那無千無萬的在爭鬥的社會主義旗下的人們：『無產階級除了錄詩之外，無所損失。他們有一個世界可以克服。全世界的勞動者團結起來！』

為避免讀者的混亂起見，這裏需要一個解釋，就是：這宣言發表的當時，我們現今所知道的社會主義，他們常認為是共產主義。所以馬克斯便企圖預言社會主義向着世界政權演化。

假如是那樣，一個人如何能够一面忠實地主張確信階級鬥爭之預言的馬克斯主義，另一面接受不僅反對革命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直接行動底議會演進的理論呢？

誠然，投票箱與馬克斯理論不易於混和在一起。同樣，高呼讚美馬克斯之名的人，多不是因為對他的理論全部了解，也不是因為全部同意，只因爲擁護馬克斯，似乎是正統社會主義者必行的教儀之一，或者是對那『能把一種空洞的希望變成一種勇壯的確定的運動底想像力和洞察力』（註一）的一種讚許。

麥克唐納這樣地把社會主義領域中最引人注意的人物歸納起來說：『他用強大的觀察力把握到真理，所以縱

使他的算理的解釋不能成立，只剩下些希望的殘灰，但是那真理依然是生龍活虎，馬克斯比馬克斯主義更偉大更永久。這話他自己也知道，據說他有一天被那些門徒們和自稱門徒們爭吵得生氣，他說道：「謝謝上帝，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千古不朽的不是馬克斯主義，乃是馬克斯。」（註二）

註：一、二、麥克唐納著，彭學沛譯：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面六十一。

一八八一年，美國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乏一書未行世以前，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仍為共產黨宣言裏的理論所支配。

亨利佐治之書發表時，正在政治問題一度沉靜，而貧窮與工業問題重新引起論戰之注意的時候。這本書之出版，不僅是麥克唐納政治旅程的開始，而且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新時代的開始。這一個運動，在過去數年間，急激的發展以至於今日，還沒有達到它的頂點。

三年之後（一八八四），大概正巧在麥克唐納出發赴倫敦的時候，海德曼創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叫做社會民主同盟。這個團體是另外幾個目的大同小異的團體的先驅。同年，費賓社也成立，明言以指導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為目的，并開動它那分散着的十字軍，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羣智識界的十字軍，以有秩序的方法向獨裁者攻擊。同時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又開始第二期的運動。關於這運動，麥克唐納說：「它給與聖馬太基爾特（Guild of St. Matthew）以活動的生命。（聖馬太基爾特成立於一八七六年，為民主教堂會（Democratic Church Society）之）」



這種一時激發的活動，如同時在政治上沒有一個重要的轉變，也必隨歐文與社會民主同盟之間的多個似乎有進步的時期，一樣消滅下去。十五世紀之初，自動地採納歐文主義的自治團體，僅能在日常生活上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在仍未脫離專制國家的情形中，唯一可行的途徑。）但，迄世紀之末，民主的選舉權出現，便產生了一個新的武器。藉仗這新武器的力量，社會主義便可以用新的方法來實現。麥克唐納抵倫敦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已不再徘徊在歐文式的分立自治團體底限界裏，當時他們的工作與宣傳影響及麥克唐納的，已經是如何藉全體選民的擁護，以獲取政權，以實現理想的計劃。這樣，在地方的與全國的議會中要求地位，甚且支配的地位，從議會中制定生產與分配的方法。謀在一個地方試行社會主義的時期已完全過去，現在已是希冀在全國實行的時候了。

然而此時社會主義者的工具仍未足以為開始獲取政權之用。開始的時候便出了各種錯誤的步驟——假如沒有錯誤，它是會令人驚奇的。

正在社會主義推進它的勢力時期中，麥克唐納論及他所屬的團體說：「社會民主同盟對外交的先見，空論和批評，從不符合英國實際的情形，甚至最能依英國演進的程式去採納社會主義的費賓社，也從未能於當代的政治運動中實行他們所持的社會主義，更從未討論如何組織羣衆，使他們宜於推進社會主義立法的問題。」（註）

註：Socialism, 1907, P. 50

到這個時候止，還沒有一個把這些社會主義團體與偉大的工會運動聯結的企圖弄成功。可是，明顯地這是變

取政權的第一部，因為社會主義團體與工會合作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無異是將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運動底堅實的力量，增加在社會主義方面，而政治運動反過來，也彌補了工會實際上的缺憾。這是組織工人和使每年舉行的無能的工會年會成爲堅固的壁壘的方法。（已往工會的年會，除掉通過一些決議案『交付團員施行』而外，便無事可做的。）

麥克唐納因爲具有預見機會之來臨底銳利的智力，很早便計劃與別的團體聯合，把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作，集中在聯絡工會上面，以建立一個基於共同信仰的新政黨。

與最後斷然的步驟有關的，還有如下的幾件事：地方工黨在布刺德佛德（Bradford）曼徹斯特等城中紛紛興起；倫敦碼頭罷工乃其繼起的所謂新工會主義（New unionism）；一八九二年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中小數人反對大會爲自由黨份子所支配等等——因爲這些事件連續地發生，工人們才取了斷然的步驟。

這新政黨的誕生再也不能延遲了。勞動者既一旦有了政治的意識，也就走上了絕路，非有新的方向不可。勞動者需要徹底的改革，這些改革又非從兩大執權的政黨中所能獲得。另一方面，現存的社會主義團體中，又沒有一個似乎有鉅額那足以聯繫工人與思想家於實際同盟中的鏈環底可能。

在這個社會主義危機四伏的時候，却有一個新領袖起來，以指導和推進這個運動；引它脫離大陸的思想和口吻，使它成爲獨特的英國的發展，根據英國的情形決定適合國情的方案。這個英國社會主義的路德（Ludlow）就是哈定。

哈定乃是一個最初代表工人出席下議院者之一，是頭一個非但不藉保守黨自由黨的擁護，同時非而反對之，獨立地完全代表勞工派而勝選的人。一八九二年工會大會在格拉斯哥舉行時，那些認為必須尋出使有組織的勞者信仰社會主義和與社會主義團體合作之方法的人，另外舉行了一個祕密會議。

會中決定為達到這個目的計，必需有一個新團體。那些可以被稱為新派社會主義者的人們，更決定不再遷延地立時實行。翌年，這小小的一羣，復在布刺德佛德舉行會議，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於是隨着那個會議而誕生。

近年有許多苛刻的言論批評獨立工黨。其中不少還是當年最初加入的人和其忠實的擁護者，例如腓力士諾典（Philip Snowden），他們退黨來表示他們對於獨立工黨後來的活動底不滿。連素被稱為獨立工黨頭髮斑白者的麥克唐納，也不再以獨立工黨代表的資格出席工黨（Labor Party）年會。他因為充任國會工黨領袖的原故，也就常被舊日的同僚們貶責。一九二八年發表的馬克斯頓——庫克（Maxton—Cook）宣言，就是最近兩組織間目標分歧的一例，該宣言的目的是強迫工黨執行部施行一個更勇敢的政策。

凡是稍明白現代社會主義的人，都得承認獨立工黨之存在直是年代錯誤的事情。因為現今獨立工黨只是一個單純宣傳性質的團體，而他們大部份的宣傳，又是專以窺阻目前指導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領袖為目的。不過，不偏地說來，則在哈定領導之下，和在麥克唐納早期積極參加時的獨立工黨，確曾對社會主義供獻過有價值的勞績，例如引導社會主義團體拋棄那些從外國傳來的最後殘餘的影響，和發揚英國獨特的與適合英國人性質的

政策和宣傳等。『漸進是不可避免的』，這衛布的名言，實始自獨立工黨建基於演進之上，而非於革命之上的時候。

獨立工黨之創立，是社會主義演進中第三階段的開端。第一階段是歐文主義，第二階段是馬克斯主義，這新的第三階段，因為它有一個立刻可行的家喻戶曉的綱領，所以很站在優勢上面。『讓一切的勞動者們到議會去罷——讓他們自己動手，從事為勞苦的人們奪回從勞苦中得來的結實底工作罷。』

以上所述的英國社會主義史，乃是逃至麥克唐納最後掉頭不願地掉棄了與自由主義合作的一切希望，而致其全力於助成獨立的，替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黨之創立時為止。

麥克唐納傳

三六

#### 第四章 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 (Margaret Chatsworth)

一八九三年，麥克唐納也不再沒有朋友了：一方因為當拉夫的書記，得和許多倫敦人士交接；同時以費賓社及社會民主同盟會員的資格，復獲與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來往。這些先驅者正如麥克唐納一樣，都感覺得他們在向著那能使社會主義公開地向舊的正統的政治理論挑戰底用途中前進。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從不乏才華燦爛的脚色。費賓的辯論與集會，對於一般熱心不及麥克唐納的青年，既都能予以良好的政治教育，對於滿腔熱誠的麥克唐納，自更不待言。他此時業已顯露出蘇格蘭人的特性——歡喜研究大思想家的思想和聽取他們的言論。但確切一點說，則他底思想發達之主因，乃是他讀而不厭的屏習。

有一個時期，他被那個與多瑪德衛孫教授 (Professor Thomas Davidson) 有關係的新讀會 (New Fellows' Club) 所吸引，但那種吸引力并不長久，因為當時麥克唐納已經厭棄抽象的理想，只熱心于那些具有絕對實際目的，並且具有衆目可見的結果的團體。在新讀會宣傳的『個人道德之修養』(The Peaceful Perfec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中，他却找不出希望中的答案。

青年人與理想和熱情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往往除了開會與辯論之外，不久便需要另一種的表現方法，叫人們認識。

麥克唐納因為當倫敦著名自由主義者拉夫的政治秘書，所以和許多報社接觸。他于是便開始寫稿，其文筆之才也就成了一個有用的大道：一面得藉此以播散他的理想。同時復可以獲些收入。結果，一八九一年當他辭去拉夫祕書底職務的時候，他即轉就星期快報（Weekly Dispatch），從事筆墨生涯。在政治之外，加上一個新聞記者的事業。

後來在週聲報（Echo）也任了一回事。（週聲報是愛德華滋Pasmore Edwards創辦倫敦晚報，早已停版。在週聲報及每日新聞（Daily Chronicle）上，他長期的選稿，同時非常寫稿投寄各方。

上面我曾說過，「天意」原要見麥克唐納做一個作家。他底美麗的散文體和驚人地澄清的表現文筆，實與生而俱來。人們現今疑惑，不知那些發表他的文章的報館，曾否按其文章之價值而加以欣賞，大概那些編輯者，假如今日尚存的話，也許要說，當時已發見他的天才底火花，并曾加以鼓勵。事實上和他交接的朋友，或者有些真的鼓勵過他，但是他底不可克制的意志，他底不可撲滅的精力，才是使他能不顧阻礙、失望、貧窮與疾病而從事文字生涯的原動力。

一次，他在倫敦新聞記者俱樂部對新聞記者演說，他述及那時的回憶。

他說：『我所憶及的編者，早至于福克思勃倫（Fox-Dourne）夫勒拆（A. E. Fletcher）和葛拉克（William Clark）諸人的時代。那些真是偉大的日子：勞苦，勤學，晚睡，早起的日子。工錢雖很少，但用時所得到的愉快卻很大。我常帶着滿意的心情，去回憶那些過去的日子，因為後來再沒有別的經驗能給我更多的快樂和更

大的空舉。過于我第一篇社論在《倫敦報》上發表時所得到的。」

在這個從事新聞記者的插幕中，有一個新的時期，他曾任獨立工黨勞工領袖（Labour Leader）的編輯，並且為全國名人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投稿。

明日之人（*The Man of To-morrow*）的著者說：『由M字以後，都是麥克唐納的手筆。這事足以簡明地顯示出，那時這個赤足的鰥錫矛斯少年，已從自修中得到怎樣地一個完全的博學的教育。』

除掉新聞記者的活動之外，他還為他所屬的各個社會主義團體非常努力地工作。他的努力使他成為獨立工黨中最活動的份子。這頭一個有政治意識而又獨立的一羣勞工者的目的，拿麥克唐納的話來說是：『社會主義，它的方法是團結一切以社會主義為目的和原動的勢力。它反對抽像與教條，它直接命中勞動者每日生活的經驗。』

這新政黨最緊迫的工作，是以政治行動的需要去喚醒各種有組織的工人。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九年間，他們在工會內外舉行不斷的宣傳，結果一九〇〇年組成工黨的前身勞工代議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然而在麥克唐納那個不斷地要求勞工需要有自己的代議士去下議院的意見被接納以前，在工黨推倒了一切障礙而現身于韋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國國會所在地——譯者）以前，還有不少重要的事情在麥克唐納的奮鬥生涯中出現。

他一方為獨立工黨工作和贊助發賣社的時候。同時致力協助他的同名者，住倫敦職業會祕書（*London Trade*）。



es Council) 的詹姆斯麥克唐納 (James Mac Donald)。

這個職業會那時代代表二百多個團體差不多一百種職業，算是在倫敦工人團體中最大而最能代表的團體。它并且是頭一個替那些獨立的，不與自由黨生任何關係的勞工候選人努力的團體。

實際與工人接近，乃是麥克唐納的力量底主要源泉，他具有洞察入微的力量，深知維持生命之任何要素，對於黨中低微黨員之影響。正如林肯一樣，他從民間來，也就仍「屬於民」。同時這也值得注意：一千八百的九十年代中，他最大的努力不是為的費資社，而是為的獨立工黨和倫敦職業會。因為費資社的集產主義信條，帶着濃厚的搖籃和統計一類的氣味，無與于人道，使他不能十分滿意。在工黨未組成之前，麥克唐納的格言可以說是一：「人道勝于財富，權力或榮譽。」

因為拿着這些意見，所以他很敏捷地便明白：要在倫敦并且在美國推進社會主義，第一步實際的工作，乃是要說服職業會，再進而說服工會大會，使他們拋棄不管政治的觀念，轉而擁護一八九三年哈定在布刺德佛德 (Bradford) 已開展其戰鬥旗幟的獨立工黨。

非待得到職業會和工會大會的擁護，獨立工黨不過是一個僅有領袖而無固結的選民以殿其後的政黨。雖然勞動階級已在騷動不滿與熱望改良。但是也非待至工會領袖們從事整列他們，以他們的選票擁護勞工候選人之後，要想動搖議會內保守與自由兩黨堅實的陣營，向全國普遍地宣揚勞工的福音，和通報議會政治新章的開始，均無多大的機會。

一八九三年（獨立工黨成立之年），哈定以己西哈訥（West Ham）代表的資格重入議會。兩年後總選時，獨立工黨更推出了二十八名候選人，麥克唐納也在其內。他頭一次企圖以掃桑波敦（Southampton）勞工候選者的資格入議會。

麥克唐納在那回開始競選的那篇演說，代表他在政治生涯開端時所持的主張。那時他才只二十九歲。

他說：「總選日我所持的主張與綱領，可以簡括地敘述如下，請各位批評。當我發覺自由黨不是準備着勇敢地去解決目前最迫切的麵包與牛油問題，——即是貧窮問題，束縛生命之發展和製造勞動者窮苦與犯罪的根源問題——我便不再信仰自由黨。我們要求的勞工政策，既非保守黨所具，也非自由黨所有。他們都不能解答何以掃桑波敦之屋租日漸漲價；何以那些勞力的店員和工錢生活者，從城的面積增大中僅得到如此微少的利益；何以失業者之困苦日益嚴重；如何去應付這全世界採用的機器。這機器原是要使勞動舒服些，但在實際上，它目前正開始剝奪勞動者工作的機會。」

麥克唐納繼續說：「按我們想，這些問題只有一個簡易的答案。就是因為那些專利者私有了掃桑波敦的土地和房屋，強收高漲的不勞而獲的房租的原故。」

「所以我主張土地國有；在目的未達以前，立刻開始徵收企業之額外盈餘和天然地利之收益，以為地方之用。」

「同時我主張鐵道和鑛山的租金也歸國有。」

關於工業和工業問題，麥克唐納那些簡括的建議，（其中不少定然驚駭了一八九五年時代的掃桑波敦良民。）現在仍錄在工黨的綱領中。

「機器之發明必須繼續。其對勞動者之危害，祇是當它被那些勞動者的利益相反的人所操縱，和被那些祇願利用它來從事無理的競爭的人所把持的時候，我們如要受到發明的利益，只有採用前回工會大會的決議案」即是生產，分配，和交換等工具之公共管理，為達到這個目的，並為解救現存社會制度中某幾種較嚴重的罪惡起見，我主張：

「八小時工作制。

「一切勞資契約均須施行澈底的僱主責任法案。

「修改救貧法并及于養老金。

「較澈底于愛司癸士（Asquith）的工廠法。

「失業救濟策，應行勞動直接雇用制，政府雇傭適用工會條件，使政府成為「事實上」的模範雇主。

「廢止連密的房屋，酒賣布營。

「漸進的所得稅。

「廢止早餐捐。」

關於政治自由方面，麥克唐納主張如下：

成年人之選舉權。

廢止上議院。

愛爾蘭，蘇格蘭，英格蘭和威爾斯各設自治政府，而以帝國聯合議會統一之。

選舉用費，議員用費，均由國家給與。

修改註冊法 (Registration Law)，其要點如下：

(1) 廢止寓客無選權之限制。

(2) 三月之居住期。

(3) 選舉區與選舉區間之移住，有繼續請求註冊的權利。

(4) 設置公共註冊官員。

麥克唐納結語對選民說：『要實施這個綱領的要點，議員們必需獨立不受牽制。停止資助威爾斯英國國教黨及地方否決權案目前所以有行將通過之勢，乃是因為贊成這二案的議員們有獨立行動，不受他們所屬的黨底操持的傾向之故。因此：如果你們只把受黨指揮的表決機器送到議會裏去，不管他們持的是什麼綱領，結果他們必將被迫犧牲了他們的聲音，以求黨的便利。現下許多事情都沒有確定的標準的時候，同時人們對從前較進步的政治家的信用和健全，愈來愈發生不斷的疑惑的時候，你們在掃桑波敦所聽到的：「黨！黨！」這種呼號最足以危害社會的進步和良好的政府。因為保守黨和自由黨均已敗壞不堪。我以「主義！主義！」的口號來回答我的敵

人。我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我是「勞工派」——對我和我的綱領負責。你若選我入議會，我必按期將我的工作直接報告給你。

我宣誓，我純以保護你們的利益，推行我所信的政治主張為目的，決不投反動的票以擁護任何閣員——不論是自由黨的或者是保守黨的——，但視政策之本身價值而予以擁護或反對。更不論其提議者為何人。」

在仍為保守自由兩黨所支配的選民之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勇敢的綱領。主張社會主義為目前實際的政治信條的人，在當日的掃桑波敦決無得選的希望。因此麥克唐納也終歸失敗了。他只得八六六票。我們對於這個數目也僅需要一個註解，那就是這個數目已足驚人。因為除了哈定和多瑪士卜提(Thomas Burt)二人得選而外，其他諸人均落選，只有幾個得較多數的擁護者，覺着前途還有希望而已。

麥克唐納對於這回失敗并不憂慮，因為在下議院之外。他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他常常離開他稱為「家」的倫敦寓所，為新黨而宣傳。

他在倫敦之外的第一次遊行演講，聽講者當屬寥寥。因為他選定的工作範圍是南英格蘭，以多維(Dover)為中心點。我們知道南英格蘭迄今仍是社會主義難於發展的地方，在那長久歲月之前，這個先驅者那裏可以有多大的希望呢？

如此進入了政治生涯之後，麥克唐納還抽暇為青年俱樂部(Boys' Clubs)工作，并且任新誼會的秘書——這新誼會為前輩急進者的組織，前面曾經說過。至於文字的工作，他也沒有丟棄。他早已開始傾瀉那些代表他政治

信仰的思想明智的作品。這些作品對新黨運動也就有不少幫助。

麥克唐納除了發表了千萬言為社會主義辯論的文字和數千篇的政治演說面外，他還寫了一些非政治性質的小冊。

其中一本叫做道德與民主主義 (Character and Democracy)。這本書是他數年前在倫敦來斯安教堂 (Laysan Mission) 的演說詞底轉載，大概與他最密切的朋友也把它忘了。

演詞中他力言道德之重要，

『道德——人類持此以在經驗中判別善惡；持此以與偉大之過去相連，以負未來之重任。道德，人類持此以活潑他的生命，使過夫一刹那之來，不是為它自己而來，不是過去了便過去了，乃是無窮中之一偶然；乃是要在無窮中產生果實，永不失去，永不遺忘。道德，人類持此以自識，不為無責之人，而為具人性之人，為神之代表，復隨年代之增長，人性自完為神性。』

這種認人類目的之崇高底觀念，乃是麥克唐納生命之一要素，他從赤腳之童年起，便固執着如今向衆宣說的理想。把麥克唐納看做一個政客，忘却理想主義的他——深情而銳敏的他——是不會明白他的真性的。

前章中我曾述過使麥克唐納成功為今日之麥克唐納兩個連環偉力之一：蘇格蘭人的血統。

如今另一偉力又起來支配他的生命，鼓舞他，慰藉他，並且為他精神上的伴侶，現代紛擾之世界所難遇的伴侶。他遇到了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皇家學社 (Royal Institution) 名化學家與教授之女兒，名科學家克爾文

勳爵 (Lord Kelvin) 之姪女。後來也就和她結婚。

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乃是貴族婦女中受了內心的推動，嚮往有閒的愉快生活而贊助社會主義的一個人。麥克唐納頭一次聞她的名是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在聖多瑪醫院 (St. Thomas Hospital) 的時候 (那時他當獨立工黨掃桑波救的候選人)，在醫院裏。他接到一封不認識的署名葛拉德士吞的信，信內并附有幫助他選舉運動費的捐款。

數年之後麥克唐納在她的日記裏發現這樣的一段話：『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到麥克唐納的第一封信。』那就是麥克唐納對她的捐款表示謝忱的覆信。

後來，麥克唐納參加先驅者俱樂部 (Pioneer Club) 舉行的社會主義辯論會時，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也在坐。他因病稍息的時候，她也再寫信給他——當時她是新成立的婦人工業會 (Womans Industrial Council) 的勤懇工作者——此後他們便相會了。

馬加勒特麥克唐納曾述及她的家人頭一次見到麥克唐納的情形：(麥克唐納無畏地熱烈地提倡時人認為冒險的事業引起了她的興趣。)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馬加勒特和她的家人圍坐着，不耐煩地等候麥克唐納。

她的家人原很疑惑，以為接待社會主義者為不智。因為那時禮貌的上流人還不屑談社會主義。

麥克唐納終於在這些陌生的人中帶着笨拙躊躇的態度來臨，但結果，他以他的真誠和豐富的識見感動了他

們，如感動了馬加勒特一樣。我想馬加勒特的家人從未論定這個目光閃閃，黑髮而剛健的蘇格蘭人，究竟是一個暴徒呢還是一個天才。

然而，無疑地，他們不滿他的政治活動，始終加以反對——雖則通常都維持雙方的尊敬，但有時却足以使馬加勒特鬱鬱不樂。

及後他們訂了婚。一八九六年當麥克唐納三十歲時，他們便結婚了。婚後卜居在法學院林肯廣場三號(3, Lincoln's Inn Field)。那些有名的茶話會也就成為新黨得未曾有的社交，自馬加勒特死後，便水無可代替了。

他們的結合將永留為理想婚姻的例證。馬加勒特葛拉德士吞使這社會主義底不倦的奮鬥者得到一種新經驗——家庭的經驗和個人的快樂。她如她的丈夫一樣，也致力於勞工運動，為她心中所抱負的目的不斷地努力，所以有人竟謂麥克唐納的家乃是「檔案和小孩的混和。」

他們的結婚，自始至終，正如生命的詩一般。她死後遺下一個髮辮的父親和五個孩子，孤單地留在世上。「破偶像者」說：「馬加勒特之手撫揉着這為理想而勞苦不息的人底嚴酷，醇軟而甜蜜了他的生命力。」

他這新獲得的快樂和侶情，對他的意義怎樣呢？在麥克唐納致他夫人底美麗的敬念中，他說？

「從重負與顛波中回到她身旁，就如躲避在風平浪靜的避難港中。仰天開顏一樣，在疲倦與乏力時，在受了打擊和挫了銳氣時，在想着撇開了一切徒勞的爭鬥，回去自己的家園時，我便願挾着她向巴京汗州(Buckinghamshire)的老家奔馳。那兒她將會用她愉快與不變的信心醫療而撫慰我，鼓勵我再上勝負不常的前線。我自己也



不能確說英國勞工運動之不穩，有多少是由於她的緣故，外人更不必論了。」

被這樣完美的侶情鼓舞着，年紀才只三十歲，便已經是社會主義運動中頭角嶄露的人；雖非富有，畢竟窮坐的日子已屬過去；同時更充當着正在激蕩全國人思想的運動底一個國會候選人——無怪乎（一八九六年）他們是帶着輕快感恩的心情，赴加拿大蜜月旅行了。

這是麥克唐納漫遊異地的破題兒第一遭，可是他們仍不放過考察當地勞工情況與政治的機會。這原是他們同具的特性。

加拿大的旅行是他繁忙生活中的插幕。他帶着休閒興奮與激勵的精神回來，以應付連續不斷的輿論的襲擊，并幫助工黨隨生的工作。

## 第五章 工黨之誕生

一個人當着挫折與磨難的時候，而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信賴，那算是幸運的事，工黨所負于馬加勒特麥克唐納的，祇有那幾個曾經參與初期運動的人，才能够正確地計算出來。在麥克唐納從一個無名的社會主義戰士，進而為一個知名的人物底關鍵時期中——有時他被人憎惡，有時却受人尊敬——鼓舞和獎勵他的，就僅有馬加勒特麥克唐納而已。

麥克唐納他自己，或許也不會想到那樣快就會成功：從加拿大蜜月回來，他參加頭一次大團結的努力，結果，三年之後，工會運動者便與社會主義者聯盟起來，產生了一個政治上新的力量。

在沒有說到工黨的前身勞工代議委員會的歷史之先，我們還得說及馬加勒特麥克唐納之為人，和他們在法學院林肯廣場三號居住時的情形。

雖然麥克唐納即令沒有受馬加勒特的影響，在歷史上也當不失其為一個著名的人物。但是因為他底初期的苦鬥，和不斷的受譏議與反對的結果，他或竟會是一個性格嚴酷與容易苦惱的人。不過有馬加勒特在，他便懂得怎樣不怨不移地去對付外來的誹謗與反對。

真的，如果麥克唐納沒有經過那些鍛鍊的話，他的政治生命，便會很不名譽地在一九一四年斷喪了。一九二

二年那裏還有命運之神來歡迎他，那裏能從咒罵與厭厭的泥濘中翻身，回復黨的領袖的地位和得到黨的羣衆的擁護；更那裏能進而以平民資格榮任首相呢？

當他們初相遇的時候，他也正如許多青年人一樣，生活很艱苦，很有變成苦惱，極端與武斷的危險。但是馬加勒特改變了他的人生觀；痛苦的時候，她慰藉他，憂鬱與過勞的時候，她鼓舞他。她早期的生活，使她適宜于未來的境況；在兒童的時代，她的家人在諾定山（Notting Hill）上的一個教會服務，她也隨着在廚房裏幫忙，（在那個時候，自然沒有失業津貼）。這樣，她便得與貧苦人們接觸，也就明白了貧苦人們的生活。

後來，她由叔父的介紹，參加救世軍的工作，她這樣地說：『那些集會很有趣，人們在其中感悟各自對上帝的愛和對他的崇拜。會中重復與單獨固所不免，但從它的結實來說，救世軍實在做了許多好事，它的會員，據我看來，也是很熱心和不屈不撓的。』

一八八九年，當她在倫敦聖馬利教堂（St. Marys Abbots）的主日學校任教員的時候，她對於社會工作便得到了實際的經驗，後來也就畢生致力於此。不久，她每星期還拿出一個晚上的時間，去辦一個青年俱樂部。

麥克唐納在她的傳記裏說：『那些兒童是頑皮的，她只恨自己的教法不好，對待他們還是非常慈愛。有時，他們和她一道回家，有時請她吃點心，他們常對她述說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朋友。她也探候他們和認識他們的家人。』（註）

這樣的一個教育溫良的女子，後來和貧窮的人們更加接近。公開地對社會主義表示同情的種子，同時也深深埋藏着了。

她從實際上愈知道貧窮人們痛苦的生活，精神上所受的苦惱便愈大，也就愈肯拿出時間去從事社會工作；她曾借一個學校的管理員，不久又任倫敦區看醫院的幹事。

麥克唐納這樣說她：「在一個失業擾亂爆發的時候，她在日記裏寫着，曾去塔山（Tower Hill）聽那些失業呼號的演說。她的態度改變了。看醫院裏面的病人，尤其吸引她的注意。她探候他們，照料他們，靜聽他們的身世，並且在他們之中，覺到無所不在的人類的靈魂。」

一八九六年四月，她加入了獨立工黨，從那天起，她便全力的去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她把人生的目的，很簡括地這樣說：「倘如我的腳是站在公正的路上，我的臉是向着『美麗之門』，那我就滿快樂了，雖則常會跌陷於泥濘裏，和迷惑於烟霧裏。」

她是一個最仁慈的人，把自己供獻給勞動階級運動。這事從所未有，也將永不會被人忘却。她的愛更引導她的丈夫，超越過許多困難的年頭。

初結婚的幾年中，他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倫敦的家庭裏。後來，他們在拆善林（Chesham Bois），租了一間小屋，在馬加勒特死前兩三年間，他們差不多都在那兒度過他們的星期六日。

這麥克唐納得着機會讀了許多他愛讀的書，並實行了他自己的哲學：「真正的快樂，在我們純樸的慾望

中，不在多量的財富裏。』

理查槐亭 (Richard Whiting) 在他的新時代之影響 (Ring In The New) 書中。用小說家的透斷的文筆，去描寫他從事籌備新黨努力前程時，他們家庭的生活。他述說完哈定 (作者呼他爲『勝利的使者』) 以後，他繼續着說：

『勝利的組織者和一個蘇格蘭的兄弟攜手，這兄弟是蘇格蘭高地 (Highlander) 的種族，而兼有低地的人生觀 (譯註) —— 這二人之攜手，最是強頑可懼。他是農家的子弟，僅受過鄉村裏教師的教育，或許還是赤足去上課的。我知道他們住在倫敦的時候，他的兒子們，也赤足在街上跑，以鍛鍊他們的身體，他們真的像強健的小天使一樣跳躍着。後來他在格拉斯哥習文學 (註)，在倫敦辦報紙，最後他很快樂地和當時的一個最優秀的最美麗的女人結婚——你們既都是社會主義者，不然，也可以藉憐憫與愛心來栽培的。』

譯註：蘇格蘭高地 (Highlander of Scotland) 卽住蘇格蘭高地的人屬色特勒 (Celtic) 族。蘇格蘭低地人屬條頓 (Teutonic) 族。

註：作者是誤會了。麥克唐納從未有在格拉斯哥研習過的。

『他把他的同志組織成功一個堅實的競選團體，訓練他們，編配他們，并且與別的著名的和他們始終合作的團體連結起來，用互助的方法，去接濟他們。共圖目的之實現。他是何等偉大的一個勞工呵！日夕四方奔馳，他的旅途真的沒有止境。有時因着特別的任務，遠遠在田野中。』

麥克唐納原可以得到大量而且日漸增多的收入，如果他以著作爲主政治爲副，做一個新聞記者。這樣也是很合理的，因爲從事政治活動的原故，弄到他一個錢都沒有。不過，他之消耗他的精力於政治上，正是他對於他的信念的忠誠與盡力的好憑證。

他們的生活很簡單，毫不奢侈——其被目爲奢侈的，只是倫敦城中的家庭而已，但是這個却是因爲方便於工作而置的。他倆都很歡喜步行，并且歡喜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小山底小路上散步。劇場從不會引起麥克唐納的注意——直到現在他也是很少到那些地方去的。但書藉却是他們最大的奢侈品，然而有時依然是向別的富有的朋友處借來。此外，他們的生活是勇敢的生活，他們獻身於勞動者獨立的政治組織的工作；并且不斷的力學，以準備去應付還沒有完全成功的事業。

麥克唐納的學識是沒有限界的。從前有一段故事，說是有了一個美國的工程師，在歐戰時候到英國來，要求見巴爾福勳爵（Lord Balfour）他要看看他能够說一些什麼話。誰料這個老練的政治家，接着就討論着近進步的火車頭的圖樣和結構，那類高深的專門的東西，表示出他對於這個問題的學識，使得那位客人，只好緘默着佩服他。

這樣的故事，實在也可以移用在英國勞動運動中的領袖人物身上。政治，在麥克唐納看起來，并不僅限於某一時能引起公共注意的，或是能够獲選的問題。乃是廣義的政治家的教育。他從不肯放過任何足以增加他的國際智識的機會。

他的思想又是遠在別人的前頭，當勞工代議委員會成立的時候，他便早已計劃好了一個勞工政府的方案。

一八九八年三月，倫敦州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選舉時，他爲哈克尼（Hockney）的勞工候選員，作第二次向選舉人的演說。

那一次他所發表的競選演說。是很有趣的。誠然，那只是州議會的選舉，但是聰明的他，却利用那個機會，去宣傳勞工的主張。

他說：『按我想來，如果我是議會的一個份子，那末，我的責任一定是積極的要推行勞工住宅改良的計劃，比現在的住屋委員會，還要奮力。我主張他們的自來水必需清潔够用；煤氣要便宜，場所和街道要光亮；電車費要低廉，使稠密的地方能夠和公園連接，並且使勞動者能夠居住在遠離人烟稠密的地方。因此，我主張應該由州議會去經營自來水，煤氣，和電車。』

關於教育的問題，他說：『議會支出的教育費，應該嚴格的監督它的用途，使它們的效用，能夠替倫敦貧窮的男女青年，盡量的展開一個出路。如果有適宜的支配，那末，這些經費一定應該使小學，中學，大學連成一起，使任何人都有機會按級前進。』

（說來是很奇怪的，在布爾戰爭（Boer War）之前，所謂太平無事的時候，選舉者已覺得地方稅是很重要的了——然而這是祇限於地主而言。但那却是真實的，因爲他繼續的這樣說：

『負擔地方稅的人，担负得很重，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那原是可以輕減的，但這並不是說，把現在的支

出減少，因為這樣，便無異把議會的有益的工作也限制了，我們要找的是新的收入來源。我的意見，以為州議會應該使國會准予徵收倫敦地價特別稅。』

『土地遺產市特稅，也是一個正常的和有利的收入，市政府全部的財產，也應該為公共事業而用。』

現在我們拿這個徵收地價稅的要求，以與今日工黨的政綱來比對，那是很有趣的，因為他們今日的政綱，還是主張徵收這樣的稅，一面藉此以免除地方稅，同時拿它來供給市政府必需的改良費。

雖然麥克唐納曾得工會主義者的擁護（工會主義者當時由工程師聯合會（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的主幹班茲（G. N. Barnes）領導。），結果還是失敗了。但『勞工派』候選人，每一次的失敗，不過是成功路程上的另一個路碑而已。而且久在麥克唐納腦子裏的那個單一的獨立政黨新觀念，那時已經傳遍到一般人的耳鼓裏。同時他還得到他的同名者詹姆斯麥克唐納和倫敦職業會的領袖們積極的贊助。這時候，僅是勞動階級中最有力的工會大會沒有加入，但他們也很快的相接近了。

本來勞動者企圖參加國會的觀念並不算是新的。一八六八年選舉的時候，已有兩個獨立的勞動者候選人出而競選，雖然結果是失敗了。這兩個先鋒的候選人，一個是後來被稱為爵士的藍達爾格里米耳（Randall Cremer）。他是和平與裁同盟中人，並且曾得到諾貝爾獎金。還有一個是佐治豪厄爾（George Howell），他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歷任工會大會的祕書。

一年之後，新在北明翰（Birmingham）成立的工會大會，把國會勞工代表做它們的主要政策。一八七四年選



舉時，藉仗自由黨的助力，更提出了十三個勞工的候選人，結果兩個得選了。他們中一個是代表摩拍斯（Morpe）的多瑪卜提，他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三年（由羅伯斯邁力（Robert Smilie）代替的時候。），還有一個是在特梭特河邊斯多克（Stoke-on-Treat）獲選的亞力山大麥克唐納（Alexander Mac Donald）。

那個時候，工黨本來是可以產生的了，不過得到國會地位的他們，從不伴要求過完全的獨立，只要保守黨的政府稍為修改了一兩個犯罪律，他們那要為工人們爭取出席國會的代表底煽動便沉寂下去了。

一八九三年，工會大會對於組織一個獨立政黨之議，曾經過一度劇烈的爭辯，但是當時自由主義在工會大會的羣衆中，還是很強固，祇有兩個組合願意實際參加一切必要的工作，例如徵收政治捐和推出候選者等。雖然如此，後來却又增加了兩個工人的議員：代表巴特西的朋斯（Furns for Battersea）和代表西哈謨的哈定，哈定和保守黨同時和自由黨作戰，可以說是國會中頭一個完全獨立的工人代表。

麥克唐納和他的同志底不斷的努力，到一八九九年才稍現曙光，工會大會中未說服的份子底意見才算改變過來。

在那一年，有兩件重要的事情，足以表明麥克唐納生命上的轉機：頭一件是十月三日，他被推為勤司特的獨立工黨候選員，其次是工會大會要和獨立工黨，費賓社，與別的為社會主義而努力的團體，合力促成一個獨立的工黨的決議。

在我們沒有述說到這些重要的事情之先，讓我們看看『祿錫之氓』十年來做社會主義的使者中，其進步究竟

如何。

十年前，他是一個沒有錢，沒有朋友的青年。因為沒有工作的原故，連吃住的問題都不能夠解決，差不多絕望了。但是到一八九九年的時候，他却任了某工會的名譽會員六年，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名譽會員七年。同時他還服務於女工同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並出席婦女工業會的各種委員會。（婦女工業會和馬加勒特麥克唐納是很有關係的。）此外，他並且草擬獨立勞工的第一次宣言（一八九九年一月），以勞工候選人的資格，拚力的競選了兩次——全國的一次，地方的一次。

這些努力的成績，是不容忽略的，因為它解釋明白為什麼在新黨成立以後，他便取得很優越的地位。

麥克唐納從未曾做過樂觀主義的夢。他比一些幫助他的人更加明白，他們要走的旅程是怎樣的遙遠，多少的失望，挫折，與一時的失敗等待着他們奮力去克勝。

他被推為勒司特候選員以後，他在勒司特的禁酒堂（Temperance Hall）曾有一個很重要的演說，他說：「我們決不妄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能一朝實現。但是祇要國會裏面有特立獨行的人，能了解時代的謎，同時具有堅實的信仰，那末，實現社會主義的步調便可以迅速一點。」這個演說，很可以看作是麥克唐納為全國政治領袖所持的目標與政策的一個樣子。

他的魄力非常偉大，當他固守着勒司特，準備參加總選的時候，同時還參加他們在倫敦的更要緊的工作。因為當時工會大會下了一個決議，訓令它的國會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mmittee）召集合作運動者，社會主義

者，工會，和別的勞工團體的代表，開一個大會「以討論下屆國會增加勞工代表的方法。」

這個使工黨產生的有歷史價值的決議底文章，乃是麥克唐納和他的友人們在勞工領袖的辦事處所草擬。由鐵道工人詹姆士和漢茲 (James Holmes) 署名，利物浦船塢 (Liverpool Dockers) 工人詹姆士塞克吞 (James Sexton) 副署提出，結果得到二二〇、〇〇〇大多數投票通過的。

後來他們更指派一個委員會代表工會，獨立工黨和其他的團體，以負責施行這個訓令。哈定，麥克唐納和爾伯納都一起被選。

麥克唐納並且被委員會選為委員會的秘書，負責草擬一個獨立政黨的大綱，以提交大會。

關於這個決議，後來哈定這樣說：「我還記得第一次大會召集以前的時候，我們很是憂慮，因為我們要找一個有品德，而又有才幹的人，去擔負當時最重要的責任——去當黨的秘書。那些平素深知麥克唐納在獨立工黨工作經過的人，都認為他是唯一適當的人選，祇要我們能勸請他擔當這個職任，他必會使當時新生的運動成功；後來經過我們的勸請之後，百忙中的他，還是甘願地再犧牲他的精神與時間，去擔負那個困難而辛苦的義務工作，幫助我們今日這個偉大的運動的進行。」(註)

註：Labour Party Conference Birmingham, 1912.

這樣一步一步地麥克唐納便成為新黨——早在他夢中見過的——的建築師。

他們這些大半貧窮而無名的理想家，竟創造出一個有力的政黨，固已是近代英國政治上值得驚人的偶然之

事。然而與此並美的，還有一件同樣有聲有色的事情：那個著名的討論麥克唐納和他所主持的委員會所準備的計劃底會議。

那個會議開會的地方是在倫敦法靈吞街（Farrington Street）的紀念堂（Memorial Hall）。時間是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堂裏面滿坐着一百二十個從全國各方面來的代表，他們要聽取戰勝資本主義，和爲勞動大眾獲得權力的工人之路！

當時恐怕沒有一個路過紀念堂的人，以爲那裏面的會議是值得注意的。第二天，報章上也沒有記載——社會主義就連被目爲『危險』，而須加以攻擊的地位都還沒有。真的，下議院裏面，祇有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者而已，以陣線堅固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看來，那裏成爲一回事呢！

麥克唐納原可以和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人說個痛快，讓他們明白他們的前途的。因爲他和他的組織計劃，支配了整個的會議，那天出席的人，最少是他自己，已遠遠地聽到將來人們歡迎工黨勝利的呼聲了。

會議中到爭辯激烈的時候，能够指導會衆的，祇有麥克唐納而已。閉會的時候，他被指派爲勞工代議委員會的秘書，這個委員會是由工會代表七人，獨立工黨二人，社會民主同盟二人和費賓社一人組織而成。

這時真是麥克唐納可以驕傲的時候了。在那長期商議的每一個階段中，他都顯示出左右形勢的力量。如今勞動階級運動，到底是團結起來，決心促進他自己的政黨了。困難的時期也過去了——今後先驅的人們，可以取得國內工人最大的組織——工會大會——底大多數的援助了。

不久，這個決議案底背後的力量便出來『初試鋒芒』。勞工代議委員會成立僅僅幾個月，即遇到一九〇〇年的『卡幾』總選（'Khaki' General Election）（譯註）這回競選，委員會推出了十五個候選人。結果得到六〇，〇〇〇的選舉票，入選的也有三個人——哈定，理查柏爾（Richard Hill）——他是鐵路職工聯合會（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的——和約翰斯。麥克唐納却在勒司特落選。

譯註：Khaki原是一種茶褐色的軍服，卡幾總選就是說政府欲藉布爾戰爭舉行選舉，以博國民多數擁護的意思。

但是他依然不屈不撓，他覺得自己還有可以致力的地方，手上還有一個機關足以協助哈定所說的：『使勞工一致地擁護他們的候選人，候選人獲選後，是要更進而合力以解決勞工問題。』——因此他對於勞工代議委員會的秘書職務，還是一樣地竭盡他的心力，毫不灰心。

我們要知道，那個職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代議委員會要應付所屬的各個委員的缺點，列如意見之分歧，和猶疑不決的態度等等。麥克唐納一方面既要抵抗外來的反對，同時還要喚起冷淡了的人的熱心，和鎮壓一切的好謀。這時并且還有不少的工會，仍未願參加這個新的運動。一九〇一年第一次大會的時候，麥克唐納報告會員的總數為四五〇，〇〇〇，代表四十五個聯合的團體，其中最大的一個是鐵路職工聯合會，只是它也就有六〇，〇〇〇名的會員。

委員會全數的收入，還不到二五〇鎊。到第一年的年底，祇剩餘五十鎊。很明顯地，初期的工黨經濟上是很

拮据的，但是他們却能够運用那少量的收入，推出十五個候選人，并且每年還給麥克唐納以二十五鎊的酬金。

局外的人常懷疑着，以爲工黨準備了許多『乾薪』的職位，給與它的職員，因此，我們在此不妨說說每天爲黨服務十四小時的麥克唐納底年中的收入。

勞工代議委員會初成立的四年間，他每年祇收受二十五鎊的酬金，此外什麼都沒有了。這些年中，他從事秘書工作的地方，并且還是在他的林肯廣場家裏。到一九〇四年，委員會年在布刺德佛德開會的時候，這才決議提高了他的薪金，每年給他一三七鎊零十個先令，并且在維克多利街租了一間二層樓的房子做他的辦公處，聘了一位每年一百鎊金的打字生做他的助手。

這是他從工黨所得到的錢了。一直到一九〇六年，當他代表勒司特出席國會的時候，他方才和別的工黨議員一樣，每年得到二百鎊的生活維持費。這項議員生活維持費是由黨員每人捐輸一個便士的特別基金中支付出來，藉以維持做議員的人底生活的。

從沒有一個全國的運動，能僅仗着這樣少量金錢的。同時，恐怕也沒有一個人能够像麥克唐納一樣，完全不爲自己打算而努力於一個主義的。他的前途怎樣，我們此刻雖不能夠知道，但基以他這樣組織的才力，這樣不容置疑的智能，如果他幸而不會聽到工黨和下議院那類的東西，那末，今日他一定已經是一個富有的人物了。

在我們沒有說到一九〇六年總選前幾年之先，沒有說到他頭一次獲選爲國會議員的時候，有一個插話我們須得說一說。

麥克唐納反對布爾戰爭，原算不得是希奇的事。同時我們還記得，許多激烈的份子如喬治魯意 (Lloyd George) 也取的同一樣的態度。不過，後來當那一個更大的戰爭到來的時候，雖然別的人差不多都不出聲了，他還是一樣地要反對，就這一點說，則他這個初次和輿論相背馳的事情，是值得紀載的。

他自始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不僅厭棄戰爭，并且不信任它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因為反對布爾戰爭的原故，他和他的夫人都被費賓社除了名。當時費賓社內的意見，明顯地分為兩大派。麥克唐納所領導的一方面，以為費賓社既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組織，那末，就應該堅決的公然的否認戰爭。另一方面則以韋伯 (Webb) 為首領，他們以為戰爭的問題，不屬於社的範圍，那末，自然就沒有表示反對或者贊成的必要。

這後一個的意見，以有頭腦的人看來，費賓社內也不免有依附軟性的帝國主義的人，如果有另一部份的人，要堅決的宣言反對戰爭，那末，社內自然是要分裂，而且是要開除不少社員的。

在初，兩方面都發出小的刊物，後來麥克唐納這方面，覺着這事有切實解決的必要。於是他們便舉行了一個會員的複決投票，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大多數的人贊成韋伯所持的消極政策。因此，麥克唐納夫婦和擁戴他們的人，都脫離了社籍，不復參加社的工作。(註)

註：關於麥克唐納脫離社籍事，我最近詢問當時費賓社的重要會員蕭伯納的意見。他說：『即使沒有布爾戰爭發生，我們現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麥氏選那種需要他的獨立工黨為他的活動的根據，而放棄那人才濟濟的費賓社，是很適當的。這是他從最執拗的 (Fondness) (譯者按：這是法國歷史上 Fronda 的事

情，他們是很欣喜愛張別人的錯過的。）常常站在反對派的地位，進而成爲能幹的與盛放的議院法學者，成爲工黨裏面唯一能够相當首相的人物的過程中的一個部份。而哈定却是及不到的。」

在戰事期中，麥克唐納夫婦在法學院林肯廣場三號所主持的集會，便成了同情布爾的人底相會的地方。戰後，工會的人員和工黨的人員，也常在那個地方與士賴涅克洛來特(Cronwright-Schreiner)，麥立曼(Morrison)，桑厄(Saner)，克立星爾(Krisinger)和波打(Botha)那些人相敘談。(譯註)

譯註：士賴涅克洛來特諸人均係南非的領袖人物。波打係軍事家兼政治家。

戰爭一停止，麥克唐納夫婦便到南非洲去，視察災區的情況。他們和許多被俘虜的人，討論那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回來的時候，他把經過的情形，寫成他頭一本的書，叫做我所見的南非洲(What I Saw in South Africa)。

那本小書對於當時爭辯的問題說得如政治家那般通曉，所以很出名。下面一段話是描寫曾經戰事劫掠的荒地的情形的：

『遍遊這個新的殖民地，無論何處，你都可以見到戰爭的遺痕，但你却也不能忘記和約上的墨跡，此時還沒有乾。……我們驅逐了千萬的難民，回到他們的鄉間裏。你可以看見他們在鄉村的街道上，靜候着(英國的)善後委員會的好的待遇，從距離鐵路很遠的地方，可以看見他們住在篷帳裏，或者徘徊於他們被蹂躪了的家園和滿生着荒草的田地。困窮與痛苦，然而決沒有一個人向你祈求，更沒有一個人向你恐嚇。你在他們之中，可以很安



全地，好像那兒不會有過戰事一樣。約翰拉斯波格（Johannesburg）與別的一二城市，所流行的街上搶掠與毆打，祇是工人或者是異國人的行爲而已。布爾也和武士們一樣，已把他們的武器放掉，立刻穿上了和平與秩序的衣服了。」

在別一章裏，他說及英國派赴南非調查戰時戒嚴法下的判案的委員會，他說調查委員會從八百個判案中，僅認可了二百個而已。

「其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二八人，可是司令官認爲不公平，不予以批准；一一九人立刻准保釋放；被維持原判案的，僅約二百人，而這二百判案所以被維持者，也只是因爲其中有些是無關重要，有些是快要滿期的原故。細閱這個報告，」麥克唐納批評說：「我認爲委員會的決議底真意，無疑說八〇〇人中，能得到公允的待遇的，實不滿五〇人。」

還有一小段也很有趣的，我們看了它可以知道，麥克唐納當時描寫的文筆已很動人，自從他參加政治的活動後，新聞界中實在是失掉了一個出色的新聞記者。

「我尋踏着新鮮的戰神的足跡，已有好幾個星期了。我喘息着走過了數百里的鐵道，它們都被軍營，戰壕和有刺的鐵絲網所圍護着；我看見路旁遍地牛馬之骨，嗅着草原裏骸屍惡腐之氣；我驅車經過滿目不毛之地，原日羊叫牛鳴，如今却燒成灰燼的牧場；我仰望着煙黑了的垣牆，更遇見含悲忍淚的人家，低首回到他們崩壞了的家園，而白色的英兵，却擠滿在煤炭車與連牛車裏，忽忽地向着好望角，依利薩伯港（Port Elizabeth）和東倫敦

(East London) 凱旋去了。除此一切而外，我還屹立在幽荒的墳頭之上，呵，這兒原只合讓牧羊的人們來徘徊，但是如今呵，在無數的十字架之旁，你却可以看見幼弱的嬰兒倒睡在粗成的篷帳裏。這便是與戰爭相對的時候，你所看見的華麗的情景。」

麥克唐納對於倫敦的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南非的米爾納爵士 (Lord Milner) 所代表的政策，他只有攻擊，此外沒有別的話好說了。他將荷蘭人與美國人在南非洲把布爾人緊壓在鐵蹄下的統治之將來，很簡括地這樣子說：「米爾納爵士所厲行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無論它將來的結果是內戰也好，是荷蘭人墮落為伐木汲水的人也好，其失敗還是一樣地不幸。」

但是歷史不曾把這個預言證明，因為四年後，自由黨便代保守黨而起，而且不久，更給與新南非洲和布爾共和國以廣大的自治權，到歐戰時，聯邦（譯者按：即英屬南非聯邦。）對帝國的協助，也便把這個好的結果顯示來了。

麥克唐納同情布爾的言論，引起了社會一般人的反對，許多醫罵都加到他的身上來。本來他已常常受人家反對的。可是這回却有些不同。他們始終沒有討論過他的態度，究竟是合的還是不合的，實在說，當時也有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贊同他的主張，都承認那次的戰爭，與國家的和經濟的利益均沒有好處。

他同情布爾的主張，一方面使他一九〇〇年勒司特的選舉失敗了，同時還罰他為他自己的黨，多做了六年有用的鋤田的工作。在「卡幾」選舉的時候，真的沒有一個同情於布爾的人能够被選，甚至於喬治魯意很親密的加

拿爾文 (Cah Nelson) 也是落選，由此可以概見當時的情形了。

但是那六年中，麥克唐納對於新的政治力量樹建立之功績，是無可估算的。他把勒司特獨立工黨的支部，弄到非常的堅固，除掉布刺德佛德的支部而外，恐怕他要佔第一位了。一九〇〇年他之落選，恰好使他能够利用那六年的時間，以完成新黨建築的工作，絲毫不受議會工作的縛束。

他曾有三次——最後的一次即在一九二四年——因為担当等於兩個人全力的工作，所以致病。但是他從不愛惜自己。如果他在一九〇〇年當選了的話，那末，他一定是國會裏最努力的一個人，同時對於工黨秘書的任務，也還是同樣地努力。不過，凡是知道議員工作之繁重的人，總知道那是足以損及他的精神與體魄的。

他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六年，當巴爾格提出關稅改良 (Tariff Reform) 的口號從事競選的，他的成就怎樣呢，他的一個朋友這樣說：「他創造了一個組織，使它充滿了生命，以他自己的熱心激動別人，並且鼓舞候選的人和一般的選民。」

這樣「一個具有全國與國際眼光的，不僅限於選舉勞工議員，而且還要解決勞工問題的，真正的工黨」便產生出來了。

除掉担任全國的工作而外，麥克唐納在一九〇一年的時候，還任倫敦州議會的議員，以學習政府的技術，後來他不在倫敦的時候，才被反對派造謠反對，以致剝奪了再被選的資格。因此我們不難明白，他為什麼常常由張勞工黨管理市，鎮，與州的議會，如今他的長女依式比爾 (Erica)，還在她的父親頭一次被選的議會裏，

富者工黨的議員哩。

自然，倫敦州議會，只是一個插標而已。一九〇六年，麥克唐納在社會主義運動領袖中，除掉哈定而外，（哈定是領導下議院中的黨員的）他早已佔到優越的地位了。所以，一年後他便被選為獨立工黨的主席。他底英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言人的榮譽，同時也「得外馳名」了。以歐洲大陸來說，在會議場上，他與法國的若里斯（James）和德國的倍伯兒（Bebel）齊名。（譯者按：二人均是各該國的社會主義者。）

那年當勞工代議員從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總選時，他底不斷的刻苦的工作，也就得到賞賜了。



## 第六章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六年舉行的總選是新黨的試金石。它要斷定工黨前此所得的進步是不是基於各不相涉的怨恨，也即是要斷定英國的將來能不能長育一個新的政治哲學。這個新的政治哲學不以應付一時急迫的問題為基礎，而以建設新社會秩序為理想，——一種和爾爾黨的信條相反的信條。

工黨在這回競選中的策略，乃是集中在工業區內有兩個議員名額的選區。因為在那些選區中競選，不論和自由黨是否有正式的諒解，也有獲選一席的機會。此外他們更特別注意一九〇〇年「卡幾」總選時，自由黨答允了不着力的各選區。

競選的結果，工黨和自由黨同樣地出色。前屆議會中，只佔四個議席的工黨，這回推出了五十個候選人，竟獲選了二十九個。麥克唐納也在得勝者之列，他以大多數票獲了勒司特之一席。一九〇〇年他參加勒司特的三角戰時，只得四一六四票而已。這回他因為僅和別黨的另一候選人競選，所以得到一四，六八五票，（除一例外）為各獲選者票數中的最高數。

工黨執行部（Labor Party Executive）提出的報告（麥克唐納以秘書的資格幫助起草的）說：「選舉結果極為滿意。我們現在已獲得國人的認識了。」

關於票的數目，報告書中繼續說：「猝然的，各黨的政客都知道了政治上的新勢力出現了，都知道了有組織的工黨，已經是一個舊派的舒服文入底威脅了。他們都是些久睡在下議院青色長凳上的人物。誰人都在問：「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工黨的要求是什麼？它將怎樣做？」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相當的時候是會出來的。但這一件事如今却已顯然。一個新黨而能在有歷史的紐喀斯爾阿達泰因（Newcastle-upon-Tyne）選區推出它的候選人，結果並且得到全國最高選票之一；而能在布刺德佛德，和格拉斯哥，在丹梯（Dundee）和倫敦戰勝了自由保守兩黨的候選人，將會有無限的前途，將會佔着創造歷史的地位。」

雖然麥克唐納在選舉之後說（註）：「假如審慎地去考察我們的紀錄，我們將會知道我們所負於達夫維爾案（Taff Vale）者甚少，」但獨立的政治學者不贊成他的意見，一般都承認一九〇一年著名的法律爭議，結果上議院宣告工會對於其職員之行為有被控訴之責任的爭議，確曾使勞動階級中發生了激烈的憤怒，而這種憤怒也就無疑地幫助了一九〇六年工黨候選人之勝利。

註：Independent Review, March, 1906.

因為達夫維爾案在這次選舉中有如此的關係，同時在未來的數年間工人的政治團體又那麼地得力於它，那末簡單地一遶道工會主義史中底主要事件，也不為無益。

工會在近時以前 是被認為非法的組織。經過數年間長期的激動之後，那種認雇主組合以推進其利益為合

法，而勞動者之同樣組合却被認為非法之變期現象，才被廢止，同時該法也修正了，使凡加入工會的人不致再受懲罰。不過，工會還是沒有法律上的地位，在大多數場合之下，僱主對於工會仍不予以承認，團體協約既不能，隨着必然發生的罷工也就頻頻出現了。

在工會主義史的這一個階段的時候，工會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團體的一樣。僱主不能謂其團體對他負責，而向該團體控訴，他只能控訴定貨的職員或者全體委員。

在達夫維爾事件的時候，工會的法律地位原是那樣的。然而法衛爾法官 (Mr. Justice Farwell) 却只就鐵路職工聯合會職員個人之行動——這些行動沒有證明是受聯合會的命令的——便即判決予該會以禁誡。雖然這個判決案曾為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 所推翻，但是後來上議院却仍把它維持住。

簡單地說來，這個判案無異規定了工會的財產，要負因其職員之行動所致的損害賠償的責任。這樣，任何僱主如受（經工會認可或幫助的）罷工的損失，那末他便可以控訴工會於法院，而工會全數的基金，也就須負擔罰金的義務。

這判案打擊了勞動階級運動的根本，所以工會主義者都同聲地要求修改那個法律。

事情還不就此終了。法院在現行的法律上，特別是在一八七五年謀亂法 (Conspiracy Act 1875) 中之「監視與防害」(Watch and Besetting) 一節上所加的判案，更進一步地使工會的和平糾察也不克進行。

這無異是向英國勞動階級運動底縱長增高的政治意識挑戰，勞動階級運動對於這個挑戰也決定了不顧一切地



去克服它，因為除非勞動者能獲得該法的徹底修改，不然，他們實無法以協作的行動，去保護自己的利益。

自由黨曾誓為這些改良而努力，使工會可以對雇主隨意施行和平的壓力（即有罷工權），并且禁止扣押工會基金及外力對工會會務之騷擾。但，這正是擬議中的立法案，勞動者希望能有一個切實的發言地位（縱不說支配的地位）。因此，無疑地工會主義的羣衆中那種憤怒的感情，都在投勞工候選者的票中表示出來了。

即使我們不視達夫維爾案為勞工代議委員會勝利的原因，工黨在一九〇六年總選中標示出來的進步，仍是足以驚人的。

且記着：勞動者另組政黨的決案，事實上延遲至一八九九年才通過，所以勞工派參加全國的選舉，這回才是第二次。我們看看勞工候選者參加的五十選區中的數目罷：

各黨投票之總數

八五九，五一八。

勞工代議委員會候選者得票數

三二三，一九五。

勞工代議委員會候選者得票之百分比

百分三十七。

一九〇〇以後勞工代議委員會得票之總增加數

二四七，六九五。

帶着勝利的興奮和相信着選民之增加，乃是獲取政權途中的第一步，所以勞工代議委員會在總選之晨，開會時候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取消這短命的名稱而代以『工黨』兩字——工黨這個名稱，正是表明工黨領袖們對前途具有無限的希望表徵。

麥克唐納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底態度，可以說是：『堅定的信仰和理性的樂觀』。他堅信他幫助組成的工黨

底前途的發展和穩固。總選後不久他說（註）：『假如目前之工黨，也如四十年前它的先輩一樣，也只是乘着工會反對某些特殊的冤苦底憤怒才興起的話，那末誰都不必去討論它的政策和將來，因為『曇花一現』的它，決沒有政策和前途可言的。它原日的冤苦，現在當隨其成功而洗除了吧，假如是這樣，它的存在也就隨之而消滅了。』

『然而，人們却有堂堂正正的理由，足以相信現今的工黨，決不是易生易萎的路丐的嫩枝。它乃是從過去的政治情境中，自然地生長起來的。勞動者自在市邑中得到了選舉權以後，他們便失掉了對自由黨的信仰，因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已經擠入了工會的要求裏面』。

註：Independent Review, March, 1906.

論選完保守黨不能為勞動者做任何事以後，他續着說：『同時社會主義的宣傳中曾經說過，只有社會主義的宣傳，才能把勞動者的各種痛苦和社會各種不平的形態，系統地和盤托出來。社會主義者的政策，看來似頗複雜，甚或不近於情理。但無一不關於人們實際的生活，它提示出遠大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主張，它展開豐富的想像界和無限的誘引人們探險的境域。頭腦瑣屑的人，或者還要問在社會主義之下，瓶子如何洗法。社會主義者只有一面抱歉，一面前進——或者不怕麻煩地請他們親來察看察看而已』。

選完工黨堅立成立勞資爭議法 (Trades Disputes Bill) ——藉以修改與工會有關之法——，修改前屆議會通過的失業法，和關於教育與禁酒的新穎提議，工廠法之修改，政制之民主化，特別是下議院和上議院關係之改

善問題之後，麥克唐納把他的政治意見，以下面的話，總結地向兩舊黨挑戰：

『我們必須剷除封建的殘餘勢力，藉以增殖全國的人口和謀農業之繁榮；我們必須把國家的鐵道和河道一類的事業爲社會之用，不讓一般藉之以自肥的私人所有；我們必須爲失業的人，和因爲社會的誘惑而敗德的人負責；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兒童德、智、體三育并進，視他們爲國家財富之一；我們必須用對現存制度挑戰的精神，去應付一切事情，求它所以存在的原因。一方少數的地主呼奴喝婢以自肥，一方全國人却輾轉在土地私有制之下捱餓受苦，這是沒有道理的；一方證券交易所的和鐵路的董事操縱鐵路股票，一方却使英國的貿易負擔着運輸上不必要的重稅，這是沒有道理的；一個有用的人找不到職業；假如又不甘願長捱窮苦，同時他曾盡力以助其繁榮的社會，却又不爲他稍作打算，這是沒有道理的；一個青年爲高工資所誘，從事於無可上進的職業，年紀大了，却又被逐出來，卒至潦倒不堪，這也是沒有道理的。』

『這些結論』，麥克唐納繼續說：『不是由於經濟的推理，或者由於勞動階級的經驗中得來。乃是以各階級同具的善惡觀念做基礎。工黨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要使人們用這善惡的觀念，去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詳細和切實的建議，固有待於將來；一般的主張也有待於將來，雖然一般的主張甚或只是空的和希望差不多的東西。工黨將熟習善惡兩觀念。假如它過偏於一方，則其努力將成泡影。假如它注意及兩方，那末它將會造成新的輿論，它將會成爲新黨和理智與倫理的德模克拉西底核心，在未來一世紀之間，將會施行種種立法的政策，以推進人類的德性和改善社會的效能』。

麥克唐納上述的與一般主張有同等重要的「切實建議」，是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工黨在倫敦舉行第六次年會時，經長期討論後，方才制定的。當時工黨參政運動仍為勝利的空氣所充滿，因此引起大眾對於綱領的注意。這個綱領麥克唐納和各代表均與以擁護。

達夫維爾判決案引起的憤激，明顯地在第一個議案中表露出來，它說：「鑒於法院對於牽涉工會的判案，屢屢和我們不利，與最近註冊長（Chief Registrar）對於勞工代議的條例底處置，大會因此訓令勞工議員，於最短期間內，草擬工會法修改法和團體組合法，詳細說明工會的地位提出於下議院」。

這個議案無辯論地通過，大會於是轉而研究關於失業的議案。這議案似乎很奇怪，因為許多人認為自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四年間，仍為景氣時期。

大會於論辯中，有一發言人提醒出席各代表，謂在他們之後，「有無數飢餓的男女和孩童，他們爐格裏沒有火，碗中也空無所有」。因此在論辯後，全場一致決議：

「大會重申前此的宣言，認失業為私有土地制和私有資本制的直接結果。同時也是因為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的工業組織之缺乏之故。大會更勸告工友們反對借口救濟失業的移民計劃，同時宣告失業者法也是無用的政策，它甚至無能緩和失業者目前的痛苦。因此我們要求根據（一）擴大新任人員對於財政上的管理權（二）修改工人進款的限制（三）刷改工人求職時填報的麻煩這三點，予該法以修改。大會尤願說明失業問題乃是全國整個的問題，因此應有全國整個的計劃，大會決議將此意促使議會注意，并向全國加緊宣傳」。

此外，一九〇六年大會還通過國會選舉，男女有同等選舉權案，教育案，店舖提早休業案（謀施行強迫休業間的主張，和店員工作時間，每星期不得過六十小時。），國際關係案和地方否決權案等等。

以現代政治眼光看來，更重要的是關於稅捐和社會改良的決案。茲錄如下：

『社會改良計劃經費上的困難，乃是因爲目前的稅捐都重征自貧苦階級的緣故，按我們的意見，則社會改良的經費，應由社會財富如地租與利息中支付。我們并且認爲稅捐公平坦負之原則，同時是使土地和資本從私有轉爲公有的好政策。因此大會認爲工黨應有固定的稅捐政策，謀稅捐之調整，使國家的收入和社會改良的經費，都從重稅不勞而獲的稅制中得來，蓋不勞而獲的財富，原是公共的財富』。

以上所述的，就是二十九個勞工代表登於新議會（新議會由首相肯柏班納門(Campbell-Bannan)主席）中，盡力以求實現的綱領底原決議。據當日的記載，麥克唐納完全擁護大會的決議，因爲他在倫敦皇后堂（Queen's Hall）工黨祝捷會中，爲主要的演講者。他曾以下述的語句形容祝捷會，他說：『這是全國慶祝名實相符的工黨出席於議院底空前大會』。

在那個演詞中，麥克唐納引述完他們政敵謂工黨的政策爲『不切實際』的話之後，他嘲笑地說：『保守自由兩黨都會執政，國庫的收入，目前大概是在十八萬萬，但是這些事談實際的人物，却不會把失業問題解決，也答不出爲什麼男人女人「四十歲便衰老」，更不知道如何使工場內的男女，保持端正誠實與豪俠的態度。這些「實事求是」的統治階級，對於都市人口過剩，實無所知；但是如果他們心血來潮，跟工黨的人，站着鐵道向全國

任何一方（無論是東南西北）去旅行，工黨的人便會指出千里的荒地給他們看。

「前日」，他續着說：「數百做鞋的人跑到倫敦。他們鞋底有大小的窟窿，但是他們要來倫敦求施捨之後，方能把他們自己的鞋加以補綴。這些「實事求是的統治階級」却對他們說：「誰要你們這些人做鞋匠，你們每人自己的鞋都不適足」。啊，這是何等的神秘！」

麥克唐納入議會不久，他終於寫出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希望。（註）

註：Socialism, by J. Ramsay Mac Donald.

「社會主義者的對象（註），乃是要建設一個勞動者得到他應得的報酬，視人類的生命勝於國家的財產。今日則財產支配了生命，生命只好折腰屈膝以獻人這拜金時代的扭歪了的倫理和屬於這個時代的一切權威。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一天承認人類幸福之必需品的私有制，財產也使一天支配着生命。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形態，乃是將一切與公共關係較個人關係更為密切的財產，都歸公有。使這些財產都為公共目的而使用，不許私人轉之以謀利」。

註：那個時候，二十九個工黨議員中，二十四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在黨章上仍未把社會主義編入，作為黨的經濟基礎。

麥克唐納當時所贊同的社會主義，在同書下面的一節中，更明確地標示出來：「生活在轉變期中的社會主義者，他第一件的工作便是要使社會人士了解財產的區分，就是：一方面是發資本家利用為剝削別人勞動力的財產

（即是用來使社會窮苦的財產）；一方面是各個人必須具有的維持生活及發展個性的財產。在這個財產區分的兩極端中，自然還有不能區分的等類各異的級數。但，這兩極端却異常明顯。一方是土地，土地之價值全依社會的情形而定；一方是食物衣服和生活進款。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也就視前者為國有，後者為私有。（註）

註：Socialism P. 110. 1907.

關於財富與租稅，麥克唐納以下面的話聲述他的意見（註）：『每人按其能力繳納國稅的原則，在社會主義者看來，這還只佔次要地位，首要的原則，乃是國家之稅收，應從那些藉國家的存在及其活動而產生的利潤中籌措。』

『把收入區分為二：（一）純由個人勞力得來的收入（二）由榨取社會得來的收入。這種區分是頗可能的。收入的多少表示勞績的深淺，決不是一方全有勞績，而另一方全無勞績的。在安定的社會中，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可以說是依靠政府的存在而來，即是依靠政府的保護。但是還有個兩極端，可適當地加以區分：個人獲得的和社會產生的。地租之大部份，和城市地租底十分之九，都原是屬於社會的。鐵路公司和他市營事業紅利之大部份，尤其是資金虛額超過制辦時和發展時實收資本額的事業底紅利，也應該同樣地視為社會進步的結果，鐵路發達的緣因是由於股東和董事底努力，那是錯誤的』。

註：Socialism, P. 114.

因此，麥克唐納主張重征累進的所得稅，他視所得稅『在來源底性質上，與都市地租相近，其與地租不同

者，只因實際上它是純然個人努力的結果易於消滅而已」。

爲忠告那些剛復的同情者，和企圖減輕那些以爲「社會主義包含許多罪惡」的人底恐怖起見，麥克唐納很小心地說明：「社會主義的改革是漸進的，分期施行的，恰如有機體的進化一樣。」由此可見他幼時所受的訓練，定然助成了他這樣的態度，麥克唐納常常看做科學的進程，不把它看做一套不費力的希望和躁等的跳躍。

這種中庸的態度，在我們研究他開始從事議會生涯時，所概說的社會主義結果中，尤其顯然。

「當我們以轉變財產所有權，及如我所曾指出的財政的變革兩個方法，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底時期中，下面的幾件事將會出現：如今掠奪工業國家底經濟的及社會的寄生主義之重壓，將會減輕；物價將會跌落；匯兌的數量將會膨脹；一般的生活程度將會切實的改進；全國的工業效能也將會大大增加。」

「但是寄生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毒瘤被破壞之後，必然產生的節省下來的財富，一定要公平地分配。固然，其中有些要用來減低物價，物價低落，就是立刻改進了國內的生活程度，同時增進了英國在國際市場中競爭的效能。但這決不能盡用節省下來的全部利益。所以減時增資均可藉節省下來的錢去進行。血汗勞動將會消滅。資本家再不能利用婦女賤工，使之與男子競爭。工業將會平穩地進行，而今日普通之失業現象亦將會停止。是後引領人們至社會主義國家的坦途，也將會開放」。

這些便是麥克唐納從勞工派方面底暗淡的邊界，現身於光芒萬象的政治界時所持的主張。當時的政治界正是張伯倫，巴爾福，愛司葵士，普柏班訥門和佐治諸人支配着的時候。



這些主張，不僅他自己一人接受。他并謂：「國民也是準備着接受這新的主義，做他們在試驗立法中的指導原則。雖然他們不像羽毛豐滿了的社會主義者一樣，視之爲絕對的理想。這便是工黨勃興的意義」。然後他復繼續他底驚人的預言：——以過去十年間的政治史和最近將來的情景看來，那預言是驚人的——「十九世紀的政治而沒有曼徹斯特主義（譯註），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同樣地，在二十世紀中，社會主義（其權力較十九世紀之曼徹斯特主義大得多）必也成爲一個更大努力的政治運動的創造中心」。

譯註：十八世紀時，英國一些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曾在曼徹斯特開會。後人稱之爲曼徹斯特學派，并稱其所持的主張爲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

一九〇〇年社會主義從睡夢中驚覺起來，六年之後，便真的醒過來了。一九〇六年，工黨可以說是已經實在地開始了掌政的邁步。在麥克唐納和蘇格蘭的老政治家哈定攜手努力之下，它并且已經向着目的地前進了。蘇格蘭原曾栽育出許多各式各樣的種領，但是從未栽育出過一個能在歷史上留下不能抹殺的功績的理想家。

一九〇六年之議會，從工黨方面說來，乃是決定前途的重要日子。從麥克唐納的本身說，則更是他自一八九三年以來所有努力的總結品，在下議院的青色長橙上，他如果鑄不成一個新的武器拿在手上，便只好去搗他自己的政治墳墓了。

工黨在他領導之下，當時已經開始越過僅僅注意麵包與牛油的政治，——固然工黨也視麵包與牛油爲重要問題。麥克唐納主張：一個政黨，如果要掌握帝國的政權，必須研究帝國整個的問題。所以總選後的秋天，麥克唐

納便和幾個新選的議員，去視察英國各自治領殖民地，搜集那些大概要提出於快將舉行的帝國議會的諸問題底直接材料。後來他便具有如韓打 (Lady Rhoads) 會稱爲世界眼的知識。他也許是初入議會的諸人中，被認爲對於憲法的政府和國際情事最有權威者之一——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識見，以黨內而論。他自那時起至今，也是觀乎別人之上的。

麥克唐納傳

## 第七章 國民之喉舌

一九〇六年是英國政治底新紀元的劃一時代。一九〇六前幾年流行的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 思想，已自歸於消滅。對於國內各種罪惡要求救濟的意識日漸濃厚，並且打開了一條社會改良的坦途。這些社會不僅改變了當時英國國民的生活底行程，其影響且及於今日英國人的幸福。

帶着打破一切紀錄的多數而上台的自由黨，在喬治魯意領導之下，既已決心去解決貧窮，疾病與年老諸問題。而工黨——在會議中的勢力雖不很大，却能代表國民說話，并且漸得國民的信仰——在議會中又復盡力去驅策政府，使它施行更澈底的政策，并且非難任何規避解決貧窮問題的傾向。

麥克唐納深知，給予工黨以一個信條和使工黨精誠團結，比較僅僅在議會之外，獲取淺薄的聲名更為重要，所以他全力注意於為工黨草擬一個整個兒的政策底工作。認為工黨應該為執政時準備一切，即使國人尚未立時預備擁他們上台。

麥克唐納第一便注意於失業問題。失業問題在後來工黨執政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很有紀述的必要。

一九〇六年七月，在議會的辯論中，他第一聲便發為擁護失業業者底要求的言論，辯論中，約翰朋斯說：「根據一九〇五年的失業工人法案，除倫敦以外，在英倫及威爾斯已設立八十九個窮苦委員會。其中十一個沒有實行

供給失業者以公用工作的活動。在其餘之七十八區中，依法請求救濟和工作的有六萬七千人。其中五萬人被密宓有接受救濟和工作的資格。五萬人中實際從各種基金中，領到救濟金與分派工作的，則只有三萬一千人。佔委員會範圍所及的全勞動人口百分之一。」

約翰斯說完之後，麥克唐納隨着發表他的處女演說。他提醒下院注意自從倫敦失業者總會成立之後，他便在其中一員，現今且為該總會中一委員會之主席。

他在任期間「傷心的經驗」說述完了，并把那「使勞動者只因依賴人為給養的方法，便永忘懷於尋常經濟給養的方法」底失業救濟策批評完了之後。麥克唐納便說：「我們的意思不是說，連在例外的失業時，也不用救濟的方法；但這種應付例外失業的救濟方法，應該在事先籌備妥當。假如我們束手坐待失業者悲壯的列隊遊行，出現於我們眼前的時候，狂呼要求我們施捨，甚且打向我們的胸前的時候，這才想用立法去應付，請問在此危急之間，還有何種立法可用？」

關於被採用為失業者求工作之方法的農墾殖民地，——當時許多人相信這是失業救濟策之一——麥克唐納繼續說：

「我雖然不與那些認農墾殖民地試驗，為救濟失業辦法底人們的意見相同，但是我仍認這種試驗為幫助解決失業問題的一個切實辦法。然而我們決不能希望一個農墾殖民地在六七年內便可告成功。目前我們正在黑暗中摸索。我們每送一個人到農墾殖民地去，不是放他到牧場裏，便需送他到荒地裏。我們給他一個鋤，教他去掘一個

孔，然後又教他把它填起來。這是訓練，使每人手上都受過起泡的經驗。要每人都能掘一個孔，又能把它填起來，這是耕犁學的初步。這就是荷里士里海灣（Holistic Bay 係農墾地之一），不能使人稱心如意的原因。假如多耕耘它幾年，它是會使人稱心如意的。讓我們假農墾殖民地以它必需的時日罷。』

當時議會撥出十一個星期五以討論不任部議員議案（Private members Bills），工黨獲選了兩席。他們便趁機提出修改達夫維爾判決案，承認工會合法案及供給貧窮學童飲食的教育法案等。

自由黨與工黨均曾發誓，要向國會提出使工會得受法律絕對保護的法案。所以新勞資爭議法的唯一爭點，就只是應取何種形式的問題。

早在各領袖工會仍主張妥協政策的時候，麥克唐納便已努力贊助將應用於達夫維爾判決案的勞資爭議法完全推翻。後來，工會大會也轉過來，與各黨的候選人互訂誓約，以擁護麥克唐納所提議的政策。

在政府方面，檢察長代表出席下議院辯論時，也贊成一個有限度的修改案。這個政府的修改案，於星期三正式提出，跟着工黨的案，也於星期五以不任部議員議案審查報告的名義提出。工黨提出的案，包含着麥克唐納主張的根本改革政策。政府案雖早於二日前提出，而首相首相班納門對於工黨提出的案，却予以擁護，這不能不說是很可驚異的事情。

這足以證明麥克唐納所持的政策之合理。雖然工黨的提案結果沒有錄入成文法典裏（Statute Book）但是——九〇六年十二月廿一日，經國皇裁可的勞資爭議法，却滲入了許多工黨原提案的意思。在同年年底國會工黨租主

席哈定所提出的報告中，他說：「政府提出的勞資爭議法案，後來不僅與其原草案不同，並且完全改變了，以遷就工黨的意見。這同在勞資爭議法案中，各人集中精力以討論的精神，在近代政治裏面，恐怕不容易再找出另外一例了。」

這個足以稱為工會主義中的大憲章的法案，其重要條文如下：

(1) 凡二人或二人以上，根據契約或組合，從事於圖謀或增進一個勞資爭議的行為，這種行為不能提起訴訟。但是同樣的行為，而無契約或組合的根據者，則可提起訴訟。

(2) 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他們自己的資格，或代表一個工會，或雇主個人，或商號，從事於圖謀或增進一個勞資爭議，而侵入或隣近別人居住，或工作，或營業，或偶然所在的房屋，或地方，如果其目的祇在用和平的方法，採訪或傳透消息，或者只在用和平的方法，勸說或禁阻別人從事工作，則這種行為不算違法。

這兩個條文（其餘的較屬於專門的性質），使工黨不再受「叛亂」的控訴，並且認可了和平糾察的行為。保守黨第一次企圖對於這個勞資爭議法提出修改案的時候，（註一），麥克唐納批評說：

「一九〇六年通過的勞資爭議法，明定保護工會基金的安全。使資本家不能有組織地，向法院提出控訴，以盡滅其基金，甚至令其破產。……工會得自勞資爭議法的所謂利益者（其實並不是利益）僅使勞資同處於平等的地位而已。勞資爭議法迄今從未使資本家受過不平等的待遇。那些反對勞資爭議法的雇主們，只是希望在勞資爭

議法推銷以後，便於虐待工人而已。他們尤望以法律束縛着工人們的言論與行動，使工人們動輒不得，使他們受丁虐待還禁若寒蟬。未受虐待之前，又無防止之道罷了。」（註二）

註一：這所謂修正案，叫做勞資爭議法修改案。係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六日提出。由塞西爾（Lord Robert Cecil）

夫勒折（Fletcher）彌爾斯（miels）和散蒂（Sondys）諸人署名的。

註二：麥克唐納著工會之危機（Trade Unions in Danger）一九一二年工黨出版

這個勞資爭議法成立以後，工黨底公平待遇工會的要求達到了，因此工黨在各選區的地位也大大地鞏固起來，勞動階級運動中，工業的和政治的兩翼間的結合更加凝固。

麥克唐納初期在議會辯論中，關於外交情事和帝國政策的貢獻，標示出他對於這些問題有過深刻的研究（他對於這些問題是異常精通健全與真確的）。不過這些問題，等到一九一四年才佔到最重要的地位。這個時候更急迫更嚴重的問題，乃是國內的失業問題，工資問題，血汗苦工問題，住宅問題，工人受傷底賠償問題，撫恤問題，年老問題等。這些都是工黨選出來特別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廣大而未開墾的社會改良領域中的問題。工黨對於這些問題，也決不再緘默了。

我們看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間，罕薩報（Hansard）的紀錄和工黨年會報告，可以知道工黨在哈定和麥克唐納影響之下，如何地堅執以失業問題為工黨政綱的主要部份。

歷年關於失業問題通過的決議案，以一九〇七年正月在伯爾發斯特（Belfast）舉行的工黨年會中所提議的最



能代表。其原文如下：

「本大會重申前議，認為失業乃是土地和資本私有制的結果；確認失業問題，為本黨最重要的問題；尤應立時給予各地方選出的當局，以獲得土地，及舉辦他們以為有利的商業或工業的權力；嚴令各地當局，舉行各該區域的失業者登記，和把他們組織起來；縮減失業者原雇主所規定的工作時間，每星期最多不得過四十八小時，俾能盡量強使失業者復回固有的工作。大會更要求政府立時修改現行的失業工人法，明定供給失業者以有用的和有報酬的工作；並由帝國財部發給地方當局以充份的資金，使他們有能力予一切需要職業的公民以職業。」

翌年工黨復在國會中提出一個失業法案——當時失業問題自較今日為緩和。該法案的原則如下：

(1) 失業者必須舉行總登記。

(2) 市政府必須視施行失業法為其日常工作之部份。

(3) 中央政府必須與地方政府合作以從事失業救濟工作。

一九〇八年正月，在研究失業問題的特別大會中，麥克唐納述及他們正站在另一個失業騷擾的邊緣中，他說：「今天我見着熟練工人現在失業的佔百分之六的報告。那些失業者盡是社會中誠實的人，是千萬家庭中的父親，是千萬女人的丈夫，每人皆有家庭的和公民的義務。他們不是不願履行義務，不過却被天命註定了，只能在有工作的時候才能履行義務。我們現在在此開會，正是他們在工業城鎮中踽踽街頭，可以說是膝行以求乞的時候。昔日上帝咒詛亞當者，（男人須流着汗去工作）人們今日也將咒詛在他們的身上。然而全英國却沒有一個基

督徒能够上出来咒詛他們哩；同時給他們以高尚與獨立生活的機會。只要念及這些情境，已是够使凡有人性的人；感受如像被夢魘所困的情緒了」。

麥克唐納繼續說：「我們祇能在失業問題不嚴重的時候研究失業法。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方可以安靜地坐下來，討論工資，失業，土地所有權，資本集中等理論方面問題，然後才可以不急不忙地草擬救濟而又可行的法案（這個意見，他曾在下議院中力為申說）。他又說：

「失業乃是我們現在工業制度的產物，正同它產生利潤那樣地必然與準確。每有利潤，同時也便有失業」。工黨在下議院雖僅得二十九人，但却已為人所重視。他們得着整個勞動階級運動做它的背景，所以正在把英國的政治革命化。他們向朝野兩黨底爭取議席的政策挑戰。自由黨要把革命延遲，保守黨要把革命控制。工黨却要求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之完全革新。

自由黨政府執政時，曾嘗言努力解決國內最迫切的問題。事實上，終它的任期，也確不失為英國政治史上最有效的政府。

肯柏班納門和愛司葵士兩首相，對於工人賠償法（Workmen's Compensation）失業與健康保險法（Unemployment and Health Insurance）和養老金等問題，均曾予以同情的考慮。許多澈底救濟貧窮與災害的計劃，都一概在法典裏面。工黨一方面贊成這些政策，一方面堅持更澈底的改革，以適應工人們對工業繼續增加的不滿。也許自由黨政府中，祇有一個知道：工黨才是自由黨的大敵。他就是財政部長喬治魯意。他為要應付自由黨

的危機，所以極力催促同僚，去實施社會改良的政策。但，即聰明如喬治魯意者，也不會真正估量得到工黨底潛滋暗長的勢力之重要性。（註）

謹：在大戰的時候，一位代表南威爾斯礦區的自由黨議員，曾對喬治魯意說，他在威爾斯工業區所代表的議席，漸漸的要為工黨所奪了。喬治魯意回答，他祇好在南威爾斯與保守黨和工黨相戰，並且克服他們。當時自由黨在南威爾斯，僅得數席。一九二九年總選後，自由黨祇得兩席，而工黨却佔二十四席。

喬治魯意以財長的資格，在下議院提出那著名的人民預算案（People's Budget）時，說：『我們會對貧窮與疾病宣戰，所以這個預算，可以說是戰時預算』。

喬治魯意這些話是對的。一九〇九年的預算案，實為英國國會中，自來最能平衡國庫收入的預算。其實喬治魯意還可以說是對膨脹中的工黨勢力宣戰。工黨不斷地在議席上和選民的力量上，長足的增加，這對於才具非凡的喬治魯意，那裏會不曉得。他除了希望藉此預算案，以打擊貧乏與失望而外，還欲藉此種迅速的社會改良，以與工黨相戰哩。

而工黨方面亦旗鼓相當地起來，對於自由黨向議會提出的每個議案，都用直接與貧窮接近的清晰的腦筋去予以詳細的審議。把一切易於忽略的瑕疵，一一挑剔出來，要求政府予以修正。

關於這類的案件，我們可以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廿九日的翠薩報中查出來。當時養老金法案正巧付給委員會審查。麥克唐納在答記者的訪問中，對於前兩年領受過救貧法底救濟金的人，不能再在養老金法案之下，領取津貼。

的提議，大加指摘。

他復特別聲明，工黨無論何時何地，均主張凡自六十五歲到七十歲的人（他們都是因為兩年前請求過貧窮救濟，而失掉了公民的權利的人），均應予以養老金。因為有一特殊惡例曾為他所注意，那惡例涉及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婦，夫年七十四，本替鞋匠以爲生，因年來風寒，致無力繼續工作。而老婦本人尚稱健壯，在六月一日以前，曾任某家總管僕兩年，後以雇主之女歸家居住，代替了她的管家職務，這才被裁去。在做總管僕之前，她還做過 Inner Temple（倫敦法學院房屋之一——譯者）某寫字間的清除工作。她的品性還好，她的丈夫既不能工作，故曾請求教區的救濟，年來他每星期拿到三先令的津貼；可是這津貼，還需付房租的。如老婦這一類的人，因為她們的丈夫曾領過救濟法的津貼使被取消了領取養老金的權利了。

麥克唐納對着自由黨講席上的人物，向喬治魯意提出工黨的挑戰，他說：「政府是否打算帶着冷酷的面孔，對曾經於兩年前接受過救濟的七十，七十一，七十二歲的人說：『你祇能死於貧窮了，現在的養老金法案，只規定較你少兩歲或三歲的男女，才能够享受津貼的利益呢。』」

麥克唐納相信，假如這種法案真的被通過，則六十五至七十歲的人底痛苦一定要增加。如果因為請求救貧恤金，即被取消享受養老金的權利，恐怕千千萬萬的窮人，寧願捱餓也不願請求救貧恤金了。他說：「政府實無故設誘引，使窮人們忍受痛苦。」

在議會辯論中，工黨不以貧窮和痛苦底死的統計爲滿足，他還要替這些問題，穿上一件殘暴的事實的衣服。

因爲有工黨議員在議會裏，民衆痛苦的呼聲，才可以在全國最高裁判所裏申訴出來。

凡是與貧家幸福有關的問題，他們都一子以注意。他們不斷地努力求工廠工作情形，店員工作時間，血汗勞動，教育，疾病，軍縮，工業保險法；全國最低工資率等問題的改革。戰前的政府公報，滿載着他們那種求改革的紀錄。

戰前的幾年，不加思索的人們，都還認爲是景氣的日子。其實大大不然，社會的動亂正宜於工黨的發展。就算當時貿易是發達吧，或者說是天下太平吧；但是一切仍不是『人類世界上最理想中的理想』。

當時公布的資本率，標示出工人沒有得到底增長增加的工業利潤中，他們應得的報酬，恰恰證實了麥克唐納底爭辯。一九〇〇年以來十一年間，在商業局（Board of Trade）的統計中所包括的各組工人所得的工資總數，實際是大大地降落。商業局公布的每星期工資總數底變動率（註）頗能明示出潛滋暗長，終於於一九一〇年的工業底主因。那回的工業不安，不僅影響英國且及於多數的工業國家。當時是各國工團主義抬頭時期，在英國則大家正在開始討論可否用直接行動和總罷工來做工業戰爭底武器的時期：

|           |    |         |
|-----------|----|---------|
| 一九〇一..... | 減少 | 七六，五八七鎊 |
| 一九〇二..... | 減少 | 七二，五九五  |
| 一九〇三..... | 減少 | 三八，三二七  |
| 一九〇四..... | 減少 | 三九，二三〇  |

|           |    |          |
|-----------|----|----------|
| 一九〇五..... | 減少 | 二, 一六九   |
| 一九〇六..... | 增加 | 五七, 八九七  |
| 一九〇七..... | 增加 | 二〇〇, 九二二 |
| 一九〇八..... | 減少 | 五九, 一七一  |
| 一九〇九..... | 減少 | 六八, 九二二  |
| 一九一〇..... | 增加 | 一四, 五三四  |
| 一九一一..... | 增加 | 三四, 五七八  |
| 一九一二..... | 增加 | 三一, 六一一  |

註... Report Changes in rates of Wages and hours of Work. Q1. 6472. 1912.

上列的數字指示出：(一)直至一九一一年開始時，減少數多於增加數，而達五〇、〇〇〇鎊。即是說：在上表內包括的各組工人，每年所得的年金，較之二十世紀初年，少了二、五〇〇、〇〇〇鎊。(二)直至一九一〇年開始前，每年工資的減少數達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一〇年，正是工業的不安開始危及工業的利潤，而資本家對工人不得不稍予讓步的時候。

在物價方面，却日漸昂貴。據批發合作社公佈的數字，則自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二年間，日用必需品的價格高漲了百分之十以上。

當時麥克唐納在他的著作裏說：「這樣可以顯明地看出，工人之不滿是與物價之過份高漲一致的，同時多數的工業城鎮底房租又復高漲。因此多數工人階級家庭中的財政部長，於一九一〇年都遭遇一件不愉快的事！那裏是他的收入雖較一九〇〇年底的祇少一些，但去年值二十個先令的一鎊金幣，今則只值十八個先令。」（註）

註：The Social unrest Its Cause and Solution (Foulis, 1913.)

「本世紀初之十年間，勞工階級之地位，我們無論從那方面去觀察，都只見退步，沒有進步。工資低落不用說，拿他們目前的經濟標準與六年前的相比，拿他們的地位來和富有階級的相比，二者相去何祇十萬八千里。國富是大大地增加了。可是勞動階級的經濟標準也大大地降落了。富者愈富了，貧者愈貧了。」

無怪乎全國的不滿，罷工在一九〇一年的秋天連續爆發。所謂大騷動者，以一九一〇年九月汽爐業工人和煤船業工人的鬧廠道其端；隨着棉業工人於十月罷工；十一月一部份南威爾斯的礦工又起而罷工。

上述的這三個罷工，雖然驚動了全國，但僅只是未來更嚴重的糾紛之開端而已：一九一一年倫敦印刷工人罷工之後，隨着無數的小停工紛紛起來。同年六月第一次偉大的運輸工人罷工開始，騷亂的情況簡直到危急的時期。八月全國鐵路工人又起罷工——這個罷工與麥克唐納生命中的大悲劇同時，在本章之後將再詳述。

担负鎮壓工潮的領袖們，不曾因為一九一二年之來臨，而減輕了他們的責任。三月間煤礦業的大罷工開始，五月間運輸業又發生第二次的罷工。

當時社會的騷動遍佈全世界。麥克唐納在社會騷動一書中，批評這些騷動及其原因說：「革命的氣息似乎

傳遍了世界，各國的已成制度正和暴亂搏戰。因為這些暴亂，不是有推倒它的危險，便是要踢翻它的重壓。  
(註)

註：社會的騷動 (The Social Unrest)

工黨在英國的努力，是製將這些騷動導入政治的程途中。在千萬的講壇上，工黨的宣傳者，都指出惟有一個強固的獨立的工黨，纔是合勞動者用的穩確的權力庫倉。這種宣傳的結果，一直等到下次總選時（因為大戰延至一九一八年舉行）才出現。但是凡有耳可聽的人，都可以聽得見工黨每次遊行中所表現狂熱的呼聲；宣傳的結果當時也就顯然了。

的確，大戰以前的幾年，正是前途無限的工黨底黃金時代。其中却没有能像麥克唐納一樣的乘時而起。其力自培養以運用政治的武器底長期準備，在下議院內圓滑周到的論辯中，在議場上各種機會的靈活運用中，都大告成功。同時也就證實了，張伯倫於聽其處女演說之後，所給他的祝頌之為不虛。

在議會之外，他和他的夫人合着，更應為工黨的金城鐵壁。

工黨需要一個中心集合的地方，使凡是對於工黨之進步有興趣的人，都可以聚集起來，以討論當前的問題。這個需要終於由麥克唐納夫婦，以他們在林肯廣場的家滿足了。當時著名的集會，今日仍為工黨的老前輩們所念念不忘。

不應該因為結婚離開了政治活動，反過來應該因為結婚而擴大政治的活動。這是馬加勒特麥克唐納的信條。



她歡迎一切老少的社會主義者到她們的家裏去。成爲來自天涯海角的友人（他們都是麥克唐納夫婦在南非洲、印度、奧大利亞等地旅行時相識的人）訪問的地方。這些人來到倫敦以後，除了參加林肯廣場的鼓會，飽嘗咖啡與三文治之外，他們還可以遇到英國勞動階級運動中的領袖和下層羣衆。

那些集會每屆舉行的時候，凡是同情於工黨的人，決不會被麥克唐納所遺忘。一個與麥克唐納相交了二十多年的摯友，曾對作者說，他從北方初來倫敦時底寂寞，和後來應請赴麥克唐納的「家會」，霎然地遇到許多朋友的情形。

馬加勒特是一個溫文的主婦，麥克唐納也就在家中遇到了許多後來在各國成名的人物。工黨固有負於它的一個偉大的主婦——馬加勒特，然而那些仗着他們家庭做訪友問訊的地方，因得免於寂寞（這種寂寞是麥克唐納曾忍受過的）的無數男女所負於馬加勒特者尤重。

她的慇懃待人的遺風如今尚存，往日每星期三下午她在家中所組織的縫紉會，仍在麥克唐納底罕普斯忒（Hampton Road）的住宅裏舉行。藉以紀念這個昔日仁光普照的人。

她死後十三年，當麥克唐納任首相的時候，第一次在林肯廣場，那歷史的圍牆內舉行的集會中，也就包括着所有能追憶及的曾參與「家會」的朋友。假如死後而有靈，那麼馬加勒特底仁慈的幽魂，定必與他們同在，冥冥中再歡迎着昔日的友人。

麥克唐納對於英國底廣大的見識，在他被愛司葵士聘任爲印度文官制皇家調查委員會委員的時候，便已爲官

場所認識——這調查工作使他與摩黎助爵 (Lord Forcy) 很接近。摩黎自那時起直到逝世的時候，他就做了麥克斯納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

他第一次遊歷印度時，業已搜集了許多材料，並且將他的結論，寫在印度之覺醒 (The Awakening of India) 裏面。這第二次遊歷的結果，他再寫了一本印度的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這至今仍為研究印度底複雜問題的人所誦讀。

一九一〇年正月，他和他的夫人在第一次印度遊歷中，趕回來參加總選。結果他把他的議席維持下去。同年第二次的總選也沒有落選。在第二次選舉之後 (第二次總選乃是因為上議院向自由黨政府挑戰，迫着不得不舉行的) 工黨更藉着麥克斯納底穩固政策之領導，在下議院竟增至四十二個議席。一九一〇年總選中，工黨多獲一八三、五〇六張選票。同年第二次的總選中，則減少一三四、八八八張選票。但，這回票數的縮減，乃是由於：(1) 基金不足，不能多立候選人；(2) 選民姓名以舊登記者為標準，於工黨不利的緣故。

新議會開幕後，立刻從事研究國會議法。此法在取消上議院對下議院的否決權。(這個上議院的否決權，是愛司麥士政府接受全國的委任錄入成文法典裏)。在這個國會議法未提出辯論之前，麥克斯納代替了國會工黨組領袖的地位。這樣，正可以施展他在議會上的長才。

工黨對於英皇所下的開會詔文，特別提出關於失業問題的修改案。

該案由現在被稱為詹姆士爵士的奧格累狄 (O. Gandy)，以下述的語句提出。

「但很抱歉，詔文中並沒有答允草擬一個法案，規定人人有工作的權利，規定政府須負責直接給予真正失業者以工作或生活的責任。」

無論「工作權利」的要求底是非如何，顯然地，除却工黨議席之外，是沒有人予以擁護的，當工黨的修改案獲得表決時，贊成的祇得三九人，而反對的却有二二五人。

一九一一年二月國會辯論英王所下的詔文時，麥克唐納初次以國會工黨領袖的資格，喚醒全體議員的注意說，這回總選的結果只有工黨增加了議席，並且說明工黨對於新議會行將討論的迫切問題底態度。

在他的陳述中，他對於當時歐洲各國競爭軍備的問題，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這個問題在過去，他曾屢屢的要求國人予以注意。

他說：「互相競增軍備，我們決不能避免戰爭。除非我們與德國能有比現在之進步的瞭解中，一定要包括一些什麼的勇氣。」

他繼續說：「第一、我們必須停止一切關於德國經濟底進步之有刺激性的和吹毛求疵的批評。自然，德國是要繁榮她的市場，發展她的貿易，振興她的商業。她在世界的市場中，並且會愈來愈是我們的勁敵。但是我們對這些，應該以科學底冷靜的頭腦去觀察，不可現出含皇憤怒的神氣，尤不可溢乎常識之外，徒以愚妄虛誇卑陋的詭詞目人為敵。第二、我們必須決心和德國在政治方面底某幾個重要問題，求更密切的瞭解，例如德國在小亞細亞底政治的經濟的地位問題。實際上，我們能早一天從容坐下，以研究我們與德國在世界上底經濟的政治的相互

關係，我們便可以早一天，在德國，同時在英國，產生一種輿論；這種輿論足以促使兩國間真正協商的成立，足以造成軍備切實縮減的信號，更足以爲新外交政策的開始。關於這個方面，工黨的地位原是非常鮮明的。雖然有人們嘲笑我們，說我們不負責任。我頗不如是相信這些話，但是工黨在木院，在英國嚴重地批評一切關於軍費增加的問題，實在是英國的莫大利益。」

關於政府擬制中的全國失業保險計劃底各建設，麥克唐納說：「我要忠告政府，雖然我們將接納這個保險法案，但它仍不能解決失業問題最困難部份。臨時的工人，你不能保險他，不熟練的工人，——你也不能保險他。年老而又未及享受養老金底利益的工人，你也不容易保險他。實在說，我們之接納這個失業保險計劃，祇算它是一個前進的階石而已。我們必盡力感化政府，使它施行「工作權利」法案底其餘的部份，如我們會感化了它，使之施行失業業者有享受生活的權利那節一樣。」

麥克唐納講述完自由黨政府在最近的總選中，藉以戰勝保守黨的國會法（取消上議院的否決權）「還是不夠」之後，在他的演詞之末，再說明工黨的政策：

「當一九〇六年我們來此出席的時候，我們的目的，（這個目的曾經明顯地規定與說明）在擁護自由保守兩黨，假如我們認爲他們所從事的政策是利於大多數的人民。我們以絕對獨立的態度而來。如今我們也還是獨立的——絕對獨立。我深知與我們反對的諸位高明，當他們穿着假偽的盛裝的時候，當我們嘲笑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定覺得尚促不富。但是，工黨還是堅固地維持她初來的態度。我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政府的本身，乃是擁

讓政府所提出的政策。我們站在這裏，還是依舊代表勞工，我們在國中是一個獨立的勢力，在議會中也還是一個獨立的勢力。我們被鼓勵着去繼續保持這獨立的態度。因為我們的選民們一再贊成我們這種獨立態度，因為贊助我們的人無止境地增加，從它的結果上來說，因為這獨立態度是工黨在下議院中常常採用的最有效的政策。

從那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麥克唐納的忍耐靈敏與穩健。就在那天，他翻開了工黨歷史中第二的而且更出色的一頁。聽見這個新的「獨立宣言」的，有幾人醒悟也把兩黨交替的議會時代劃斷了，正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傳報了第一不列顛帝國的完結一樣呢？工黨之外，也許一人都沒有，黨內醒悟的也不多。上天祇給予少數的男女以認識在萌芽中的新力量底觀察力而已。一九一一年，下議院的議員們認識了麥克唐納的才幹，能力與真誠之後，前此之視工黨變成爲真正全國性的政黨爲狂言者，已不復作如是想了。假如有人在十五年前預言說，工黨不出十五年將幾佔下議院第三席者，這種預言必將隨笑聲而消逝。假如他更詳細地預言說，當時工黨組的幾位領袖與首相麥克唐納同坐在閣員席上，恐怕他只會被視爲癡狂院的候補者而已。

但有一人確實地已看見那種影像，或類似的影像終必實現。麥克唐納之相借工黨底勝利，正如日出之必然。除去這偉大的事實而外，他個人的成功是彌足輕重的。

不過，這視希望就在眼前的工黨新領袖，勝利却轉爲悲劇——那個悲劇祇是那些遮暗了他的生命之個人的痛楚底第一聲。二月三日他的幼子大衛患白喉致死，八日之後他自己的老母復隨小孩以俱亡。

那些悲痛的打擊，使麥克唐納夫婦都感受了莫大的刺激。然而，禍是不單行的。四月二十四日馬加勒特的攀友馬利·彌得爾敦（Mary Middleton）患病經年終於不治，這個新的悲劇似乎把馬加勒特本人底生之意志也消滅了。

同年初夏，她給一位勞工運動的同事寫的信裏面，她爲沒有依例爲勞動婦女出版刊物寫稿表示抱歉，她說：『我不是病，祇是疲乏了。』

如常人一樣，她也許以休息後便可以恢復原來的精神自慰。假如她真這樣，那末只算徒勞了。六月二十三她在折善（Chesham）鄉居，（其地爲麥克唐納合家，週末常至的）病重，病徵原極輕微，只是無名指上起了刺戟而已。她還笑着說：『它不願做它的工作了。』扶病回倫敦後，才由專家醫生斷爲嚴重的血毒症。

那年的夏天，剛巧天氣炎熱，黃銅的天色，火燒一般的街道，她却躺在病榻上，和無望的死神苦鬥了三個多月。

八月鐵路大罷工，震動了全國，麥克唐納身任工黨議會組主席，不得不離開他夫人的病榻，以求罷工的和平解決。在病者如是危險的時候，惟責任心的驅策，才使他毅然地起行，舉世將永沒有人能知道他備嚐了些什麼辛酸，因爲那些淒慘日子底悲劇，其傷人之力似無窮期。某次，醫生囑取冰塊以減輕病者的熱度，因爲麥克唐納出席一個罷工的會議，所以由一位朋友代勞，但，那使全國麻木的鐵路罷工，連倫敦底冰的供給也停滯了。那個朋友發狂地東奔西跑以完成他的使命。最後，他把倫敦惟一的一塊冰找到了——在下議院的茶室中——急忙的把它

帶回林肯廣場。

「可曾有過較這『獵冰』（冰，當時是被麥克唐納自己的隨從者截留着的）更可憐的情形從小說家的構思中出來嗎？」

鐵路罷工完了，但病者却還是一天沈重一天。九月七日多馬·巴羅爵士（Sir Thomas Barlow）說：他不以為她能多活兩三天，這才使麥克唐納驚醒，知道他們底田園式的結婚生活將從此終結。

他的夫人以平靜的勇氣接受死的裁判，這種勇氣，祇有最不怕的人才能在死神之前表示出來。彌留之際，她毫不畏縮，還在囑咐她的朋友接着悲傷，提起勇氣，以繼續她畢生致力的工作。

那一瞬間，麥克唐納如像陷入一個黑暗的深谷一樣，他底政治生活中最苦的經驗與之相較，祇算是小刺激而已。他從不懼怕政治上的反對，詆毀和憎恨。但是他底生命的伴侶之死，却把他的嶽似的自制力也打得粉碎了。

死前的一日，馬加勒特請她的丈夫到另外的一個房裏，乘他的記憶還清醒的時候，開始寫下她們二人共同生活的歷史。這樣，她就在她的丈夫奮力書寫會使他顛倒的偉大的愛情底一小部分時，便不畏不憾地（除掉她遺留下孤獨的丈夫和兒女）渡了她在塵世的最後幾小時。

「她對我們說，假如她有來生，她願能够再如今生的一樣過活；她把曾幫助過的人和事業通通付託給我們。九月八日她死了，太陽在西沈的光輝中漸漸兒消失，房間內充滿着初暮時的衰色。」

上述的幾句話是從麥克唐納著的馬加勒特·厄威爾，麥克唐納傳記中，抄錄出來的，這本傳記將永列於英國語文中，夫頌其妻底最完美的辭章之一。別的人也向這位可愛慕的女人之靈而致敬。

一位曾和她同學的人說：「她只有四十一歲，但在我們遇見看來，似乎她的前面，尚有幾年同樣的祇有她才可以貢獻的勞役，因為她有這許多朋友——這許多賢明的女人，都被她的無瑕的品格，和對人道的關懷，對現代問題底穩健而同情的見地所感引——所以她的影響似乎是無際限的」（註）

註：E. J. macrosty in the league leaflet.

一位曾和她同事的人說：「她能工作直至疼痛的時候，不覺得困倦。她有百折不屈的精神。她能忍受一切的挫折與不義：一切的寂寞與失敗，但仍高揚起她底不屈的精神的旗幟前進。」

「她底深造的學問，敏銳的手腕，光輝的智慧和她的勇敢與堅定一樣地驚人。誰求她的幫助而沒有得到賢明指導的呢？」

「如何可以把這個少不得的女人帶走，剩下我們這羣無用的人呢？她去了，我們的時候也快到了。死神把牠底有光彩的能力熄滅了，消散了，也就把世界的榮耀減色了，把世界的財富減少了。」

馬加勒特是勞動婦女同盟（Women's Labour League）的建造者，正如她的丈夫和哈定建造了工黨一樣。與她相知的友人曾告訴我，除了改善世界的最高工作而外，她漠視人生一切的興味。她輕視服裝，輕視得人發笑，一次她的幾位朋友力主為她購一襲新衣，以備出席一個重要會議，因為她對服裝純然外行的緣故，竟把新衣



前後倒穿起來。

她雖厭惡不潔，但爲求加重她諛及酒肆的侍女底職業狀況時的力量計，她仍挺着胸去觀察最低級的公共住宅，詳說她的功績，將非本書所能及，要讀她的歷史的人，還是轉看麥克唐納著的馬加勒特，厄忒爾，麥克唐納傳好。於此，讓我再錄一節脫辭（這是哈定在一九二二年的工黨大會上，呈送麥克唐納夫婦的畫像給麥克唐納時說的，當時麥克唐納辭工黨的秘書轉就國會工黨組的主席）：

「麥克唐納夫人品具非凡的人格，惟藉品德——謙遜的品德——以護取一切與她接觸的人底心志。她沒有一點煽動家的裝扮。給她以特異的力量及宏大的感化力（這種宏大的感化力當我們在她跟前時總會覺得的）者，乃是天賦的溫厚慈祥，何期竟不能逃生命的大奧秘：這樣得天獨厚的人，反而沒有天命以盡其能事，便爾天亡」。麥克唐納生命史中的這一章，隨着他的夫人之死而終結，永不重展。因爲他倆都互以整個的愛相與。凡自他夫人死後才認識他的人，決不會瞭解他所受的打擊如何地嚴重。他之能翻身過來，繼續努力者，全賴他能從失望的餘力中，攔回他的夫人生前所愛的工作裏。

書籍，報章的論文和評論等，還是如泉湧一般地從他筆下放海出來，同時他在議會內和在議會外的工作，也一如往日地受人歡迎。人們也許會疑惑他決心要爲馬加勒特建一個不朽的紀念碑——一個在他的時代底歷史中算爲神聖的紀念碑。外表上唯一的不同，只是更強的緘默。他隱蔽他的私生活，非他最親摯的朋友不能窺破。在爲人方面，麥克唐納儘可被嚴酷地批評。在爲丈夫方面，麥克唐納在心底却保持他底珍愛的回憶於不腐。

爲着他的正在發育的兒女——他的夫人遺下五個沒有母親的小孩給他，最小的希拉（Gladys）尚在襁褓中——他把他的家從林肯廣場移居於罕普斯頓。那兒兩個男孩三個女孩都交托一個荷蘭的女管家保養，女孩們新着她們母親遺留下的教育費，都在「Trenchard」的一個學堂裏讀書，該校由著名獨立新教的牧師名叫做和爾頓博士（Dr. Horton）的姊妹主理，在倫敦的那部份很負盛名。

麥克唐納任下議院領袖的首三年，却是愈來愈艱難的年頭。關於國會法案，工黨沒有什麼困難。一九一〇年第二次總選前，上議院初次向民治挑戰的時候，麥克唐納會說：「我是主張一院制的人。我之相信一院制，是因爲一院制能使立法公正。一個單一而負全責的議院，必能做許多真正的民治的工作，但是那單一的議院必須短期，使它不致於和公共的意見遠離，這是絕對重要的」（註）

註：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日在下議院的演詞。

上議院所不代表的社會階級和社會利益，正是需要社會改良的許多罪惡屬淵源。他把這個意見發表以後，繼續說：

「以我們說來，一院制的問題不僅是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我們如此絕對地肯定它，我們並且要對全國的人民說——我們將繼續不斷地這樣做，一直等到這個爭論解決了之後，等到它在那唯一的途徑中解決了之後才停止——我們說：假如那個保護的牆一天存在，牆後的人不耘而獲，不播而割，假如這些現象（因以上議院之形而存在，壓抑全國的大衆，遲延它的意志之實現，甚且往往破壞它，那末，除了在法典中放進些厲

物而外，決無社會改良可言。」

一九一一年初，國會法案初讀時，麥克唐納代表工黨重申對於憲法問題的意見：

他說：『我不贊成拿廢除上議院這件事的本身做目的。我所以贊成這些改革，乃是因為它們是達到我的目的最好而最可靠的手段。我要求廢除上議院的否決權，乃是因為我剛才指出底經濟的原因。我們有某一種社會改良的綱領，要求澈底的實施，但是我們深信上議院必會阻礙它的進行』。

較貴族與平民之爭還要嚴重的問題——甚至較工黨底社會改良的要求還要嚴重的問題——尙另有一個烏天暗地的不祥不吉的問題，這個問題麥克唐納眼見就來臨了。以一個國際情事底學者的觀點，他相信主持歐洲外交的人們，正在不知不覺間陷入深淵裏，歷史上最大的破滅將隨之而起。戰爭！一個放滿出那些堆積的軍械（這是工黨歷年所抗議的），以致血流成河的衝突。

倚着一羣急進派的議員（其後不少加入了工黨）底擁護，他向不列顛的外交政策挑戰。同時他又特別研究德、俄、法三國間的關係。這兒是危險的場合——有何忠告能停止它嗎？

爲着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起見，工黨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在勒斯特舉行一個特別會議，由麥克唐納主席。

他於致開會詞中說：『在勒斯特，我們從來未耽入過這種幼稚的幻想：以爲一個國家的安全，在乎她放在海面的無畏艦的數目。我們從不以爲一個純以武力爲基礎的國家能抵禦其他國家的敵對。在勒斯特，我們常常站在一聖潔的格言上：唯獨公理能够增高一個國家的地位，並且使一個國家有永久的安全和榮耀，這格言歷代尙存，也

將存於這一代」。

述說完在下屆議會開會的時候，政府將會提出一個再行增加軍備的要求——「一個足以危害我們國家生存的政策」——麥克唐納轉過來說不列顛的外交政策。

他說：「外交大臣無異是海軍與陸軍大臣的總和，如果外交部長進行一個愚養的政策，海軍大臣必須以無畏艦爲那政策的後盾，陸軍大臣也必須增加陸軍的軍費爲它的後盾，因此各國的工黨不僅要爲反對軍備的增加而鬥爭，並且要爲一個審慎周詳及一貫的外交政策而鬥爭。在本大會裏我將不費時間論及那個問題。我希望在下屆議會會期中，（那時我們不是對付我們的朋友，而是對付我們的敵人）工黨有機會批評英國的外交政策。但我不能不說，目前英國和俄國的糾紛，尤其在波斯所表現出來的糾紛，凡是愛好和平與國際親睦的人，都必認爲是一件極不安寧的事。」

「戰爭於現代究竟對我們的國家，加增了一些什麼光輝與尊榮呢？」麥克唐納問完了這句話之後，他以一個引起滿場狂熱的結論完畢他的演詞：

「天降大任於我們。有時我覺得我們沒有把工黨放在一個充份高的尖峯上。可是他們如今起來了；男女的平民們，平民的兒女們，乃至一切勞動者，失業者，及飢寒困迫的男女，他們都一齊起來了——我們要在英國的歷史上展開新的一頁。展開這新的一頁，我們要把歷在誠實的男女額上底編紋滑平，我們要去養育不足食的兒童，我們要去照顧失業的人，我們要去拯救迷路的和被棄的婦人，引領她們踏進良善的路途。如果我們要對自己真

誠，要對民治的習慣真誠，我們必須做上述一切的工作；但是我却疑心，下述的別些工作不與上述的同等可貴。我們還要向法國的同志伸手，向德國的同志伸手，向自北至南自東至西的一切同志伸手，我們要宣佈那神聖的日子，刀劍最後將會插入鞘裏，列國也將會追尋和平的途徑，再不向武力迷逐的神聖的日子。」

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一個決議案，宣言：「國際間一切的紛爭，不應用武力去解決，應用理智和公斷的方法去解決，並主張英國的工人們和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反抗戰報的恐嚇，謀各國間的諒解，保證國際的和平，增進社會的正義。」

一九一四年七月，戰機已達到了一觸即發的時期，上述的決議案及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藉以謀防止歐戰而舉行的（國別的及國際的）許多會議，都不能一刻地延緩武裝的軍隊向戰場上前進。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麥克唐納是否真相信德國社會主義者，仍能於德皇親臨的軍事會議中發生任何決然的影響，是可疑的。雖然當德國方面，最後狂熱的幾個鏡頭，隨着鎗聲的震憾而消逝的時候，他還是為和平而努力，可是在他的心目中，恐怕早已沒有和平的幻影了。

一九一四年九月，正當英國代表剛準備好了參加在維也納（Vienna）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的時候，戰爭爆發了，這真是歷史之鐵則最好不過的例證。

奧地利亞（Austria）致塞爾維亞（Serbia）的哀的美敦書所引起的外交的及政治的影響表面化之後，國際社會主義者總部立時在布魯塞爾（Brussels）舉行特別會議，以討論眉急的危險。歐洲各國全都有代表出席。

工黨關於該會的正式報告說：『大會決議命各支部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保持國際間的和平。並且於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了一個動人的示威遊行，法國的若里斯（Jaures）比利時的樊特維爾特（Vandervelde），德國的哈瑟（Hase），俄國的魯本諾維茲（Rubanovitch），意大利的摩爾加里（Morcari）和英國的哈定都湊合起來，爲和平而呼籲』。

三日之後，八月二日，星期日，國際社會主義者英國支部在特拉發加廣場舉行一個示威遊行，以爲消泯那遮蓋全歐的戰雲底最後的努力。

在那進行大會中，麥克唐納是主要的演講者，他所草擬的決議案受羣衆熱烈的擁護。決議案的原文如下：

『代表着倫敦的市民及有組織的勞動者的這個示威遊行，對於歐洲的前途非常驚懼，所有歐洲的列強，因爲秘密的同盟及諒解，都必被牽入漩渦，那些秘密的協定與諒解，根本便未經各該國的批准，甚至現在她們也一無所知。我們扶助國際勞動階級運動的努力，聯合各有關係的國家底工人，共同起來阻止他們的政府參加戰事的努力，如國際社會主義者總部的決議一樣。我們抗議政府從事任何幫助俄國的行動，（無論是因爲和法國有直接的諒解，或者是由於與法國的任何諒解底必然的結果），因爲這種行動不僅和我們政治的習慣衝突，而且足以危害全歐，我們對於奧地利亞在塞爾維亞的行動所必發生的不和，既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則大不列顛政府應該嚴拒參加戰爭，並應該迅速地進行和平的努力』。在這個決議案未向大會提出以前，能禁阻由英吉利海峽向烏拉爾（Urals）奏出的死亡的音樂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恐怕連麥克唐納也不知。就在那天晚上，德國和奧地利亞合作，

向俄國和法國宣戰。數小時之內，德國已經侵入了比利時，除了幾個迷信的和平主義者之外，人們全都在不列顛政府之後，擁護不列顛保護那『小國』底中立的誓言。

麥克唐納和百個真誠的理想家，在過去數年間致力於國際的和平和友誼，原是要來作反抗戰爭的堡壘的，到這個時候却寂然無聞。當『國際運動日』漸沉於「烏雲滿佈的海」中（註）的時候，若臺斯被刺死了，而和平運動中其他的領袖，對着那些雖則預知却不能阻止的事情，也一籌莫展。

註：J. Ramsay MacDonald, in contemporary Review, Sep. 1914.

勞動者在特拉發加廣場舉行示威的時候，自由黨政府底探聽者偵騎四出，以試探各黨對於比利時被佔佔的事底聯合戰綫的程度。各黨的答覆成了歷史。當英國宣戰的時候，約翰朋斯（第一個代表工人的開員）和摩黎助爵（麥克唐納的老友）都辭職，不願參加那正在開始中的戲劇。然而曾嚴厲地反對過布爾戰爭的，曾立志如果英國再動武便辭職的喬治魯意，都因為比利時被佔之故，從一個和平主義者，一變而為一個最熱心的主戰者。和內閣總理愛司英士接近的，並且對於國際事情有專門智識的麥克唐納，如果他肯以他的勢力勸使勞動者擁護政府，則內閣中將少不了他的一席。

但是他不能緘默，他並且要反對。當他赴議會參加實際戰爭開始前的有歷史性的辯論，路經宮殿圍場（Palace Yard）的時候，他也許道他正在過着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關頭。當越來越凶的戰熱已經注射了一切人的思想：工黨也逃不出例外。也許他那天演說的時候，他破天荒地覺着，原日他領導的人，向他表示不費成的騷動。但是，

如果非戰的態度便是政治的自殺——真的似乎如此——那末麥克唐納決不會向左邊或右邊逸出絲毫的。

議場內的空氣非常緊張。當葛羅爵士 (Sir Edmund Grey) 登台報告決議送哀的美敦書給德國的經過，并講明那個步驟的時候，全體議員都屏息靜聽。蓬涅、羅 (Ponar Law) 繼起發言，約翰、勒德曼德 (John Redmond) 隨之而起，滿腔熱誠地謂愛爾蘭將擁護政府參戰，這個戰爭，凡出席的人都知道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種爲戰熱所震憾的空氣之下，工黨領袖起來了。麥克唐納在開會之前曾把他的演詞和他的同志討論，並且得了他們的同意。名義上，他代表四十二個議員說話。實際上（事實上不久也證明出來），戰爭的狂潮甚至已把這少數的人也拖到政府方面，去操縱『我們慎重地抽出的』劍。

議場中有些騷擾——都在交頭接耳，議論戰事的來臨。個個都不像要聽關於戰爭之必要，或者戰爭的理由辯論。戰爭祇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在英國大多數人的腦海裏，英國的路綫早已分明。

麥克唐納不願這些騷擾。他立意要發表他的演說。他常常以爲什麼是對黨和對國家的責任，他便不顧一切，孤意而行，如今他還是那樣。

那篇演說（回答葛羅爵士的釀成哀的美敦書之發出底外交談判之巧妙分析，的演說）很有歷史性。

『如果環境許可我的話，今天下午，我原擬靜默不言，但是環境不容我不言。如今我祇簡單地對於剛才的兩個演說而發言；葛羅爵士（諸君大多數是擁護他的）的演說底嗚采聲將會在歷史上記載起來。他的演說動人極了；我們對於他的結論，或許還可以多多抗拒但是我們却不能抵抗他的懇求中的煽動。我想他是錯了。他代表的和辯



讓的政府也都錯了。我想歷史的裁判，他們也將是錯的。我們且看罷。

他分析英國所以援助比利時和法蘭西的理由，並斷言如果葛魯得士認明了英國也在危險，「便願以我們自己獻給他」，之後，復說：『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議場的空氣在反對我們。以前我曾經遇過類似的反對，然而一九〇六年我却得到了多少的報酬。（按意指得選——譯者）這種反對定將再來。我們將經過它。我們必能經過它。以我們來說，無論將來遇着什麼，無論人們怎樣說我們，無論有什麼打擊加諸我們，我們還是要說，英國應該保持中立，因為在我們的心底裏，我們相信這才是正義，並且惟有保持中立，才和國家的榮譽及現在的執政黨的習慣一致』。在那戰雲瀰漫的時候，這個演說所預兆的一切令人望與排斥，注定都打在麥克唐納的頭上。前途如何地險惡與孤立，連記着自己在布爾戰時之失人心的他也不能預測。當時他也不知道，一個星期之內，他的本黨也把他免職，另選別人代他。

讀他的演詞的人，恐怕二萬人中尚無一人贊同他所主張的政策。這個時候，全國人都已知道葛魯得士如何『鞠躬盡瘁』地去防阻戰事之爆發。作者相信在歷史的裁判上，英國的行為是清白的，除戰而外，不列顛別無可循的途徑——不論是立刻與聯合國共同作戰抑或後來與敗北的俄法共同作戰。

當夜不列顛的哀的美敦書發出：這樣開始了歷史空前未有的大戰。

兩天之後，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工黨執行委員會在倫敦舉行應付時局的會議。從當夜發生的事情及麥克唐納在下院所發表的演說看來，該會通過的下述的決議非常重要：

「歐洲各國間的衝突（英國也被牽入旋渦的衝突），乃是由於各國的外交部長都進行以保持均勢爲目的的外交政策底結果；英國和法國及俄國相互諒解的政策，其勢必增加俄國在歐洲及在亞洲的勢力，同時即危害及英德間的友好。

「葛羅爵士（就以他在下院所提出來的事實也足以證明）遮閉着國民的耳目，不顧及國家的榮譽，答應了（任何戰事，只要法國嚴重地牽入旋渦）幫助法國，並且在下院尚無絲毫機會以考慮之前，他已給予法國以切實幫助的保證。

「因此，勞工運動願向國人重申下列的事實，那就是：勞工對於釀成戰爭的政策曾力加反對，在戰爭已爆發之現在，它的責任在最短的期間謀和平之恢復，使歐洲的勞動者間，得獲重建友好的感情底良機。」

這個決議之出於麥克唐納的手筆，不難發覺，其後工黨執行委員會復與議會工黨開一度聯席會議，予以認可。這樣正式批准了他對戰爭的態度之後，當夜，大多數工黨議員却反對他們的領袖擬在下院表示這個決議的演詞。

在這個反對決議之下，工黨棄掉了這個曾不辭勞怨地領引他們走上成功之路的舵手。麥克唐納辭職之後，漢德森（Arthur Henderson）被選繼任。幾個鐘頭之內，國會工黨和全國工黨執行委員會都已聯成一氣，決定協助募兵運動之進行，這樣認可政府的政策，同時容允幫助戰事抵於成功。

祇有四個獨立工黨的同僚——哈定，昭厄特（F. W. Jowett）托程·理查孫（Tom Richardson）和史諾登

(Philip Snowden)——與英時的領袖相階，他們四人也和麥克唐納一樣被黨中餘衆排斥。

無論前途注定如何艱苦，——五人均無能猜測前途的沙漢何等寬闊——至少，他們都可以按實地說。他們只在擁護了黨在戰事爆發之翌日所自委之正式政策而已。

## 第八章 麥克唐納與歐戰

麥克唐納在大戰爆發後的幾個月中底活動，是他生涯中最受人討論，也是最受人（甚至社會主義者）怨恨的時期。如果『賣國賊』這個綽號不再加在麥克唐納頭上的話，這不是因為後來摩利鎮靖了批評者的惡罵，乃是因為這個和平者在大戰期中預言的許多不快事情都一一實現，傷促地懷疑的國民隨之日漸衆多的緣故。假如麥克唐納是要報宿仇的話，他大可以指出他在大戰期中的種種忠告，為過去十一年間的歷史所充份證明的忠告，來回答他的敵人。

卽在漢德森代替了他的職位以後，麥克唐納如從友人的勸告，緘默不言，還足以瞞過在醞釀中的激視運動。他祇要效法約翰朋斯的先例，隱息園林不問世事。可是他卻覺得他的神聖的責任，不僅應在下院宣言反戰，並且應繼續奮其全力，以謀公道的及協議的和平之早日實現。

在我們沒有以他的演講及文字去考究他的態度之前，有一個無稽之談，我們須得說及。一九一八及一九二二年總選中，有些人隨意加罪麥克唐納，說他反對海陸軍人及其家屬之利益及輕視不列顛的武功，可是我詳細地研究過他在大戰期中所有的演說及文字（無論在下議院之內或在下議院之外的）之後，却找不出絲毫的證據。澈頭澈尾的，麥克唐納反對歐戰的根據，乃是否認戰前不列顛的外交政策，和否認戰爭的本身。他相信戰爭解決不了

任何事情。戰爭祇能『在四年中把文化倒退了一百年』。他痛恨的不是人，乃是政策。他一面批評不列顛政府的政策，後來更批評戰爭的目的，一面却主張軍人的利益，並在年俸和服役待遇及別的問題上擁護軍人的權利，其至誠並不下於任何下院議員。

因此，他於一九一六年在下議院發表一篇重要的演說，主張下議院一息不懈地去求和平，使武裝戰士們底犧牲與英勇不致於徒然（當時他底任何演詞，人們只發表一小部份，並且還祇是斷章取義的短句，用以加烈全國憤恨的火焰）：

『爲募兵計，關於我們底目的之莊嚴，我們儘可力說愛國主義，儘可不要內容，祇要言詞激越的結論；但是際茲成千累萬的同胞正在戰陣上瀆射他們的鮮血，或正準備着拚他們的頭顱的時候，那種說法却無益於本院所負的政治重任。那直是規避我們的責任，要我們的外交部長能在戰聲雷鳴的時候，仍積極從事外交活動，能留神軍隊給他一切的機會，能留神戰士給他一切的機會，以產生或擴大將來的和平底基礎——要他能如是以力盡其職守，要我們能如是盡職以催促他去盡其職守，我們才配舉眼仰望戰場上的人，才配對他們說，我們雖在後方，却還是幫助着他們在戰場上的工作』（註）

註：House of Commons, May 24 th, 1916.

不論麥克唐納對戰事的態度對或不對，讀者必須待讀完本章之後才好下批評。然謂其不聽那些爲報國而戰的人底要求，却是不當的。

以下黨領袖的資格回答葛樂博士的演詞之後五日，（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麥克唐納投文勒司特先鋒報（Leicester Pioneer），批評議會中重要的辯論。

述及付款延期令（這付款延期令目的在使倫敦的財政機構能渡過戰事的震動不致於恐慌）之後，麥克唐納復批評葛樂博士的演詞，其後他的批評文却被千數的演講重述出來，以爲反對他的證據。

他說：『當葛樂博士起來發言時，保守黨的議員們喝采歡呼。自由黨議席上給他的歡迎，不僅沒有那樣熱烈而且沒有那種音量。終其演詞，議場上的情形迄未改變。保守黨人揚巾笑叫，自由黨人却一派一派地分開來，時而表示反對，時而隨保守黨表示贊成，時而寂然，着驚，着驚他們被強姦了什麼。』

他續言，『以雄辯而言，該演詞自無可議。惟在一切過去後，我們冷靜過來細讀它，看看究竟爲什麼英倫已差不多對德宣戰時，我們便將發覺自始至終惟一的理由乃是因爲外交部是反德，海軍部却又是亟欲找機會使海軍實戰演習的。』

論及葛樂博士關於比利時的完整問題之後，他繼續說：『可是事實在那裏呢？葛樂博士引起我們對比利時的注意底理由，實幾乎誤謬。且看他在評論後一二小時，向下議院宣讀的從倫敦比利時送來的正式文件，便可明白，文內說：「昨日下午七時德致比書，建議比利時守友誼的中立，如是在和平締結之時，仍可保獨立」。』（註）但是他先前所說的話却無可收回。譯文上並無完整字樣，只有獨立的字樣。先前他使我們意會，如德國已保比之獨立，他或許已稱心滿意。事實，德國確會保比之獨立，可是他却已出戰了。他更以爲下議院不再會尋根問底精

研文句了。

註：葛榮爵士的演詞如下：「我向卜議院諸君報告一些我得到的消息，這些消息當我在今天下午向諸君敘述的時候，還不在我手上。這是我從倫敦比利時公使館得來的消息。

大旨如下：——

「德國於昨日下午七時發出一個通牒，建議比利時守友誼的中立，讓德國軍隊自由通過，如是則在和平締結之時，比利時及其屬地均可保獨立，苟拒而絕之，即視比利時為敵以爲恐嚇。並限於十二小時內予以答覆。比利時回答說，假如侵襲她的中立，無異昭然侵犯其國權，同時假如比利時接受德國的建議，無異犧牲國家的榮譽。比利時認定她的義務，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嚴抗任何壓迫。」

固然，我祇能說政府準備對於這個消息予以嚴重的考慮。除此而外，我無需再加以評註。」

「他要求德國底別的保證也是一樣。德國曾經特別聲明，如果英國保守中立，他決不轟炸法國北岸。這是德國第一次的答覆。外交部長說，還不满意。他自傲地不讓我們知道怎樣，也不說德國的答覆和他的要求相差有多少，但是明顯地德國的意思是拿這個答覆去應付當時的局勢，而英國此後也沒有進行任何外交的企圖。以冀德國修改他的宣言，使它更令我們滿意。其實外交的企圖已被他們高傲地放在一旁，因為前星期末外交部已和海軍部決定了助戰的緣故。

「我們從不爲這樣小的目的而武裝我們的國民而要求他們去犧牲。一切困苦與憂鬱都是爲葛榮爵士爲我們請來

的，這些困苦與憂鬱做了我們家中底摯友。不幸地，他們將必接受了他的請柬，待至他們的陰影遮蓋了天空的時候，我們將會思考與自覺，將會起來反抗那些苦難的製造者。同時，歷史也將會公正地判斷一切，星期一日在下議院得到大多數人歡呼的演說，將會與爲它而犧牲底人們的生命相衡，其本身亦將變成一些灰燼與塵埃，武斷與謬誤，此外一無所有。

凡是記得戰事初期中漫延全國的憤慨，愛國的狂瀾和犧牲入伍的精神的人們，不消說也會知道這個評論導引起  
的注意不僅限於勒司特。剛在宣戰的星期中，它之出現，自足使羣衆空前未有的憤怒，集矢於該文作者的頭上。  
實在，假如麥克唐納願爲不列顛最被憎恨的人，他除掉說英國之參戰乃是因爲『外交部是反德的，海軍部却又是  
亟欲找機會使海軍實感演習的』這句話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話了。

八月二日，他在勒司特商業堂用粗糙的聲音說，他『不相信戰爭，他以爲戰爭罕有需要，如其是需要也罕有  
成功。』

麥克唐納續說：『我們並不真是爲比利時之獨立而戰，我們之所以戰，乃是因爲我們是三國協商（Triple  
Entente）的份子，因爲我們的外交政策自來便是依照同盟的辦法以期保持均勢，並因爲我們對於商業的勁敵有  
了偏見。如今我們是參戰了，我們祇能始終從事。一面忠愛着我們自己的國家，奮力地期望着我們不至於失敗或  
者掉臉，我們，一面却希望着德國失敗或者掉臉，這算是悲慘的事。人們對於陷我們於這種困境的外交政策是如  
何地憎厭呢。』



然而勒司特先鋒報的這篇論文所引起的反對的怒號和在勞工領袖發表的「我們為什麼參戰」（小標題：「葛蒙爵士的責任」）那篇論文所引起的呪詛的怒號比起來，祇算是未來的嘗試而已。其後，起先僅是辱罵的運動，如今竟急轉直下而變成實際的迫害，甚至他的朋友也知道了宣佈麥克唐納為講演者（在倫敦和別的許多城市），無異是開放暴行者的狂瀾的信號。從那篇論文發表以後，這個前任國會工黨組主席底神聖的言論自由權，在國內的許多地方也被剝奪了，然而我們也得承認這種舉國訛毀的極端的表示，還是阻不住北英格蘭及蘇格蘭的人們（在戰爭中任何時）對麥克唐納底演講的歡迎。反而倫敦，並且奇怪地，南威爾斯，其後且及他代表多年的勒司特，却成為敵對派的主力。

麥克唐納在勞工領袖發表的那篇論文（後來獨立工黨重印出來），足以視為他反戰理由底熟思的文據。那是當時他反戰的口實，對於要去考究他生涯中最大的政治的關頭底歷史的人們，它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書末我把它重印出來。（註）

註：附錄四。

這裏摘要錄出幾節便够了，這幾節也就是他的政敵拿來，說他不懂是和平和不愛國並且是袒護德國底進一步的證據。

「當葛蒙爵士謀德俄兩國間的和平底企圖失敗之後，他便藉口保護比利時，故意把我們牽入戰事的旋。我把我曾明白證明過的話再說一遍罷——這回歐戰乃是各國間的『合縱連橫』的結果，英國之所以參加戰事，

乃是葛葉爵士底外交政策的結果。

另一節說，「政府爲這個戰事加上高尚的意義，她對我們說，英國不能不擁護比利時的獨立。其實這祇是一些矯飾的小技而已，這種矯飾因爲比利時人戰時的勇猛將使政府能暫時地遮瞞下來。

「貧窮與我們相借，死亡復與貧窮並行。假如我們坐下來用十分的智識問問自己，「爲什麼這些罪惡會出現？」其唯一的答案就只是：因爲八年來我們的外交政策都爲葛葉爵士所主持的緣故。

「德國如是希望限制戰事的範圍，其大使因曾請葛葉爵士自行提出他心目中的中立條件，然葛葉爵士却謝之不提。這個事實爲葛葉爵士及愛司英士在議會的演劇中所隱蔽了。

「他們二人把全盤的真實隱沒。假如葛葉爵士曾把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則他當日的演說決不能釀成戰爭的情緒。葛葉爵士擅以國家的榮譽（國民一無所知），替爲法國或俄國而戰，他早已無討論中立問題的餘地，這是鐵一般的不可移易的事實。」

上述的摘錄（讀其全文更不消說），顯示出麥克唐納對戰前八年間外交部採取的政策，何等地不妥協。然而一旦戰事爆發之後，他却從不非難繼續作戰以至英國（法、比、德也如是）能獲得和平爲止之需要。

戰期中，麥克唐納不能不評我們的外交政策，一來恐怕我們裁判失據，二來恐怕在戰後和平締結時（這和平含着更大的紛亂的種子），他會被迫着默言。戰事之初他即專力於和平的條件，以爲和平的條件才是真實的試驗。因此他謀置他的批評在個建設的錠子之上。然而一般人却早已決心一勞永逸地摧毀德帝國主義的威脅，沒有

耳去聽任何建設的或破壞的批評，當德國宣傳局着手將麥克唐納的演說和論文散斷地傳播以證實（從一個不列顛政客口中說出來的話以證實）他們之謂『無信的英國』才是侵略者，葛榮爵士才是罪魁的話時，不列顛的一般人士無言以示他們對這個『叛逆的和平主義者』底憤恨，於是轉而行動。

其時反對麥克唐納的運動益形酷劇，因為他底舊日的同僚們已獻全力以助混合政府（他們對於由他領導的小羣和平主義者連公開裁判的機會也不為之謀）更獲得些合理的根據。

麥克唐納每因在報上答辯他底被人誤述的意見時，結果祇助長紛擾而已。在給晨報（Morning Post）的一封信中，一九一五年出現，他指出，在勞工領袖的論文中，他曾特別聲明『葛榮爵士曾竭力去防止一個歐洲的戰爭』，以答辯人們謂他曾把『歐洲的大激變歸因於葛榮爵士底詭辯』之責備。

麥克唐納說：『我說，此戰乃是歐洲均勢政策的結果，當它必然地來臨時，我們無能防阻它，因為我們已無望地被捲入了事勢的旋渦裏。那並不是葛榮爵士（不論他是一個權謀家抑或是一個聖人）造成此戰，祇是說戰成之後，他甚至無能奮力以使我们避免它而已，我祇說了這些話。』

社會大多數人視這樣的邏輯為『吹毛求疵』的東西。人們祇有主戰或反戰而已。因此麥克唐納擬詳究引起戰禍的外交事件底一再的企圖（以為將來更穩實的準備）注定都是失敗的。其唯一的結果，祇更激動輿論對他的反對罷了。

他給勒司特市長的信，也無補於事。信內他解釋為什麼不能赴該城的募兵會議，並將他對戰因的意見和他對

忠誠的公民（無良心上異議的忠誠的公民）在大戰期中爲皇軍服務底責任的意見，明白地分開：

「市長先生大鑒，

星期日未克與會，抱歉至深，余於戰因之見，除爲人誤述外，大概是盡人皆知的；但我們却在戰了。它將會自了的。力與精神必得勝，無數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結果將隨勝利而來臨。

因此勝利必屬我們。英倫尙未衰頹。她的使命必須完成。她可以（如果她決心）在世界上各民主國中得到尊榮，如果和平將來由她的調護而成功，則歐洲各民主國必爲她的保護人。這應是無疑的。

畢竟我們此時不能退回來，也不能向右轉或左轉，我們必須一往無前。歷史將會在適當時明判賞罰，惟目下全國青英必須解決眉急的勝利問題。讓他們都以昔曾爲國爭榮的勇士底精神從事罷。任何走入迷途的人，經這樣的鼓勵之後，也必會走回坦途來了，戰聲原不是各國人民的，然到頭來犧牲的却是他們的生命與自由。

假如有機會讓我可以訴諸純正的愛國——我相信這是吾人心中最可寶貴的情緒，使它清清楚楚地與我認爲和真正愛國主義無關的思想相別——我將愉快地利用那種機會。如果需要的話，我且不辭自造之。我要工會，友誼會及同樣運動底真誠的人負起他們的責任。對這些人祇要說「英倫需要你」就夠了；要說得恰恰不錯。他們將會聯合起來幫助她。他們將保護她，待戰事完結以後，他們更將負責使釀成戰事底政策和情況都如災禍之陰影一般地消滅。

你的最忠實的麥克唐納」

假如那封信在一九一二或一九二二年發表，則它之爲懇求全國不負其理想底鼓勵的與愛國的呼號，了無疑

義。但一九一四年的時勢遠離正常，是信之發表，却引起個新罪名。（雖然它對於國家的榮譽，公民的責任具有崇高的觀念，復明示作者之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祇為的是項批評為他希望的公正的與永久的和平所必須）看來，麥克唐納是猶移寡決的。他一面反對戰事，一面却擁護戰事。一位最近一年任國會議員，在大戰全期中出席下院的某君曾對作者說，在大戰爆發後，麥克唐納連着幾個星期躊躇不決，并引這封關於募兵的信以為證。他或許未細讀麥克唐納當時的許多演說而已。他所有的演說，都有一貫的明顯的政策，即是一面反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一面承認在戰事一旦迸發之後，在未獲得公正的和平底可能性之前，必須繼續作戰的事實。

誠然，麥克唐納於徵兵的提議是不贊成的，但是他之反對，除去要求尊重那些持政治的或宗教的理由以反對兵役之入底意見而外（且須記着兵役法中『信仰條款』乃是愛司葵士所插進去的，關於此點，許多人贊同麥克唐納的意見），乃是因為確信不列顛不能一面送千萬的壯丁上前線，一面不致陷煤田軍械業及別的基本工業於危險的緣故。麥克唐納之持此見或許是錯了。後來的事實也令人聯想到他是錯了。但最少他不負有任何防阻不列顛勝戰底期望之罪。

人們對麥克唐納最有損害性的責備，乃是說他的言詞語調予敵軍宣傳部以至所歡迎的軍需品。發楞泰因開勞爾爵士（Sir Valentine Chilol）在一九一四年十月的大晤士報（The Times）上發表一信，批評他對不列顛各大臣的責備，并將當時流行的意見綜合起來，說：

『這類酷烈的責備，在國外，尤其在德國定然生出些什麼影響呢？生出這個影響：因為它們正巧供給支撐德

國宣傳（其主要目的和對像在描寫大不列顛爲暴徒爲惡棍）的資料，所以不僅在德國被熱烈地歡迎，在全世界的中立國家中也被熱烈地歡迎。德國聯邦議會議長，在其計劃要求世界同情酷愛和平的德國中，謂德國適於敵人底陰謀勉行參戰，不移不易地恰恰倚據麥克唐納先生所用的論辯以痛斥大不列顛之奸詐，是豈偶然之符合？全德報章隨着麥克唐納之領導，對準葛勞博士（視彼爲不列顛背棄信義的具體物）集中他們的狼毒，說他口上儘說和平心裏却在備戰，是又豈偶然之符合？過去七星期中，我曾過細研究德國及某些中立國的報章（雖不再以新聞記者的資格），可是差不多沒有一個重要的德報不把麥克唐納的宣言（註）一部的或全部的載出來，藉作痛罵英倫的口實。誠哉，在德國宣傳之目的上，麥克唐納的那篇宣言，有如是大的價值，人們竟公然地把它以數頁單張的形式大量地輸入德國，復從德國分送至各中立國，作爲廣播真相之用。此外，我還目擊中立國的擁德報，把它轉載或翻譯出來，按以同樣的註解，用諸同樣的目的。

註：“Why we are at War,” by J. Ramsay MacDonald, The Labour Leader.

信末，發楞泰因開勞爾博士將那時英國大多數人對麥克唐納的意見表示出來：

『實際戰事——我們從未參與過的可怕的戰事——的時候，麥克唐納先生曾公然以無恥的反覆責難其自選的各大臣，以圖損毀自國的名譽，他更進而助敵國的報章——助得且非無功——使之對自國懷惡感，不僅在德國如是，在各中立國也如是，須知後者對大不列顛的向背，隨時都足以重大地斷然地左右戰事的勝敗。此其行動直越乎最大限的信仰自由，不列顛政府及其國民決不能當然地或安然地等閒視之』。

心裏相信着反對自選的政府底外交政策是不對的人，能默然嗎？別人當他發覺了自己的言詞正被曲解，敵人且引之以反對自己的國家時或許會如此。

麥克唐納先生之愛其祖國定不後於國中任何人，但，對着當時的爭端，他只能說（戰後第一星期在勒司特說的）：『一面忠愛着我們自己的國家，奮力地期望着我們不至於失敗或者掉臉的我們，一面却希望着德國失敗或者掉臉，這真是悲慘的事』。他痛恨那種陷歐洲智識界領袖於主戰或蒙辱二途的外交，既痛恨也就不能默然。

其前路如何地悲苦，世人也有所知了。被誣，受罵，集會被擾亂，許多老友都轉到敵對的陣營裏，政界中無人勝過如是失人望的暴風向克抬頭的。某些他昔日最密接的團體，也不堪其苦，（苦，是由於他對戰爭的態度所加諸他們的）。祿錫矛斯，他的本鄉，也在它的高而夫俱樂部中間除其名藉。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勒斯特自由黨協會的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Leicester Liberal Association）——這協會自來對麥克唐納都取友誼的態度——舉行了一個會議，熱烈地通過下列的決議案：

『自由黨協會執行委員會此次會議關於勒司特先輩的國會議員——麥克唐納先生——對葛累爵士所探的態度，願在會議錄上表示堅強的異議；并抗議他那些勵敵掉己的，在中立國，對戰前外交不列顛之所為招致一種謬誤意見的言詞與文字；不得已地完全與他批評和攻訐負責的大臣（國家此時有最高需要的大臣）底論點分離』。

那個字字審慎的決議案，毫無當時報章用以描對他的活動那類語氣之暗示。被倫敦某報（註）稱為『麥克唐納

先生之政治的擁護者」的某君說（其言足以代表勒司特對其國會議員的意見）；「在德國範圍之外，只有麥克唐納先生要求世人等待更進一步的證據，才去定那平和的不抵抗的清白者之罪。麥克唐納先生必須另找個選區。個人說來，更幸他另找個國家。在英倫他已無容身之地。他不能愛英倫，否則他為她服役了。他既不服役，復不屬人，只在那兒吹毛求疵而已」。

註·Weekly Dispatch, July 4 th, 1915.

以「既不服役，復不屬人」責諸當出席下院的麥克唐納，無乃大怪。當我們憶及其人以對戰死者滿懷悲憫之情，不惜於戰發後的頭幾個星期，以孟祿醫生的野戰病院底義務員的資格（Dr. Hector Munros Ambulance unit 當時在費爾尼斯 Furness 附隨比利士軍隊）親赴比利士時，此一責難更屬無稽。

這個紅十字隊（Red Cross unit）早期會員中有非爾士夫人（Lady Dorothy Fielding）辛克萊小姐（Miss May Sinclair）和現被稱為爵士的季布茲先生（Mr. Philip Gibbs）諸人。在倫敦有個委員會專事派送義務員的工作，一九一四年秋的一天，孟祿醫生接到一個新來者的名單「麥克唐納」之名赫然在目。

麥克唐納於丹刻克（Dunkirk）會見孟祿醫生。同車赴野戰病院本部。當夜孟祿醫生留下麥克唐納在其陣營過宿。翌日孟祿醫生回來時，却已無麥克唐納的踪跡，多方詢問才探聽出麥克唐納已被比利時軍官（遵照從不列顛當局來的訓令）捕去的事實。他們以他通行證越序為當道讓讓底辯解，但當地的不列顛高級官員們——其中一位現任帝國內其重邦的總督——認他為不宜於準許以任何資格在西線服役的人，才是真實的原因。



經孟綠醫生幾度磋商之後，這個被囚的國會議員才以下述的條件被釋出來，即是：孟綠須親自駕自己的車驅送他至丹刻克，以一個比利時兵為護衛，并須日整他上了開赴英倫的船。

以孟綠醫生而言，事變似告終結。但二星期後西利將軍（General Seeley）親臨戰地病院本部訪問麥克唐納。西利傾聽孟綠醫生的故事，然後進而解釋說，他得到訓令，內開麥克唐納重來比利時，現在途中，囑領彼自山赴前線任何部份視察。

當日麥克唐納便抵丹刻克，以不列顛本部賓客之禮相待的正是二星期前認他為『不合法』予以放逐的官員，後來，在聖奧美耳（St. Omer）復受夫棧亦將軍（General French）的款待，一九一四年耶誕節時并視察了整個的前線。

在未重來比利時的二星期間，在倫敦他曾會過啓折涅伯爵 Lord Kitchener 譯者註：啓折涅伯爵戰時任陸長）并把丹刻克所遭遇的事情詳細地向他報告。啓折涅伯爵聞之，異常震怒，立刻給他一張赴英軍本部的紅色『運客車』通過證，使他持之可以通過英法軍整個的前線。

經過被捕的事件之後，麥克唐納便不再企圖在法國從事實際的救護工作，但他還訪問了許多後方的醫院，西利將軍事後曾述及隨他訪問中有一次遭逢重砲的事情。他說：『麥克唐納在危險萬分的時候所表示的鎮靜與勇敢，實非任何人所能及』。（註）

這些事情暗示出麥克唐納在戰事期中痛苦的命運，但僅只是暗示而已，在大戰期中，他說他為真實的話所付的代價底真情實況，只有麥克唐納自己才能佈露出來。大概他永不會佈露出來的。有位大戰期中接近他的人曾對我說，自始至終他從未聽過麥克唐納對於那使他見棄於社會，甚至敢庇護他的人也被恐嚇的反對運動偶評一語。然在戰後，他却不辭千里遠候在險巖滿佈的牢頭會與他相償的人。

一般人的敵愾心，在兩個著名的集會中爆發出來。其一為在倫敦紀念堂——正是工黨創立時他曾出席的地方——舉行的集會。倫敦人士決意不聽這個『極端和平派的賣國賊』發言，同時一些請假回到倫敦來的澳大利亞軍人，復從而以暴力使那個公判見諸實行。那天要演講實不可能，麥克唐納，像喬治魯意在某慶祝會一樣，只好絕演講之念轉而逃生。

二場爭鬥更屬險惡。這便是『普爾斯達廣場之戰』(the Battle of Plumstead Common)，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獨立工黨籌備一個自由演講大會，麥克唐納從蘇格蘭回倫敦參加。是日羣衆擁護與反對兩派相爭以至於互毆，麥克唐納說畢以後，很困難地才逃避出來，當時石子橫飛，頭顱破裂，不管他有多大勇氣，倫敦人士之不願靜聽他的言論，卻又來一次明顯的表示。

此時，或許有可為仇怨辯解之處，但麥克唐納堅決地不讓個人的仇怨乖枉他的判斷。一位曾與他同時代表出席某大會（大會在負責的報紙也在討論應否把他監禁起來的時候舉行）的工人曾記一個事件駁諸報端，這事件暗示出麥克唐納在放逐時的情形。

選格拉斯哥工人說：「我曾會過他，在同時代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無人有較他不屈不撓而又中庸的力量。在黨內，他也不去獵取聲譽。

「拿這小事件來說罷。一九一六年紐喀斯爾 (Newcastle) 市廳滿擠着獨立工黨年會的代表。黨人中贊成強硬政策的顯然少數。代表們一個繼一個地起來大聲呼喊要取漢德森班茲，克來尼 (Clynes) 帕克 (Parker) 諸人的頭。這兒正是取諸於衆的千載時機，任何極欲把握着正在興起的民主勢力的在野黨首領，未有不爲附和羣衆的誘惑所動的，然而，麥克唐納却徐徐地，帶着有節調的蘇格蘭腔調，以嚴正的論理代替那足以使全場狂熱的激越言詞，預言暫時的戰事問題完結之後，將來統一的需要比前更大。演詞的要旨是「雖然你們與他們的意見不同，但還須平允地相待」。

「非有道德的勇氣，決不能表出那樣的態度，麥克唐納從不避衆憤而懼於爲善」。

戰事沿其指定的路程前進，國家一再爲勝利而一致犧牲，隨着憎恨也變爲迫害。

當不列顛各報將麥克唐納投登在羅散 (Lausanne) 出版的進步的文獻 (Les Documents du Progres) 底論集裏的一篇關於德國的暴行 (人們以之作爲宣傳之用) 的文章譯載出來之後 (後麥克唐納說「真準確」)，反對他的運動愈益熾煥起來。(註)

註：一九一五年一月，在白實士關於德國在比利時之暴行報告書 (Bryce Report on the German Atrocities in Belgium) 未出版前寫的。

『余意，利用「敵人暴行」紀以爲宣傳，是極應斥責的。第一，比利時及法國委員會所接受的證據，并非真實。在一切恐怖的经验中，他們的神經早已紊亂不堪，細密與準確的觀察力也完全毀壞了，要這些不幸的人正確地報告遭遇的情形，差不多不可能。一旦可怕的死亡，他們看來會成暴行；幻像代替了觀察。我頗信，假如我也如這些不幸的人們經受同樣的一切恐怖，則我的所謂證據也就無置信的價值。因爲我的供述只代表恐怖加於我的智力底印象而已。』

『在英倫我們已發現許多事件，起先似乎是絕對證實了的，及後始知竟是全然杜撰的，至少也是狡辯的東西。如今我們學乖了，不再接受表面可信的供證。我不明比利時和法國的裁判當局（不久之前，我且疑及英國的裁判當局）如何竟能在如此的所謂「暴行」報告上簽他們的名字。這些報告在平常的違警罪裁判所也不會容納的。』

『自然在亂離時期，不免有虐待與野蠻的舉動。而且虐待與野蠻的舉動德國軍隊也定然要負大部份責任；其中一部份簡單的理由乃是因爲它是敵國作孽。這類過分的行爲自來與戰爭相聯，并且當是加罪於侵略軍隊的。可是利用這類的紀事去播撥各國民間的感情，去延長戰事，却是可惜與鬼惡的。這樣的行爲也就應受正直與真誠的男女們之反對』。

民主管理制協會（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在北明翰（Birmingham）舉行一個會議，麥克唐納出席演說，他以下述的話證明他之謂應以清明的思想對付存亡攸關的問題之說底不謬：『他深信世人將會回復和平的信仰，經過黑暗的陰沈的痛苦境域之後，男人們女人們將會回復人類最有努力的慾望和鄰近和』

平地快樂地相處。可憐的失了丈夫失了父親的女人和兒童，將或有一天會和德國的失了丈夫，失了父親的女人和兒童相依着，手攜手的在善良的人底公墓哭訴。假如他的話會使人易於有清明的思想，假如他曾與那些從事會使人易於有清明的思想的人相交，那末，甚至死人也能奪去他覺着已爲國家供獻已爲歐洲善誼供獻所得到的最大快樂與最大的光榮』。

由軍械部長喬治魯意倡辦的工業徵兵，藉使政府有完全管理大不列顛勞工勢力之權底提議，麥克唐納力持反對。他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勒司特演講，力謂如果政府容許徵兵制（無論以任何形式出之），將會危及民主的自由。

他說：『我不是因爲對戰爭有何理論，才反對征兵，我之反對徵兵乃是因爲我相信如果你們讓徵兵在英國創立，則英國整個的精神將會因之起急激的變化，並且會盡改那些使人住在英國覺着光榮與快樂的特質。徵兵的意義就是使每人都成爲一個潛伏的兵士，一旦國家有事，政府便可以把你從一個平民變做一個士兵，你以平民身份抗而不做的事，也得使你如兵士一樣的做。假如你們知道我是如何地受那些要在政治上乘機行事的人底批評——那末你便可相當地明白我對他們所作所爲持輕蔑態度的緣因。

『誰是徵兵運動的領袖呢？他們正是會與工會主義作死敵人的。我們將以其爲無意義視之嗎？假若如此，那末你在一九一五年較你在已往的數年反而更近視了。人們一天能自決出賣或不出賣自己的勞力，便一天站在可與資本來相抗衡的地位（當資本來引起了衝突的時候），但是你如沒有那種自決的可能，那末你的工業的自由便被

剝削了」。

麥克唐納對政府不建議徵財加以非難之後，他繼言德軍侵比並不是大戰的原因。却是大戰的結果。他說：「葛榮爵士說德之侵比不是戰事決定的原因，但不失其重要。如果我已往關於戰事起因的話，被人們誤述了或惡意的顛倒了，這乃是因為自戰事爆發之始，我已明白地看出英國人民所以參加戰事乃是由於戰爭直接的結果，不是由於戰前的原因。乃是因為他們腦海中的理想，因為受了光榮和自由而戰的鼓動，因為他們不從一九一或一九一二年，却從德軍侵入了比利時邊境時起追跡戰爭的歷史，惟其如此他們的心是純潔的，他們的手是無垢的。當他們想及被污的比利時女人，葛榮爵士便請他們常常想及，在和平的日子，假如一個女人在 *Piccadilly* 的街上走路忽而被人污辱，他們將如何地打不平。戰地上的恐怖與罪惡業已驚人地打擊着他們的想像，但是葛榮爵士還要他們想及太平的時候，假如整日均有女人因受男子的虐待在他們中啼哭訴怨，他們將如何地打不平。戰事完結之後，他更希望僥倖繼續為人類的解放而戰鬥，為人類解放而戰，這和工黨的名字與歷史有着光榮的關聯」。

這個時候，凡是承認和麥克唐納認識的人都逃不了社會的排斥，麥克唐納還為工黨做理財的工作和黨保持正式的關係。當權的工黨領袖參加混合政府，和麥克唐納天淵相隔的時候，麥克唐納在大戰期內自始至終都依然與工會及工黨的下層羣衆，保持密切的關係，這是政治矛盾之一例。在這種關係上，人們不能不覺得他所忍受的譏諷，反而只鼓起了那些記得當日反對工會合法要求的人們，也是拿謔告做他們底主要工具的人底對他的同情。

工會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五年在布里斯拖舉行大會，麥克唐納以兄弟會的工黨的代表底資格出席，當時正是報

界反對他的運動達到極點的時候，然而第二天，一個保守派的報紙還批評說：『的確，大會中對麥克唐納的演說底熱烈景仰之情爲任何別的演說者所不及。』該批評中更提及大會對他的演說『熱烈若狂』的情形。

他的演說聰明地說明工人羣衆須團結一致，使工黨愈加強固以準備戰後一切將發生的問題。換句話說，它是一個要和全國的勞動者不可因戰事引起的不同意見而影響及工黨的實際工作底有力的呼籲。

『社會主義者與勞工羣衆必須保持偉大的聯合，以應付和平後必須應付的種種問題。我胆敢說，本大會，無論暫時對我及我的同事所持的態度怎樣，它決不會忘記戰爭之後跟着的便是和平，在和平的時候，你們必回復你們固有的工作，回復往日的爭辯，繼續反對往日的敵人，回復固有的理想，回復固有的要求，並且爲應付那些責任計，你們必須找回往日的朋友，返回會給你以如此大力的你們的舊黨和熱誠。這些事實非常簡單，需要非常急迫，而意義却又非常明顯。吾人立黨的明智將再會把我們團結起來，給與我們以一種力量與熱誠，使艱難的路程呈現光明，使遙遙的遠路縮短，使我們的困難消滅，因爲我們絕對相信我們有組織的勞工做我們的後盾，而有組織的勞工底聯合力量和自尊自敬的心理常常都是準備戰勝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因爲哈定之死，使麥克唐納的工作更辛苦，精神上更寂寞。這勞工運動的先鋒者，這頭一個以獨立勞工派資格出席下議院的國會議員，是因爲傷心悲憤而死的。麥克唐納在哈定的傳記上說：『大戰爆發之初，當他第一次從選區競選回來的時候，他已是一個受了打擊而頹喪的人，在陽光之下，他坐在下議院的層臺上，我走過他的身旁，他似乎在向一個空虛的荒地遙望。自此以後他便每况愈下。其後工黨整個的陷入戰爭的氛

團中，雖然獨立工黨還是像從前一樣地可依靠，可是他覺得他的工作完了，他一生盡其能事也只能從欄堆中拾起一些碎片而已。」

戰爭的狂潮，誣譏與流言的疑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沈入驚風駭浪的漩渦裏及舊同事們對他的態度，這些一切湊合起來給哈定一個致命的打擊，使這個為建立理智的皇位，為囚牢人類下等的本能而畢生奮鬥的人不能不放下其未完的工作。

哈定之死是勞工運動的一個大損失，損失之大，只有當時參與錯綜複雜的事情底小數人，才可以體會出來。

後來麥克唐納在哈定傳記的序文裏讚揚他已逝的領袖說：「凡和哈定接觸的人，立刻便覺其人格之偉大。他的力量並不在他是一個政治組織的首領，因為獨立工黨的組織力和他的影響比起來，差得很遠，而礦工聯合真正堅強起來的時候，他亦已辭去正式的職務，也不在他底足以煽惑羣衆的天賦的口才，因為他的措辭雖明晰而美麗，但很少激動性，他的聲調也沒有動人心絃發人意氣性質；他更從不以阿諛諂媚的態度以獲一個同志。也不以卑下的口吻以取得羣衆的擁護。他從事實際的工作為人的模範，使人們為偉大的目的而追尋。他不讓任何人在山谷間的溪流裏優閒，却引領他們走上崎嶇的山路。哈定成功的秘密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自各方面看着他的我——在勝利的時候，在失敗的時候，在講壇的時候，在閒坐的時候，在以尊嚴的面孔應付不相識的人的時候，在朋友中（他們大致是隨他奮鬥，但有時不免和他衝突的）狂笑高歌的時候——我認為他底成功的秘密是他的人格，其次是他對常人的尊重和對一切人類假象的無視。他是一個樸實的人，一個堅強的人，一個勇敢的人。」（註）



註：Foreward to *Life of Keir Hardie*, by W. Stewart Cassel.

哈定死後，天然的繼承者麥克唐納的責任更大。麥克唐納差不多自那時起，是獨自個兒負起宣傳哈定未竟之志的重任。

然而謂他的活動均限於批評方面，也未免不公。反過來，戰事爆發之初，他便注目將來和平締結中嚴酷的試驗。如果他非難戰前不列顛的外交政策，正是因為他要將歐洲的和平放在一個較過去的同盟和軍備制度更健全基礎之上。

人們給他的辱罵，如果不是基於其為一個和平主義者這個簡單的事實之上，便是因為他不讓戰爭的狂熱，代替他的爭辯和清明的思想。大戰期中，麥克唐納不顧時人的狂熱，埋頭去研究尚待解決的問題。在其對戰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對和平締結的態度上，尤其如此。

一九一六年四月他忠告社會主義者注意戰後待他們解決的問題。

「一切社會主義的舊問題，必會在更擴大的形式上重新起來，關稅改良派乃至節約擁護者的騙子們，都必出來大吹大擂。和有資本主義必會奪回他們在戰時迫着不能不讓步的損失而努力——例如鐵路——更必死死地把持着，原應從它取出的——例如礦山和輪船。反動的勢力將如箭在弦上。從前為衛國而犧牲的呼籲，今後必改換一個方式，要變為為國家的善後而犧牲的呼籲。這種呼籲必會為敵愾同仇的人們所贊成，必會誘惑那些衝動的無識的人贊成一種當他們心境和平時在所反對的經濟政策。在這種情形底下，要求公正的勞動者必會為布爾喬亞的堅

固陣營所反對，布爾喬亞受了戰事的打擊，正在力謀補償之道；而且比前更多的報章將會與勞工為敵。

「另一方面，一般下層羣衆，在戰時既被誤謬的感情所騙，這回任何激烈的煽動也不能拘束他們了。當他們發覺戰爭不會摧毀軍國主義，「全國團結」也不會將國內的利害的衝突解決，戰時他們拚死擁護的國家愈不屬於他們之後，衝突也就愈加激烈。牧師對我們說在戰壕中也宣傳的基督教，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消極抵抗那類的東西了。那些贊成階級戰爭的人們將會稱心滿意。

「戰前，社會主義雖稍稍解開它的問題；戰後必須重頭開始——但不是二十或四十個人去開始而是千萬的人開始。正如一個在森林中砍倒樹木以尋出路的人，為事所阻不得不暫時停止工作，回來時：困難便比前更多了。

「「國家究屬何人？」的問題，將會再引起人們新的疑問。工會主義也加了一個新的方面——政治中的一個要素。女人和不熟練的工人開始參加各種職業（前此差不多絕對不容納他們的各種職業），使工會主義多了一層新的意義。戰時私人企業底效能和榮耀完全破壞的經驗，給與社會主義新的權利。人們（除了保持國際頭腦那些人）看不出事勢的推移，拿不出解決戰爭的混亂底辦法，也就給與國際主義一個新的權威。

「戰後，社會主義者決無安枕的機會，各方面都急需他去改革。「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除了你們的缺之外你們將一無所失」這句話我們如今說來，真是有更大的自信和更大的意義。」（註）

註：「Socialism after the War」 by J. Ramsay Mac Donald, M. P. Herald, April 29 th, 1916.

那篇文章直可說是一九二五年寫的，因為它紀述和平簽訂後七年間所經過的情形，如在事後追紀的一樣。它

較我所能舉的任何節錄更能表示出麥克唐納對和平將引起的問題，預見得如何地清楚。

麥克唐納一方在下議院內外爲公正的和平而辯論，對於前途的危險，也同樣地着力。

大戰中期，他底一篇最重要的演說乃是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當信任案補充投票辯論時（一個許他對戰事及由之而生的一切問題得作總觀的辯論）在下議院發表的。麥克唐納利用這個機會重申他對於戰事和戰後必需締結的和平底意見；在明朗和力量上，這是一篇與當時他底任何演說有同等價值的演詞。

他說：『展讀已往戰爭的歷史，真是最憂鬱不過的事，我們每每不得不致敬戰事爆發時國民所表現的偉大神。對於捨生爲國的人們，我們尤敬仰感激不止。但是我們那些感情，迄今照例，總與悲憤相結，因爲國民犧牲了之後，我們的政治家却不能把戰爭底道德的目的和最高的理想實現。這是歷史上層見的。我今天特別站起來，爲的是要求政府記着：國家的責任并不限於增兵，并不限於通過給養你所註冊的兵士底軍費，但却在運用外交的手腕及政治的力量，使破頭顱灑熱血的將士們底最高的犧牲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永久的和平。』

麥克唐納要求政府明白宣佈不列顛爲什麼參戰之後，他繼續說：『我不猶豫地說——我絕對肯定地說——假如英國還要保持一點光榮的話，她決不能稍犧牲比利時主權以言和（除了她是被逼着不能不接受那樣和平）。假如德國幻想着，以爲英國有任何一派人在準備犧牲任何部份以接受和平——請注意——不僅比利時的主權，並且她的任何部份，那末，德國的輿論最好能把那種謬見破除，早一天好一天，法國既然也被侵略，那末這個道理用之於法國也一樣地正常。關於這點，讓我們完全明白罷。』

關於在歐洲的，少數民族被異族統治的問題，麥克唐納說：「歐洲有些民族在各國被異族壓迫，以至引起不安與搖動，我們應該設法解決這個足以擾亂安寧的問題。你可以臨時通過三千萬鎊，也可以把國中優秀的份子送到戰場上去犧牲，但如果你不能把歐洲的民族問題解決，那末你只能在慘酷的犧牲之後，一無所獲地空手言旋。」

他說明巴爾幹問題應用會議的方式不應用武力的方式來解決之後，（其言曰：「這個信仰和血統都非常複雜的巴爾幹，你如果讓一方有戰敗者，一方有勝利者，或者僅順政治的方便來把他們劃分，你決沒有解決他們的希望，因為那種方法，你解決不了什麼。」）他轉過來說，他以為，協約國戰爭的最高的目的應該是什麼的問題。

「這回戰事目的應在推翻歐洲的軍國主義。可是你如何去做呢？老實說，那正是我們中有些人不能同意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我又和克倫瑪助爵（Lord Cromer）底非常勇敢的意見一樣，「無忌憚的普魯士貴族黨一天掌握着德國的政權，長久的和平也就一天沒有希望。」這，我只能希望在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的朋友，早就够聰明把那個問題解決了，他們本是可成功的。可是它是政治的問題，不是軍事的問題，如果議員諸君贊成我那個意見，他們得要贊同克倫瑪助爵演譯地說出來的意見，「要把普魯士的貴族黨予以行政的制裁，那必須是德國人自己起來的工作。」那不是輕輕便容易說出來的話，但我們中知道德國的人，很知道那是惟一解決問題的方法。你決不能以任何政治的統治加諸德國，以適合你自己。德國是決不能接受的。

麥克唐納繼續忠告下院說：「假如你只用陸軍與海軍，你將永不能得到和平。我時被以耳為目的人（不是愚昧的人）視為不惜以任何代價謀和平的人。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不知是何所指。但事實如何呢？常常說陸軍

海軍爲和平惟一工具的人，才真真是不惜以任何代價謀和平的人。因爲他們從不能夠得到和平。如那樣，沒有軍隊能——永遠也不能——得到和平的。」

他以動人心弦的言詞結束他的演詞，暫時的，下議院諸人也忘記了對他的憎恨：

「我們，做國民的，正在掀天覆地的風浪中站不穩腳。可憐的我們擁集在國家之一角，等待風浪之熄滅，等待雙方各自表白的機會。所以，站在中立者的立場上，站在縮減戰禍的立場上，站在使犧牲縮減至最低度及促成和平（不僅只是光榮的而且是永遠的）的立場上，站在全歐洲的立場上，我懇求議員諸君，繼續他的外交，繼續他的牒文——即是商議，無論他是否予他們以這個字——並且記着這個問題不僅提高我們的心志，而且開明敵人的思想。以我們高尚的心志和敵人們開明的思想，我深信這回戰事必以和平而求永久的終局，——和平的要求必基於各國人民的同意而成立，也將永不會爲人類的歷史所責罵。」

他在下議院辯論的政策，同時也向全國的選民力說。一九一六年九月二日他在北明翰演說：「和平決不能以已失敗的方法得來，在歐洲各國的人民未願握手言歡之前，戰事也決不會停止；然而握手言歡的時候到了。」

真是預言！一九二四年麥克唐納以英國首相兼外交部長的資格主席的著名的倫敦會議之後，德法的代表重新作第一次的握手。

一九一六年六月麥克唐納在丹梯（Dunfermline）又說：「如果你想僅以刀劍以克服一個國家去謀歐洲的和平，那末你錯了。因爲從沒有那樣的事，如今我們也還是不能。如果你們幻想和平建基於武力，那末我們實迷途日遠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奧爾丹（Otham）舉行的盛大的集會，麥克唐納是主講者，會中『毫無紛擾。』

關於戰爭之爆發，他說：『國家常危急的時候，全國的男女便都受着一種本能的驅使奔起衝國。英倫不僅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小紅塊，她如人一樣，是從無數的世代中滋長發達的，因此英吉利的男女有其富有的過去，希望的現在，和偉大的將來。戰事爆發的時候，這些觀念一齊湧現在人們的腦海裏，使他們忘却一切的區別和信仰，只知道爲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盲目地去戰鬥，那就是戰爭爆發時本能的感情。』

他暗指獨立工黨對戰事的態度之後，他跟着說他不以爲他們是在對戰事下最終判語的時候。『必待戰事結束以後，他們才能坐下來平心靜氣地考察事實，比較事實。戰爭的根源，也必待戰事過後，社會一般人士心無平復以後，才能够作真實的研究，目前，甚至大學教授，也免不了掉有偏見的。』

這時，全國人對於和平主義者的一羣人再不能忍耐了，警局對於一些擁護麥克唐納的人，也隨着行動起來。一九一六年獨立工黨和其他的社會主義團體，對於警局截留小冊子反搜捕他們底總部的事件，提出嚴重的控訴。警局的行動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八日達到了極點，他們搜捕在倫敦的獨立工黨總部，并向倫敦市長官邸審判廳（Mansion House Police Court）提出控訴（由尼爾斯爵士 Sir John Knills）。結果獨立工黨敗訴，他們意猶未足，復接二連三地提出控訴使麥克唐納不得不把這類事件提到下議院去質問。

麥克唐納指出警察檢去的小冊子中之一種原是史諾登在下議院關於財政法案的演說底轉載，（不過他們加上

雖繳戰費的題目）另一種却是社會主義者星期日午會和晚會所唱的歌詩（其中還有些是從新舊聖詩中抄出來的）之後，他說：「如果議員諸君或者政府認為這樣截留人民的出版物是幫助國家的方法，那末，他們真是大錯而特錯了。如果國中有一羣人認為將其意見公諸全體國民之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之為此，決不是以滅弱國力為目的，其動機更非政府任何人員所得而非難。則這類的意見當然應公諸全國。國民館中人把這類的意見公開發表，政府和國家均將蒙其利，將來可訂議的和平必較戰事行動更能表示出智慧。那是一定做得到的。撒母爾先生（*Samuel*）自然可以用他的警士加諸我們。如果他那樣做，却不失為聰明。他應視我們之尊榮禮遇我們（我以最大的友誼對政府而為此言的）。那較以任何武力加諸我們，使我們去護衛國家的利益更為有效。自然他是可以用他的武力的。可是他的武力必失敗。他可以不顧我們對政府的幫助，他可以帶我們至尼爾斯爵士之前，可是我請實在地告訴他，他希望達到的目的決不能如願。」

戰事隨着它的可怕的行程前進，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西線之相持，在殘酷的破壞未逼出或種的和平之前，尚無解決的可靠的預兆，麥克唐納於是更努力為公正的和平打開一條坦路，并且揭發征服的和平之危險。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問下議院說：「問題是：未來的歐洲怎樣？我不是指的軍事的形勢，我指的是政治的形勢。戰爭不僅是軍事的事，同時也是政治的事。克勞則維次（*Clauswitz*）在他的名著戰爭一書中說：「戰爭的結果是政治的」，如果我們不聚精會神於戰爭之政治的尾聲，那末，我們便失了勝戰所給予我們的機會。聖就加利波利（*Gallipoli*）和類此的遠征而言，我們還是冒險以圖僥倖嗎？我認為下議院的絕對的責任是要使一

個兵士的生活都不流於白死；他們的勇敢與犧牲，直使正直的人爲之淚下。我認爲凡是留在後方，過着舒適的後方生活的人，都有使前方的將士們沒有不必要的犧牲與危險的責任，都應盡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接濟他們。」

麥克唐納繼續說：「我是從不反對下列的爭辯的人中之一個，那爭辯是：道回戰爭的結果應該……事實上我還可以說它必須，如果我們和歐洲列國都是聰明的話——澈底地把前代歷次戰爭的原因洗除淨盡。如果道回戰爭不是最後的一次，那末它必將是失敗的。如果道回戰爭不能使我們着實地縮減人民對軍費的負擔，那末，它便沒有帶來承認它的千萬的人相信它會帶來的結果。因此，從不反對那個爭辯的我——常常準備着一切可能實現那個目的的方法，同時，也非常懷疑現在採行的方法，究竟能否達到那個目的。拿「戰決雌雄！」這個口號做比方吧。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那末我們只有戰到勝負分明，那用不着什麼說辯。我不企圖設辭以避之。如果必要以戰爭決軍事上的勝負，才能夠獲得我們視爲此戰之目的底政治的及道德的結果，那末我們也沒奈何。只有戰到勝負分明。但我不相信它能有這樣的效果。」

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國革命後不久，他在斯溫西 (Swinsay) 再論及這個重要的問題：「我不是一個擁護派，我是一個擁護歐派，一個擁護民主派，一個擁護國際主義派，此外我一無所介。我不要一個劣拙湊成的和平，一個在歐洲政府中抵受不住六年風雨的可憐的和平，我需要一個以自由的民主主義爲基礎的永久的和平，不再被王，帝，外交家或軍界攻擊的和平。」

同一演說中他更說明他所有的活動都是憑藉着一個單純的願望，即是「將來的和平應該是獲得自由，民族平



等，自治和獨立底和平，尤其應該是爲歐洲的被擄開被 矚的民族謀未來的和平底和平。」

「我們要求政府明定戰爭底目的。我們要求政府對她自己對全國對全歐認明她準備在什麼情形之下才去爲和平而交涉的概念。我們不讓她強然無定。我們不要她在似乎勝利的時候，把目的擴大，在挫折；似乎失敗的時候，把目的減低如此而已。我們要求政府對協約國澈底明定她在和議合作，同時對敵人也澈底明定她在和議戰鬥，使我們有個確定的戰爭目的，然後始可以依目的成就的程度爲勝敗的標準。」

「英國現在有兩大危機。第一、她或會因厭戰而言和。如果英國厭戰而言和，那就最不幸了。那樣，你毫不能達到你的目的。正如一個競跑以期獲獎的人，半途坐下一樣，不僅是失敗，簡直是慘敗。因此我們決不能讓英國因厭戰而言和。還有，當一個國家從事戰爭——她便覺得煙霧迷濛，戰熱狂奔，新對像半途出現，貧乏的協商國也會加困難於她；戰爭初期六個月中連夢都沒有做過的目的也會漸漸加壓迫於她，不知不覺間，無所措手足的時候，她完全承受了。從事戰爭的國家常失了方向。實際作戰的時候她常失落了自己，那種情形必須避免，如其我們可能避免。拿什麼去避免它呢！只有一個辦法——政府應該明白地規定戰爭的目的（真正的戰爭的目的不是和平的目的）始終以之。然後便無所謂憊倦，因爲你的國民都向着目標前進。亦無所謂失敗，因爲你的目的常常照耀你的途徑，並且正確地指示出目標是什麼在何處。」

麥克唐納繼續說：「我們原來的對象是什麼呢！比利時！不錯，比利時必須解放，如其比利時的獨立一刻發生疑問，歐洲也就沒有和平。關於這一點讓我們都弄得清清楚楚吧。還不止於此。內閣應該宣言凡是用腕力得來

的東西，不能由施用腕力的人去保持。還不止於此，當我們參戰時，我們還有第二個目的。無論如何，它很早就出現。我們要確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情。那保證是什麼呢？我想有兩方面：第一我們必須使民主政治在歐洲重要列強中建立起來。其內政之性質必須給予一個民主國家以相當保證，保證她的民主的意向在他們的首都中得到同情的接受。

「如果政府宣佈那些目的，我們便可正確地知道我們處身何地，為什麼而戰，意向何在，敵人對於那些目的也應該如我們一樣地知道，這是有同樣重要性的。」

麥克唐納最後以下述的話總結他的意見：「我們要重述我們的目的，要予戰爭的目的與和平的目的以明顯的分界。我們不可以民主主義者希望在歐洲得見的一切解放包括在我們戰爭的程序之內。我們要明白地說明，在將來和平會議中我們自是為解放而奮鬥，但我們戰爭目的所指的解放，只是在戰後被奪去了的自由。我們應該宣佈立刻盡忠團結，同時應該寬大地解釋國聯的精神。我們不要再假形國聯的神經同盟。國聯不應也不可成為各國政府間的聯盟。必須是各國議會的民主組織體底聯盟，成為各國公意的代表。」

我們原還可以從麥克唐納的各演詞中錄出更多的話（那些話同樣地表示將來議和時他對「外交，談判，開桌會議」的熱望），但上述已舉的業足證明麥克唐納意見之一貫遠勝他的敵人。他屢次警告國人反對戰前不列顛外交政策理由，同時也就是他反對戰時英政府許多行為底理由。人們對於他的活動無論持什麼意見，但細考事實之後，沒有人能否認他在戰時所說的話是他在薩利譯夫（Saratjevo）被刺陷歐洲於戰事之前所說的話底論理的

結果。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他在下議院發表動人的演說：「我的用語中沒有失敗也沒有投降。那些還在追尋每次戰爭業已表明爲虛幻的東西底人們才是真失敗者。他們（不是我們）信任舊的政策，舊的政策是以此戰製造歐洲無窮的戰爭。那是失敗的。讓我們對這些事情完全坦白吧。如果我們跟着某幾位議員所追尋的政策，歐洲便永無和平。當你完了一個戰爭（無論是德國打法國，或者任何的戰爭）五天之後，你再復武裝起來準備第二次鬥爭，那末不如誠實地對人民說罷，不要騙人民再信我們是爲結束一切的戰爭而戰爭了。」

「我是以結束一切的戰爭而承認此戰的。因此，我說必須採用一個歐洲歷史上從未採用過的方法，因爲如果你取舊的方法，結果只能達到舊的目的。所以我要求政府重新考慮這些外交的問題。」

他繼續說：「一事我們希望在戰後能夠出現，在休戰的時候。在這個推我們違反我們的意志底戰爭的動力停止的時候，在我們能夠應付圍繞着我們的問題的時候，歐洲的人民都聚集起來，乘戰時一切痛苦的經驗尚未消失之時，創造一種使戰爭無復再起的可能底勢力。要達到那個目的，我們必要得到解放，但它不是從戰中得來的。或許某些戰能給與解放的機會，但解放的本身只能從和平的桌上出來。」

大戰全期，憎恨他的運動沒有一刻停止。但無論反對得如何兇暴——其中有些或許是可辯的，但多半還是忘記好了——麥克唐納却從不懼怕。

放逸的年頭，使他衰老。髮隨勞瘁以俱白，然而精神却是老當益壯的。且置其主張不論，我相信將來的歷

史家論他的功罪寫他的事蹟的時候，必會讚許在災難的年頭中，他所表現的無畏的勇敢，沒有這種勇敢，他決不能達到後來的光明。

這時黑雲中已漸現曙光。一九一七年大會的時候，（時在他不准領護照赴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大會及被海員工會禁止他航行之後）麥克唐納對工黨演說，盛譽日復，并鼓勵起人們在戰前的熱誠。同時在亞爾伯特堂（Albert Hall）的一個集會中，（當時還不敢把他的名字公告出來）場中的鐵路工人大呼拉姆則（Ramsey）麥克唐納之名——譯者）直至他們之舊偶像起而演說時，呼聲才在滿意的情緒之下停止下去。

在末論及休戰和戰後英國政治上的反響之前，我們應該指出，在大戰的數年中，麥克唐納別的活動雖為戰爭及和平的問題所遮掩，已如前述，但他同時也注意到許多其他的問題。麥克唐納自一九一四年起以至大戰終結時止，單獨地用種種方法反對政府加於思想的與行動的自由底限制，這些限制是由政府慢慢兒隨着戰事的開展向議會提出的。他尤其代那些相信『良心之自由』也被徵兵案之施行及法庭的某種判案所蹂躪的人發言。後來復在下院質問檢驗局強認不合格的人為合格和逮捕為良心而反對兵役的人（因為藐視議會宣佈的意旨）的事件。

在那個時候，他或任何人，要維持戰前被視為不可侵犯的自由，自無甚可為，但麥克唐納還保持着一個自由的國家底種種理想，從不肯讓一件錯誤的事道然地過去。

一九一七年下議院還有一個問題須得提及，如僅因其關係於一個尚在討論中的改革之故，也有提及的必要。這是因為要給與三十歲以上的婦女以選舉權和擬議中的別的選舉的變革。這些變革及後編入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

法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18 裏面) 而起的選舉改革的問題。

這個問題最初辯論時，有些人提議應將比例代議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加入政府的法案中，麥克唐納對此制持反對的意見，他說：『如果我有機會，我將反對比例代議制。』

他在下院講演說：『我知道今晚沒有人代表比例代議制說話，但如果有人，我願請問他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比例代議制在許多國家都試過。但那一個國家能證明偉大的能幹的政治家因比例代議制而獲選，因前此的選舉法而落選呢？事實上誰不憚煩去把比利時或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及別的地方底比例代議制選舉結果的表，一劈一散地翻開來看，也決找不出一個強幹的政治家是藉比例代議制的運用而獲選的例。』

『贊成比例代議制的人驚訝比例代議制的否定。比例代議制乃是一種最妄誕的代議觀念。目前的方法無論如何，可以迫令候選人（當他們尚未當選之前）宣佈他們的結合在什麼地方，誰是他們的同事，他們將為那一黨而工作。這樣在大體上，本院的大多數才是有代議性的大多數，不是偶合的大多數。』（註）

註：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那個演說是有重要性的，如僅因其足以證明麥克唐納之反對比例代議制，不是因為政治的利害，也不是因為近幾次全國競選中三黨制的「賭博」方便了工黨的籌度，乃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經過細密的研究，知道什麼才是國家的最大的福利的結果。（註）

註：麥克唐納在他戰前著的社會主義運動 (The Socialist Movement) 一書中也發表過同樣的意見。他說：

「比例代議制大大地增加選舉的費用，給與地方選舉經理人以更多的操縱的機會，使議會中的多數黨及政府更須依賴議院中那些雖零散有時却足左右裁決的人，并選出較今更多的國會議員，但他們的表決却不代表任何公意，也不實現任何委托，因為其中許多只由於單一的問題而得選——例如禁酒——然而國會中的每一問題，他們也得要參加表決。社會主義者深知惟有藉助於一個有效能的運用靈活的機關，才能够達到政府底民主化，決不是一套難觸摸的苦心作成的妙文所能爲力。」

休戰之臨近及休戰稍前時，選舉權範圍底擴張（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及年滿三十歲的女子均有無條件的選舉權），劃開了工黨執政底歷史的新章，逼着工黨的領袖們重新考量黨的前途。

一方意識着需要，一方意識着機會之臨近，工黨遂於一九一八年決定了兩個議案，謀加強黨對民衆底感動力，統一戰時的國家統制政策給予社會主義思想底刺戟。資本主義既已不可掩飾地在戰時底緊張局勢之前崩潰，同時工人羣衆又已瞥見公有的可能性。其時是非是顯然的——工黨必須立刻站在前頭成爲完全社會主義的政黨，并且必須進一步直接徵收以個人資格入黨的黨員，這些黨員從前是要（藉以取得黨籍的資格）加入聯合性質的團體——例如中上階級的同情者之加入獨立黨或費資社。

因此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倫敦舉行的全黨大會，便把黨章修改了，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第一次成爲全黨一致宣稱的目的之一。（註）

註：一九零五年工黨在利物浦舉行年會時通過一個決議，以社會主義爲黨的「最終目的」；一九零四年工黨

便加入了社會主義國際，並於同年派代表出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會議。這可算是工黨內確信的社會主義者之大成功，但仍迄一九一八年，社會主義才成爲黨的經濟政策的基礎，才始裁諸每個黨員都必須署名以證信的黨章之內，戰前，黨的國會議員大多數（雖不是全體）已是確信的社會主義者了。

在修改後的黨章，這個重要的項目底原義如下：

「基於生產手段之公有及各工業與勞役之公營與統制最可行的制度之基礎上，使勞力及勞心的生產者同獲他們勤勞的全部果實及可能的最公正的分配。

「一般地推進人民底政治的社會的及經濟的解放，特別是那些直接依靠他們自己的勞力及勞心底努力以維持生活的人。」

隱含在改正的黨章內底第二個決案准許一切「勞力及勞心以從事生產」的人入黨——不僅不屬於任何工會，「黑衣」工人有直接入黨的資格，前此獨立工黨的「智識份子」底壟斷也隨之歸於消滅。

担負着黨底責任的人們，也許已預見到這個結果，工黨沿着直接代表各階級成爲全國性的政黨底路途前進所不能避免的最後一着。無疑地，他們也明白「獨立工黨底戰時極端的和平主義引起人們希求這種壟斷歸於消滅，同時希求那些不同意獨立工黨底態度的人得直接趨近工黨。」（註）

註：工黨簡述第五十二頁Portrait of the Labour Party, by Egon Wertheimer, P. 52, Putnam, 1929.

無論這個步驟是由於何種的考慮而決定，其結果却把獨立工黨存在底一個最後理由「黨中黨」（Party within a

Party) 也勾銷了，不過獨立工黨對工黨的聲明中特有的冷淡性也就始於此時。

這樣把黨的組織現代化，以信仰社會主義爲入黨的條件之後，工黨便開始準備它底第一個考慮周全的綱領。於一九一八年大會時討論，後來以『勞工與新社會制度』(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之名行世。

『勞工與新社會制度』把人們由戰爭所引起的對一個更好的世界底一切希望結成一單個的綱領。這兒不及轉錄了，全書分爲四個主目——(一)全國最低工資之普遍實行。(二)工業之民主的管理。(三)全國財政之修訂，包括所得稅的改善，地價徵稅，增加遺產稅及資本課稅等，(四)國家剩餘財富爲公共福利之用之保留。這最後一目，一方以生產工具及分配之國有化，一方以增加財富之課稅獲得之。(註)

註：勞工與新社會制度之爲一個政綱，與後十年刊布而目前仍實行的勞工與國家(Labour and the Nation) 稍較進步。在後一文獻中，昔日的某些建議掉去者有之，貶降者有之，餘者復失其急切性。這些變遷大概可尋跡於兩個不同的時期：工黨離起爲交替的政府及其短期的執政。在另一方面，某幾種提議，例如信用之國家的管理及將英倫銀行改爲公共的公司，却第一次出現於勞工與國家中。在大陸社會黨綱領中包括的性的，婚姻法的與宗教的問題，在不列顛的綱領中却付之闕如。

工黨在勞工與新社會制度的序言上謂資本主義制度帶着它底不願一切的利得和工錢奴隸制，帶着它底無繩束的爲生活資料而奮鬥的榮耀，帶着它底「適者生存」的虛偽的辯護，帶着它自身引出底畸形的不平等的情况，及由此釀成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墮落與殘忍，實已達了個致命的打擊。伴隨着這個致命的打擊，必然是它從而自願的



政治制度與觀念，我們工黨無論是在反對黨的地位或者在適當的時候被召執政，決不以一臂之力助其復榮。反過來，我們將以最大的努力把它和那被它迫死的千萬人同葬。

乘着成年人普選權運動相當的成就，打着一個無疑地鼓動了人心的政綱，使人堅信任何充爲反對戰爭之痛苦與耗費之重現底主義的政綱，揚着刻上社會主義的旗幟——終局社會主義成爲可炫耀的資產，不是（除了最激烈的黨員）大眾因疑懼而倒退的革命的提議——工黨使準備作戰，此戰將決定它在戰後世界中政治的地位。

這時馬克斯已經被人忘却，至少從不被人提及。工黨採了個顯明的不列顛牌子的社會主義，并批准了一個字裏行間都顯示出對國情讓步的着重實際可行的改良，不重信條或理論的政綱。一些人，其中有馬克斯派社會民主同盟（Marxian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先驅者，拿『勞工與新社會制度』和馬克斯草擬的共產黨宣言比較之後，大爲歐陸各社會黨的政綱所基礎的理論底爭辯嘆息；同時勞工大眾復無保留地接受它，認它是最聰明和最可能的政綱。

向年晚一點，還有一個決議，召令工黨的團員在大選前脫離混合政府。大選是喬治魯意及逢涅羅在休戰簽訂後的幾天決定的。決議文如下：

「工黨本次特別大會聲明如下：在大戰期中工黨已誠信地履行其擁護國民政府的諾言，議會而解散，則工黨所持以參加混合政府的惟一條件（空前未有的急難），自歸於消滅，大會因此聲明自總選公告之日起，工黨即與混合政府脫離關係，至懇求全國選民的幫助，以勞工與新社會制度中的原則委諸吾人，使本黨在新的議會中，

可以用議會情勢允可的最有效的方法，自由地去擬進它的改造政策，而議會情勢之如何，却視乎選民們的選擇而定。

‘Coupon’：總選的結果，混合政府派獲壓倒的勝利，首相喬治魯意個人也大獲勝利。全國六百零二個議席中，而且依據一個由最近通過的新法大大地擴張了的選民註冊，混合政府派的候選人還在四百五十八個選區以上獲選。

一般人都承認當時的情勢與工黨不利，因為他們的團員剛從混合政府辭職歸來，某幾個領袖人物却仍為大戰期中被加上的雲霧所遮蓋，而喬治魯意求國人給他以權威俾在巴黎締結穩實的和平底要求復把別的酌量一掃而空。

在這種情況之下，工黨的成績預算不錯，三百六十一個候選人共得二百五十萬選票，其中五十二人獲選——較一九一零年第二次總選時增了十五席。

‘Coupon Election’：使全國人有個對那個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如是毀傷了愛國情緒的人「大發雷霆」（沒有別的話可以形容勒司特的選舉戰）的機會，麥克唐納的舊選區，代表了十三年的選區以一萬四千票拒絕他，另選一個愛國的混合政府派的「勞工」候選人，「若非此不足以確使他受到教訓。

然而歷史對於凡忠於自己的理想的人總有一種技巧以扶助他，在晨曦前的黑暗中，事情已在醞釀轉變，註定六年內那個被放逐的人位於唐寧街（Downing Street）任大不列顛的工黨第一任首相。



## 第九章 餘 波

和平臨近的時候，反對麥克唐納運動的第一個局勢可以說是完了，可是第二個局勢却接着開始。直至休戰簽約時，人們對他的報復業已兇狠顯著地公開出來。隨着「勒司特賣國賊」之後大罵的報紙，把他在大戰初期發表的演說及文章，一月復一月地重印出來，時且加以重大的諷刺。同樣的文句也被用在政治的講壇上非難他。

如今，麥克唐納既經落選，反對的運動也就狡猾地改變了。公開的輕侮和講壇的非難俱歸沉寂。工黨昔日的導師失掉了黨的領袖的地位。在下議院也失掉了他的議席。假如他仍佔正式的黨中理財的位置，那和他被撤去的地位相較，實無關重要。

真的，他在勒司特的失敗，不久便使他與其生涯中的「酸性試驗」而面相觀。

這個激運根本和他早期歷次的落選不同，那時——在一八九六年和一九〇〇年——他還是個不知名的宣傳怪異主義的人。然在一九一八年他已是舉國聞名的人物，雖不得人望，但仍被認為工黨有領袖能力的首領和設計者。因此當他的選區反映出全國那時對他憎恨的感情時，正是他的政敵們凱旋之日。

那些政敵們極敏活地看出并利用他們千載一時的機會。既把他擯平在地上之後，他們決計不讓他再抬頭，不讓他再有恢復為舉國聞名的人物的機會。不問不問便是他們的武器。四年來他們已在報章及講壇上向他咆哮。如

今他們不去理會他；謀以不聞不問室之死地，然而常常準備着運用任何放在他手上的武器的他，却轉而利用四年的長期向全國各地演講。他筆下放濺出許多書籍，小冊子及綱領，給與工黨以一個主義一個目的去應付未來的工作。可是一般人全沒有去聽他。

假如麥克唐納是猿那種為報紙或「雄辯家」所搖擺的輿論來造成他的力量的話，不聞不問的運動或許成功了。總選後的幾個月，人們還意惻地疑心這「和平主義者」遭遇了些什麼。可是他們的注意却漸漸為其他更動人的問題所奪去，麥克唐納遂全然不為人所聞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假如有人愚到以為麥克唐納將會代漢德森多瑪氏或克來尼起而為工黨領袖，他必會為人所訕笑。惟獨那些知道組織的工人底心理的人，才會隨着他底預言一個復一個地得到證明時，領會到黨的下層羣衆是怎樣一天一天地和他接近。他底週行全國的演講，成效日見，雖仍無與於顯貴的領袖們之列。可是他以純粹的智力和豐富的精神，已漸回復他昔日的威望。

假如這種遊疑為的是要澈底一試麥克唐納，看看他究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還是一個無用的人，那末，這些逆境真是再好也沒有了。頭腦狹窄的人或許會暴露自己的弱點；起來反控他的黨和那些似乎貶謫他至於此地的領袖們。

可是麥克唐納却從歷史的源泉中，抽取精神上的鼓舞。他心安理得地等候逆流之轉變。這時，假如他的意見在下議院和報章上寂然無聞，在無數的集會中，他的呼籲却愈來愈得利害。這無數的集會，聚中新的力量於黨。

休戰後四年間，他一息不懈地宣傳社會主義的信條，要求真正的和平，并且指出獲取真正和平的途徑。他對於歐洲和平的意見，乃是自一九零六年以來所素主及在戰時所陳說的，這些在前章中已曾引述。不過我們須補

說一句，即是：一九二四年在他底短短的執政期中他所施行的這同樣的意見，却是使第一次工黨政府能誇示外交的工作爲其最大成功的東西，這是人人都承認的。一九一四年及其後麥克唐納屢說，基於談判不基於武力的和平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和平。他常常以『握手』爲口號。

戰後不久，一九一九年工黨大會於南港（South Port）開會時，麥克唐納提出下述的決議，把他對於保持歐洲和平的方法底意見記錄出來：

『大會認爲，如今德國既已決定簽訂和平條約，由此以打開與世界各民主國家合作的機會，同時德國迅速地加入國聯，國聯又復立刻將和平條約中與休戰時爲協約國政府所定的牒文不符的苛刻條款修改，這在榮譽和權宜的見地上同是必要的；因此大會要求勞工運動聯合國際的勞工運動，從事一個有力的運動，使羣衆擁護這個政策，作爲世界各國國民間和睦之第一步，作爲國際間的合作與善意底新紀元開始之第一步。』

麥克唐納提議那個決議的時候說，他們該用下列三種心地之一去謀和平。他們可以說：『如果德國戰勝的話，她會比這個慘酷』，麥克唐納本人以爲德國會那樣，此外他不多費一詞，可是無論是製造戰事或者主持戰事，或者企求和平，他決不抄襲德國式的軍國主義，如他知道英國，他也知道德國而置和平於英國，則所謂和平也者決不是和平那樣的東西，英國決無一人甘願接受它。或許可以藉暴力使他們屈服，然而決不能使他們即此默爾而息。但結他們心中腫痛，忍淚含羞，以教其子知恥，以教其孫復仇已耳。麥克唐納不贊成那種和平。

麥克唐納繼以回響之聲說：『還有一種和平，一種懲罰的和平。德國必須自負其行爲所生的義務。那就是懲

罰。但懲罰中每以含公正始奏良效，人而混其激怒於懲罰中，其所懲罰遂非復公正法官所施之懲罰。乃如一憤怒之人被毀其敵人而已。那種懲罰決不能產生和平。

「還有第三種心境——一種足以解決引起威禍底歐洲問題的和平，一種足以統制歐洲諸惡慾的和平，一種帶着宏大的態度以臨世，降服此世如但爾理(Daniel)之降服獅洞底狂亂慾念的和平。那就是我所贊成的民主的和平。

他說決議案所包含的政策是以把不列顛及歐洲從（由于舊的原因而起的）第二次戰爭底危機中拯救過來。

「尚有最後一言：我們是民主主義者，我們受一種新的政治生活所鼓舞。我們估計事物之價值，與舊政黨估計同樣事物之價值不同。自工黨誕生之後，人們無虛飾的心，人們通常的經驗，對國家有價值的男人與女人——他們完全改變了。舊的統治制度不再有領導之能力，無能再生鼓舞。為常識的觀念及簡明的，基本的，人道的理想所鼓舞起的人們，正在大踏步去克勝并保持他們克勝的地方。」

這演詞中的最後一節，尤值注意：平常在工黨大會儀式的環境中，少有這樣雄辯滔滔的詞令：

「今天，當我一面讀和平的信息，一面為和平祈禱時，心裏忽來一異想，這異想我認為是應有的。我想及散在中歐的無數的墳墓。許多我們的兒子睡在那兒。大家的心裏必欲為那些永不再回來向我們歡笑的人們立個素白的紀念碑。你們不要為他們立個莊嚴壯大的紀念碑，使後人即便忘了他們的名字却永不忘他們的犧牲嗎？那是我所希望的。我約模覺得我聽到圍着墳墓漫生的野草發出一種壯大而緩和的諧聲，那種漫生的野草底單純的和緩的平靜，似乎愈來愈響亮，愈來愈雄壯，非至暴亂和槍砲底清晰的聲音被它息滅靜止以後，是不會休止的。今天我

們可有那種情緒嗎？心裏可有那種感覺嗎？我們不可以在幻想中走到我們的兒子們永睡的地方，或覺得在歐洲，在我們的內心，爲那同樣的和平所支配嗎？我們不可以從痛苦與犧牲中獲得光明與智慧使歐洲永保和平嗎？」

數月後——一九二〇年四月——麥克唐納在倫敦演說，顯示出他還是專注於戰事所遺下來的問題。

他對勞工代表們說：「戰爭的結果，法國執了全歐的鎖鑰。如果法國採用和平的政策，卽有和平；如果她採用黷武的政策，卽有黷武主義，如果她採用報復的政策，也卽有報復。因此，英國，法國及一切別的国家必須採取和平及智慧的政策。今日歐洲最大的敵人乃是那些企圖搖擻英法惡感的人。我們與法國間的諍解，必須是相互的，決不能爲一種民族的帝國主義（Nationalist Imperialism），決不能爲一種狹隘的近視的国家的利益。必須是包括對各國公正的政策，容納別的国家，不拒絕別的国家的政策。不僅要有個英法間的諍解，還要有個歐洲各國間完全的諍解。」

同月在加凡市政廳（Govan Town Hall）底演說，他答覆當時的首相喬治魯意謂工黨爲共產黨，警告國人反對工黨中的極端份子底演說。

麥克唐納否認喬治魯意的論斷，說，凡有智識的人永不能謂工黨爲共產主義者的組織。

他繼續說：「喬治魯意說及別的憂慮——我們的極端份子罷了，我并不可怕我們的極端份子。在国家的見地上說來，我怕他比怕我們的極端份子還要厲害。我們的極端份子，正如舊自由黨時的急進極端份子一樣，他們的目光不過較大多數人前看一點而已。他們正如大衛李溫士敦（David Livingstones）深入非洲後，回來告訴我們當地



的情形一樣。他們正是使我們活潑有生氣的人。我常常不贊成他們。但我希望在不贊成他們中，我能同時從他們的想法和貢獻中得到利益。他們或許是危險份子，但，只在社會無能使他們負責任時，他們才會成爲危險份子。」

麥克唐納繼續說，對極端份子，在使他如馬裝上馬具一樣，在給他一些須負責任的工作，然而對煽動家却須予以撲滅。因爲煽動家是積極的危險份子。那便是工黨中的極端份子與喬治魯意之區別。他們必須受議會或直接行動或其他別的方式支配，麥克唐納補上一句說：「我個人是贊成議會政治的。」

戰後不久，工黨決議建築一個自由與和平的國家紀念碑，獻給大戰中工黨的犧牲者，但只籌得幾千鎊，議因終消。

一九二〇年麥克唐納以工黨理財的資格，向大會報告建碑計劃進行的情形，他的演說顯示出這代人爲大戰而犧牲底崇高觀念。

論及那個計劃并不是要建築一個戰爭紀功碑時，他說：「它不是要將那些年頭中底恐怖的狂瀾存諸永久。它是一個和平的紀念碑，一個自由的紀念碑，一個具體表現勞動者底最完美的精神和最純潔的心靈的紀念碑。讓我們緬懷我們的死者，沉思他們爲何而死罷，更念及我們企圖從事我們的工作底寬厚精神罷。我希望它與塵世的紀念相離。我們的死者較塵世的俗念更純潔更清淨。我希望我們及我們的子孫不以戰勝的紀念視將來建築起來的紀念物——一個無論它怎樣的細小——而以每個良善的不列顛人視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或韋斯敏斯德禮拜堂（Westminster Abbey）同樣的看重視它。我希望今後代代的勞工領袖們，都以神聖的自重心致敬這個紀

念碑，并且說因為他們的先人盡了他們的責任的原故，這是一個最後的為那些因幾個統治者之專橫及一切政府之錯誤而死的人底最後紀念碑。」

麥克唐納不任議員的四年中，他做了許多工作。他深信和平之恢復和選舉範圍之擴大，必使工黨有更大的責任，因此他用全力為自己及為黨準備着以應付等待他們的任何命運。

不演說的時候，他便著述。這些年來他著的書有如下數種：議會與革命 (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 議會與德模克拉克西 (Parliament and Democracy)，戰後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after the War)，工黨之政策 (A Policy for the Labor Party) 和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這末後一本是他對社會主義最聞名的著作，一九二一年出版。就是他把當時飄浮在他自己腦中的及飄浮在與他同樣想法的人底腦中的觀念，放在他的銳敏的智力顯微鏡下考驗，也就是他把那些分析考驗之後，而仍能健有的選擇出來，以組成一個符合工黨目的的綱領，一個能够使工黨應付未來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的綱領。一九一八年假如他沒有落選的話，這些書恐怕不會出來，同時在勞工命運底關鍵中，明晰的思考恐怕也沒有可能。暫時的脫離議會生活，麥克唐納反而可用偵探的眼光去觀察政治界，并能更確實地預測將來的趨勢，假如他耽於常規的工作像戰前及戰時使他在議會中無暇晷的情形，這些都怕沒有可能。

此外，他更主編社會主義者評論報 (Socialist Review) 及廣泛地旅行戰後的歐洲，因此獲得它的問題底直接之智識，這種收穫使他於一九二二年回到議會之後，成爲一個對國際事情見聞最廣的辯論家。

從自法國到君士但丁堡的旅行回來後不久，麥克唐納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工黨在托爾波特港（Port Talbot）舉行的大會中演說，評論戰後歐洲的情形，並力言建立勞工政府之需要。這個演詞後來被亞比拉馮（Aberavon）工黨支部用勞工致沒落的世界底消息（*Labours Message to a Ruined World*）的標題重印出來，麥克唐納在亞比拉馮爲有希望的候選者。在那演詞裏他論及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這裏我只引錄它底結尾的極盡練達分析能事的一句：

『我常常誦念這詩句——

『歐洲要從破敗的舊世界中新生，和平要從公正安定中建立，光明，戰鬥的英國勞動男女，團結，奮起，表現你們的力量。』

『當我能背誦它的時候，我念及勞工運動及獨立工黨，念及過去的年頭底光榮的爭鬥，我們雖被擄倒地上，却從不失敗的過去的年頭，既賜我們以勝利的紀念，復賜我們以戰陣的傷痕的過去的年頭。站在今日的如此的歐洲之中，痛定思痛其所演的悲劇，我仍重誦那詩句并相信它，因爲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如你們一樣地，在思想着，在工作與組織着，相信着完美的事物，寄懷於高尚的夢幻，并且斷定在你們可能的範圍內，你們正把那些完美的事物高尚的夢幻具體地在英國的實際政治上表現。』

在戰後心神恍惚之中，麥克唐納並沒有忘了他是英國社會主義底領袖的主張者。在他著的戰後社會主義一書裏（註）他把促成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法底意見歸納起來，他說：『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是一個發號施令使人服從的權力，必須是個人自由的條件。因此，社會主義者的綱領必須如此設計，使其強制，組織及社會管理爲一種解放

個人的性質，保護他，使他不至於流為工業及經濟的奴隸，並且使他有進入智識與精神自由的領域的可能。」  
復次：「大戰覺醒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因此戰前昏睡的國家所要求的猶豫的嘗試的社會改良計劃，就算是最急進的，到今日也歸於無用了。今日之政策必須是勇敢的，徹底的與革命的；在建設方面，舉凡工業和政治底貧困及爭鬥所自生的情況，必須澈底除去，不僅予以改變而已。即以在政治上的口號決不是「如我們在戰前一樣」，而是「如我們在戰前早該的一樣」。」

註：麥克唐納著，戰後之社會主義。勞動者全國出版社。

關於實際的事情上，麥克唐納贊成以徵財產稅，增加所得稅及遺產稅，國有鐵道及礦山，郵政局之改造使它兼營貨運，保險及銀行業務（銀行業務以未經採用的方法辦理）以清償大部份的國債。

麥克唐納繼續說：

「勞動者決不僅要求回復舊的情況，却須要求戰後的大改良。凡是工資低的工業，均應由法律或行政命令規定其最低工資標準；工會應該被認為工人在工業上的代表，他們與雇主間所訂的合約，政府需採為決定商業狀況公正與否的標準。今後決不容再有工會工資率與地方工資率的違制。政府只知道勞資相方同意的工資率，在必要時，並且需有強制執行合約的能力。同時罷工與關廠也不容再有罰金的限制。我希望罷工與關廠的事情會不再出現，但恐一時它們仍不免在暗中活動罷了。」

「有組織的勞動者必須參加工廠的管理，基於作廠管事制的充分代表工人的委員會，應該成為工廠管理的普

通形態。

「一切如像分紅的計劃，無需獎勵，因為分紅制沒有給與勞動者以充分的管理，却把他們束縛着，并且誘引他們以得些須碎屑為滿足。從已往的經驗中，分紅制已於勞動者無益，如以目前更廣遠的眼光視之，其缺憾更大。任何勞動者的團體必須從事提高大眾的地位，不在損別業或消費者而謀本業的利益。」

「在這些保障之下，在這些誘引之下，勞動者與資本家雙方必須同心合力去大大地增加生產。」  
他簡括地敘述了進一步的社會立法之適切需要——特別是廣大的住宅計劃，土地與鄉村問題的解決，及教育的利便之改進後；他以下述的語句承認其簡述的工作之繁重：

「我們的工作較任何國家所曾遭遇的更為廣大。但，假如在這個毀滅的悲劇之後，人民還是接受一些瑣細的施捨的虛偽的東西，認為是他們的命運，假如勞動者的領袖們，眼看着久戰未下的衛城底坦道，還瞞着眼睛怯着心腸轉而為降服的休戰，這無異出賣他們自己的階級，也就出賣他們自己的國家。」

「革命并不是流血的轉動，它乃是久睡者醒後起而做出來的變革，是社會從其錯綜複雜底昏迷的壓迫中，忽而可以自由行動時的變革，是一個生命力的新潮衝破了舊水道，泛濫成爲一個肥沃的洪流時的變革。今日文明的世界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讓社會主義勇敢地踏步出來把握着自然而然的機會罷。」

凡是研究麥克唐納所持的社會主義及其根源的，不可不讀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書中詳述不列顛工業機構亟待變革的情形，亦即工黨所自負的責任。同時讀者還可以在書中，看出染着不列顛勞工運動的領袖底政治思

想之科學的基礎——相信社會爲有機體——。

節錄不足以明白表露麥克唐納的哲學；因此我從原書中抄出兩段來，這兩段話是反對社會底資本制度的。

「無論經理人或工人都須使得資本得到利息。假若利害有衝突，便由資本的利息來決定。歐洲人究應去擔任監護黑色人或應去干涉紅種人，都是依資本的利息爲從違。假若如得到資本利息的豐厚，必須保持一部份是失業者，那末許多工人的家屬便應陷於失業。假若爲維持資本的運用應該生產過剩，便應該過剩生產。假若有時也要把同道中一部份做犧牲，那末犧牲者便應像古代的人犧牲一樣，甘受苦難。假若牠有時墮落的傾向中能夠現出一時的繁昌，便應承認牠有那樣幹的權利。」

另一段是關於資本主義的：

「這個制度的特色是：——由許多私人的結合去供給公衆的需要，但以那些私人的利害打算的基礎。這種利害打算激勵他們去改良他們的經營供給的組織，這種改良的努力當然不是爲得對公衆的義俸心腸，而是爲得有利可圖。現今對於一般人勞動的要求乃是要求他們去替那些資本所有者造出利潤。偶然的那些勞動者也能維持生活，但是從那整個的制度說來，那些勞動者的能夠維持生活那是偶然的無意中做到的事體，并不是當初計劃的那一項。那些人得到工作的最要條件，是要使許可他們勞動的雇傭者能夠得到利潤。這是全問題的中心，生產交換的機器是構造得運用得要使得公共的需要可以由私己利益去供給，而這裏所說的私己利益即是工業資本所有者的私己利益。」

那制度是怎樣運行的呢？每一個主東或組成公司的許多主東從事生產都是以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為目的。有時也許要減少生產額，有時要增加生產額，或減低價格或增高價格，或採用自由貿易的國家政策或採用保護關稅政策。或和他人競爭或和他人聯合。無論採取什麼方針，根本目的總是在於增加利潤。結果或是引起一時的繁昌或蕭條，或引起勞動時間的增加或失業，或發財或破產，或省約或浪費。那都管不了那麼多。只有這樣的，那冒險的，勇敢的，樂觀的，貪得無厭的私己利益纔能對社會并對自己服務——尤其是對自己，這種私己利益只被市場的經濟可能性限制，不受任何社會義務的觀念限制。例如，大戰時和大戰後，物資感覺缺乏的時候，或貨幣價值變動一般人喪失了明確的廉價貴價的觀念的時候，又當到大戰中所施行的種種限制被廢除了的時候，那私己利益便乘機爆發起來，肆意圖利，儼像一架放開了控塞卸去了制機的摩托卡一樣。如果對茶業或煙業新加了關稅，舊藏貨的價格便即時突漲起來，等到那增稅減除了的時候價格卻仍舊不落，必須等到舊貨賣清以後纔許有點希望。那制度的運行，不受任何公正的道德的社會關係的限制，只受牟利機會限度的制限。資本主義對於他自己的勞役常常是努力取得最大限度的報酬。」（註）

註：麥克唐納著彭學沛譯：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我們可以從麥克唐納在那些黑暗日子中的演詞及著述裏面，找出兩個為今日工黨感謝不已的主要觀念。

自始他便深知道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全不相干。

一九一九年當不列顛工黨遭着最大的天賜的危險時——當時共產主義者的反叛差不多把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

政黨完全破壞——就是正在生涯最困苦中的麥克唐納，工黨在會集中的先鋒戰勝了那種挑戰，在朝的工黨因為參加混合內閣，對於共產主義者的襲擊，差不多不抵抗，設無麥克唐納之力，工黨許是敗北了。除他而外誰能竟此，尚屬疑問的時候，麥克唐納却已再救出工黨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人們為和解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作最後一次的努力，在社會主義國際中謀獲與俄國的統一，也就是麥克唐納以不列顛代表的資格，證明俄國代表所持的見解，足使統一不可能。

許多人，甚至在工黨裏也有，承認工黨公開地摒除共產份子的行動未免遲了一點，可是當時麥克唐納的演說已證明最少他對於俄國共產主義的狄克推多底真性與計劃並無絲毫的迷想。

麥克唐納是頭一個對付極端份子底憤怒的人——這些極端份子當時是他最忠誠的擁護者——他對於持暴力為政治主張底基礎的人，予以積極的反對，並且以嚴正的言詞反對與他們為任何的聯合。

休戰以後的幾個月裏，利害關係任何方面的考慮都發動麥克唐納取反對的方針。他在大戰中所持的態度，在某種限度上，對於黨中一部份擁護混合內閣的人，感情上不免疏遠了，而戰後對他忠服的人，大部份却是熱烈地歡迎過俄國革命的人。

遲至一九二〇年，有些人提議請麥克唐納和國會工黨組合作，幫忙他們在議會內的策略上的運用，因為麥克唐納要求最後的聘請必須是全體一致的，談判終於破裂了。當時全體一致是做不到的，事情就因此擱置下去。

麥克唐納從一九一九年起對於共產主義的意見的演說及著述，於其為人之真誠方面，及以為在其領導下的工



黨與當時俄國的統治者有關聯的人那方面均予以明晰的註脚。

和議簽定後，麥克唐納立刻批評當時列寧向全世界隱掩俄國混亂情形底烟霧之後所力持的巨大而恐怖的自治政府的試驗。

『我對於列寧政府所作爲決不原諒，尤不稱贊，但是列寧政府却已昭示吾人它能給與俄國以個安定下來的機會。列寧不得已向不幸的需要俯首，例如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Great Liouvek）他不得已以殘忍的決心去握着刺人的孛蔗，例如他剝奪一切布爾喬亞的選舉權；但是當他錯誤的故事，他的罪惡的必要和他的專制和盤托出的時候，相衡之下還是他有利的。』（註）

註：麥克唐納著：議會與革命（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

一九一九年六月，關於協約國當時幫助白俄的事，麥克唐納答記者之問說：『我常認爲圍攻俄國的行動是失體面的。這種行動也是可悲的，不僅使不列顛蒙恥，並且種下無限的惡因。我想這是因爲協約國正在鞏固布爾維克主義的原故，布爾維克目前之行事，是我死力反對的。我們有真確的證據，足以證明協約國之干涉，正使布爾維克主義者得所藉口以前進。』

同年他在議會與革命書中也說：『在危險時期維持革命的獨裁還可容忍，但是在改造時期的獨裁，和發號施令以爲改造事業的根據的獨裁，是絕對不可容忍的。稍爲有一點價值的社會黨人，決不會對此獨裁表示屈服。這種獨裁，只有在民族複雜如俄國的國家纔能維持，也只有身居遠方不明真相的社會黨人纔會加以稱贊。』（註）

其次，「因此，專就吾國而論，我們已經達到一個階段，社會主義的程序，不過是政治的鬥爭。一個議會的選舉，就可把列寧必須由革命始可獲得的一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民衆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的工作。況且像這種已經得到由政治革命始可獲得的一切的國家，決不能用俄國的方式，來開始牠的社會革命。在選舉之後繼以革命，以求實現業經失敗的少數計劃，是屬於兒戲的事，而非嚴刻的政治所應有的。」

斷言（一切的革命）「歷史也許會承認其創造者，但決不能承認其抄襲者，」麥克唐納以下述的話總結俄國的革命：

「俄國革命，已成爲世界歷史上最大事件之一，而感受壓迫的統治階級與資本主義對它所施的攻擊，徒然使每個關心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的人傾向它一方面，共同組成聯合的防線。但這是俄國的。其歷史背景與遺傳是俄國的；它所處的經濟環境也是俄國的。」（註）

註：麥克唐納著：議會與革命。

在他那封公開致共產主義者的信裏，麥克唐納更詳言他反對暴力，信仰民主主義的理由。

他說：「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所以我得要相信輿論與教育；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我得要相信社會底不斷的改進是基於一個生長的計劃上面，不是基於命令的服從之下。我必須謀目的與方法二者間之均衡，對於工具之性質及其工作我也得要相當顧及。我決不用一柄麵包刀去削尖我的鉛筆，也決不用一個鞋擦子去清潔我的牙

齒。在我的孩子無知的時候我決不打他，在他是非未分之前，我也決不以飢餓去懲戒他——因為，我相信打和知識間，餓和是非間並無相連的關係。在某些場合之下，服從的本身是好的，命令也許可以強制執行，但是希望整個社會都按着命令舉止合禮，在思想上在行為上也依照命令行善去惡，這表現在蘇維埃政府的歷史者（蘇維埃主義之毀棄，土地處置之變更，工廠管理之限制，對美國財政家之讓步等），直如相信每個能背誦教義簡明問答的蘇格蘭人，都可以避免陷入人生的網羅一樣地愚妄。暴力的方法與社會主義者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結果必情感上喚着暴力，腦子裏却嚷着社會主義，情感在說他們合作，理性在說他們相敵。」

麥克唐納繼續說指出：『假若俄國能有一個沒有外交的襲擊，並掌握着生活品的供給的情形之下，讓布爾維克的政府執政十年，它也只能（不能再多一點）弄到俄國達到一個舊輿論擁護的工黨政府在不利執政五年的成績；反過來，不利頗假若被布爾維克執政兩年，將會弄到我們達到俄國革命前十二年的情形。』然後麥克唐納以毫無慈悲的筆鋒分析共產主義的信條——記着不是威廉戴遜希客司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 Hicks）也不是文斯頓察赤爾（Winston Churchill）寫的，是麥克唐納寫的。

『共產主義者乃是一個穿起硬布女裙和髮起螺旋形頭髮的政客。平民在歷史上已經從暴力進到政治，如今他們已進到政治那邊，我何為又匆匆忙忙地開倒車呢？在古代，暴力誠然有其吸引力——例如在斯巴達克斯（Spartacus Revolt）的反叛高忒台勒爾（War Tyer）約翰波爾（John Ball）奧力味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等的時代——法國革命是由暴力鼓舞起，儘管暴力虛擱，巴黎公社的英雄氣概也是由暴力鼓舞起的，儘管自起爭

論，儘管在維爾賽的軍隊未到途前已歸失敗。對於這些史實我寧願去玩味不願去抄襲，寧願去利用它給與我們的感悟，不願去忽略它。過去的二百年間，沒有選舉權的人匍匐地從事革命，使他們的子孫不必再事革命，只要去運用政治，我是現代的人，相信政治，不相信革命也不相信獨裁。」

從來贊成議會政治的文字，可曾有過如上述的這幾句話一樣地又簡又明嗎？我着實懷疑。

在我們還未放下麥克唐納對於共產主義底意見的問題之先，（這個問題在近時歷次的選舉中給予他的政敵以莫明其妙的口實）我再錄兩段話。

頭一段是從一篇他在倫敦奧爾特爾折俱樂部（Aldwych Club）的演詞中摘錄出來的，那個演講之發表後上述的文章四年，其時麥克唐納已重入下議院並且恢復黨的領袖的地位。

「說工黨的黨員是布爾塞維克主義者，是採的以頭站在地上生活的人的意見。

我們除了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為仇敵之外，和他們的關係就和在月裏的人一樣。你們中或許有不少人以為自我為一個布爾塞克主義者是有理由的。可是事實上，你是大錯特錯了，假若你以同樣意見視下議院裏任何一個工黨議員，也是大錯特錯的。我們對布爾塞維克的主張就連百萬分之一的同情也沒有。」

最後，這裏我們更有列寧的一個演說底節錄，列寧如果見着布爾塞維克的人是不會認不出來的——這演詞不列寧的共產黨（他們早就目麥克唐納為無望），最近於一九二八年重印分發，作為反麥克唐納的宣傳：

「他（指麥克唐納——譯者註）是第二國際底模範的代表，是謝得曼（Scheidemann）考茨基（Kautsky）

樊特維爾特 (Vanderelde) 布雷特定 (Branting) 諸人和國際社會主義的出賣者底好同事。

『麥克唐納的演說及著述那樣地平滑，那樣地和諧，那樣地通俗更那樣地似乎是社會主義的，正是供給一切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勞工運動中掩蔽布爾喬亞的政策底最好的榜樣。

『麥克唐納始終是一個布爾喬亞的和平主義者，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改良者，夢想着一個無階級的國家的人。他正如一般布爾喬亞的欺騙者，詭辯家，附屬者一樣只在辭采上認識得階級鬥爭而已。』

一方被人稱以賣國賊，一方却被推測的友軍咒詛，這種惡運極少人遇到，甚至政客也罕有的。但是假如還有人責麥克唐納與布爾塞維克主義賣弄風情的話，那末，一九二三年的時候，麥克唐納很可以指證出在每一個工黨大會裏共產主義都是大大失敗的，一九二二年大會中，那個看來清白的『容共』（假如他們接受黨章的規定）的提議，也體無完膚地失敗了。

同年（一九二二）麥克唐納說：『布爾塞維克主義任何的提議，都是以革命的方式去進行，跟着以獨裁制去維持的。這和法西斯主義及英國保守黨的右派較和工黨更相近。』

這反對與共產主義有任何『交易』的根源，乃是因為麥克唐納那時不斷地受工黨快要統治的觀念所支配。此時，除了謀選民轉而擁護工黨這必要的工作而外，直無物可阻工黨之執政。謀轉換選民的態度，工黨需要一種解決當前諸問題的社會主義方案的宣傳。關於這類的工作，工黨最得力于麥克唐納及韋伯二人。自一九一八年起工黨便有它固定的目標和政策。戰後麥克唐納和韋伯二人更把工黨的信條修訂，加入一種基於戰後新世界的需要底活潑

的信仰。

一九二〇年工黨大會中，麥克唐納提議入黨費由兩個便士增至三個便士。他說：「他們決心無論任何區域中的任何角落裏，都成爲工黨組織的一部份；無論自北蘇格蘭至英格蘭之西極自北海至大西洋，都必須布滿一些工黨的活動團體。至少在組織上能夠做到這樣，你才覺得心滿意足的。」

他這樣在幕後從事調和黨內因大戰而起的分派，給予黨以一個準備爲前途奮鬥的新綱領，及以必勝的意志鼓舞全黨——或者最少是要獲取最後可能的選票的時候。局外人便滿以爲麥克唐納已逃亡了已完了。當一九一八年國會舉行第一次補選的時候，許多別的人都當了工黨的候選人，獨不見麥克唐納之名，以爲他是逃亡了的意見更似乎真的證實了。

等到一九二二年他才企圖再入下議院。是年適尉勒克魯克司 (Will Crooks) 辭去國會議員之職，於是麥克唐納便被選代他爲武力赤 (Woolwich) 工黨候選人。

麥克唐納重闖入議會的消息，無異是一個誹謗他底新爆發的信號。他的政敵早已決計永遠放逐他。同時一般的倫敦人士，卽有承認麥克唐納爲誠實的人在，對於他底戰爭或和平的意見仍視如敝屣。

在這種情況之下，戰時對他的罵罵於是再全力轉回來，同樣的演詞底節錄，又重新搜集起來。街頭上昔日「賣國賊」的呼叫又可以聽到了。一切反工黨的勢力，連共產主義者也在內，開始了防阻麥克唐納得選的工作。結果，這回的選舉成爲近年補選競爭中最劇烈之一。更因爲反對方某派底卑污的策略，竟使多數人回味它時不能不帶

着恥辱。

的確，這東武力赤的選舉乃是七年來麥克唐納命運中被人憎恨底運動之極頂。他的政敵並不是爲的要戰勝一個工黨候選人。他們寧願在別的地方失去十二個議席，却不願讓這個差不多已重新獲得工黨領袖地位的人獲選。工黨關於這回補選的正式報告裏說——「敵人所用的策略全是一類最無所顧忌的東西——在東武力赤的競爭中尤其證明出來。」

麥克唐納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的競選演說，拿當時競爭的情況比照看來，可以說是一篇充滿了政治家風度的文獻。恆常的，無論在演詞中在文書上，他都是力避參以私見的。

他首先對謝勒克魯克司底長期遠和，逼着他不得不辭去議員的職務表示「深深的抱歉」之後，便轉而以嚴酷的語調斥訴混合內閣的報告：

「歐洲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飢荒與抑制的情景，內部的競爭與財政的混亂，工業的麻痺與戰爭的危機還是一一存在人們的眼前。因此凡是曾受過痛苦，如今還忍受着痛苦的如你們一樣的人，聽着，如今是時候了，你們應該主張以民主的精神去解決一切問題，主張建立一個名實相符的能代表各國人民的國聯。」

「就在你們的帝國之內，印度與埃及正呈現着可怕的問題。同時政治的及工業的敵人也參加那個騷動。」

「在爲『消滅一切戰爭的戰爭』而死的人底墳墓上的野草尚未發青的時候，已經有人對我們說，我們又必需出備第二次戰爭了。」

關於國內的問題，麥克唐納說：

「國內有兩個非常緊急的問題，下議院須立時予以注意的，第一個是失業問題，第二個是愛爾蘭問題。政府關於前者無力去處置，反使我們愈覺困窮。關於後者却又剛愎而又無情地去應付，反而養出憎恨，謀殺與不名譽來。」

「失業本來是我們的制度的特徵，是週期爆發的，它帶着痛苦給予千千萬萬良好的工人階級底家庭。戰後，失業是必然要來的。自一九一五年以來工黨已一再，再而三地忠告政府，可是政府還是沒有適當的準備以臨這痛楚的日子；的確，政府一方操用慈善的政策，在英俄間貿易的途徑上放下種種的障礙，一方面又故意地使中歐陷於經濟混亂的狀態之中，二者相併自然愈發加重失業的恐慌。它曾經企圖利用退伍軍人之困窮（退伍軍人是它所不願的），以破壞工會的防衛，工會的防衛本來是退伍軍人及普通工人用來保護自己的，它爲謀掩沒它延遲建造退伍軍人的房屋底責任，不惜多方挑撥退伍軍人與建築業工會間的爭執。它又制定一種企圖普遍旅行的沒有補償的短時工作制，降低了一般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並且使這種永久降低的生活程度易於執行。此外，它復以不公平的規約責成企圖盡職的地方當局，減少地方救濟的機會。」

「我擁護經全國總工會及去年一月廿七日在倫敦舉行的工黨大會簽署的工黨的建議。這個建議包括（一）與俄國及其餘的歐洲國家通商；（二）建築足敷應用的房屋；（三）地方當局工作的組織；（四）失業津貼的滿意的計劃。」



麥克唐納繼續論及和愛爾蘭和解的政策，減縮虛耗的政費，積財五〇〇〇鎊以上之征稅，及不課奢侈品稅的預算等問題之後，他以忠告的語調結束他對喬治魯意混合內閣之斥誅：

「工黨目前而獲勝利，必將鼓舞我們反對逼佈全國的詭計及剝削的鬥爭底運動。如今工黨在議會所得的議席和全國的勞工比較起來是不相稱的。一九一八年秋天，常和平剛剛來的時候，一般人民很是淨泛，他們愉快的心理被了利用來重選「由黨魁推荐候選人」的議會（Coupon Parliament）議會中人都是些從大戰中圖了利的燧石面人」。可是如今它已失掉信用了，一般地都逐漸要求它終止了。讓東武力亦給予那搖搖欲跌的東西一個嚴重的打擊罷，幫助建立一個在國內外都能够為平民的利益而服務的，能够虔敬戰死的人們，實現他們底自由及公正的理想，能够解救國債的重負的，能够消滅新戰事的嚇嚇的政府罷！」

麥克唐納在兩個擠擁的會集中，開始競選的演說。其一在波士多爾山學校（Postall Hill School），其一在厄爾街（Earl Street）。在第一個演說中，他表示他是明白這回補選重新引起的發狂的誹謗運動底力量的。他說：「我不希望你們會稱為適意的鬪爭，我知道這回鬥爭是不會適意的。我也不希望一個文質彬彬的鬥爭。這回的鬥爭也是不會文質彬彬的。我更不希望這是個光明磊落的鬥爭，因為我知道這個鬥爭決不會是光明磊落的。可是我知道，我和我的朋友是要光明磊落地去鬥爭的。我們將問的是政治原理，我們決不會在你們的面前，扯下工黨的旗幟，摔到污泥裏，再把它升起來，讓微風吹乾它，清去它拖下的污泥以侮辱你們。日子到來了，勞動的男子和女人既得到了選舉權，必須在運用選舉權中運用他們的智慧。向感情呼籲，向熱情呼籲，向偏見呼籲，向愚昧

呼籲——這些都讓混合內閣的人去幹。工黨是不那樣幹。因為工黨不應那樣幹。」

麥克唐納繼續批評混合內閣的報告并且詳述工黨的目的。然後這個年來不能在倫敦公共集會中演說的人，一兩年前在距他如今站立的地方不出五里的公地還是騷動的中心對象的人，用一種動人心絃的聲調說：「我是一個舊式樣的人，我不願意稍稍改變生命的真實性。史帝芬孫（Stephen Son）曾寫下一警句說：『胆敢與你的死者不配』。這警句近年常常懸在我的眼前。它不僅適用於父母輩，并可適用於政客和國民。」於是他終止了一下，然後以他的手指指着廣大的聽講的羣衆，再後以詩律的音調說：「胆敢與你的死者不配！不要忘記你們的死者是爲什麼而死的。且放眼一看今日的歐洲，看看英國及因我們的兒子爲國而死才給了權他們的政治家成就了一些什麼。我們需要工黨起來恢復這個平衡。」

在普蘭斯達（Plumstead）的厄爾街的擠擁集會中，麥克唐納以戲劇式的呼籲向武力赤的選民結束他的演詞，請求武力赤的選民給他以最多的選票，不是爲的麥克唐納，乃是爲的給予全世界的勞工以一個好的消息，他說：「這不是我個人的鬥爭，恰正是勞工的鬥爭，勝利不是我的勝利，正是勞工的勝利。候選者，鬥爭，勝利一切都是那偉大的勞工覺醒運動的一部份——勞工擴大它自己，勞工放着它自己的理想在前頭，勞工選擇它自己的代表，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女兒，永不會遺棄它的；勞工們選擇他們，使他們做其代表；勞工們和他們密接地聯繫着，知道他們從何處來，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知道他們將往何處去，勞工因爲已往在下院的經驗，畢竟自信起來了。呵，這樣，勞工是有生氣的，勞工是團結的，勞工是堅決的，勞工是有組織的，勞工是有政治意識的，

被事實破外來的壓力呼喚着，出來拯救歐洲，拯救英國的榮譽，拯救愛爾蘭，拯救一切民族的國際的民主的政府，使它不致覆沒於資本主義底新的爆發中。勞工被請用它的思想，請用它的良心，請用它的靈魂，請用它的力量，請用它的勢力在國際強者的英國，在向世界呼籲和平，予其國民以希望快樂和友愛的英國。這便是我的理想，這便是我的感悟，這便是我的目的。」

競選運動在殘酷悲痛中進行了十六日，加文氏 (Mr. Gavin) 在觀察報 (Observer) 上，主張麥克唐納得選。他認為麥克唐納是工黨中偉大的議院人才之一，可是他這種呼籲只是諷諭與譏說的荒野中，一種微弱的呼叫而已。

爲混合內閣的候選人從事遊說的婦人，毫不猶豫地對勞動階級的婦女說，工黨的候選人是沒有道德的；他們殘忍地對待他們的妻子！這種無稽的宣傳，足以代表出素日程度甚高的英國政治。在這回競選中如何地退化。即使不事贊成麥克唐納的人，也會希望這些飽受教養的婦人，自那回遊說之後，便滿懷着羞恥不能自己。

問題是在這裏——這種迫害會騙麥克唐納說在工黨舊席中他得了選嗎？投票差不多截止的時候，問題還在疑問中。甚至唱票開始後，許多人還相信麥克唐納是『得選』的。可是最後的數目，他差六八三票失敗了。

此時在倫敦遶流着反對的狂潮，即在工黨佔優勢的選區，他也沒有獲選的可能。『麥克唐納能獲選嗎？』似乎是否定地答覆了。

麥克唐納在未爲東武力赤工黨候選人之前，他已任了亞布拉文 (Aberavon) 工黨底預期的候選人 (亞布拉文

威爾斯的一個選區議席，一九一八年曾以六千的多數選出了一個混合內閣派的人物。因此在武力赤競選失敗之後，他便回到亞布拉文去，準備在總選舉的時候在那兒競選。

可是前途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的確，政治的預言家大多數都認亞布拉文是工黨候選人沒有希望的地方。聰明的預言家更說，以麥克唐納做候選人，必歸失敗尤無疑義。

其實，持這些見解的人，却沒有明白，八年來麥克唐納的被逐中，反對他最劇烈的地方乃是在保守自由兩黨底報紙支配下的倫敦。我記得當他在倫敦出現便即成爲騷動的信號底時候，在中部及北部他都能在很有秩序的會集中演說。此外，下層羣衆漸漸覺得麥克唐納的演說較任何勞工運動中別的人物來得更更有經驗更有權威。假如他是被雲霧遮蓋着的話，那些雲霧往往被他雄辯底閃耀與預言底雷鳴所掃破。

雖然他知道許多人對於他在戰時的言行很懷疑，可是他不會設法使人忘記。他隨時隨地還是爲獨立工黨及其政策辯護。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武力赤競選失敗之後，他在孫德蘭(Sunderland)演說，要求他的政敵證明他的錯。他說：「遠大的眼光是不得人心的？一九一四的時候顯然看出來了，回頭看看，說「我真是獸子了」是人人所能的。只有少數的人才能向前看，說：「你要做一個獸子」。這便是一九一四年的獨立工黨與今日一般意見相異的地方，英國除失掉了七年的生命——七年的日歷之外，還失掉一百年的文化。獨立工黨的黨員沒有爲他們一九一四年所持的意見向人道歉之必要——的確，自一九〇六年起我們達對國人說英國是往何處去了。後來大戰來

了，如今無論什麼地方有悲傷的人羣在舉行慶祝的，也就有千千萬萬的退伍軍人在街頭踹躅。他們肩上負擔着的不是槍桿却是哀傷與貧困。」

「歷史使我們很安全」，麥克唐納說，他根據個人的意見，繼續指出獨立工黨對大敵的態度，如何地被戰後的事實：例如失業，市場之倒閉，德國之破產，歐洲各國間之小戰，及政治家在國際間之紛爭等一一證明。他結束說：「讓我們為我們的黨及我們的成就而驕傲罷。」

麥克唐納第二次殘酷的試驗，不久又來了。一九二二年底，保守黨在卡爾登俱樂部 (Carlton Club) 舉行那歷史的集會，通報混合內閣的末日，墮下說了許久的總選舉。

這回總選舉，工黨提出四一四名候選人（一九一四年只提出三六一名）結果一四二人得選。工黨合計得四、二三五，四五七張選票。前屆總選則只得二、二四四，九四五張選票。因此得佔六十七個議席，增加了近二百萬的選票——這足以證明工黨勢力在工業選區中不斷地增加的情形。

然而，這還不是成功的全史。工黨一方靠他自己底實力增加，一方乘自由黨之分裂，竟一躍而頭一次佔了反對黨的地位。

是我們這個新黨的政黨向着執政的路途前進中的第二個標記。

這回總選中，麥克唐納的命運怎樣呢？只有曼徹斯特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記載他在亞布拉文競選的消息。各報對於其他的工黨候選人底演說都一一記載起來，對麥克唐納底不聞不問的壓迫卻還繼續。

然而即使報紙不理會他，一般民衆在競選的狂熱中忘記了他，可是黨的羣衆却空前未有地爲他作後盾。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擺子已經開始回動。到一九二二年回動的程度，已使這被逐的人摧毀了混合政府的六千多數，爲工黨贏了亞布拉文的議席。

這結果是工黨勝利中最值得注意的。其意義不僅是多得一個議席，而且證明了近代政治中報復的殘忍鬥爭之終歸失敗。

在倫敦和在別的城市中觀望選舉結果底廣大羣衆之對於麥克唐納在亞布拉文得選發出來的歡聲，證明黨的下層羣衆知道麥克唐納得選對於他們之力量有何等意義。

『破偶像者』把當時消息傳至倫敦時的情形記載下來：

『烟霧連綿，天氣寒冷，人們在屏息靜氣地等候選舉的結果已三個鐘頭了，忽然在光耀的板上現出：「格拉摩干 (Glamorgan) 亞布拉文工黨勝利」的字樣。立時歡聲四起，不必問「誰代表亞布拉文？」了，死的字母中也有一種電力似的。』（註）

註：The Man of To-Morrow, by "Iconoclast" Leonard Parson, 1924.

『破偶像者』繼續說：『當選民們從黑暗中把一個年來因爲固執主義而飽受風霜的人找回來而高舉的時候，他們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這被逐的人不僅是勝了，而且是以一四、三一五票對一一、一一一票壓倒保守黨候選人，相差三千票以上。

麥克唐納本人也把勝利的情形記載下來。他說：（註）『要說明亞布拉文是如何地鬥爭的，也就無異說明今日選舉的通常方法。這回亞布拉文競爭的情形較許多地方艱難一點，注意也恐怕多一點，出席投票人與選民們的數目相較也比一般高些，可是競選的方法却和到處所用的差不多。』

『現在的選舉人名冊內包括的人，大多數興趣於選舉中的刺激不是興趣於政治，他們的投票依賴號，妄想，或美名。這類選民的存在，竟使遊藝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使候選者愈來愈公然採用宣傳式的罵罵以博取羣衆的同情，全國滿貼牆上的贊助保守黨攻擊工黨的廣告便是那類的東西。關於資本稅建議底批評，（例如說資本稅是處罰儉約和減少工業資本等等）十分九都是那樣性質的胡說。這種選舉方法看來似乎是不會一時消滅的，而保守黨乃是這種低劣的行爲底主要責任者。對於那種低劣的行爲我們如不跟着以誤述，詭辯和誣議去答覆它，就得要把那種方法予以嚴厲的探討以奮鬥的精神去反對它。我們在亞布拉文採的是後一個態度，結果我們得到政治上的公正裁判。』

註：“Aberavon,” in *Wandering and Excursions*, by J. Ramsay Mac Donald, Jonathan Cape, 1925.

麥克唐納繼續解釋他競選的綱領中最初似爲危險，後來却成至寶的資本稅一項（資本稅是當時工黨的首要的目的）。

他說：『常報紙開始對資本稅攻擊的時候，我頗懷疑擠擁集會中的羣衆能否耐心去聽精細而又繁複的解釋與辯論，這種解釋與辯論却是一個有力的答辯所不能缺的。可是結果使我吃驚。當我以經濟的論據從事證驗的時

候，他們的興味反而增加。例如關於國債的本質，藉課稅以償還國債的情形，工業資本的本質，重所得稅對於工業投資的影響，及每年按資本價值繳納所得稅，並不即是沒收也不是減低工業資本，諸如此類的問題，都為聽衆聆聽接受。資本征稅問題，實在使我把選舉變做羣衆教育最好不過的題目。」

曾以三個人的集合，視爲工「黨」的人，如今回到一羣以工黨之名說話，以工黨之名投票的議會了。曾被人勸告說「這是不可爲的」的人，如今回過來見到自己參與創立的黨，成爲保守黨政府的反對黨了。只需要一短步。工黨便會和保守黨相調了。工黨一定會執政的。從患難的年頭中從不搖動的這個信念，如今在麥克唐納心中定然熱烈地燃燒着了。

擺子開始動了，是決不會中道停止的。這準備爲下層羣衆服役的人，不到一個星期之內，甚至驚訝了同黨中一部份的人，便被選爲國會工黨組主席以繼克來尼的位置，此時一九一四一筆勾銷了。麥克唐納是回來報復了。

「破偶像者」曾有這樣的記載說：「這樣還不到一個星期，情勢完全改變了。沉寂打破了。報紙失敗了。不能不對事實柔和地低頭。回復一九一四以前的遺習底擬議也烟消雲散了。只有少許人悲痛地回憶着麥克唐納沒有絲毫反悔，更沒有絲毫退讓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意見。但一般文章只是「赦免與忘記」。

還有可注意的，麥克唐納退回得力於黨中進步份子不少，他們希望麥克唐納來做一個「奮鬥的領導」，這在克來尼之下，他們認爲是缺乏的。但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其中有許多人說，即換麥克唐納來也太中庸了，如今他們



公開地贊助馬克斯頓 (Maxton) 或其他黨中勇敢的份子。可是這些年間麥克唐納已經取得黨中最偉大的議院操縱家的地位，假如一九二二年推選他的人如今大部份轉而主張撤換他，却仍然無礙於他的領袖地位，因為黨隨着在各選區中獲得的新勢力，也就擴大了他的黨員的範圍，而這些新進的黨員却明白地看出今日黨中除麥克唐納之外，再沒有第二個具有天賦的智慧及政治家風度底人了。在過去七年中，他把黨的命運轉變了，在下議院之外更為黨獲得不少的威信。

跟着麥克唐納選為議會工黨組主任之後，還有一個近代政治史中最不自私的態度出現。當他知道自己被選為議會工黨組主席，票數僅稍微多了於剛被罷免的克來尼之後，他便立即建議預被提名為副主席，做克來尼的總副官。

我們且考慮一下他們二人的地位罷。大戰期中，他們二人背道而馳，克來尼曾做內閣閣員——麥克唐納却是一個以實瑪利 (Sharnel) 克來尼——邱卡邑 (Lancashire) 的先驅者——在困難的年頭中負黨的領導責任。照理他原該希望做工黨 (反對黨) 的第一個領袖。那個位置原是他努力應得的。可是在將近成功的時候，在他的希望正該最熱的時候，人們因為擁護一個八年前被驅逐於黑暗中的人而罷免了他。

我不知道何者較善——承認麥克唐納底超越的政治能力呢，還是承認克來尼底中庸與忠心？的確，除了麥克唐納之外，沒有別人會完全實現『一切全為工黨』的這句格言了。

麥克唐納親自以這些語句表明那種不自私的態度：

「關於此，讓我乘這個機會致歉於我的前任克來尼先生。他對黨的忠誠，非常偉大，予我們一個明顯的榜樣，無人不受他的感動。如果命運使工黨成功，決無人比克來尼先生的貢獻更多。凡我覺得我責任上應做的事，都由於我對黨的最高利益底考慮，而克來尼先生之爲我的同事是最完善的。假若我能成就了我前頭的工作，我將不問收穫，我只在內心裏感覺予工黨在議會中得到了勢力的無限決想；同志們必須起來完成偉大的工作，因爲天將不假我們以遐齡了。」

可是事實上，麥克唐納的斷言却證明是錯誤的，因爲擺子不曾停頓了它的搖動。再一年之內，鮑爾溫內閣從保護政策者總選（Protectionist Election）中崩潰下來了，全國人覺醒了要找一個工黨政府出來執政，使麥克唐納擔任政府中兩個最重要的職務。

在大戰期中黑暗的日子，麥克唐納牢記着約翰伯來脫（John Bickel）當日所曾忍受的遭遇，從這急進的勇者底行狀中吸取偉大的力量。假若今後英國還有第二個政治家要忍受憤怒的輿論底槍箭，那末，那個人如果是聰明的，必會轉頭向麥克唐納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的生涯史實中求取他需要的力量與鼓舞。因爲在整個糾纏不開的英國政治絲絡中，一個人從權力的地位上陷入深淵裏——陷入只有寂寞，憎恨，咒罵，一切均屬不名譽的深淵裏——然後從時間的急流中，得再回復較其時昔更大的權力更大的聲望的，再也沒有第二個例能較麥克唐納所遭遇的更顯明了。

將來當工黨完成了它的使命，回望他們奮鬥經過的紀錄時，或許即以那些把一九二一年在武力亦失敗的候選

者，推移於一九二四年爲首任工黨首相的離奇曲節的事實做它底長期的浪漫的歷史中底最戲劇的一幕。

## 第十章 反對黨

左沒有說到一九二四年的大試驗，麥克唐納當了下議院第二大黨領袖，英王召請組閣之先，讓我們說一說最初由達涅羅（Donar Law）主持，一九二三年由懷中大將（Whitside）主持，懷中大將辭職後由鮑爾溫主持底短命內閣的情形。

從工黨的見地上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韋斯敏斯德舉行的議會極值得注意，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麥克唐納重任下院工黨領袖；第二因為工黨在歷史上第一次對着閣員席上各閣員做反對黨。

工黨不僅從大戰年頭中的懷疑與猶豫裏「回來」，并且將歷史的自由黨從光輝中推了下去，獲得社會一般的注意與興味。假如一般人猜到一年之後道亞布拉文的勝利者會與鮑爾溫換位，以英國首相的權威與信譽發言，那末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當麥克唐納起來提議修正英皇底演詞的時候，那些要求旁聽席位，藉以評判這些差不多不知名的議員底才具的人，恐怕比當時實際要求的更多了。

麥克唐納正好趕及回到議會發表他對於愛爾蘭問題的意見，愛爾蘭問題乃是新議會第一個要批准的事件。

他在第一次的演說中說：「我們必盡力幫助這英愛間不好的一頁迅速地閉結。從閉結中打開使愛爾蘭更快樂，使英國更尊榮的新頁。本院給與愛爾蘭的話是，在這英愛關係調整中，愛爾蘭從其自由去會間，將給予英國

以她素不願給予的好意。」

麥克唐納建議要求英國立刻採行的政策，在工黨對英皇演詞的修正案中可以看出來，那修正案在大會中很早便提出的。內容是：

「可惜，在目下空前失業的狀態之下（這空前的失業大部份乃是四年來誤謬政策的結果，是該由混合內閣的行政者負責的），英皇演詞中，竟無適當的可行的待遇失業者底辦法，沒有充份承認這是國家的責任，更沒有新的轉變使歐洲的消費者再購買我們的貨物，藉以恢復國際間的貿易及穩定國際間的匯兌底影子。」

修正案的辯論中，麥克唐納概述工黨三個目前的要求。

他說：「我們的修正案要求三件事，并批評政府沒有把它們一一做到。第一，在如像今日的失業狀態之下，我們必須有改良的工作，或者改良的待遇。我們曾屢在這些議席上說，如果政府不能盡第一個責任，沒有工作給他們，那末必須維持他們的生活」。

關於「布施」的問題，麥克唐納繼續說：「沒有工作的金錢補助，只是最後的辦法，我們採用它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好的，乃是因為除此而外，便沒有辦法，是明明知道它本身是不好的，政府底責任乃是繼續定出一個能於最短期內恢復貿易常態的計劃。」

麥克唐納復說德國的賠款問題和巨額的國債，乃是較好的貿易途中底一大障礙。

「非待至減輕了國債，我們決無法減低生產費，也不能改進我們在世界中立市場中的地位。如何去減輕國

債呢？當代表科兒那華利 (Colne Valley) 的史諾登先生 (Mr. Snowden) 拒絕辯論資本征稅的時候，保守黨議員諸君便微微地感覺快樂了。議員諸君，我敢保證他們是不必久候的，資本征稅是快樂的。此際，我願請他們考慮他們如何可以減輕國債。因為國債的負擔，我們的國家收入每年大概要支出三百兆金鎊。你決不能繼續支付下去。這個國家，這個工業的國家決不能繼續支付這筆實稅。工資也不能繼續因免這筆實稅而課的稅。如此重征科學的征稅制也不可能。可是有大的經濟和工業利益的商人還在笑我們提議一個足以減輕國債，足以減輕課稅，足以減輕生產費，足以不必增加一個六便士的工資，而可以切實地提高工資的眞假底計劃。」麥克唐納結語說，「他們實在不應該笑我們，應該推懷歡迎我們。」

麥克唐納在議會開會三星期後的那篇演說，其中有一部份是他這回到下院之後第一次關於和平問題的意見。在那篇演說裏，麥克唐納重述同意與友誼的和平底需要，并引申基于武力而造成的和平底危險。

他在一個一再引起工黨議員的歡聲底結論中說：「我們需要眞正的和平，非俟我們獲得非武力的滿意的和平，忠誠合意的和平，相互合作的企圖達到一個聰明有效的建設計劃的和平，我們決不能滿意地認爲已盡我們的責任，際此人們將軍事的制裁與經濟的目的混和起來，政治家今天說賠款，明天說軍事估價的時候，建設眞正和平底基礎條件還在由聰明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放下實質的基石中堆積起來。」

雖然，新議會開會只是件渡過些日子的事，可是已够使全國人的注意集中于工黨身上，因爲這時正巧是混合內閣執政了多年，詭計欺騙的鬥爭把英國的政治弄到較一世紀以來更爲天黑的時候。

麥克唐納利用耶穌誕議會休會的機會，懷抱着他的出人的精力到處演講，遠至加的福(Gardiff)亞伯丁都有他的足跡。在演講期中，昔日詈罵的聲音完全沉寂了。在保守黨勢力範圍下的地方，也有無數的集會，聽講的人也是擠擠擁擁的，由此可見選民們要瞻仰反對黨的新領袖的風采，要聽他的言論，要研究工黨何以能步步成功的政策底熱望。

麥克唐納在近格拉斯哥(Grassgow)的啓爾賽司(Kilninch)演說。論及工黨成功的祕訣，他說：『當我在下議院放目一望工黨的時候，我便可以看出它的力量。在我背後的席上坐了一位成功的律師，報上差不多天天都有他的名字。和他并肩而坐的是一位（并不是誇張）在礦穴裏出世的。一個有遠見有眼光，一個有社會實際痛苦的經驗。總之，工黨的議員都是社會各階級中熱誠的人。我們工黨較任何別的黨有更多的經驗，更多的智識，更多成熟的思想，更多曾在團體裏服務的人，從代表大眾的觀點上看，你們在下院中有最優越的黨。』

在一九二三年二月議會新會期之前一二日，在倫敦和本堂(Holborn Empire)獨立工黨的大會中，論及工黨財政政策，他說工黨不滿那種富人少納稅，窮人反多納稅的課稅政策。即使所得稅一鎊由十先令抽至十四先令，最富有的人底袋中的殘餘還足夠使他們奢侈浪費，但在目前課稅政策之下，是無法更多抽富入底稅的。如果人民每年生產物值七百或九百兆便須征稅，恐怕沒有一個財政部長能從下至上安排出一個能公正地應用於一切以下的階級的稅律級位。』

麥克唐納繼言：『工黨財政部長第一個責任，乃是清還大部份的國債，藉以減輕課稅，并使課稅能公平地普遍施行。那就是實行資本征稅。我們希望不久見諸實行。這種征稅並沒有什麼神祕。我已與我們的同志商談過，決

定要求新會期中劃出一天來，讓資本征稅問題得充份討論的機會，希望下院能根據我們草擬的決議案予以通過。」

一星期之後，這個不倦的領袖。乘小船渡海赴加的福。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八日即在科立堂 (Cory Hall) 擁擠的羣衆中演說。他以柔揚的語調縱覽工黨成爲政治上的一個勢力底過去現在和將來。

他說：「我們正路過一個大的試驗時期，我們配得上呢，還是配不上呢？一個偉大的政黨，你需要和知道它的是什麼呢？最要緊的你必需有主義——你決不能夠一天是一天地去謀應付眼前的事實來建築一個偉大的政黨。

一個爲世世代代實現進化的政黨必須把握着未隨舊政黨俱亡的部份，轉交與未來的世代，實現它光大它。」

麥克唐納復展開他心中的幻影繼續說，工黨不是一九〇〇年創造的——雖然它是那時誕生。工黨乃是其後頭一切自由思想的繼承者。乃是十九世紀中一切試驗的繼承者，乃是急進黨的自由黨的異教派運動的思想道德觀念和理想的繼承者

他說：「一個偉大的政黨決不是一個瑣屑的政黨，也決不是一個回念過去少看將來的政黨。我以實現先人的遺志去致敬他們。例如關於住宅，失業，年老恤金，退伍軍人的待遇等問題。我們在某幾個方面，特別在一切只能以社會結構的新觀念去解決的大問題上，總較別的黨有優越的智慧，因爲我們比他們更近代化。我們更肯用力去利用過去人們的經驗。我們不能達至善，但我們是一步一步和它接近的。」

他繼續勇敢地爲工黨宣言：

「我們需要更新我們的幻念，這就是目下國人腦海中認爲工黨在努力的。我不是說我們較自由黨或保守黨更



明白退伍的軍人，更明白失業的人，更明白無住宅的人，或者更明白無家可歸的人，我是說我們的經驗是這樣的；當我們看見被遺忘的退伍軍人時，我們的感觸多於百萬家財的人；當我們看見那些曾經多年過着愛情的家庭生活的老男女離散時，我們的感觸多於最有同情心的富有的男女。我是說勞工運動中的男女底經驗，是一種使我們感觸多於只用眼瞧瞧、說聲嘆息的任何階級的人。」

關於這個演說，（這是麥克唐納第二次任議會工黨領袖底頭一年演說中最出名的一篇）南威爾斯一個自由黨報紙說：「麥克唐納先生必然接受了加的福人們對他熱誠歡迎底印象。在其澈底縱覽政治情勢中，最少在某一點上，他使他的聽衆滿足了。那就是：如果他沒有做得到工黨（反對黨）的領袖，他還是不會缺少忠貞竭力熱誠和責任的。這一點，那屬黨外人也得要予以承認。」

麥克唐納從這全國演說旅行回來之後，在下院中，發表了兩篇關於國際安全問題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演說。

在提出一個關於和平與賠款，特別是關於魯爾的佔領底決議案的時候，麥克唐納以有力的演詞重述他對於歐洲安全問題的意見。

「在這些一切事件中，拿我們自己的地位來着想吧。很奇怪地，今日大多數人民似乎忘記了國家竟是我们自己的國家。我們雖則對於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有種種的意見，但誰去應付英國與各國關係的局面呢？誰呢？我是說的政治的關係和軍事的關係。議員諸君或許以為暫時的我們與這些都無關係，以為在戲台上演扮着的歐洲大

劇——我希望不是一個悲劇，雖則它非常似乎是一個悲劇——沒有我們的份兒，我們只在正廳上或樓廂上看戲而已。那實在是很可笑的見地。事實上我們是在戲台上，我們且不能離開戲台一步。」（註）

註：Hansard, March 6th, 1923.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出了一些什麼呢？我們從找不出宣佈戰爭的人形惡魔。事情原不是那樣來的。我們只找出（常常都找出、將來也找出）一些精細而又緩和微小至於滴滴的事體，不知不覺地我們陷入了下去；無聲無音地隨着下降，滴滴慢慢兒地大了，水流也慢慢兒地強了，而我們還是繼續的下去下去，最後我們陷入急流去了，這時無論我們持什麼意見，拿什麼觀念，想什麼希望都沒有關係，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惟從瀑布以俱去。

「如今遭遇的事，乃是一串新章的開始，如果我們不小心去應付它，充其極或許會成爲戰爭的。我們今日的境遇是這樣，歐洲的軍事均勢在變遷着；政治的均勢也在變遷着，目前，以我所得到的消息及實際情勢的觀察，英國在這些情勢中并無左右的力量。我們不能發生大的影響。沒有一個國家盼望我們去領導，可是事實上，假若我們能够勇敢地擺明我們的立場，爲我們的立場而奮鬥，祇要數個月的工夫（被人誤解或所不免），英國是可以給予歐洲以一個道德上的領導的。」

他復說：「我相信只要稍微勇敢些，英國是可以獨自取得這些道德勢力底領導的地位，假如歐洲的問題是要解決的話，這些道德勢力是必定要來的。尋覓着如此努力者的人，而看見我們底寂然與沉悶，他的愛國心恐怕也

爲之冷落了。

他續說：「此時，不是寫下今日或明日的歷史，乃是寫下未來五十年的歷史的時候。你如今開始，如今選擇一定的途徑，如今發動一個新的歐洲外交。可是今後十年你還是不能打消它的。你還只是事實的傀儡而已，事實將會代寫上你底歷史的終局。」

他說明法國安全問題，可以提出包括一切的國聯去解決，并聲明在全盤問題考慮和諒解後，他也願意接受國聯的勸托之後，說

「我最後一言——我會一再地提及的——是：今日的事情乃是來自底一個最大的支配的因素。今日的事不是這個或下個星期的事，也不是今年或明年的事，今日的事乃是一串連續的事，將來它要結實，結實最後直待至我們五十年後或七十年後歷史的全行程（特別是我們的國際關係的歷史），被這幾個星期內出現的事情所裁決方才休止。這不光是法國或德國的問題，而是整個歐洲的問題。而且，事實上也容易見到，美國也不得不來參加，這樣便更成爲一個世界的問題。一兩個月之前，人們大概都很吝嗇地很不願承認我們在開倒車回頭去戰神廟（Temple of Wars）一拜。我們常說「這回戰爭是要消滅一切戰爭的」，我們常說，「協約國底勝利不僅是要用來保護協約國，而且是要用來做和平的基礎的」，似乎如果我們要再說「讓我們準備第二次戰爭吧」，我們真的再慚愧沒有了。可是我們如今慢慢的少一點慚愧了——少一點慚愧了。請看，那些在戰神廟爲灰塵所遮蓋的祭壇，如今被人整理起來了，外表也可尊敬得多，我們正退回到一九〇〇年前一式一樣的思想：搜索整個世界，謀同

盟以確立均勢，以武力獲取安全的時候。」

這演詞底結尾的一段，很值得注意：十二個月之後他做了英國外交部長的時候，所施行的便是這些政策：

「一個議會當着許多帶着滅亡的命運底事件正在來臨的時候，還束手地呆坐，不從事去導引它模造它，使之向道德的智慧和的方向前進，議員諸君，你們可以幻想出還有比此更足以危害憲政政府的事情嗎？我們之來此——無論如何，我們中一部份之來此——為的是要使下院成爲一個有權威，有聲望，受人尊敬的團體。假若不能達此目的，將會怎樣呢？那便立刻剝奪了使國家藉審慎周詳的有生機的試驗與變換中由一個階段進至另一個階段底惟一方法了。如今試驗來了。機會也來了。我們的誠懇也許比不上政府——我不說這個——但較政府有更大的自由，我們可以與法國及德國交換意見。我們可以站在議會的立場上查詢法國的意見，比利時的意見，甚至德國的意見，從事促成國際間的好意。那是我們的功能。那是我們工作的領域，提議這個決議案，也因為我相信時間已到來了，議會應該在輿論的領域上，盡它對歐洲的責任，只在它盡了對歐洲的責任之後，才可以保證來代的歐洲的和平。」

第二個演說在三月二十日發表，正當工黨提出那著名的提案：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敗，社會主義制度應代之而起的時候。那決議案底原文如下：

「我們一方鑒於資本主義制度既不能適當地利用與組織天然富源和生產力，及供給大多數人必需的生活程度，一方相信生產與分配工具之私有制乃是資本主義失敗的原因，因此本院確認立法的努力該漸漸地把資本主義

撤換，建立一個基於生產及分配底工具之公有及民主的管理之工業與社會制度。」

這個動議底論辯為該年下院各議案底論辯中最重要的一個，並且引起了其他各黨議員底廣大的興趣。社會主義的信條，在下院從未有如這次底澈底的討論。這足以證明工黨在政治革命上的成就，在幾年之前凡自認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還被目為『幻想家』，受人鄙棄。可是如今這種『幻想』的觀念竟在下院提出了，並且不是由少數的議員提出，而是由下院中的第二大黨提出，由反對黨的領袖代表發言。

麥克唐納在論辯中的貢獻，活現出昔日十字軍的信仰。麥克唐納在沒有討論論辯中質詢的問題之先說：『資本主義常獲不安全——勞動者之不安全，供給之不安全。』

『議員諸君或問，假若你們把那些在國際貿易上願劃宏謀的人與工業分離，你們怎樣辦呢？問這句話的人，真以為我們會把那些人處死嗎？我們還是請他們安於原位的。可是今日的情形怎麼樣呢？亞美利先生（Amery）會相信他們底願劃宏謀的經理人是他們自己的雇主嗎？自然，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出錢雇請他們底公司的備人，正如他在海軍部中雇請的職員是國家的傭人一樣。亞美利先生願意把海軍部作為一種私有的事業去經營嗎？如其不願，為什麼不願呢？實情是這樣的：商人只是資本家所雇用的人，並不即是資本家自己。』（註）

註：Hinsard, July 16, 1923.

麥克唐納在另一段裏說：『我反對人底自由被經濟底列陣式的勢力所限制，如今日的資本主義所弄成的情形那樣。為什麼我們還得不到一陣自由的涼風呢？大多數人不能夠自由地去為他們的兒女選擇前途，不能夠過好的

生活。大多數人不能夠自由地講他們願講的，想他們願想的。我堅決地絕對地反對物質主義——即資本主義支配人們的生命。此外，生產這個大問題是以什麼開始的呢？資本主義要求更多的生產爲的是什麼呢？絕對的什麼都不爲。最近有些議員先生對我們說，他需要一個基於節儉基於入息一類東西的社會。他用這些字眼的時候，他不描畫資本主義實際是怎樣的一個東西，他只描畫一個純粹幻夢的社會。資本主義不能夠以增加財產要求人民去從事生產，因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直無財產可言。我們需要拿一種與財產完全不同的刺戟去向他們請求。代表倫敦的那位議員先生提及佐治亞地方（Georgia）。我願將我從前在那裏的時候所得的經驗詳細地中肯地述說出來。我曾親去高加索的礦山調查，那裏的礦山剛剛收歸國有。從前那裏是很騷動的。生產降落，不守法和不秩序很流行。國有後這些都解決了都安定下來了。我詢問那個屢屢領導糾紛的人，如今的情形與昔者的情形有什麼不同？他說：「從前我們工作由這裏」——說時摸着他的肩膀——「到這裏」，指着他的尖鋤的末端——「因爲那時我們是爲的資本家工作。在新情狀下，當我們想及我們的兒女在提弗利司（Tiflis）享用我們的煤的時候，我們不光是由肩膀勞苦至尖鋤，我們的心也在工作。」

「我要對反對我們的議員諸君說，除非你能把工人們的靈魂也講到了，你才能够希望他們盡責，才能够希望他們有豐富的出產。資本家不能夠使工人達到那種境地；他們或許可以給予工人們高的位置或監工的地位，但這只是粗糙的物質主義，舊摩所可腐壞，盜賊所可劫掠的，必待找到了善美的微妙的精神力，社會才能够解決生產的問題。以人們所能想見的範圍說，除掉社會主義別無他法可臻於此，資本主義是永不能的。」

麥克唐納在結語中，引用他的朋友摩黎勒爾兩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 編輯時所說的話：『我們必須先有偉大的學派然後才能有有力的政黨。此際，凡予思想以自由及異樣，予世人權利以熱誠的，對良善的目的均必有所貢獻。』

麥克唐納說：『這便是我的信條，這便是我的信仰，也就是我贊成社會主義的理由。』

一九二三年六月工黨在倫敦舉行第二十三屆年會，韋布當大會的主席，他底演說，從當時的政治情況看來，得人們非常的注意。

韋布的那個演說（工黨重要黨員關於工黨政策底最有力的最論究的解說中之一），關於戰後問題及工黨外交政策的那幾段，尤足以映出麥克唐納當時的意見。因此，我們把那較為重要的幾段適當地錄在本章之內。

追述隨着『十年不屈不撓，屢行壯烈』而來的成功之後，韋布先生說：

『讓我們如今轉過頭來研究英國當前的幾個嚴重問題。』

『從歐洲這一端到那一端充滿着如戰事一般的緊張，乃是目前一切糾紛的根源。這種緊張明顯地是戰後不滿意人的條約底結果。未來的歷史家必會說一九一九年時的巴黎，是個國際無能甚至災難製造的工廠。如今這已展開在人人的眼前了。休戰至今差不多五年了。可是歐洲複雜的經濟組織還不會恢復成一個商業的整體；有些地方糧食和原料都感覺過剩；却極難於與別的地方的生產品交換；的確，在貨物的自由運輸上，旅行與交通上，不知增加了多少障礙，在歐洲地圖上空想地劃上的政治疆界上，我們還不曾得到一種統一的運輸制度；民間貧乏與因

苦成爲普遍的現象；甚至法國及其他各國工廠與地方的物質損失也還不會恢復。一九一九年的世界信任其成就真正和平的政治徹底失敗，在歷史上恐怕再沒有如此動人心目的了。

「失敗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有人說（這種說法很有至理）這些條約所鑄成的大錯乃是神學上稱爲不能征服的惡味底直接結果。儘管他們的處置爲他們準備好了一切學問與智慧，明顯地這四大巨頭(Big Four)仍不能拋去自由選擇（不顧當時情勢底堅不可移的事實）他們認爲政治上於他們數國或他們自己有利的事情的見解。必然的，我們工黨的人認爲條約之失敗是因爲自始至終他們一面忽略了經濟，一面忽略了道德。我承認這簡單的信念：道德和經濟同樣，乃是一切事情的本性，無論大小的事情，我們如忽視了它的本性，我們的估計與佈置也就不免落空。然而一九一九年的世界走得最錯的（這我想各國及他們大多數的國民要負責的）還是在解決問題的精神上。如今我們大家都可以看見，歐洲既不能基於憤怒與暴力之上，也不能夠基於憎恨，貪婪與恐懼之上重新建設起來。同時個人的憎恨與貪婪，恐懼與暴力，不是僅僅代以國家的便是和經濟的與倫理的要件相和。

「今日我們在國家的立場上，應該拋棄這種國家主義者的幻想。如今機會成熟了，我們的外交政策不應基於我們意想中的權利，應基於我們所洞悉的世界共同的利益；不應基於國家的憎恨，國家的貪婪，乃至國家的恐懼，應基於人類兄弟的情誼；不應基於損人利己之上，應想怎樣拿我們特有的天賦與機會去爲整個人類服務。如今各國既已發覺他們乃是互相關聯的一體，我們將知道兄弟的情誼（凡對整個人類爲最善的服務的）終必增進各國的福利。工黨爲相互服役的政策而奮鬥，與熟謀自肥的政策相反——無論是剝削別人以自肥，或剝削別國以肥自



國。

關於外交政策（大部份是由麥克唐納負責的），韋布爲如下的宣言——從將來的十二個月間的政治情況看來，這宣言很重要。

「這樣的外交政策將會很迅速地確定英國在歐洲提攜中的領導地位，這領導地位，是現政府拋棄了的。它將明白地對法國說，我們不再與她攜手從容進一步的我們看來似乎致命的壓迫政策，這種壓迫政策似乎是從精神分析家稱爲「恐懼心理」上生出來的，不是足爲大國法的東西。它將信實地接受德國人（假如吾國收回過份的感事賠款）在經濟可能範圍內補償法國比利時底礦山和建築的損失，賠償被炸彈或魚雷犧牲的平民底意見。它爲謀一般問題的解決起見，將捨棄一切進一步的要求，並力主普遍地屏除各國間的戰債。它將使國聯成爲絕對世界性的組織，在它的範圍內成爲像國際郵政聯合那樣地永久有效。這樣的一個外交政策將固執地虔誠地以及早恢復世界各國（當然包括最近與我們作敵的國家）底經濟的繁榮爲目的。它將不斷地努力永遠進步的軍備共同限制。按我的意見，它將鼓舞我們在國聯之內創立實際的國聯通貨及藉國際郵政聯合居間調節的國際匯寄聯續機關。它將力謀海關及護照障礙普遍之制止，或者至少須使這些障礙次要於交通自由無上的最高利益，同時，假定因爲各國政治上的特異，目前不能成立一個歐洲關稅同盟，最低限度，從阿斯脫刺罕（Astrachan）至教幾西拉斯（Algerias）必須建立鐵路與河道完全聯合的管理，對於那些目的僅在通過的一切貨物及旅客，不擾擾也不征稅，伴着這樣的一個經濟政策，我們還可以要求歐洲各國的政府在中學及大學裏採取一個國際主義教育的共同政策，代替那些聯

所謂愛國主義之名灌注於世界的學校教科書裏的可笑的錯誤的歷史與經濟學。」

韋布在他演詞中的另一段，提出他底著名的「不可避免的漸進」(inevitability of gradualness)政策，從那時起這個政策便被視爲工黨在內政方面底演進的目的，而麥克唐納就是它的代表。這個宣言并獲得一個增加的要義：經過黨中一部份，尤其是獨立工黨底對抗的口號「爲上實現社會主義」的襲擊後，更成爲工黨信條之一的確，自一九二三年工黨大會宣佈這個「漸進」的信仰，而麥克唐納復從而擁護之之後，便兆端了個人的分裂，在獨立工黨拒絕麥克唐納爲獨立工黨出席一九二七年工黨大會代表團團員的時候，分裂更確定不移。

關於「我們今日所處的情勢底一般特點」，韋布說：

「第一，讓我說說我們底政敵常常愚昧，而在理解上復似無能明白的，我們改革計劃中那不可避免的漸進問題。社會主義者不僅有主義而且有綱領這一事實，似盡把我們的批評者惑亂了。假如我們說及我們的主義，人們便對我們說「那是不能實行的」。說及我們的綱領，他們又說，「那不是社會主義」。但爲什麼，因爲我們是理想家，便疑我們是呆徒了嗎？工黨之視社會主義是基於政治的民主主義的；這使我們承認每向目的前進一步，都必先獲得（至少在數目上）全體人民大多數的同意與擁護。因此，即使我們目的在把一切事情爲上革命化起來，但，每一特殊改革，却不得不等待十或十五兆的各式各樣的選民都多同意的時候。不論英國選民們會做錯什麼，會看錯什麼，但人們因何恐怕他們會走得太快，走得太遠，在我却是不能理會的。的確，那實在是任何有效的民主主義底最有價值的保證。」

他繼續說：「但是工黨，即使在相當時期後掌握了政權，它甚且不要求把一切事情立刻改革的。凡是有教育的人都必明白：草擬一個改革一切的宣言是容易的，一次會席上立出一些新天新地的法律也是容易的，然而翌晨的結果，除了廣漠的擾亂外，一切還是沒有改變。我記得蕭伯納先生三十年前說過：『不要忘記你可以一個下午把所有的鐵路都國有起來，但是你却要花很長的時間去把三等車廂與頭等車廂都改成二等車廂』。只要我們是先要把我們的主張放進法案裏面，在委員會裏一節一節地去爭，然後再送去相當的機關施行於全國——這就是工黨施行社會主義的方法——我們就不能不重視不可避免的漸進。這種把社會主義翻變為實際的計劃，一件一件地去探行，乃是我們三十年來繼續努力的工作，結果，各方面，我們計劃的各部份都已由州或鎮的市參事會，甚至由中央政府成功地實現起來，并且已經成爲一般人的老生常談了。全國的人雖不盡了解社會主義却都習染了社會主義！如今是潛在的意識變爲意識的時候了。」

麥克唐納於七月底在南岸爾德（South Shields）演說的時候，答覆鮑爾溫前不久論及社會主義的話，也乘時把這點意見詳爲引述。

他說：「社會主義真如像妖怪一樣了。鮑爾溫在他的演詞中，活像發現了一件東西似的。他發現了兩種社會主義者——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這真是一大進步，因爲在總選時只有一種社會主義，不好的社會主義。獨惜他仍未發現好社會主義者現正佔勢力。他對不好的社會主義者，妖怪的社會主義者下的定義是，他要在一分鐘之內謀改革。他更闡明說，妖怪的社會主義者宣傳說一個陡然的改變之後，你便可以入新運命：少做工作，多拿薪

金，得到世界上從未有過的舒適。

麥克唐納繼續說：「我希望鮑爾溫或任何擁護他的人，拿任何社會主義領袖所著的書，論文或演詞讀一讀，看看究竟有沒有與那定義相符的一類東西存在。這是一個公道的要求，並敢請鮑爾溫或者他的團員，或者他的負責的宣傳者，在不蹂躪原文內容範圍內，選出我們中任何一人底著述以證明鮑爾溫那種說法。」

前此一天，麥克唐納在達刺謨（Durham）礦工節日中演說時，他曾論及煤區底糾紛與衰落的危險，這種危險已經把我們最大的基本工業蓋上了恐怖的黑影。

他在達刺謨跑馬廳露天的集會上說：「我們得了一個教訓，那就是我們不能進行一個工業的鬥爭，倘若不把它送到下議院去，但資方却不願意我們那樣做。我昨天聽見首相說，人民漸漸習慣跑去唐寧街十號（10 Downing Street）了。假若你們在煤區上有了糾紛，代表們便到唐寧街十號去。這固然可以，但你們多半到什麼地方去呢？同時。首相又說，每一個工業的紛爭，無論罷工或關廠，都是與社會有損害的。這點我們很明白，并且也屢屢的這樣說。但如果社會不能予社會中各部份的人以公平的待遇，那末當一部份人起來自謀公平的待遇時，社會不必鳴不平也不必咆哮的。」

「首相的意見是什麼呢？是不是說罷工或關廠的糾紛應向代表全國的政治的與工業的生活狀態，實際上却是怠慢地分坐着，說『那不關我們的事。讓他們自己去鬥爭罷，讓富翁們與那些僅有三十仙令或四十仙令的人去會商罷』的下院求解決呢？須知工人們與在銀行裏有積蓄有信用的雇主們之間是沒有不平等的。」

一九二三年秋季的政治情況是鮑爾溫先生忽然投入保護政策派，意外地引出了第二次開稅總選（Fair Election），結果不僅保守黨佔大多數的舒服時期被剝奪了去，而且早了幾年爲工黨第一次租開路，早至工黨內最樂觀的人也不會料到——麥克唐納也定然沒有料到，這在前章他就工黨領袖職時底演說中，便明白地表示出來。

麥克唐納以工黨代表的資格，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日在倫敦柏路累維亞酒店（Hotel Bolshaya）舉行的中餐鼓會中開始向關稅保護派挑戰，出席者有工會大會執行總部，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此外還有工黨的議員及工黨的候選人。

他演詞中的首段對達涅羅之死表示哀悼，很值得注意。在柔和的語調中，顯出凌駕乎政爭障礙底同情，麥克唐納說：「在我們認識他以來，我們覺得人與人間的維繫有較重於政治意見者在，我說這話深信是代表我的同胞而說的。」

「我自己從未與達涅羅先生在下院同一邊坐過，關於任何重要的問題，我從沒有和他的意見一致。我還記得在他年青的時候，他常使我們發怒，可是他的人格已由憂患中日漸豐富，我們也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乎他在我們的心裏纏繞着一樣。我們覺得他是一種「正心誠意」的人，爲公共責任而勞悴的人。」

「我想，我們對他的憶念將會常使我們不致因政見不同而把人類的慈愛毀碎，使凡當議員的人們不能放棄他們的責任。」

這在總選競爭中最初的结果使麥克唐納執政并肩負空前的國家二大重任的演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足以代表當時他的意見。這裏我只從全文中選述出一點——就是他說明工黨對於關稅保護問題的意見。

「保護關稅不是一個救治的方法，只是一個轉換——使一個大運動移於側線的好方法而已。當然，在保護關稅之下，你還是有賄賂，腐敗和援引的事情。我們都知道在討論工業保護法案之時，下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我從未見過如此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現像，這些一切必繼續存在，當頭腦率直的工人們還是像流水一樣地這邊那邊的飄蕩，時而一個工業被保護關稅鼓舞起來，他們便說太平的世界來了。前次我們反抗保護關稅這個口號的時候，我們是從反面對它。我們不再這樣做了。我們如今爭的不是保護關稅遠反自由貿易；我們爭的是保護關稅遠反工黨政綱。」

麥克唐納在另一節裏說：「世界上沒有一國行工業保護政策的，能够沒有常住的失業問題。保護政策從未能把那個問題解決，將來也永不能把它解決。」

資本征稅的提議乃是一九二三年總選時工黨綱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也是麥克唐納在他的競選演說中最注意的一點。

十一月二十日，在布里斯拖大集會上演說，他詳細地說明資本征稅的提議。

「這可怕的东西，這資本征稅是什麼呢？它本是很尋常的一件事。其所以成爲問題者，乃是因爲它易爲人所誤解與諷刺，真是沒有辦法。」

他繼續說：「每二十四小時，我們要從國家的生產中拿出一百萬鎊來償還國債的利息。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人要你們相信那不要緊，工黨却要你們相信那很要緊。我們工黨這樣說，假若每天（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作一整天計）需從國家的生產中拿出一百萬鎊來，從尋常的生產循環中（生產轉變成爲資本，資本又復從而自轉成爲生產，循環不已）拿出二百萬鎊來——假若每天一百萬鎊這樣地從尋常工業運行中拿出來——僱主儘可說他們所願說的，財政家儘可說他們所願說的，政客儘可說他們所願說的——那實是工業的重担，是在戕害着工業。」

在挑戰口吻的一段中，麥克唐納繼續說：「當這巨額的債務放在你的肩膀之上，在利息支付中，它吸取諾大的國家財富，諾大的所得稅，諾大的糧食糖茶間接稅，使我們連人道的富有同情的偉大事業——從天上帶下地面來的理想——也無力去進行，因爲國債佔了第一個留置權，減少了我們國家的收入。」

他復說：「國債的總額究竟有多少呢？它相當於：假若我們照我們的提議還債，凡擁有五〇〇〇鎊的人——不是說每年有五〇〇〇鎊，乃是說積蓄有五〇〇〇鎊——及擁有多過五〇〇〇鎊的人，必須將他們的財產底一個相當的部份給與政府，使政府可以藉此清還國債的主要部份。我是一個沒收者嗎？一個盜賊嗎？一個半官的政客嗎？須知事情的結果是這樣的：被這樣征收的人，據他們自己說，是在支付債務。」

「假若我的所得稅，每年要拿二十鎊給政府，我便對我的賬房說，「你能計算一下，說明我每年交政府的二十鎊中，有多少是因爲我要分担國債的原因嗎？」假若他回答說，「你在清還一百鎊的資本負債，」那末，我便要去索美塞得大廈 (Somerset House) (註) 說，「看呵，我不要我的資本這樣地混亂。我不要你每年寄一張

二十鎊的眼給我；人家對我說，我只負十鎊的國債，拿它去投資，再乘二十鎊或任何的類數——說二百鎊罷——那便是國債中我應得的部份；將來我的所得稅單上對於那部份減少一點罷。

註：倫敦國內稅務處大廈

「有人對我說，雇主們到處說：『如果實行資本征稅，我便停業；我不能夠繼續下去啦，絕對不可能的。』有人說資本征稅將騷擾工業，毀滅信用。但請問假若你還隣人的債，隣人會對你銀錢上的誠實失掉信用嗎？」

「那便是資本征稅的解釋。那便是資本征稅底基礎觀念的解釋。」

在這演詞的末尾，麥克唐納感傷地述及三十八年前他頭一次來布里斯極的情境，這在第一章中我們曾說過。一九二三年，我在這裏站在這擁擠的羣衆之前。一八八五年我也在這裏站在公共的地方之上，但，只得三個人聽我的話。呵，誰說這些一切沒有天意存乎其間？另一邊的人，明白得我們如何地少呵，如何地少呵！他們對我們的眼光是如何地細呵！我們，人類精神底偉大興起的表現是永不衰老，永不滿足，永不任人爲的任何住宅久留的，但常如住居沙漠的卑多宴人 (Bedouin) 一樣，睡在帳幕裏，翌晨起來把帳幕收起來，又復向他的旅程前進。朋友們，我看我們的旅程是沒有盡頭的。我們已經上了征程，我們只有旅行，我們只有往前去，我們的兒女們也會繼續給他們的旅行，他們的兒女也會繼續他們的旅行。朋友們，我和你都耍留心的，是：我們的旅行必須是前進的同時是向上的。」

在這回競選運動中，麥克唐納壓過他的肩膀可以担负任何勞工運動領袖應担负的責任。



不論人們對於資本征稅的提議底意見如何，各黨的人都承認麥克唐納拿出這樣的一個提議來，實在是他們底強頭的政敵。在超人的精力，在卓越的口才，在博得世人景仰的全職之上，他在許多競選的人物中站立了起來。

麥克唐納在亞布拉文競選演說中，反駁那些說假若資本征稅一旦實行之後，必還有第二次實行的人底意見。他說：『我願切實保證資本征稅（因為事情的本質不能）決不會實行兩次。資本征稅的一點一滴必全用在減少國債上頭，決不用做尋常的開支，它的目的在求解除工業的重担，使我們的貿易在世界上更有勢力。』

迄競選之末尾，他還是堅持資本征稅的提議。

十二月三日他在托爾波特港演說：『我爲要表明我如何地完全相信資本征稅，曾說，施行計劃可待財政部的人去議定，但可笑的，竟有人說我這話是不堅持資本征稅。其實我並沒有弱了下去，除非有一個更好的計劃出來，我決不會弱下去的。』

十二月六日，工黨有四百二十七位正式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競選結果投工黨票的人與前年相較稍微增加了一點，共有四，三四八，三七九票。得益於反對保守黨之保護政策者不少，使工黨候選者在三角競選區中勝利。前屆議會中工黨原有一四四席，如今除仍保持一二八席外，復加上六三席，總計工黨共佔一九一席，差不多等於下院總數三分之一。麥克唐納本人在亞布拉文也差不多四〇〇的多數勝過一個保守黨的候選人而獲選。

然而工黨議員之大大增加，還不足以說明保守黨失敗之整個經過。從新團結過來的自由黨同時亦大獲勝利，愛司奈士之將與工黨攜手以實現國人的判斷——下院不信任保守黨政府之表示——既亦無疑，選舉結果之翌晨，

大家便都熱烈地討論「誰將統治我們？」的問題。

十一月二十二日麥克唐納在模爾京（*Moor*）演說，指出這回總選的道德性。

在說過人人都知道代替保守黨而起的多半是工黨政府之後，他說：「我不僅爲憲法的形式，而且爲憲法的精神，爲光明磊落的態度，向國人作誠懇的嚴重的呼籲。在過去一切煽動家及革命的引誘之下，假若不是工黨一面再再而三的起來依憲法而努力，國家或者不能夠安靜地快樂地慶祝耶誕誕辰和新年了，我明白告訴你們，溫文的和誠實的政治，乃是繼續那樣安靜的代價。」

如像麥克唐納所說的一樣，假若國人要求，環境也許可的話，工黨是不辭執政之責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相信國民最好試試工黨執政的經驗，同時他們也相信關於國際的事情，工黨較任何別黨，有更大的權威去建立和平的與公正的條件。

工黨將會執政，因爲關於失業問題，他們自信有一個解決的綱領，一個一貫的觀念與權力，爲別黨所無，因爲他們自信他們對於發展農業的利益同時不犧牲國家其他利益的政策，較自由黨或保守黨均佔一個更優越的地位。最後，因爲他們相信，非切實調整國家的財政，國家的工商業決無復興的機會。

麥克唐納被召組閣的情況，今日已成陳迹。當時叫做「大試驗」的責任落在自由黨領袖愛斯葵士肩膀上。他曾說如果真試工黨政府的話，最好是在一九二四年，各黨在下院都估不到絕對多數的安穩情形之下。

因爲他那種論斷，在下面總選中，自由黨便大大地損失，這也正是愛斯葵士不願任何可能的「推移」底勇氣

的功勞吧。他的批評推測第一次工黨政府是失敗的。我想，他們只是不曾費神想及工黨數年前便已醒悟舉選決定真正權力的英國，無需革命手段的效果。據作者的意見，任何阻礙工黨於一九二四年組閣企圖，恐怕會引起英國一百年來所未有的憲政上的大恐慌，和很長遠的反響。

但，即使麥克唐納，和一般國民都希望工黨執政，黨內却有些潛勢力持反對的意見，他們以為應該待至工黨在下院有了大多數為它的建議作後盾之時，工黨才好去執政。

一個當時與工黨內部很接近的著述家曾把這種情形記載下來，他述及跟着總選結果宣佈後（星期一）『那些說是表現工黨意見的代表們』的非正式的中餐會中，最初大家都傾向反對組織政府的情形。（註）

註：“‘Iconoclast,’” in J. Ramsay Mac Donald (1923—1925)。

『當時惟一主張組閣的理由，在求一壯觀舉動——使英皇勅語中包含一個社會主義的宣言，工黨應馬上起來。這個意見條陳之後，大家都予以嘉許。』

那個記載上續說：『麥克唐納先生出現了；起先他稍為靜聽了一下。然後他開始解釋上述的談論。結果（差不多還不待他說完）持上述議論的人都已轉過來了，他們中大多數都相信事實上他們早就已執政了。因為要求一個堅強的政綱而放棄執政的機會真是懼怯；為下台而上台，更壞；直是頑愚。目的在收旗，先把它扯起來（我們自己心裏明知道，敵人心裏也明知道必須收起來的），直是最無意義的玩藝。難道我們的責任只限於說話上嗎？那裏沒有需要做的事情，而我們曉得做的嗎？一切事情都依着歐洲問題之解決為轉移；這豈不是一件重要的責任

要嘗試要獲得的嗎？况且，除此而外，如果拒絕組閣，黨的前途將會怎樣，我們肯設想一下嗎？我們會連反對黨的地位也失掉的。

『半小時之後，整個情境都變換了。表面上不覺得他們腦海裏起了革命，麥克唐納也沒有明白說出必須執政的語句，那些先前暢論維持在野地位的人，已轉注意於誰任外交部長的問題了。』

從工黨方面說來，時間已到了，從麥克唐納自身說來，年來逃亡中致力的和平政策，如今將要證明了。

可是（將來事實也證明了）當人民正讀報上奇蹟的新聞，麥克唐納被召組織政府的時候，佈置中便已種下破壞的種子了。幾天之前麥克唐納在挨爾京說：『沒有一個有堅強主義為信仰的政黨，肯在被下院另一部份人壓制下執政的。』

可是這正是工黨必然的境遇，因為它沒有在下院得到大多數。殘酷的命運這樣責罰他們。然而除了拒絕組閣而外，是無可選擇的；這在工黨看來，還不如自己去應付困難的局面之為愈。

麥克唐納在挨爾京說：『上帝知道我們中沒有一人現在要執政的，沒有一人要應付混雜的局面的；但國家的事情總有人要去做的，為國家利益計，總要有人出來負責。假若我們退回到欺詐的政爭上，退回到混合的內閣上（混合內閣自試行後便玷辱了政治的生活）我相信那是國家最大不過的災難。』

麥克唐納結語說，假若我們執政，我們將以工黨的資格去執政。我們將信賴我們的主義去執政。如果這一份或那一部分反對我們，他們即管反對，讓他們自受其果。我們將提出我們相信是實際的，是國家需要的建議，

我們將求自由黨和保守黨選擇那一天爲誰服務——爲他的黨，爲他的階級，爲他自己的利益呢，還是爲構成國家的脊椎底大多數人而服務呢？」

就這樣地應付着英國任何政黨從未遇過的困難與危險，工黨開始它的大試驗了。

## 第十一章 大試驗——第一次組閣

假若工黨能自主地選擇第一次組閣而在下院無權的時期，它決不會選擇一九二四年。

當時政治的情勢仍被戰時引起的嚴重問題，及一九二〇年貿易暴跌的黑影所遮蓋。失業已到第四個年頭，工業中心區呆滯之經濟的反應又復廣延無已。工資隨着罷工，的謠言愈益降低。住屋缺少問題因時光虛度無真正應付大多數人擁擠於不衛生的，無健康無禮貌的公共住宅中的情形而日益嚴重。在鄉村間，農人與工人齊聲呼喊着生存不可能。

國外，則恐慌逼起於愛爾蘭，土爾其，埃及，印度及伊刺克（Iraq）各地。歐洲，雖則有了和平條約，却還分成敵對的營寨。法國之黑種人軍隊，不顧她昔日的協約國底反對，佔據着魯爾。德國在離羣孤寂中俯視她的傷痕，俄國則目不斜視地走她自己的路，與世相絕如癩病者獨居荒島。

真的，許多工作等着工黨去做。可是一個少數黨政府，其本身的生存無時不靠些目標不同的人底擁護，許多工作也就不能澈底地去做，而黨內熱心的羣衆，不了解政府處境之困難，則又以爲未曾澈底的工作却應毫不恤黨外人的意見大刀闊斧地去幹，這也同樣地是真的。

假若黨內許多人都不原諒麥克唐納及其黨員所從事的工作底困難，麥克唐納本人却是沒有妄想的。假若這個

不是他選定的時候，他却已預備。這是從勞工代議委員會成立之後，他日夕努力與盼望的時候；是他不辭勞悴遍歷全球以期一鳴驚人的時候。

雖然第一次工黨政府遭遇的國內國外問題，都是絕望的，可是它之來却也有其適當處，因為那個時候剛在英國法律上准許工業有自由組合權後一百年；第一萬國工人聯合會成立後六十年；第一個代表工人的議員出席下院後五十年；工會大會贊成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後二十五年。

自始麥克唐納便決定了英國必須有一個新的前途。

鮑爾溫內閣失敗前，麥克唐納將掌握政權的時候，在保守黨陳詞的爭辯中，麥克唐納說：「歐洲今日的情勢直近乎一九一二年的情勢——相敵的軍隊，相敵的國家主義者政策，大部金錢不用於建設，却用於準備第二次的破壞；昔日互為協約的國家，如今却日相視以相視，只隱瞞着一半的敵意。這一類的事情，需要各黨內具善意的男女全誠底結合，努力去防止，更需以英國純潔的莊重的和神聖的力量給它，使它發長一片新葉，使歐洲各國的人民都有更光明的前途。我們需要新的頭腦去應付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小心翼翼的去運用由那類事情而起的外交對於別人的感情，我們要客觀地去觀察，對於我們自己的利益，要用友誼的堅定的態度去擁護。在這些一切之後，我們更需要一個歐洲的前途，假若有了這樣的一個前途，我對歐洲也就毫不失望。」

那些以為工黨組閣中，黨內各派間免不了爭論的人，一星期內麥克唐納上奏英皇時，他們便覺得很對忤了。因為麥克唐納在他的整個計劃沒有完成以前，他決定了保守秘密，同時為避免騷擾和各方紛至沓來的獻議計，

他跑回他的本鄉薩錫芬司，去思量許多隨着決定組閣馬上起來的問題。自然新聞記者跟着他，可是他們一無所得。總不過是學蘇格蘭人保守秘密學得不像的東西，麥克唐納却比蘇格蘭人還要靜默。

有些人還說：『當內閣第一次召集的時候，大半的閣員還是才曉得他們自己的位置，與誰共事則直無所知。』當時特別有兩個問題要沉思默想——一個是外交部長的問題，一個是如何使上院裏有相當的勞工代表的問題。

麥克唐納決定兼攝首相和外交部長兩個要職，實在是極困難的重任。

羅伯比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 五十年前說過，一個要監督各部工作，同時要引領下院議事的首相底責任，差不多不是一個人能獨負得起的。最近，葛勞得士也說，非有過人的精力不能擔當外交部長的責任。誰能兼這一職而仍活着呢？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不容易找出個代替人而又同樣滿意的。麥克唐納畢生最注意的是外交的事情。一般都公認：他是黨中最能打倒歐洲的戰艦，同時能打開一條基於友誼和軍縮底真正和平的路的人。

大概還有一個原因促使他決定兼攝二職。不久之前國會正證明首相與外交部長，對重要事件的政策不一致的不幸的結果。降低了英國在國外的威信。麥克唐納第一個着手的工作就是要恢復這種在國外的威信，作為國際和平的堡壘，他的地位因為兼就了外交部長的職務大大地鞏固了。

在估量工黨十個月的結果時，我們決不能忽略這些因素。不幸，麥克唐納擔負着任何人所不能擔負的重任。



十月裏，正當黨急需它的領袖很有氣力地去應戰的時候，麥克唐納已是一個疲乏的人了。在那月的競選運動中，他十月來辛勞的影響已現出來。不過，即在我們政治史中這爭辯的偶然事，我們可以說工黨的損失正是國家的收穫，因為十月來英國在歐洲各使領間的威信提高到為一九一八年前所未有的境地。

第二個當前的問題乃是上院問題。本來工黨，自麥克唐納以次，都是反對這遺傳下來的制度的。可是英皇的政府却不能不繼續的，為依照已接受的條件計，在上院裏，工黨是需要有代言人的。

為解決這個憲法上的問題，麥克唐納指派三位上院議員——哈爾登(Lord Haldane)帕摩亞(Lord Parmoor)辰茲斐德(Lord Chelmsford)——出任內閣階級的職位，另推出三位政府大員為貴族。三位上院議員就是航空部長多姆孫(G. B. Thomson)印度事務部總長悉德奧利味(Sydney Olivi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和殖民事務部副部長悉德亞諾爾特(Sudney Arnold, under-Secretary of the Colonies)。假若麥克唐納要回答黨內那些不贊成這樣對環境讓步的人，他可以指出這三個新的貴族并不是遺襲下來的，這樣一來，上院的遺襲主義便隨他們的存在而失去了。我不是說這個事實使他們升遷，但這在祿錫茅斯考慮時是必然想到的。

後來麥克唐納論及組閣的工作說：「發動一個革命較組一個內閣為容易，假若我有第二次的機會，我寧來一個革命，以代替組一個新內閣的責任；可是我不會那樣做。我們已盡我們的力了，從大體上說來，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可告無罪的。」(註)

註：Speech at I. L. P. Conference, Youlg. April 21st. 1924.

麥克唐納於二月十二日在下院宣佈政府的政策。那個會集非常重要，空氣也非常緊張。他頭一回以首相的資格出席下院，他的演詞是很審慎的政策之宣佈，所以在未來數月中鼓舞他的內閣的。

他開始說：「沒有一個首相在下院當過如我所遇的一樣困難。目前，在下院中，沒有一黨佔得多數。保守黨是三黨中人數最多的，可是選舉底結果，下院不能請它繼續秉政。如今工黨以第二多數黨底資格接受了執政的責任。我想這不能不相當改變下院向來的習慣。我想我們須較前少說些黨，少想些黨，要愈來愈多注意於議員本身的責任，以負責的議員的資格去投票，不自限於政黨政客的地位。以下院說來，還是很好的。」

說道「國家遲早總會熟習工黨的領導，如今工黨早臨至爲欣慰」之後，麥克唐納把當時流行的一些話描寫出來，那些話大意說：「我們既是工黨，當然被逼着要去把國家破壞，破壞它的信用，在非常憤激及恐怖情勢之下把資本剷除淨盡」，「直是胡說」。他續說「我希望英國及帝國在工黨政府經驗之下，將絕無這種話或這種觀念的可能。」

「任何政府如今上台總有兩個很大的問題要去努力，無論如何也要重視。」麥克唐納說明工黨的住宅政策之後，即繼續說失業問題。

「這裏還有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失業問題。以前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只輕輕一咬。我們必須獲得兩件東西，（這兩事我們正在努力）第一，是工作；第二，如果沒有工作，便要藉保險計劃供給足夠的入息。這大概是解救失業的要點。任何政府要應付失業問題，第一要緊的是恢復失業者原有的工作，這是絕無可疑的。政府既可設法

振興商業，那末，就應即向商業方面着手。因此，我們將集中力量謀商業之恢復，不必開首就是失業的津貼。前天我看了一本反對我們的雜誌，寫的人就連自己在寫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假定我們對資本的惟一觀念，乃是把它搶劫過來，拿它去爲消費而分配，結果使國家破產。我願說明白政府絕無意從商業的常軌中，抽取巨額的金錢去爲些只能緩進的臨時政策。這是社會主義者原有的穩健的教條，至於花錢直接津貼失業的計劃底需要性，一定要與保持工商業底通常的經濟方便及來源底更大的需要性相較爲準。」

論及農業，麥克唐納繼續說農民課稅改善問題必需解決。

「一個一個的政府都應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已嘗試我並不懷疑，但都歸失敗。工黨政府是打算一試的。整個課稅都須修改——不僅爲農民，而且爲一般人。政府決集中注意於這個問題，希望——在未下台前，在未讓政權於反對黨，或舉行全國投票前——它能拿出一個重整和改良的計劃。農業家自耕無需繳納改良稅的，是國人中最受基於科學的課稅之利的。我們將不去理會關稅及補助金一類的東西。關稅及補助金都是錯的。二者都只在鼓勵人趨於無能，它們引誘城市視農業爲艱難城市的東西。它們不僅限於農業及農產物。」

麥克唐納繼言：「農業需要一種能激勵它自己去奮鬥的東西。我前天和一位著名的農業家談話，他說——『假若我們能够使全體的農業者都如那些在前頭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一樣地有效能，則英國將很少農業問題。』政府將向這種精神及這方面進行，因此我們選擇合作的方法去幫助去發展去激勵農業。」

關於外交方面，麥克唐納說：

「我還有有些關於外交方面的事情要說。當我考慮兼任或不兼任外交部長的時候，最值得權衡輕重的問題是：目前英國對歐洲各國的關係及其所處的地位，既如此不令人愜意，為應付這種情勢計，我相信任首相的人，最好同時兼任外交部長，藉以加重外交政策的力量。我不知道當時輕率了沒有，但最後我決定暫時——至有些端倪，前途轉好時——冒險地去兼任二職，竭力以赴，一旦我覺得能夠解除二者之一的時候，我決不猶豫地仍事懸棧。」

然後麥克唐納為下列肯定的陳說，從將來予俄國以信用的事件上看來這陳說很重要。「信用問題將由俄國提出，不由我們提出，但在政府信用上說，除海外信用，貿易便利信用及類此的事情，原則上對其他各國已為下院所批准者而外，我無意更進一步，更不疑其不足。」

自大戰以來，在下院得未曾有的一篇動人的演說的結尾中，世人可以看見一個實際的理想家，以掃除政黨的信仰的階級的障礙，要求善意的男女的協力底盛感的呼籲以解決日常生活諸問題的景象。

「政府將以它認為與國家及國際有利益的事情從其自己的觀點上向下院提出。混合的東西都是可恨而又虛假的。我深信為國家的政治生活及與我們意見不同的諸位同事所持的尊嚴計，我們應以一個獨立的政黨底資格發表我們的意見，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下院，請大家負責地予以修改，接受或否決。因此根據我們的觀點，我們將把一切國家的及國際的大問題向下院提出來，成敗在所不顧。假如我們要在這個星期或這個星期還未完以前便要下台，我們在英國的歷史上，也已劃了我們的痕跡，同時因為我們承認俄國，也就做了歐洲新外交政策開始的工作。」

「關於對法國的新態度，我們要開始對各種問題予以新的考察，這些問題今不及早予以解決，則不僅無解決之望，歐洲各國且必將再陷於戰事恐怖中。英國的希望需要一種鼓舞與刺激；它需要安定下來，謀貿易之恢復與發展。它需要勇氣與自信，以運用其潛伏的力量，尤須喚起一般民衆積極參加國家繁榮的運動。一切失業的和半失業的人，都要明白我們在此談及國家名望及繁榮的問題時，我們的意思是請他們同來享受。是請他們做繁榮的夥伴，除掉我們能確保他們做了繁榮的夥伴，我們永不會滿意說已盡了責任。我曾敢胆向全國人請求（不論他們的階級，他們的職業），在這個背理的懦怯的時候，這個悲觀與樂觀相為支配的爭持的時候，我請全國的人，我請下院，人人都拿出希望來，都拿出決心來，在善意的基石之上，謀求安全與信用，謀求公正與尊重，決不好去希望『無爲而治』。工黨決持此以邁進。」

同一星期，麥克唐納與法國晨報（Le Matin）的代表談話，復詳言上述的意見，他聲明對法國的態度，一般外交政策和策略必將『向前挺進』。

無論人們對第一次工黨政府的成敗底意見如何地不同，否認其慎始者却極少。尤有意味的是，輿論對麥克唐納的態度已轉變過來，他在那出人意外的年頭中愈來愈受人尊敬，一月八日工黨決定執政之後，他在亞爾伯特堂的演詞，破天荒地爲全國的報紙逐字逐句地登載出來。

我們如要把合成一九二四年底故事的各相連續的成績，一切消極的與積極的錯誤及議會與輿論的轉變都一一記載起來，自非本書篇幅所能及。大概此時欲對其成績下適宜的意見也嫌過早，因爲『他們所做的罪惡死後仍留

存。『而其成績則早已爲他們的後人所誇耀，這種情形在政府較個人尤爲真切。因此短命的麥克唐納政府底成績，仍貯藏在歐洲新精神的發展中；在住宅方面——最近五年間建築的多數補助住宅，都是根據惠特力住宅法案（Whiteley Act）來的，雖則一九二九年總選時，保守黨的宣傳者有時忘記了提及這個事實；關於津貼金方面，其行政活動的三個範圍（第一次工黨政府底卓異的功績）是不怕歷史的裁判的。

工黨執政的九個月中，提出下院的法案，其範圍遍及於下列的諸問題：失業保險，房租統制，交通，住宅，農業，工資，年老津貼，工作時間及戰前津貼等等。

這些法案只是工黨政府實際工作的一部份。在行政方面，他們也有不可埋沒的成績——他們從管理政府各部的嚴緊中得到的結果。此外，麥克唐納在外交部長任內，還有三件日夕掛懷的事——那就是倫敦會議，對國聯的政策及英俄條約。

本書既是麥克唐納傳，因此我打算將那些由他個人負責的事情較爲詳細些說說。

可是在我們還沒有轉說到外交方面的事情之前，對於政府其他各方面活動的成績，作簡括的觀察，也不爲無益。

第一次麥克唐納政府失敗之後，工黨印行了一本小冊子，裏面說：『在失業救濟方面，沒有一任政府做到如麥克唐納政府那樣多的工作。工黨對於失業問題，一開始便把四種限制廢除，那些限制原係防阻（一）與親戚同居的獨身人，（二）已結婚的婦人，（三）短時工人和（四）外國人享受非契約的利基金給予的。』

第二步便把前任政府視為必需的，失業者領津貼十二星期後，即停廢三星期的規定廢除，並且通過一個新法案，將領取津貼的期限由二十六星期延至四十一星期。這個法案成功之後，工黨政府復提出，增加依賴的兒童底津貼費，（每星期由一先令增至二仙令）及失業津貼率（每星期男子從十五仙令增至十八仙令，女子由十二先令增至十五仙令）。

至於更重要的：防止失業和為失業者找工作問題，工黨政府却没有同樣的成功。這失敗或許有種種理由——其中一個主因，我留待下面再說。無論如何工黨自己是知道這個失敗的。在「下台之後工黨的報告說：『現實的工業與財政制度底限制，既難於進行失業救濟，尤難於謀失業之防止及為失業者找工作。』（註）不過，他們還可指出：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失業者數為一、二八五、六二五人，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已減至一、〇四一、八〇〇人，減少了二四三、八二三人，這個減少額，他們的後任在同樣的六個月內，未一突破。

註：Labours Great Report, Labour Publication Department.

就罷工視乎工業和平而轉移及麥克唐納政府，對於在工業上的同僚那種無匹的權威而論，人們或許希望罷工減少，事實正如希望一樣，一九二四年因罷工而花費的時間較諸前數年少許多。這個是因為工業上沒有大的騷動及別的原因。但如反工黨的報紙要責工黨政府無能指揮它的羣衆或說在工黨政府之下工業的糾紛反而增加，那末，正式公佈的數字很可以看看。

下表是工黨在任第一期及前三年中同時期底工作日的損失數：

一九二二年二月至六月 七八、九一六、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六月 一八、五七九、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六月 四、二九二、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二月至六月 二、七一二、〇〇〇

在競選宣言中，工黨曾答允『爲老年人，寡母，病的與無能的國民謀豐富的糧食。』這個諾言，在史諾登的預算裏面，已經部份的履行出來，它爲當時領受減額津貼費的六萬人民，準備了充份的增加，同時把那些往日沒有領受任何救濟名義的十五萬以上的人，都包括在津貼法案範圍內。

在大試驗完結後，工黨宣言說：『現在已有十七萬以上的老人在工黨政府提出的改革草案之下，領受津貼。』

關於退伍軍人的津貼金，工黨在幾種改革案中承認國家的債務。其中最受人感謝的，乃是爲那些被前任政府認爲『窮狂』的退伍軍人給予現金這個改革，如此他們的療治費便可以從公共的基金中支付。

一次過的資給制停止了，任何因戰役而致健康日壞的領受津貼者，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請求增加津貼。緊急津貼也提高了，從前最低限度四仙令二便士，現在增至五仙令，這類津貼的起碼數也提高了，未婚的個人，每星期增至二十五仙令，已婚的夫婦，每星期增至三十五仙令。結果，凡接受緊急津貼的父母或依賴者，每星期立刻多獲二先令六便士至五仙令，國家每年也就負擔二四〇、〇〇〇鎊。（註）



註：Labour and War Pensions, Labour Publication Department.

上面我會提及惠特力住宅法案。工黨政府對於住宅方面做得很勇敢，惠特力的計劃，擬於十五年之內建築二百五十萬所住宅。這個計劃的特點，在吸收大批的工人以完成這偉大的程序。工黨後來說：「關於這一點，只有工黨政府才能獲得工會底同意，才能够使工會——包受失業及貿易衰落的工會——稱心滿意地接受政府的保證。」

同時除了解決這個住宅問題而外，還提出了許多防止建築材料之乘時謀利，及關於城市設計的法案。

關於工黨政府如何利用前任給予各部長的權力，可以由她從事公共衛生的工作那方面看得出來。

他們相信「防止疾病是最經濟的辦法」，所以工黨政府執政之後，立刻發出一張通告（第四七四號），廢除一切對於健康事業方面底捐助的限制。這樣一來便立刻擴大了產科及兒童幸福的計劃，多派健康巡視員，在家庭中多為母親及嬰孩設備床褥，並且開設了約模七十處嬰兒幸福中心區。

從下表中，我們可以大概看出健康事業的捐助之增進情形：

|          | 一九二一—四     | 工黨政府時代   |
|----------|------------|----------|
| 產科及兒童幸福的 | 七五四、九六一鎊   | 八三〇、〇〇〇鎊 |
| 肺癆病的     | 一、一三三、五二一鎊 | 三八〇、〇〇〇鎊 |
| 性病的      | 二八四、九二〇鎊   | 三四〇、〇〇〇鎊 |

教育方面，也只「迅速地進步，沒有挫折」，工黨政府的政策一方把班級面積加以限制，一方改善校舍的建築，加增每個兒童所佔的位置，並收回准許中學聘任無證書的教員的成命，自由黨的報紙，對於工黨政府的這個教育政策批評說：「工黨政府把英國大多數人的教育程度整個地提高起來，這是人們對它最好不過的紀念。」

上面我們把麥克唐納政府底政策及成功，簡單地觀察一過，然所概括者仍只是他在任期內許多活動中的幾個方面而已。此外還有別的重要政策及人物。我還不曾說過過殖民部長多瑪氏 (J. H. Thomas) 的工作 (多瑪氏是麥克唐納任命諸人中成功的一個)，也沒有論及農業部長畢斯頓 (Noel Buxton) 的工作。內政部漢德森及商務局主席韋布的工作，乃至於國防與財政的種種問題等——這些一切說起來，自然足以鋪張我們的描述，然而却不足以改變其本質，因為第一任工黨政府最後結算中，只有三個要緊的工作——外交、失業、住宅。這三者才是麥克唐納政治才具的真正試驗，外此僅是附隨，雖係附隨，却也很有價值，甚至很重要，不過它們伴隨着使我們與歐洲間發生一種新精神的外交，和與國內擁擠的失業者有關的失業救濟和住宅建築時，則仍只為次要的問題。其中兩個問題我們曾說過了。關於外交方面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研究麥克唐納在外交部長任內的個人成績。

麥克唐納就任外交部長之後，第一件工作便是承認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他立刻提議召集英俄會議，研究賦職和戰後一切防礙英俄間友誼關係之建立的重要問題。這個會議四月間舉行，跟着便草擬了一個總約及商務與航運條約。

然而，較我們與俄國的關係還緊要的問題，乃是法德間因法國要求賠款而起的爭論。

麥克唐納於是立刻轉移他的注意，從事促進法德間更友誼的空氣。打算召集一個會議，使法德兩國的代表，在英國首相中立的與協助的主持之下能互相謀面，商談一切。

麥克唐納說：『我的第一件工作是要促成一個更健全的空气，我先做成一個局勢，看看有若何反應沒有。這些心理上的事情實較可厭而又巧妙的帖文來得更重要。因為這些帖文無論大使們如何有禮地送給外交部長，還是免不掉如在他的頭上擲磚石一樣。我們的外交必須全然正直與絕對坦白。它必須是願虛周全的，只求對方也作同樣的反應。我們無論採用何種政策，法國決沒有恐懼的必要。她所做的事情，我們不一定一一都同意。然而我們也不希望她隨着我們的想望去做。但我們間決不應發生什麼問題，我相信除了可用善意與誠懇獲得解決的問題而外，我們間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我們必須以法、英及歐洲的立場去考慮賠款及魯爾佔領等類問題，盡力尋覓一個滿意的解決。我們尤須記着時間正玩弄着一個悲慘的競賽以對抗我們。』

二月五日麥克唐納知會法國內閣總理勞卡累 (M. Poincaré) 說：『我現正應付着某幾個困難的問題。』他引論英國經濟生存受着『嚴重的危害』的事實之後，更指出那嚴重的危害底結果說：

『英國人民對於法國似乎不願英國的合法利益及歐洲問題的將來結果，決心破毀德國，進而謀支配歐洲大陸的行動異常焦慮；他們皆以法國東部西部均駐大量的陸軍與空軍為慮；對貴國政府對中歐新興國家軍事組織所表示的注意尤感不安；他們更懷疑為什麼法國政府應該以金錢接濟這些一切活動，而不願英國的納稅人每年要籌出三千萬磅以上，為對美借款的利息，同時也要籌出大量的金錢以支付對法債款的利息，而此借款（以他們所見者說

來)，法國迄今仍未爲任何代價的。」

麥克唐納繼言，法國「以安全僅對德國而言」英國却希望「安全對戰爭而言」。這直貫無隱的「公文」組織說，一個依於根本目的的合約，將會澄清疑慮的空氣，打開一條諒解的大道。

「我願在這個基礎上和你討論我們間未決的問題。假若我們能够對於主要的原則謀得同意，同時假若這個原則，可以對我們各國的國民及世界的輿論解釋，那末其他次要的問題——雖然它們已成爲糾纏煩雜的問題——我相信是容易解決的。假若，反過來我們被繁瑣的細目所混亂，例如魯爾問題，來因問題及巴拉丁（Palatine）問題等，那末，最高的目的反而陷於模糊，我們也復歸於只對重要而不根本的問題徒事繞圈子的爭論底煩惱了。」

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力事宣傳談判與同意的和平的人，如今要親自一顯身手了。許多人，甚至黨內的人也都有，都預言他將無所成。批評他的人說，「感情」與「兄弟的情誼」並不是實際的外交，其實那些人還沒有明白麥克唐納具有現代歐洲中最實際的頭腦，他的頭可以高入雲霄，可是他的腳卻是踏實地的。

不過，一般人總希望麥克唐納以前前威爾遜總統的宣言所鼓舞的精神給歐洲。這二者固具同一的道德力量。而終底卻不盡相似。威爾遜總統，給予當時被戰爭底痛苦所籠罩的千千萬萬底希望，結果許多不曾實現，其理由如今已盡爲人所知。麥克唐納卻貫徹其政策，在其操權期內，已是暗示其政策之效果。

一九二四年四月之末，他赴他的選區，到處都受熱烈的羣衆底歡迎。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說：「那

直不像是黨的遊行，持各種各樣政治意見的人，都舉起歡迎他。」

麥克唐納在不列顛渡船上（Filion Ferry）演說，開首便承認這種事實。

「如果我曾參與過或幫助過，使國人感覺得勞苦大眾所組成的政府，對於國家的外交，內政和國家的利益，處理得也如別政府一樣，那末我便很可以驕傲了。假若我能藉你們的贊助做到那個地步，那更是對民主政府的一大貢獻，不僅是對英國的貢獻，而是對世界一切自治的民主政府的貢獻。」

關於外交方面，他說：

「第一着，我要建立和平。有時，你們以為我不大注意安全的問題。那是何等的無意識呵！我是最注意安全的。我希望你們能覺得很安全，你們的兒孫們將永遠不會被徵募去戰爭，如我從你們的襟章上看見的你們所經過的一樣。自然我不能光是說和平，宣傳和平便可以達到我的希望。也不能夠光為和平辯護，向戰爭攻擊便可以達到目的。因此，拿着這種觀念在心裏，我惟有努力促使歐洲的事情進入一個好的局勢裏面，使將來沒有一國需要拿起號角放到唇上。和平？我不能得到和平，除非我先得到了友誼。我們可以簽合夥的文書，我和你也可以，可是假若簽字的墨水裏沒有友誼，那文書的效力是有限的。隨着歲月之過去，白紙上的黑字是會褪色的，直至一天字跡完全消滅了。契約破裂了。簽字的雙方反着臉怒目相視。你如何去防備它呢？」

「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反對感情及精神一類的東西。其實精神是與生命最有關係的。假若你的屋不建基在精神所製出來的基石之上，它未來的敗壞將會是很大的。我們至今還未發現的，還不曉得去應付的，就是這很簡明的

東西，一個能創造友誼的政策，較之一個聰明而嚴厲的，在紙上寫着：「第一，第二，第三等等」的政策更要安全些。別的東西是會滅亡的，而精神是決無止境的，工黨政府，尤其是英國的工黨政府，對於世界的安全，世界的和平底最大貢獻，不是以繁雜的綱領開始，而是以建立友誼的局勢開始。」

在法德的會議沒有正式開始之前法國傍卡累政府倒了，五月間總選舉的結果，「左派」的人在赫里歐（Berthot）領導之下，組織了新政府，宣稱為和平而努力。

這事之後，事情推展得很快。赫里歐往赤克斯（Craqueux）訪問麥克唐納，麥克唐納也往巴黎回訪赫里歐。這往來訪問的結果，決定八月間在倫敦召集一個會議，希望在這個會議中，法德間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是危機點賠款和魯爾問題能够坦誠地討論。麥克唐納并且取得法國政府的同意，容許德國的代表以解決案的商議者底資格出席。

倫敦會議的主要目的，在研究那所謂賠款的專家報告，一般稱為杜威斯計劃（Dawes Plan）的。七月十六日各協約國的代表羣集倫敦。八月五日德國代表也到了。數日之後，便簽定了倫敦解決案。

光禿日子自然比不上麥克唐納底靈敏的外交手腕。在商議的過程中，瀕於破裂者再。麥克唐納雖決心取消了字典中失敗一字。但，在八月的第一個星期，情勢之危急，似乎他也無能防止會議於衆議紛紜中被棄。

經過最後的努力，八月十六日解決案簽字了。解決案除包含杜威斯計劃底施行計劃外，尤其要緊的，是法軍退出魯爾的協定，魯爾佔據為數月來諍解的障礙。此外還獲得德國經濟統一的恢復，法比二國復同意，在德國通

過法律設立團體以實施專家計劃之後，即行廢去在德國境內所設的關稅障礙。

大會閉會的時候，德國馬克斯總長（Chancellor Marx）與法國內閣總理握手——這是和議後兩國正式代表第一次的握手。

那一剎那間的驕傲和着在大戰中受盡困逐的政策底證明，顯露着麥克唐納在大會閉會演說中的每字每句：

「我相信我們所給予歐洲的較一個由法律家草擬印在紙上的協定還要好多，因為我們大家都從事商議討論，彼此互為換位設想。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貢獻戰後第一個真正由商議得來的協定；出席的各方，在道德上都必須盡力去實現它，因為它不是哀的美敦的結果，我們會盡量在各國輿論容許我們的範圍內，互謀遷就。這個協定可以視為第一個和平條約，因為我們是以不顧戰時的恐怖和戰爭的心理底情緒來簽字的。」

那天跟着他起來演說的人，都承認這回成功很得力於他。他們都說：「成功的結果大部份都藉他的力量。」每日新聞（Daily News）說：「與法國成立解決，是他的燦爛的榮譽。成功了逢涅羅，鮑爾溫 and 喬治魯意所失敗的，是一個極大的偉業。」

然而，這只是巔端而已。麥克唐納在那天說：「我們必須繼續向前，一步一步的進行建設和平與恢復的工作。」他真的已在「繼續向前」了。當他主持倫敦會議的時候，他的次長亞塔爾遜遜拜（Arthur Ponsonby）已和俄國在倫敦從事談判。

英俄談判，自較法德協定為困難。英國的輿論，雖已反過來主張對俄貿易應予鼓勵，可是仍不免受着布爾塞

維克恐懼心理底影響的支配。另一方面，俄國的統治者却不斷地向「布爾喬亞」的英國工黨和它的領袖瀉散他們的毒液。

隨着麥克唐納之執政，莫斯科底惡棍唱歌隊加增了力量。年來俄國政府肆意輕蔑英國工黨的風氣，已是盡人皆知的，在此也無需舉例以說服有常理的人，說什麼麥克唐納決心從事把這衆多的歐洲人帶回國際交誼中的時候，他心目中對於俄國目前的統治者是沒有愛惜的那一類的話。不過爲後來的事情做註腳計，我們把俄國真理報（Pravda）的話轉述出來，也是很有趣的。這是國際共產黨第五次世界大會開會中，訊那維夫（Zinovieff）底演詞的概要。他說：「在英國的共產黨，目前甚至要反對麥克唐納，因爲，將來羣衆覺醒他之卑鄙的時候，他們便會記着我們共產主義者早已這樣說過了。」訊那維夫還說，他認爲麥克唐納是英國的克倫斯基（Kerensky）是勞動階級的出賣者，是布爾喬亞手下的傀儡。

這樣的前途不能說是有希望的了，可是麥克唐納和逢遜拜還是忍耐着，而駐倫敦的俄國大使拉科夫斯基（Rakovsky），較他在莫斯科的政府表示得更伶俐更有禮貌。

八月四日，雙方不同的意見，已獲得部份的解決。拉科夫斯基與持有俄國公債的英國人已成立了局部的協定，這個協定使他們許有收回昔日投下帝俄公債的資本之一部份的希望，還在布爾塞維克政府本已宣佈取消的。這樣似乎麥克唐納又可以獲得另一個榮譽了。不料顯然的失敗却來了。談判無結果而破裂，談判破裂的公告也發表了。



看來似乎是完了，不過當時爭持的意見多半是外表的不是實質的，因此第二天談判復得繼續，用一個新的方式，把許多困難的地方解除，協定終於成功。可是因為談判形勢的隨着忽然的改變，乃是某幾個與黨中較極端派同一利害的工黨國會議員底干涉而來，所以引起許多人責罵麥克唐納，說他是被迫着才違反自己的判斷去成立協定。其實以為黨中那些對共產主義與他持不同意見的人們『彈起調子來』，他便不能不和着跳舞，那真是粗鄙。因為在下次總選中，許多人都提出這類的話來反對他（總選之所以舉行，因為下院諸人有反對英俄條約的空氣，同時因為他們反對坎卑爾（Campbell）案），我們不妨把當時實際的情形說說，這些情形是一位與勞工運動很接近的作家的記載：

『大事宣傳的「一般議員」的干涉，其實祇等於重新談判底一個應時的幫助而已，重新談判不論如何，原是會成功的。他們確然不曾施用壓力。在英國的目的上說來，絕無壓力之需要。自始至終達遜拜先生較拉科夫斯基先生總佔着一個優越的地位，因為他知道英國內閣是全誠地希望和平的，而拉科夫斯基的代表團中却代表些在俄國的不大願意和別的國家合作的份子。所以達遜拜先生於八月六日正午，便可向麥克唐納報告：謂協定已依照財政部長當時認可的方式告成功。當夜他在下院報告時的困難，只是包含協定的條約，尚未從草擬人手中印刷起來而已。不過，他還可向院報告協定已告成功，兩項條約亦已準備簽字了。』（註）

註：“Iconoclast” in James Ramsay MacDonald (1923—25)

達遜拜先生一再的論及這件事情，以下是他最近致函某報館中的一段。

「我會盡力驅散翱翔於英俄談判上底蹊蹙的雲霧，可是結果失敗了。我曾爲皇家國際事情學社寫了一篇文章，詳述協定簽字以前最後幾天中，每小時實在經過的情形，我投文各報并寫信給泰晤士報，糾正兩個錯誤的通訊。……最後時期中，議員們的干涉實與條約中各項全然沒有關係，我只利用那個機會請拉科夫斯基恢復因小故而中止的談判而已。」（註）

註：The Nation, May 4th, 1929.

那兩個條約，一個是關於商務的，在這個商務條約之下，美國得受最惠國的待遇，而以延長一九二〇年對俄貿易底出口信用計劃爲交換，還有一個是一般條約，在這個條約之下，蘇俄首次承認在某種情況下，滿足英國持債券入底要求（註），待此二約依照規定解決之後，再草擬第三個條約，假若此二約沒有解決，則不再草擬第三個條約，也不擴展以鼓勵英國商人和俄國通商爲目的的政府信用。不過在第三個條約簽訂的時候，政府負責勸告國會，如貸款給俄國，他們應該保證貸款底利息和償還準備金。

註：根據麥克唐納在下院的報告，那些要求是：

- 爲財產的……………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 爲公債票的（美金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 爲公債票的（盧布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 爲各種索取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 (Hansard, July 7th, 1924)

於此有該注意者，莫政府在道三個條約中，均沒有提議貸款給俄國，雖然工黨後來說，他們確使籌集貸款較爲容易。

在隨着麥克唐納政府辭職後舉行的總選中，許多人說，麥克唐納『決不貸款』，八月間却被迫贊成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那幾個嚴重星期的情形，在該事發生四年半之後，麥克唐納寫給我的括要，仍與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他在曼徹斯特的報告絲毫無異。

『六月間在我手上的一切建議，只建議給俄國政府一個貸款保證。當時俄國急需向人借錢，同時他們希望我們作保證。我說，「決不能！」以後怎樣呢？建議的性質不絕地演進，愈來愈轉得厲害。八月間的情形，我想是這樣：如俄國能在市面借到錢，那末，我們就保證她能借得到的貸款——並不是我們拿出貸款，而是如俄國政府能找得貸款，比方說，能在倫敦市面找得到一百萬鎊，在俄國自由投資，那末我們就作那筆款的保證。我們不保證二百萬，也不保證一千萬，我們只保證俄國能在市面自由找得到的準備投資人那貸款的數目。那是第一個時期的情形。

第二個時期是這樣。除非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不願作保證。條件中之一，就是不許軍事的消費包括在貸款之內。還有一點就是：在英國下院本身未認可那個數額之前，未認可那些條件之前，未認可俄國政府提出的保證。

之前，什麼都不得發生，什麼都不得作肯定的規定，只在英國下院認可上述一切之後，我們的保證才發生效力。」

麥克唐納對我說：『我提議，爲我們商人的利益計，把一九二〇年特別通過的幫助英國貿易的那個出口信用計劃，展用於俄國。自始至終，政府貸款的問題，連考慮都沒有過。反之，甚至在擬議的貿易保證尚未有效之前，它還得要先由下院批准，總之，一切事實都曾經提出下院討論過的。』

讀了麥克唐納這個周密的說明之後，我只要補說一句，那就是保守自由兩黨反對這些條約的意見并不是全體一致的。

『時觀報』(The Spectator)說『以我們觀察所及而言，英俄間擬議的條約，對於英國任何利益均無損害，反而裨益了英國幾項利益，(例如，持公債票的人，原已一無可得，如今却還可以收回一些權利，從事英俄貿易的商家，藉英俄商務條約，得到確定的地位等)，同時俄國從此回復國際間的友誼，間接上也有很大的利益。反之，對案并不是一個更好的協定，竟直無協定而已。』

因公議會暑期休會，反對這些擬議的條約底運動也就暫時擱起來。可是在秋天臨近批准時，其重新爆發也愈烈。

在未臨下院嚴重會期前，麥克唐納中止了很必需休養的的假期，出席九月四日在日內瓦舉行的國聯大會，這表示出他對『和平的意志』底堅決，對國際友誼的理想底熱誠。

他以英國代表團團員的資格出席，也就是大會上英國首相親臨作演說的第一次。他向着五十四國的代表，以英國首相和外交部長的地位，概述達到世界未來的和平的政策。

曼徹斯特導報說：「他底演說，正是全世界久望英國首相起來說的。」歷史將來或者會視這個演說爲麥克唐納對世界和平最大的貢獻。它必然是他生涯中最重要、最珍貴的宣言，節錄決不足以示其意義，下面我們只錄出它結束的語句。

「我們對和平底注意較大於我們對製造防衛的工具底注意。製造防衛的工具是容易的，但須小心，恐怕製造它你反而破壞了和平的機會。國聯必需做的工作是促起各國對和平的注意，必須使世界深知國聯之存在，必須使世界深受國聯的影響。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具體表現信賴法律底秩序與公正，然後，各國因感戴國聯的權威，視國聯爲可靠，不是爲的它的武備偉大，而是因爲它的頭腦冷靜，性質公正，才可以在一個絕對安全的感情之下，沒有人敢危害他們之下，追尋他們各自的前途。」

許多親聆這些舉世盼望的說話的人，覺得在那一刹那間，麥克唐納真的達到了偉大的極頂。可是他早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嘗他夢着同一的夢，只得幾個人聽他的時候，便已期待着發表這篇演說，向文明世界裏的良知呼籲。他之所以拋棄了一個假期的日子，不辭勞瘁，奔馳了半個歐洲，在國聯初期嚴重危急的時候，親自出席以增重國聯的威信，乃是因爲他是近代英國政治家中最助國聯理想底頭一個先驅的人，並且因爲他不肯卸却因此落在他肩上的責任。

倫敦會議，英俄條約，和在日內瓦國聯中的演說，這些都是在他第一次短期執政中，對歐洲和平努力之表記。歷史將來如何估計他的成就呢？每日新聞在批評他的外交工作中說：「麥克唐納先生完全勝任首相的重任。在特別困難的時候，他也毫不阻越。」

另外的一個作家又說：「光耀從各方面趨集於他身上，在閃耀之下，他的容貌不僅沒有萎縮，反而日益煥發。歐洲與美洲採用各種各種的語調，祝賀英國有這樣一個與英國無上的風習相稱的首相，并且仰望着這個在大陸底乾竭的葉脈中湧放着新生命的人底言行。」（註）

註……“Iconoclast,” in J. Ramsay Mac Donald. (1923—25)

上述的兩個意見，乃是一九二四年秋間一般輿論底公正的榜樣。說到這裏，我可以附帶說說，大概在一個月之前，一個著名的在大陸方面代表英國保守黨報紙的英國新聞記者和我討論麥克唐納的外交政策，他表示麥克唐納乃是英國最近五十年間最好的外交部長，而英國在大陸方面隣邦中的威信也從未增高過如一九二四年時的一樣。隨着議會秋季開會之始，這年內即謀推倒工黨政府的狂風暴雨底雲朵也開始積聚在人們的頭上了。

英俄條約只是許多黨內黨外批評的開端，其中有些是滑稽到極點的，這些批評在未來的幾個星期中，暗傷政府底地位與威信。

擁護麥克唐納的羣衆，對於工黨開員當政時穿起朝服，竟也抱怨起來。可是朝廷乃是憲法的一部份，在議會裏沒有佔得多數的工黨政府自也無能去修改它，這是明白的答案。況且，由巴京汗宮令行政府人員會集時的薩殿

的禮儀上看來，適當的儀注與對宮庭優禮待遇底尊重，也是無可避免的。關於這個問題，工黨中的某派所持有的意見，實有失為一大政黨的風度。

還有第二個惹起各方討論的問題，可以稱之為『汽車事件』。

亞力山大加蘭爵士（當時只稱為亞力山大加蘭先生 Mr. Alexander Grant）是一個富有的蘇格蘭餅乾製造家，他和麥克唐納一樣，是馬累州人，在貧苦的環境中，出生在一個近錄錫矛斯的村落裏，他送一輛汽車給麥克唐納，並且附送馬維布來司（Morris & Price）公司底三萬股份，以其利息為養車的準備。這事不久，亞力山大加蘭先生的名字，在榮譽表中男爵品位列內出現，謂工黨『出賣榮譽』的論調隨着便『甚囂塵上』。

這風波底實際情形原是这样的：亞力山大加蘭爵士的父親與麥克唐納的叔父原是在高地火車路做車掌的，兩人做了一生好友。亞力山大男爵年來常到祿錫矛斯探問，他與麥克唐納政見雖不同，可是友誼却成熟了。麥克唐納執政之後，亞力山大男爵知道麥克唐納每日在外交部和在唐寧街工作疲勞之後，還是從地底鐵路跑回罕普斯忒家裏。而且往往為人所不察，在擠擁的時候，他也被逼着『握吊而立』一路回去北郊。

亞力山大爵士認為一個負如此重任的人，來往却那樣地不方便，是件不合理的事情，他於是送一輛 Daimler 汽車給麥克唐納，作為他對首相底舒適的貢獻。那是一個純潔慷慨的人給予麥克唐納個人的禮物，但，同時也是給予負重任而沒有適度的健康上必需的舒適底英國首相的禮物。

麥克唐納關於這事件曾說：『我解釋說，我租一輛便足夠了，因為他日我離職的時候，我較前總還要窮困』

的。」亞力山大答說：「我決送給你一輛。」麥克唐納說：「我仍不願意，我不妄想自己做一個汽車所有者。那和我簡樸的習慣相衝突。經過很長的時間，我才被他勸服，現在還存有許多信件，顯示出我們兩人間的思想的。最後，我同意這樣的辦法——以我的名義存放一筆錢，在我有生之日保有一輛汽車一天，我將享用它的利息，但到我死的時候，那筆錢當歸還亞力山大加爾爵士或他的後人。這就是那風波的整個經過。」

在這事之前，亞力山大加爾爵士曾為建立蘇格蘭國立圖書館捐了一萬鎊，因為這對桑梓教育的大捐助與別的捐助，所以發表中也有他的名字。在官方大家都知道，無論那一個政府，爵士的品位總是會給他的。

工黨政府之倒根本的原因還是在英俄條約，雖然下院關於另外一個問題同時也為不信任投票——那問題就是關於政府對工人週報編輯共產黨員坎卑爾底刑事訴訟手續之提出與後來撤回的舉動。

麥克唐納說，工黨政府如果不因為這些問題而下台，也必會因為其他的問題而於年底以前下台的。他肯定地責難喬治魯意與張伯倫爵士（Sir Austen Chamberlain）及別的保守黨人同謀「佈置」，以完結使工黨大獲名望的試驗。

他說：「從那天起（當自由黨把工黨擁上了台之日），自由黨對我們已是敵對的，甚至取攻擊的態度，後來覺得我們做得很好，與他們的期望相反，他們便與保守黨合謀推倒我們。這種事實，凡熟識政治內情的人都很知道。那是很重要的一點。」（註）

註：一九二九年五月總選競爭的時候，在曼徹斯特的亞羅克草場（Ardwick Green）多瑪氏演說，證實麥克



唐納此說。他提及在失敗之前，他曾爲工黨作最後的演說之後，他繼續說：『在我沒有起來之前，我已知道他們有一個秘密會議。我知道喬治魯意先去看張伯倫爵士。并且知道他們已着手一個推倒我們的運動，在我還沒有把工黨的話說完之前，他們已不顧我所說的是什麼，一溜烟的攜手跑去密室謀倒工黨去了。』

我把工黨第一次政府的失敗的這個解釋拿出來，不管它的正確性如何，我只要提一提，一九二四年自由黨的領袖是愛斯葵士而不是喬治魯意。

關於坎卑爾案之撤回，是否受了政治的影響，這冗長的爭辯，讀者可以找一九二四年九十兩月間的罕薩報，在此不贅了。

十月八日不信任投票，經過一場大爭辯，結果政府失敗了。

在爭辯中，麥克唐納說：

『政府已決定，在他們能做得到的範圍內，決不讓共產主義有在英國宣傳的機會。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更且反對共產主義。我深信如果昨天在工黨大會裏，以壓倒的多數通過反對共產主義者加入的決議案，拿到保守黨的團體去表決，投反對票的人也不見得會多過工黨的數目。』（註）

註：參看本章中之數字。

麥克唐納極着重地說，工黨只拼慮這種困匱究竟於國家的利益有增進沒有而已。他說：『但是甚至到那個時

候，我們也還沒有發出訓令。許多供給有專門智識及負責官員去考查的意見，都將最後決定的責任放在他們身上。本院如因此不信任我們，自然它是有權的。一加二常多於一加一，假如諸位在客室中點數，那末今晚諸位自然都是反對我們的，那是完了。我在前次會議中曾說過，我們應該從下院拒絕我們的建議中採取善言。假如下院以為我們的建議不是至要的，假如對我們建議底拒絕與我們的失敗，不會縮減任何政府所必需的自尊。我如今重複的再說一次。假如下院現在不通過決議案也不通過修正案，那末，我們只好出之辭職。這便完了；這是各位公認的大冒險的完結——是一個對國家光榮對社會的安定貢獻最多的政府底完結，可是這個政府假如全國人再有機會裁判它的時候，是會再來的。」

翌日，十月九日，麥克唐納在下院宣佈，謂由於保守黨和自由黨底行動，總選之舉行將不可免；因此，那天早晨他向英皇報告，要求解散議會。

同日，在那嚴重的表決沒有舉行之前，麥克唐納在工黨年會中，發表他那篇主席詞，這在下院他的演說中也述及的。

他說：「我們相信，我們之存在，對於全世界與我們同樣的運動及政治理想加增了不少鼓舞。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如像春天底溫暖的空氣一樣，掃蕩一切在人類心中和行動中索制新發展的冰霜，憎恨和殘酷。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使我們的國家為鼓舞和誘導別的國家的代表。我們不能夠希望由幻術中產生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只希望舊的世界能夠對新的創造的精神開始表示反應。我想關於這點我們已經成功了。」

論及奧爾索底論辯，這論辯昨天便舉行，明天大概是政府失敗的時候了，麥克唐納說：「明天晚上大概十人中總有七人要到客室中非難我們，可是後天他卻將會被派為法官，公平地考慮我們的主張。我們的反對者一方面佯為沒有舉行總選的必要，我們應該繼續工作，同時他們剝了我們的尊嚴，公開攻擊我們（這是他們在本星期末要做的詭計），等到我們政府的用處被破壞之後，受了致命傷之後，我們也就無顏懸棧了。假如我們辭職，他們便佯為是我們引起總選的；假如我們繼續下去，他們又非難我們，說我們是五千鎊一年的蠅了。他們打算推我們到他們詢問的焦點，而特別的辯士和劊子手在他們閒暇的時候，便準備偏見的起訴狀拷問台與斷頭台。是何等一個炫耀的詭計呵！」

麥克唐納繼續說：「如果票舉行總選，責任不是我們負的。乃是因為黨棍們濫用議會的投票權的緣故，而擁護工黨的人心對這種詭計的反感，將會使我們的勝利更大，當國人有批評我們工作的機會時。在各選區中，來些新鮮純潔的鬥爭，反而會澄清污濁的空氣，使我們在下院脫離各黨私利的牽制獲得完全的獨立。」

然而，那快來的總選並沒有澄清了污濁的空氣，如麥克唐納的期望一樣，因為有一個新的要素對於總選結果之決定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這就是在總選前不久所發表的凱羅維夫的信。

在我們沒有說到麥克唐納稱為「新火藥陰謀」之前，我們必須說說麥克唐納向全國宣傳的問題。他要求國人對坎卑爾和擬議中的英俄條約之締結，予政府以信任的表決。十月十三日他開始在加拉斯哥演講，麥克唐納說過他們的政教都帶怕他們之後，繼以下述的語句說明關於英俄條約的實情：「你們俄國政府的代表與我們英國政府

的代表，第一必須同意究竟需要多少錢，怎樣去籌錢，錢的用途怎樣，我們有什麼保證，什麼時候支付等等。當各代表都同意條約所包括的一切之後——代表之構成，一是商務局，一是財政部，一是外交部，或者甚至首相也親自出馬——還須待下院詳細考慮，俟他們認為它的條款是健全的與聰明的之後，代表們所已同意的條約方才生效力，如果保守黨和自由黨的不把這些事實明白地對你們說，總選的結果他們必會失敗的。』

麥克唐納更進而述及工黨政府的工作：

「拿歐洲來說罷。他們反對什麼呢？原先大不列顛之名已降至不可再降的地位。我們把它提起來。我們找不與法國間或國際交誼間任何協定。我們却把它創立起來。難道他們連這個都反對？我們覺着國聯因為沒有人去主持領瀕於滅亡。我們即親自去日內瓦領導它起來，今日的國聯較從前強健得多了。難道他們也反對？我們平衡了三千萬的預算。我們用的錢都消滅歸公。難道他們也反對？我們把你，特別是勞動階級，從茶與糖底重價的負擔中解救出來。難道他們也反對？你們也反對？我們正從事寡婦津貼的新計劃和諸如此類的救濟。難道他們也反對？我們正草擬按級抽地稅的計劃。難道他們也反對？

「我的朋友惠特力破天荒地解決了一個問題，不是上至建築宮殿下至建築茅屋，無所不包的住宅問題，而是如何地去建築房屋租賃給工資時有時絕的工人階級，使必要時租出去不必賣出去。那是破天荒之舉，難道他們也反對？我們正從事發達電力的計劃。我們上台的時候，差不多是一無所有的。他們也反對嗎？在聖奇報告 (Carter Report) 上我們正從事的職務。他們可以反對的。我希望他們反對。和平與軍縮——我們只開始了工作。他們要

反對我們繼續嗎？他們可以的。朋友，就是這個政府，就是這個綱領，就是這個理想，前星期被中斷了，我請你們讓我們回去繼續我們的工作，以大多數做我們的後盾，不以大多數反對我們。」

這個演說用無線電向不列顛各地廣播，千千萬萬的聽眾都可以回憶，詞句間之急跳，聲調之勉強，演講者焦燥地在講台上移動起伏不定的情狀。須知在競選開始的時候，麥克唐納已經是疲乏的人了，但聽眾是不知道的，聽眾們看他，只作他有些『神經』，武斷，與狂熱——深賦政治家風度的演說家有此印像實是不幸。

加拉斯哥是這回麥克唐納競選旅行的開始點。由加拉斯哥起，他復至愛丁堡，紐喀斯，再穿過約克州（Yorkshire）而至曼徹斯特，經過黑邦（Black Country）到亞布拉文，每天發表四五個長的演說者一星期，此外，沿途每鄉每村因為洶湧的羣衆的包圍，也得作簡短的演說，一天八九次。

凡沿途聽過他任何演講的人，都可以證明羣衆對他的歡迎是如何地熱烈。在曼徹斯特一個偉大的集會中，他說了一個半鐘頭，受羣衆熱烈歡迎之後，他再說：

「這回總選的問題我認爲是這樣：它是非常簡單的，也是非常率直的。問題不在究竟工黨政府做錯了沒有。它是有錯的，我送這個禮物給我們的政敵。我怕什麼呢？他們要怎樣做便怎樣做。我們曾做錯過的。那不是問題之所在。問題是：工黨政府有機會繼續它已開始的工作沒有？」

十月十七日著名的帶未勒汽車把麥克唐納載到了威爾斯，他在那裏正如一個凱旋的英雄受人接待一樣。不幸他已是一個疲乏的人。他疲乏得不足以爲劇烈的競選中的政黨領袖。就數月來他歷盡的辛勞而言，他的演說還算

很有政治家的風度。不過在去亞布拉文的翌日的某篇演說中有一節，在競選結束的時候被反對派報紙一致地攻擊。

他那篇演說論及工黨政府受誣譏的痛苦，他說：

「政黨在瀕於失敗和不名譽的時候，常常都說謊的，如他們現在所做的一樣。他們說我們從英國運了數百萬給俄國等類的謊語。爲什麼他們不能夠來個合理的智慧的鬥爭，拿出他們的主義對抗我們的，來個光榮的開始呢？爲什麼他們誹謗我們呢？爲什麼不來一個政治主張的大鬥爭，而只效忠狡辯的狗兒在廢堆上東嗅西嗅呢？」

這一節原是從精密的政治的辯論中推出來的，全篇演詞也繼續這種辯論。說者是英國的首相，人們總以爲報章上關於他說的話必很公正。可是報章怎樣利用它呢？他們只從原文中扯出這一節——麥克唐納說，這一節從演說時的情境說來，還是很公正的註腳，較之反對黨領袖們底無數的話決不會更不可想——來毀壞麥克唐納首相的威信。倫敦的某一報紙在某標題上寫着這些字：「首相兼外交部長，麥克唐納先生說：「爲什麼，不來一個政治主張的大鬥爭，而只效忠狡辯的狗兒在廢堆上東嗅西嗅呢？」」

還要補說一句，麥克唐納雖做首相及反對黨領袖，還是很難獲得報紙底公正的揭載，甚至關於國家重要事情的談話，也是一樣。人們或會以爲，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連任下院第二天黨領袖的人，事實上其言論該有完全詳細公表的權利。其實並不這樣，一九二九年南巴特西(South Batsford)補選之後，隨着非難工黨與著作家聯盟，並諷刺說，工黨緩和了賄賂問題的疑慮，麥克唐納關於這些誹謗會一再的辯及，但是報紙全不予以記載，

直至他爲這事在波頓(Bolton)演說，攻擊檢察長之後，他否認對著書營利有任何容忍的話，才被報章一般地揭載出來。

最近麥克唐納關於這類對工黨的誤述發表了一篇抗辯書：

『我要無條件地警告讀者們，不要信那些所謂演說及批評的記述。我對於那些真正的誤述，倒沒有什麼怨言，可是那些「斷章取義」的記述，完全把演說的目的和要領誤述的，却不能無怨。最近有一位曾聽我演講的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打算把我的演說底紀述，寄給一些保守黨的朋友，但當他找報紙一看的時候，所有他親自聽過的演說底紀述，既不表示原詞中所包括的根據，也不表示演詞的次序。加爾文先生(Mr. Carvin)辦的報，本週根據我在北明翰說的關於保護關稅的意見底記述大爲申論，其實那個記述是失落了我的整個解釋的。這不是偶然的事；只是故意而已。我們逼近總選哩。大戰的時候我問及一個常常出席我的集會的記者，爲什麼他不嫌麻煩常常來出席，而甚少發表我的演詞。他答說他不是要記載我的演詞，他要記載的只是我的失言足以爲反對我的話。』(註)

註：Forward December 1st, 1928.

且回頭看看他在亞布拉文遜區演說時的情形罷。這回不僅反對派只拿到一句話的藉口，還有更糟的事。十月二十五日，投票前的一個星期六日，所有的報紙都『飛濺』出一個『駭人聽聞』的事，那就是『紅信』的事，說是第三國際主席凱羅維夫簽字的。

這「紅信」(當時立刻成爲一個通行的名詞)，說英俄條約的命運將視英國各方對麥克唐納政府所施用的壓力爲轉移，並且主張，如果「和平毀滅資本主義」不可能，應即加重在英國陸軍與海軍中的宣傳運動，藉爲叛亂成功及以暴力推倒資本主義制度開道。

這些話俄國的統治者是常說的，無怪乎一般人毫不懷疑這個文書的確實性。

信本身原與總選無關，可是選民們都以爲這證明了俄國對工黨計劃的影響，所以也就成了麥克唐納第一次任期完結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封信的原文或抄本，在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知道有這樣的一封信之存在前，如何會落在報紙之手底整個經過情形，至今還未大白。同時在麥克唐納因爲競選的事情去了亞布拉文，還未得到該信底確實性的任何證據之前，外交部如何即公開地印刷那封信並且送出正式的譯文向拉科夫斯基提出抗議底複雜情形，也沒有人明白。

關於這件事，工黨的意見是這樣的：那文書在所有黨員都離開了倫敦參加競選之後才到達外交部。後來通知麥克唐納，麥克唐納寫了一個條子同原件給問負責的官員說：「這信確實與否須慎爲研究」。在研究中，同時準備一封給拉科夫斯基抗議的信稿。

抗議信稿，數日後便寄給麥克唐納。因爲這些事情使工黨在總選中大受影響，所以關於這第二步的情形，我選錄出麥克唐納自己的話：

「我批閱那信稿予以修改，就以修改後的原稿寄回去，盼望他們把它及證明『紅信』確實的證據一併再寄給



我。」

可是那個修改後的抗議信稿沒有再寄回給他，而外交部在他仍在假的時候，便把它公佈於世，其中的理由據工黨說還未完全明白。這無異說工黨政府已承認那封信是確實的。假如沒有錯，那末該項文書無疑地違反了英俄熱條約中不許布爾塞維克在英國宣傳的規定。

由於發露了布爾塞維克的人們企圖托庇在工黨之下干涉英國的內政（工黨當時正因為提議在某種條件下，保證對俄貸款的利息，大受各方攻擊），所發生的影響是可想像得到的。

事常還不止如此。除了非難工黨謂它受俄國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個伴隨而來的非難，說那封信放在外交部已有一個月之久，而工黨不願把它在總選之前發表。這後一非難的根據是因為某倫敦報紙得到了『紅信』的原本或抄本之後，才使外交部不得不改變它的意見，把那文書發送給報界。這兩個事實合起來，假如是真的話，實在是對麥克唐納最不利的控訴。

可是第二個非難是真的嗎？

總選之前夜，麥克唐納在加的福說：『我請他們拿出證據來，當他們在烹調造作的時候，我先給你們幾個時日。關於坎卑爾案，政府是十月八日失敗的。這封信，這封紅信，十日才送到外交部，即是在坎卑爾案政府失敗之後二日，十四日才發到科去。十五日寄去曼徹斯特給我。十六日我始收到。十六晨我草了一個筆錄，請他們對於這封信的確實性慎為研究。假如它是確實的，須馬上發表，而在這個調查時期中，應預先草擬給拉科夫斯基的

備，這樣待調查結果，證明那信是確實時，我們便可立刻向蘇維埃政府提出抗議，不致遷延時日。

「我的那個筆錄，十七日他們收到了。二十一日那個草擬的信稿，寄去亞布拉文給我批閱。當時我去了巴遜特羅 (Bassett) 我的兒子的選區。到二十三日我才收到。二十四日早晨我便立刻批閱那個草稿。我修改了一些，即以修改後的原稿寄回去，盼望他們把它及證明『紅信』確實的證據一併再寄給我，但當夜那抗議的信發表了。」(註)

註：詳細的概要參看 "Iconoclast" J. Ramsay Mac Donald (1423—25) Leonard Parsons 書中『紅信』一章。

麥克唐納說『紅信』發表並沒有延遲是對的，總選後在張伯崙在下院以外交部長的資格的演說中可以看出得出來：

「如果我們已抱怨的話，遲延之責當不在外交部長身上。以當時係在總選的時候說來，我想麥克唐納先生對於那文書之發表並沒有延遲，這是無人可置疑的。」

張伯崙的這話到十二月十五日才說的，那時說工黨政府的人物圖謀在英帝國內鼓勵革命之傳說，甚露塵上，大大地助長了保守黨在總選中之勝利，及使鮑爾溫以我們政治史中一最大多數就任。麥克唐納相信『紅信』對於保守黨之勝利並沒有很大的關係，而反對黨間之『契合』才是工黨崩潰的原因，但，一般與當時的政治情勢很接近的人，却與他持相反意見，即工黨中許多資望甚高的人，都認為工黨大受『紅信恐怖』的損失。

關於這個影響麥克唐納生命的插話，只需要兩個註解。第一，許多無偏見的觀察者的意見，以為在凱撒維夫轉信這事件初起的時候，麥克唐納的態度稍有點含糊。這大概一方因為他兼任首相和外交部長，責任甚重，一方因為政務紛繁與競選旅行的勞頓苦於疲乏的原故。

第二個註解是：曾懷疑麥克唐納對於這個事件不願拿出對俄強硬的態度，已為業已證明的人，實在並沒有明解麥克唐納反對共產主義的堅決態度。

假如麥克唐納是近這五年才反對共產主義的，那末還可以說是受了一九二四年的教訓，可是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甚且更早些，他已明白地斥責俄國暴力統治的理論。

前數章中轉錄的他的演詞與著述，對於這種非難已經給了一個完滿的答覆。在他執政時期，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並沒有軟弱，這可以從他在工黨大會的主席致辭中看得出來，這個演說是在總選競爭未開始前發表的。

他說：「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謠言的陰謀，祕密的結合，暗地操縱，惡意鼓動鬥爭等等，不是造成我們工黨的社會主義的方法，也不是它的理想。我們的創始者如哈定和摩里斯都認為它們是可恨的。他們尊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但不與之接近。當他們有仇敵的時候，他們寧願讓他們在外邊，不願開門讓他們混進來。我們勞工運動最要緊的，是舉起我們依于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進步的旗幟，反對依權力以行專制。大戰會聲言把世界脫離獨裁，謀叛，惡行與強壓於人類的身體與思想的權力。除非我們預備好參加反對它，不然，我們無寧閉上窗子說我們怕行善之為愈。共產主義，自我們看來，與我們直無共通之處。它乃是沙皇主義與戰爭心理底產物，因此與我

們無涉。」

工黨對於麥克唐納這種「與莫斯科觀念無往來」的意見底擁護，可以在同一大會提出並通過的三個決議案中充份地看出來。第一，大會以三，一八五，〇〇〇票對一九三，〇〇〇票否決共產黨與工黨合併；第二，以二，四五六，〇〇〇票對六五四，〇〇〇票決議共產黨黨員不能正式地被擁為工黨的候選人；第三，共產黨黨員不能為工黨黨員。這最後的決議案以僅僅的多數通過。翌年，一九二五年，工黨的門更「水洩不通」，他們以二，九六二，〇〇〇對四八，〇〇〇接受執委會正式認可的反對共產主義者滲入的決議案，該案原文如下：

「全國執行委員會，尤願以此通告大會；執行委員的意見認為一切屬於黨的工會，必須遵行年會對於共產主義者的決議，通請他們的會員，凡選代表出席全國的或地方的工黨大會或會議的時候，不可提出或選舉非與黨聯屬的政黨底會員，及共產主義者。」（註）

註：一九二八年，工黨在北明翰舉行的年會，前項決議案中易滋誤會的地方也加以改正了，大會在共全體的宣言中，決議只許那些接受黨章的人，在工黨會集中演說。自那時起，共產主義者才最後拋棄了「赤化」工黨的希望，才在總選舉中公開地和工黨作對，其結果在一九一九年的總選，與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南東黎(South-East Leeds)的補選中都可看得出來，在第一次共產黨與工黨直接相鬥的時候，共產黨得五一二票，而工黨的候選人却以一一，二九二的多數票得選。

自一九二四以後，麥克唐納的意見從沒有改變過，這從他的演詞中，尤其在他第二次組閣後在下院的演說的

這一段中，愈可以看得出來。他說：「英國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希望各黨都注意。往日革命爆發，顛覆的是皇室，近年新起的革命却把民主主義也推倒了。」

Hansard, July 2nd, 1929.

在我們沒有放下第一次工黨政府的故事之前，我們還得說及麥克唐納的長女依實卑爾麥克唐納(Esobel MacDonald)，做唐雷街十號正式的「女主人」時，所獲得的敬仰，繼承鮑爾溫夫人，愛斯英士夫人所主持的社交責任，即在馬格列蒂麥克唐納的女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麥克唐納的小姐却都做得整整有條，在那幾個月中，凡與麥克唐納的家庭接觸過的人，都交口稱譽。尤其特色者，她沒有因此拋棄了簡樸生活的標準——差不多如斯巴達人的生活一樣——這種簡樸的生活是麥克唐納家中向來的特色。

總選的結果，可以說是工黨政府的失敗，但，不能說是工黨的失敗。工黨提出五一四位正式推出的候選人，得票總額達五，二二六，七三三票，而一九二三年只得四，三四八，三七九票。然而工黨雖增加了一百萬張選票，却還失落了四十二席；一九二四年國會中，工黨佔一九一席，如今只得一五一席。這種矛盾的原因，第一是因為自一九一八年三黨同時參加競選，第二是因為一九二四年總選中，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勢力直接的競爭較從前任何一次總選為多。這因素在新的下院中，發生同樣的影響，保守黨以更多的選票換取工黨縮減的議席，這可以從工黨失敗的分析中表示出來。它在與保守黨直接鬥爭中失掉了四十席，與自由黨直接鬥爭中失掉了六席，三角職的只失掉了十六席。

麥克唐納在直接鬥爭中，仍保持着亞布拉文的議席，但只得二千票的多數，這多數較前是縮減的。

總選結束之翌日——實在在他常夜聽到結果的消息的時候——麥克唐納便知道在勢力上同時在地位上也失敗了。悲痛的鬥爭完了。謠言與羣衆的恐怖心理已大功告成，工黨的發展——拿在下院的議席來算，不拿在全國所獲的選票而算——暫時也被牽制住了。

在這個時候，他從其豐富的思想中求得安慰。失敗之後他說：

『有時一個人必需避開熟習的事情；面孔與聲音，避開每日循環不已的工作，因為一個人的頭腦會如過被踐踏的青草。需要保護，需要灌溉，需要讓它獨自個兒。呵，讓我踏上荒山的幽徑，靜聽羊鳴，與白雲朝陽雨露爲伍，訪問死者的墳場，生者的茅舍，迄暮，給我一烟一火，一榻睡到天明。友朋且相棄，山徑永相迎。得勢不諂；無位不怨，不平不鳴；失勢不餒。是永生摯友，藉期歎欣，滌洗積慮罷。世上無更可信，找得到它的人有福了。它使它無與於無常的命運與世人。』

那幾句話真的有預言的性質，因為好些困難的日子在他的前頭，許多人把『他們的不幸』加到他的身上。

隨着工黨政府辭職之後，批評的呼號又重新出現了，這些批評的呼號在黨的領袖們執政的時候是早已潛伏在黨內的。他們中許多人本可不必徒事呼號的，獨惜能了解當時困難情形的只有三數人而已。

一九二五年四月獨立工黨大會在格羅斯忒（Gloucester）舉行，一位演說的人說，他們應該從工黨政府九個月來的工作中，找到一個教訓。

『工黨政府對於領老年恤金的人做得很少工作。它沒有利用格林那（Green）地方許多的國家工廠，那些工廠原可以用來做建設工作的大試驗的。工會大會曾要求利用這些工廠擴大工人工作的機會，但工黨政府拒絕了。加拉斯哥及別的地方的造船所裏，一些機器也沒有，但假如工黨政府力主修葺，必可以給大多數人以工作。工黨政府不但沒有保護海員的生命，反而減少了航行前檢驗人員的數目。當工黨開員們在穿起古羅馬的緊身衣，配起了劍赴英皇的晚餐會時，正是一一，〇〇〇的失業者被拒絕領取津貼的時候。工黨政府對於罷工的警察做了些什麼工作呢？他們之爲人較皇子皇帝還要好的。』

『當他們壓實工黨政府的時候，讓他們把他們的惡行記載起來罷。讓他們牢記着他們在蘇丹所施行的政策和用武力壓迫罷工的政策罷。』

在回答這個演說及大會上別的演說中，麥克唐納描述與事實及環境更相符的工黨政府工作困難的情形：

他說：『他們以爲工黨政府是具有清楚的戰陣在前面的男女們所組成，他們果願意，便可以予以轉變，設不予以轉變便須負濶職的責任，這種觀念是背理的。因爲無論是在野或在朝，他們都被洶湧的騷動的羣衆所包圍，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只能團結起來，向着社會主義的路，以期在錯綜複雜的利益和成見中，謀些須的進步。有時不能不轉彎曲折，甚至不能不退却，這都是在朝或在野所要應付的問題，除非獨立工黨的朋友們明白了這點，他們對工黨政府的毀譽才有效力。他們可以說這件沒有辦好，那件沒有辦好。但，他要對他們說的，正如一個奴隸聽人家說他得了一個好主人，將會有好的職業和好的日子後反唇相譏的話一樣。那個奴隸轉過頭說，』

「你去上工罷。」他對他們的觀察和對他們的批評底觀察是，「我願你們親歷其境。」

關於如果機會再來，工黨是否仍願在下院佔不到大多數的地位中重復執政的問題，麥克唐納以他銳利的眼光加以分析。

他說：「當我們「清夜自思」的時候，每念及我們執政時爲着環境的限制不能多所設施，我們之惋惜較大會中任何人爲深切，我的同僚也具同一意見。」他這話立下了一個原則，如果在下院仍只佔少數的地位，決不再上台。他不再賤生命從事了。這說來也許好聽却不是確實的。假若機會真的到來，工黨須向下院答覆「你執政還是不執政呢？」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或否」的答案將視乎當時整個的情勢而定。

他繼續說：「工黨政府八個月來的歷史，當要記載起來的時候，將不會由褻狹的只事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去書寫。它必將由能重視它與整個英國及歐洲生活上的人去書寫。」

一九二五年九月底在利勿浦舉行的工黨大會中，對於大試驗的批評更進一步，並且再企圖通過一個決議案，不許黨在沒有佔到大多數的地位之前再行執政。

這個決議案由運輸工人總會的伊倫斯特俾維 (Ernest Bevin) 提出。原文如下：

「大會鑒於最近工黨政府的經驗，認爲在下院只得少數議席的時候，工黨不宜再復執政。」

一個擁護這案的演講者說，工黨政府只是「酒後狂熱」而已。不是因爲他們不願多所設施，只因爲他們的主人不願讓他們去努力。那演講者繼續說：「工黨沒有把罪惡從根剷除的機會。一個黨去執政，只爲的希望別人會



慈和一點，偷偷摸摸地從中做一些事，那是他們所需要的嗎？乃至他們中常對國民說他們一定做的，如廢除老年恤金底不合格的規定，也沒有勇氣去做。可是別的人却上台做了，於是工黨又不得不解釋說，他們雖執政却是無權的。」

在論辯中，麥克唐納說及人們對於他政府中之一員底攻擊之「卑鄙和不公」。他略說他們遭遇的困難情形之後，繼續說他們從前曾經有過許多好的政府，也有過許多壞的政府和平庸的政府，但是當他們和他都死了，他們的兒子也死了，距今遙遠的某一世代的人讀起二十世紀的歷史的時候，如果他們那時候對於一九二四年那些從礦抗中來的人，從工廠來的人，從田間來的人，打破了空前的紀錄，以只佔小數議席即出而執政，成功了工黨政府這件事，高聲贊美，他不以為那是諂媚工黨政府，或者是諂媚工黨。

麥克唐納要求否決那個決議案，結果絕大多數擁護他的意見。

真的，黨內的人對他這類的批評，只反映出他的勢力。要撤換黨的領袖的提議，只有過一次——緊隨着一九二四年總選之後——而漢德森却利用這個機會，在一個宴麥克唐納的晚餐席上，斥那種謠言為無稽。他說：「這樣的一個妨礙生長的東西不能太快的去輕傷。我希望不再聽得到它。」

一個大陸方面的觀察者，在其研求麥克唐納於失敗時仍保有這種力量底原因中，找出了一個因素，這個因素仍為那些專事攻擊麥克唐納以損毀工黨的人們所不能了解。他說：

「在千萬人底想像裏面和良心裏面，他的地位是超乎政黨政治的。縱令在別的方面他很不像列寧，可是在城

市中之陋巷裏，在地方中之茅舍裏，他已成了一個傳奇的人物，成爲千萬被蹂躪的男女們底希望，夢想與期待中之人格，這一點他與偉大的俄國革命是相似的。還有像列寧的地方，他是整個勞動階級底無言的希望的中心點。如此的虔敬與如此的親愛乃是政治的實在境中底最重要的因素。」（註）

註：Egon wertheimer, In Portrait of the Labour Party, P. 176.

除了有些人批評第一次工黨政府而外，另外却有些人從它的真價值上，贊美它的成就，尤推崇它的首相。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觀察報說：「工黨任何真正的成功，其有負於麥克唐納者較其他諸人合起來的還要多。」該文繼續說：

「有資格的人決不否認他乃是一個偉大的外交部長。在外交部裏更無人否認這一點，他獲得屬員的尊敬，在外交部長資格上他以超人的尊嚴代表整個的國家。」

「他當政時遭遇着非常激怒的戰爭心理。可是他從事恢復真正和平的心理較歐洲任何人爲力。」

「在蘇丹的事件上，這個工黨首相底穩定不屈的態度，乃是對國家及歐洲底無價的貢獻。」

我隨便的再從這個顯著的譜頌中節錄一些話。它繼續說：

「這些乃是工黨政府短期中光耀的事蹟。當這個競選戰底熱的灰塵吹散之後，麥克唐納先生的成績，與沉着而勇敢的政治家風度，將會再顯露出來；并且受人紀念。」

最後：

「英國工黨政府首任首相，乃是一個極受人尊崇而卓越的政治家。」

凡細心研究過麥克唐納執政時個人成績的人，決不會說這文章（即說得過分一點）是不正當的。不論他將來的遭遇怎樣，決沒有人能夠說他在這初任首相上，配不上歷任的卓越的愛國者和政治家，也不能說他配不上後來的人。

## 第十二章 間斷及第二次組閣

保守黨以笨重的多數與工黨對抗，（工黨本佔一五一席，補選後增至一六二席）使「長期國會」沉悶乏味。「長期國會」自一九二四年底直迄一九二九年六月止。

這不是因為沒有遇到重大的爭點，例如遷延的煤礦危機，繼長的失業，防衛的推廣，勞資爭議法，察赤爾的提案，及和平與軍縮問題等，都供給許多使人憤怒激昂的材料。可是這些爭點政府從不焦慮，因為政府的黨校（Whips）隨隨便便地執行黨的紀律，便可以在任何場合下把工黨和自由黨的議員壓倒了。

在鮑爾溫第二次內閣的歷史中，只有兩個插幕。一個是祈禱書底辯論——非政府的事情——還有一個便是——九二六年的大罷工。

煤礦問題，當新保守黨政府下車伊始的時候，便已向全國展開了它的黑影。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麥克唐納在他自己的選區演說，也曾論及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并為談判的「和平」而呼籲：

「黑雲遍佈全國的煤礦之上。我為的是和平，我要問的是『果有和平的話，雇主能讓礦工們與其妻子家人不必拿飢餓做和平的代價嗎？』那就是全盤的問題。我們不需要爭鬥，這你們也深知道的，你們果即從事爭鬥，你們

是很不利的。因為煤業的情形并不好。但是，如果雙方合力避免去爭鬥，那末犧牲決不能完全歸你們去負。假若我們得到和平，如我的希望一樣，我對煤礦主人們的要求是——不要讓和平的意思是使煤礦工人們忍受比今日更多的痛苦。

『傳說礦工與鐵路工人和工程師正進行一種準備。果真一方工會聯合起來，一方資本家也聯合起來以從事工業上自殺的爭鬥，那是國家再大沒有的災難。我只希望工人聯合起來，要求他們應得的權利，同時盡他們對社會的責任，他們果如此向社會的道德與理智呼籲，輿論將必站在他們方面，幫助他們勝過一切困難。能幫助礦工的工會乃是輿論和理性。我希望一切公正的男女，不論是鐵路工人，工程師，乃至別的工業上的人，都站在礦工方面，幫助他們為生活費工資和合理的人的生活底要求而奮鬥。我希望一切公論的機關，禮拜堂，尤其下院，都一致起來使礦工得到他應得的，使他不致被謀利的資本主義犧牲了。』

用談判的方式以求和平之所以困難，乃是因為雇主與礦工雙方都有心理上的毛病。這可以從煤業的業務報告上看得出來——報告中所包含的，都是些沒有結果的罷工與關廠，而這些罷工與關廠的結果往往只是憤怒，虛費了時間與失掉了市場。

一九二六年年頭的情形已相持不下，——煤的出產是虧本的，雇主要求削減工資，却不允將煤礦業『合理化』；而礦工方面又不顧一切，堅持『不加一分鐘的工作，不減一便士的工資』的口號——其結果只有一個可能的結局。縱使政府用強制的力量加諸雇主身上，令他們從事整頓，也還是不濟事的，因為礦工已迫到了『飢餓

線」上，要在他們可容許的最低生活程度之下再作任何的削減，他們拚了命都是要反抗的。

當時有組織的工會已看到了這個對礦工的挑戰，乃是資本家對各業的工資進攻戰的第一部，同時再加上對礦工同情的觀念，於是他們也站在礦工的一方面，為他們的條件而爭鬥，這些條件便是關廠的代替。

因此工會大會一面挺身而起，一面與政府談判，謀獲取保障礦工的條件和保證，打破礦主企圖實行的殘酷的建設。那種行動是可敬的，然其結果却不能盡使人滿意。因為旁的工會相助的形勢，堅定了煤礦工領袖，礦工聯合會秘書科克（Arthur Cook）底固執態度。此外還有別的一些人也不反對最後採用總罷工的武器，一九二一年以來工業上的「妖怪」。

工黨和工會大會就早要在這種情勢中，謀和平的解決。但是因為首相拒絕以強制的手段使礦主覺悟，和礦工們那不可壓抑的態度——反對工資任何的削減（削減工資是政府要求的談判先決條件）使歷次的和解的企圖都歸失敗，五月三日總罷工開始了。

那天工會大會的總參事會發出的宣言說：

「一個最嚴重的情形，因為礦主驅逐了一百萬以上的礦工，因為政府在糾紛未解決以前，拿不出一個使煤業可以在不再降低礦工生活和工作標準之下繼續進行底可接受的建議之下產生出來了。

」總參事會得着各工會的全權代表底合作與批准，逼不得已組織聯合的戰線以抵抗企圖犧牲礦工工資以謀煤礦問題解決之實行。

「星期四，五，六三天各工會執行委員應特別大會中，總參事會曾採取最後的辦法，謀運輸業，印刷業和某種生產工業之停工。

「除非星期一午夜前得到一個為工會大會代表們能保證礦工接受的解決外，在這些基本工業和業務中的工人們將一律退出。

「工會否認一切危迫的災難底責任。他們的行動并不是直接對抗社會。隨着總罷工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其責任應全由礦主和政府負之。」

細說起來，麥克唐納對於實行「直接行動」底企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總罷工乃是由工會大會總參事會代表不列顛勞動階級去指導的，而麥克唐納與漢德森之被請以工黨代表資格加入工會執行委員會，却是在總罷工開始差不多英國各工會都派了代表出席以後。

宣言中提及的那個決定一切的會議，乃是五月一日，星期六在倫敦紀念堂舉行的。那個會議，也就是各工會把他們的前途放在工會大會手上的時候，它將永遠銘刻在那些出席的人底心中，作為英國勞動者給予世界的團結的深刻印象，不論對與不對。每一個出席的代表都相信礦主只是因為礦工的貧乏而獲勝，他們并且宣誓如果有命令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工人羣衆將退出他們的業務，甯願捱難，受辱忍痛，不願留他們的兄弟在煤坑裏。

大會中，麥克唐納在講壇上佔了一個「觀察者」席，當大會的主席普赫（Arthur Pugh）開始點數一切隸屬工會大會的工會底名字，向各工會底秘書詢問前開大會給予各該工會執行委員的問題底答案的時候，會場裏的益

極非常緊張；那問題是「他們是否將他們的力量交付於總參事會之手，是否能隨時遵行總參事會的訓令，無論是關於爭議的行動或財政上的幫助。」

主席所宣讀的工會名單包括整個的工業界——鐵路工人，運輸工人，工程師，洗衣工人，膳室工人，新聞記者，店員。隨着呼叫出的工會底名字，代表們一個一個地起來回答一個表示命運的「是」。

一個曾經在場的人說——「雖則是在創造歷史，可是它並沒有戲劇的色彩，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戰慄，但每想及這些一切的意義時，却不能不驚惶起來，不能不感覺得勞工最後是覺醒了。」

「他們乃是親愛如兄弟姊妹的一羣人，從事不得已的防禦政府進攻的準備。」

註：Daily Herald, May 3rd, 1926.

那天代表三，六五三，五二七工人的工會一致贊成執行工會大會的訓令，只有四九，五〇〇因為特別的理由作不確定的表示，雖然不一定是否定的。這樣，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整個大不列顛的工會運動爲了聲援礦工而團結起來。

麥克唐納代表工黨向大會演說：

「在思想上，在靈性上，不爲這時的感情所動的人，真是可憐了。當我們在後面的坐位上起來辯論的時候，政府已決定了。我恨不能一死了之。我想我的同事漢德森也和我一樣。」

「政府決定了向我們人民的生活程度開戰，但是決不能離開下院而戰。」



麥克唐納繼續論及一些早報說他們希望勞資爭鬥的事情。

「我以神聖的名義對英國的大眾說，在事情未爆發之前的最後幾天，我和我的同事們全誠地爲和平而努力；我從未見過像他們那樣奮勇的人。」

「星期五晚十點鐘的時候，我以爲我們已經獲得和平了，今天我要求要以公正解決這事的英國大眾，不要理會報紙所載的談判的曲折。」

「假若他們那樣做，我要問問他們，能不謂政府決心使談判破裂爲對不住社會嗎？」

麥克唐納續說：「我相信，假若我們能多出六個鐘頭的時間，政府決不能在禮貌之下開戰。可是他們却不願給我們時間。他們自一九二五年二月起便虛耗時間，那時我們便對他們說，煤業中是有疾病，騷擾的，并進而問他們怎樣去應付。」

「那些警告，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一九二五年的時候，他們自承沒有準備，於是便拿別人的錢去佈施。」進而論及談判破裂之後，麥克唐納結束說：「礦工的妻子含淚以迎她們的丈夫的時候到來了，因爲她「難爲無米之炊」。我深深地感覺得社會上有千千萬萬的男女，決不讓礦工從這個爭鬥中失敗下來（雖然這個爭鬥是不必要的）。」

「星期一我們將把這個問題向下院提出，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星期一之前，事情有新的轉變，使我們愉快地有希望地去從事我們的工作。否則，我們將不怨不報地和你們攜手以赴戰場，不達公正的目的誓不休止。」

五月三日！星期一，工會大會仍力求和平方式，使雙方及政府均可接受以爲重新談判的基礎。可是時間飛快的過去，雙方相持不讓的態度把和平使者的機會完全傾覆了。

當夜談判還是在下院裏繼續進行，鮑爾溫還在忙着應付千鈞一髮的總罷工，麥克唐納在新道報 (The New Leader) 上說：「我自來反對同情的罷工。它沒有實際的價值；它只有一個必然的結果——一個更慘酷的盲目的反動。濫用自由者，反對自由者其毀自由更易」。鮑爾溫批評他這話說：「我對於他的意見完全同意。」

在下院的辯論中，麥克唐納以國會工黨組的領袖的資格起來答辯。他肩上所負的責任僅次于首相。他在工會中雖沒有任職，可是他爲他們而發言，——爲成于成萬準備犧牲工資安全與積蓄——甚至他們所有的微小的個人幸福——底男女工人們而發言，爲不自私的忠實而發言。

他把關於煤業關廠的談判和造成總罷工的情形從始至末地述說完了之後，他說：

「我們大家都曾盡了我們的力量，今後還是要繼續。首相剛才說他抱着痛楚的心坐下去。我也抱着痛楚的心起來。剛才有人論及我以前關於總罷工的言論。如果我因爲首相把我的一個文書宣讀了便對他鳴不平，那只是因爲他選擇了一個無聊的非難。我所發的較他所宣讀的更爲詳細。這與我沒有什麼影響。因爲我已盡我一切可能的力量。關於總罷工及布爾塞維克一類的東西底討論，我絕無關係。我與剛才演說的那位代表喜爾喀特 (Hillhead) 的議員和恩博士 (Sir Robert Horne) 一樣地尊重我們的憲法。我不知道，那使在最進步的社會裏，假如不理性地做社會生活的基礎，將會怎樣。我會這樣說「一個政黨，一個人，決不能立於社會與革命之間作夾攻中之畜

門，除掉社會與革命雙方均存理性。一面再提高了的水堰，其背後的水勢只有增加無已。必至最後水堰崩潰了才止。我曾經那樣說過，那是我今日處境的困難。一小時或兩小時——一天或兩天——我們能够拿出這個時間嗎？礦工們說「我必須護衛我的生活程度。」不論他是否用複雜的估計方法護衛他的工資，都沒有關係；實在他在星期末所得的錢，也沒有用複雜估計法之必要」。

兩天之後，麥克唐納再為公正的解決而呼籲，希望能在更大的損失與更大的痛苦未發生之前，在礦工未為飢寒所逼而投降近於奴隸的條件之前得到公正的解決。

他說：「我再向下院請求，你們不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嗎？我和我的同事是堅決地站在礦工方面的。不幸的時間開始了，下院不拿善意與常識來增補，看看我們能否解決它嗎？我要忠告你們，我不是為工會大會而發言。我不為任何人而發言。我不會與我的同事或圍繞着我的人商量過，我只是由衷而言，因為我知道——我相信，我知道并且可以見得到——積日成週，積週成月（雖非所願）這些一切將會變成什麼景象。就記憶上說來，事情必遷延不決。雖然工人們和政府都會說過，從他們說來，不再有什麼呼籲了，然我是局外人。我獨自站立的。我不是工會大會之一員，因此，我較我的某幾位同事更為自由，我可以做出些明天或許被工會大會譴責的事來。但我決不失落了這個機會，不把我心中的話對下院諸君說，假如我所說的話被拒絕了，我也算盡了我的力，任何人也不能再有什麼作爲了。」

在雙方不願妥協的情感之下，這個和別的為公正解決的呼籲，自然只有失敗一途。不論首相所持的意見怎

樣，幾位重要的開員却是歡迎這個鬥爭，並且打算藉此『決雌雄』擠工人們於死地的，在那堂堂正正的『危害國家』辯論中充滿着戰爭的情緒隱蔽着『給工人一個教訓』的真意。說到這裏，我們得說說，礦工領袖們那樣頑強十足的態度，也是使政府中人態度陡變的原因。罷工期內自始至終——並且在一般地回復工作之後——礦工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拒絕一切尋求解決的基礎企圖，不論是由工會大會提出的，抑或由政府或其他個人提出的，即使解決的基礎使聯合會可以不負任何罷工損失的責任，同時礦工又不至受礦主要求的惡影響。他們對於每回求解決方式（包有必要的工資相當抑減的規定）的企圖，都以『我們看都不要看』一句話答它。從未有以如此的代價保持固執的態度的。

他們反對薩繆爾的報告——即薩繆爾爵士（Sir Herbert Samuel）主席的皇家煤業委員會底定獻——因此大大地延擱了許多優越的進步與發展。當總罷工開始前的星期日，工會力謀解決的時候，他們還是不願緩和。其後罷工大會力謀解決的時候，他們還是不願緩和。其後當工會大會從薩繆爾爵士處取得一個解決的方式的時候，這個方式且為一般擁護工人聯合的人們認為是『草擬礦業重開談判底計劃之滿意的基礎』，他們愈益剛復自用。

這個時候千萬的人閒着無事，工會的基金因融化了不少，社會的生活也受了不幸的阻礙。

我相信將來的歷史家必將這兩件無可駁詰的事情記載下來——一是勞工運動底團結與忠誠的精神，一是礦工領袖頑固態度底高昂的代價。因為礦工事件之走錯了路，使礦坑停工了八個月，結果稱為和平的，實是涸竭而已。

在這些情勢之下，只有一個結果，除非工會大會準備將整個勞工運動作孤注一擲。

總罷工二十日之後，工會大會總參事會報告說：「從礦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態度中，總參事會確認這個事實：無論重開談判，以求解決的條件是什麼，礦工們決不以談判當事者的資格考慮任何部份任何等級，任何區域礦工工資之調整的事情」那另段報告結語說：「總參事會覺得很難認可他們之僅被口號束縛着……礦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絕對反對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做解決案的基礎。……總參事會不能隨着礦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只拿着個拒絕的政策」。

隨着這個決議之後，總罷工撤消了，留下礦工獨自去談判解決。不過，假如他們還願意，仍可以得到工會大會的幫助與指導。

這些事實很值得記載下來，因為他們證明所謂總罷工之「瓦解」不是由於政府所持的政策之成功，也不是由於懼怕將來的結果，只是因為工會大會覺得礦工底拒絕調停的態度，把他們底犧牲和努力，全歸無效。因此政府把總罷工完結了，乃是礦工自己把總罷工完結了。

在恢復工作的時候，麥克唐納用他的聲望防阻怨恨，並反對那些企圖利用紛亂的時會以達他們底目的的反動的雇主。他一方面要求和平應為「友誼的真正和平」，不應因為工會的男女忠於工會而受犧牲，同時宣佈不應再拿總罷工為武器，總罷工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需要的進攻的形式。

總罷工撤消，撤消之翌日，麥克唐納發表演說，井從英皇向全國的呼籲詞中轉述下面的話（註）

註：House of Commons May 13th, 1926

「讓我們忘記了前幾天事件所引起的任何痛苦的因素，但牢記着（雖經嚴重的考驗）國家是如何地穩固與有秩序，今後吾人應從事永久和平的工作，因為既忘記了過去，祇有以一個團結的民衆底希望矚目在未來。」

麥克唐納轉述英皇的話之後，繼續說：「前天首相宣佈罷工停止的話與今天不列顛公報（*British Gazette*）底記載截然不同。我認爲那是極遺憾的事。他不僅無補於事，反而挑起憤怒，我請問是否能更正。讓我們不要誤會這一點：昨天停止了的總罷工，贊成也罷，不贊成也罷，只是純粹工業的爭鬥。對或不對，他只拿着一個觀念，祇是一個觀念，幫助礦工反對減薪而起的。那些鼓動罷工的，主持罷工的人事前事後都曾說過，獲得某項工業上的保障之時，便是他們滿意地宣佈和平之日。這應驗了。根據他們絲毫未離開過的綱領與目的，昨天的結果實現了，事情都成過去之後，昨天的事情究竟需要多少勇氣方做得到，沒有人較首相更能知道，沒有人較那些曾從事工業糾紛的人更能知道。採取昨天的步驟的人是冒多大的危險。我想那是應有的一步，我並且想那一步，應該叫各人，各階級，社會的各部份都決心幫助這一步成功和平的偉業。」

「結果是什麼呢？從前我們是有過工業糾紛的；也有人曾以搗毀工會相恫嚇，事實上工會也曾被搗碎過，契約破壞了，憤怒出現了，待至和平的時候，我們中最樂觀的人便以爲最大的不幸已經勝過了，不僅工業上的不幸，而且人民思想上的不幸，可是那個和平只是一個偽善者。一個假裝的東西。只有雙方的常識勝過他們，因此待和平來的時候，戰鬥完了的時候，雙方的戰士，第一件事便是互相緊握着手。如今雙方還沒有握手。」

在報章上不曾握手，在街道上不曾握手，在暴躁的遊行中不曾握手，關於給予那些等候工作的人的條件中也

不會握手。

麥克唐納繼續說：假如有任何碎碎工會的企圖，假如國民中任何的一部份，或任何一個愚妄的人，以為在兩星期或昨天的事情之後，可以刮去工會中人的面孔，他實在是大錯特錯，我們要一個解決。我們不要開始不規則的戰爭。我們不要遺留絲毫的怨恨。但是假如我們要避免怨恨，那末我們必須以尊敬的態度待遇工人。因為他們不是緩步倒退的人。決不好以為他們的頸上釘住了絕對隸屬的羈絆，可以隨指氣使。如果工人們受了壓迫，讓我們知道吧。我希望下議院（雖則院內各方有政治的仇恨，有政治的派別，對於最近八九天來的事情更各有根本分歧的意見），如今應該首先向全國發佈一個反對排擠差辱的宣言，為和解，恢復而呼籲。

有一個新聞記者問他，總罷工是否真是成功，麥克唐納答覆：「那全視乎你的意思怎樣；我今且拿另一個問題作答。在總罷工結束的時候，和在總罷工未宣佈之前，政府對罷工的態度是一樣嗎？當然不一樣。」

「鮑爾溫先生在總罷工前的一個星期中，曾拿出在總罷工之後所給予罷工的文書嗎？在總罷工之前，他曉得光讓礦主與礦工直接去談判，永不會解決他們的問題嗎？他也知道在礦主與礦工談判的時候，如果政府出作調人使雙方避去爭鬥，總罷工就不會起來嗎？總罷工之前，他全沒有做這些事，及至總罷工之後，他方才宣佈，他要把這些一一做到。那些說總罷工是無條件屈服的人，真是無稽之談」。（註）

註：Labour Press Service, May 20 th, 1926.

關於將來的問題，麥克唐納同時對那位記者說：「我們將在下議院繼續我們的工作，促使政府施行我們認為

必需的立法，直接間接使礦工得護適當的工資。然而政府已自毀其誓言，明顯地他們拋棄了礦山國有化，和受權市政府經營煤業的立法案。我們決在下議院爲這些事件而奮鬥，進一步，我們必令政府實行改組煤業的誓言。我不相信礦主會自動地把煤業改組。但煤業不改組決無和不可言。我們的任務在強使政府從立法中取得權力，進行適當的事情。

麥克唐納繼續說：『總罷工完結的時候，國會工黨將起而工作，全國的黨員都信任黨必能盡他的責任。如果他不夠促使政府盡他的責任，無論怎樣，他也可以使國人明白誰是罪人。除了國民給予我們的權力，我們別無其他的權力，我相信開明的國民必給我們以一切的需要。』

在北罕麥斯祕（North Hammersmith）的一篇演說中麥克唐納批評總罷工經過的情形，把事變的責任歸諸政府的身上。

他說：『他們對你說，那直是革命，他們對你說，那是對憲法的常規底固意的襲擊與挑戰。他們說，你們不是爲的擁護礦工才起來。乃是爲的聽一些從外國來的陰險與兇惡的命令以搗亂自己的國家。不幸得很，竟有不少人相信那種無意識的話。其實你和我都知道，人類那種休戚相關的非常表示，乃是現代人類不復能够目擊千萬的自己的血肉被逼於溝壑而袖手旁觀的非常表示，就爲的是那種感情，那惟一的感情，才使三萬萬工人一起罷工。』

『不論我們對於總罷工的觀念怎樣，不論你說它是工業的武器或者說它是政治的武器，可是，無論怎樣，我們却不應該把它的真相抹殺。我們的地位是婦孺皆知的。最近幾日，所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當政府處理談判的



時候，當他們忽略他們的機會的時候，當他們離開了理智途徑的時候，當他們對一切常識與善意之門掩耳閉目的時候，當那個星期杪的時候，他們已經把整個工會運動「裝箱」了，逼得整個的工會運動只剩下一件可做的事情，那就是宣佈一個大規模的同情的罷工。

「担负那個罷工責任的人們，一時一刻都沒有玩弄政治的問題。我屢次出席他們的會集——不是參加他們的工作，因為我從沒有參加過——我是爲的要曉得這些人腦子裏面想的是什麼。到下議院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好拿出直接得來的材料供大家研究。可是沒有一時一刻我聽得到任何工人——我不管他是被目爲右派或者是左派——也不會聽得到工會大會總委員會中任何一員密談或勸告或提議以政治問題爲目的的行動或政策。」

「而且工人方面自始便從沒有失掉過他們的理性。而政府方面却自始便失掉了理性，工人方面自紀念堂大會閉幕之後，從最頭一天，最頭一秒鐘，前頭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創造一個工業的情況，藉以加強礦工們反對礦主對於他們生活程度的侵食底力量」。

麥克唐納很少用總罷工做武器的。他反而利用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事件，把他懷疑總罷工（不論希望藉它求得他們工業上糾紛的解決的工人們如何地團結）底效能的理由記載起來。

總罷工完結之後，他說：「我們的立場始終不變。工黨從不視罷工爲政治的工具。罷工的觀念，行爲和結局都純是工業的。我相信這回罷工的結果，工人們必會加強他們對政治行動的傾向。而工會與工黨間的合作必會愈益益密切」。

經過那兩個悲慘的星期之後，他再表示他對於選舉箱的信任；

「讓各工會睜眼看着事實吧。工人們是會英雄地罷工的，可是當他們罷工時，將會遇着什麼呢？他們可以示威，可是總罷工是不會「勝利」的。他們可以抵受飢寒，可是決沒有稱心滿意的結果。工程師罷工，決不會幫助礦主們更理性些，轉而會使他們自己的雇主減少理性。礦業糾紛之上再加以鐵路糾紛，決不會幫助礦業之改組，反而會使礦業解體。那不是使這個舊的饑饉陸的世界向前進的方法。

「武力只引起武力，一旦總罷工爆發，受打擊的不是雇主而是社會一般的常人。當工業的武力不僅用諸襲擊利潤時，它簡直擊及人民的腦袋——或者人民的肚子」。〔註〕

註：Answers, May 29 th, 1926.

在另一個陳述中，麥克唐納以更嚴正的語句非難拿總罷工做工業上的武器：

「總罷工不能在工業上用為武器。因為它既拙劣又無效。它並沒有可視為勝利的目的。

「如果罷工到底以決勝負，工會因之而傾覆，政府也會逼出一個革命來，如果以罷工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則負責罷工的人，又將會被罵為通敵。

「因此今日，有些不負責的批評者責難工會大會的 General Council 有些人却責難礦工。其實真正的責難該責在總罷工的本身，和那些沒有考慮總罷工的結果，只一味宣傳，引誘工人們鑄成大錯的人。

「總罷工對礦工沒有幫助。它能獲得的最好的賣買他們也反對了。那個賣買究竟是聰明的還是不聰明的還未

分曉。

「我希望這回總罷工的結果，將會使我們把工會底策略整個重新考慮，假如這回驚動全世界的英國工人團結的力量能夠在政治上表現出來，那末我們便可以從選舉箱中把礦工的及同樣困難的問題解決。」（註）

註：Socialist Review, June 1926.

復工之後幾天，工黨在北罕麥斯密（North Hamersmith）補選中的勝利，證明了一般人對麥克唐納底理論之擁護。但是煤業罷工依然踏着它的沉重的步伐前進，而經濟的力量——貧窮與痛苦却大賣其氣力，結果使礦工們不得不同頭接受礦主的條件。

當這個可怕的衝突在進行的時候，下議院的工黨議員一天復一天地企望政府對礦主們施用壓力。可是政府反而通過八小時工作法案，麥克唐納的努力歸於烏有，他擬促政府使雇主讓步。下議院保守黨議席上龐大的多數（齊諾維夫信的結果）使工黨議員們無望地相對。根據工黨的說法，當時保守黨政府怒氣正盛，要向它作理性的呼籲簡直是白費氣力。

九月間，內閣總理在假的時候，有一個短時期，文斯敦察赤爾 Winston Churchill 似乎打算站起來反對礦主，主張舉行以全國做基礎的聯合談判，可是政府（且捨麥克唐納的說法吧）「背棄了察赤爾內閣總理把它帶回礦主們的口袋裏」。對礦主們的威嚇也就從他們的頭上安全地掠過。

「狡黠地故意地，政府給予礦主們八小時工作法案，以便他們對抗礦工而維持他們的私利，可是礦主們一切

的要求政府都答應了之後，政府還不能夠使他們與他們在聯合會會面。可曾有如此屈辱的政府嗎？前天我在報上看見一件案件，說一個無賴盜奪去他的情人底所有，然後叫她滾開去。結果他獲得應受的處罰——監獄。如今礦主們對政府所給予的寬厚，毫無感謝之意，腦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求把礦工粉碎，堅持復工的條件（讓我們不可用『和平』一字以污辱礦工們）然後叫政府滾開去，內閣無可如何，只得歎息，召集礦工們把自己的手統扭着，自承政府對礦主們的任何意見只得降服』（註）

註：Forward September 25th, 1926.

煤業罷工如何完結的，現在說來已成歷史了。整個爭議的歷史和時作時輟延宕數月的談判經過，說來總需要幾章的篇幅，而其經過除了工人們那深種的憤怒（直活至一九二九年并不僅限於煤的運區）於五月三十日總選中助工黨大勝利這一點而外，直與這本麥克唐納的生涯的傳記無關。

當煤業罷工遮蓋着社會一般人對別的問題底注意的時候，在勞工運動之內，麥克唐納與獨立工黨之間底紛歧的意見迫於爆發。這些紛歧的意見最初顯現於一九二五年獨立工黨年會中。

麥克唐納在一切事件上早已專心致志於對獨立工黨表示好意。他稱贊它作爲一個宣傳團體的活動。同時却不贊成（有時公然表示出來）它底獨裁工黨政策底傾向。他說獨立工黨『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提議爲『華美而無用』，這算是對獨立工黨最大的冒犯了。

大概麥克唐納對於哈定所創立的團體，依然還保有一種情感。因爲當他初次逼得不得不反抗它的某些活動的

時候，言辭間惋惜的成份似乎多於憤怒。

獨立工黨的工作乃是要宣傳社會主義，並且用種種方法候着種種機會實行宣傳。宣傳的方法，實在應該按照獨立工黨所行的方法去做。假若拿這個運動去賣弄風情，其結果只模糊了我們的地位，並使忠誠的問訊者更難於了解社會主義。假若擁護那些強令我們採行我們不願的政策的人變為共產主義者的擁護者，弄得我們天然地與他們相混——這一類的事情，不是我們該給社會主義的服務。

「許多重要的工作等待獨立工黨去做。那就是使社會主義生氣勃勃成爲一個激勵的和譽導的觀念。那種工作需要不斷的專心的智力上的苦工。假如獨立工黨拒絕做這種工作，人們才能視它爲無用」。

不問雙方的檢束怎樣，對於政策上的分裂却日見顯著。一九二六年十月工黨年會在馬蓋得（Lydney）舉行的時候，麥克唐納以全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發言人的資格，對獨立工黨所堅持的某些提議澆以一盆冷水。

自一九一二年（他辭去工黨祕書的職位轉就國會工黨領袖的時候）至這回大會爲止，麥克唐納屢被獨立工黨提名爲工黨的財務部長，并以獨立工黨代表團團員的資格出席工黨歷屆的年會。

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年會舉行之前，獨立工黨以他對獨立工黨沒有同情爲理由，把提名之舉撤回了。這個決原可以引出一個異常的情勢，因根據黨的規定，一切工黨議員及候選人，只算是大會底非正式的會員，他們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必由構成工黨的團體所提名的代表，才享有選舉及被派任工黨執行委員會任何職務的權利。因此，獨立工黨把提名撤回這件事，無異說在下院做工黨領袖的麥克唐納會暫時地被剝奪了被指派担

任工黨任何職務的權利。

可是摩利和內壹爾那 (N. E. H.) 工黨州部，却提名麥克唐納爲他們的代表，毀碎了獨立工黨的破壞，才把這個難題解決。然而異常的受窘的可能性還是沒有消除，大會一部份人爲確保這種情況不復發生起見，曾提議暫時規定有特殊地位的國會工黨組主席，不必得任何團體的提名，仍可任爲全國執行委員會的非正式委員。

新領袖報 (New Leader) 把獨立工黨爲斥逐麥克唐納事辯解的情形供之全世。當時國會工黨議員對是舉會力加批評。

「麥克唐納先生一方反對獨立工黨謀使工黨採行的政策，同時又是工黨中反對獨立工黨的政策底最重要的發言者，這使得麥克唐納先生和獨立工黨同陷於一個異常的地位。這樣自然會發生混亂不清的事情，因此，獨立工黨全國執行部覺得代表黨的代表團最好是能够反映出獨立工黨的政策。」（這我們還是對麥克唐納先生個人有充份的善意的）。全國執行部的這個勸告，自然也不是說麥克唐納先生從此便不再被提名爲工黨的財務部長。因爲去年，除掉了獨立工黨而外，還有二十九個團體推荐他。獨立工黨底主席及秘書會爲這件事訪見麥克唐納先生，向他釋明獨立工黨全國執行部的那個勸告是依照這些廣大的立場而成立的。對麥克唐納先生個人絲毫沒有減少了重視。」

一九二八年出現的那著名的馬克斯頓和科克 (Maxton-Cook) 的宣言，其目的在對工黨施行更極端的政策。（這「左翼」的宣言中有如下的一句特色的話：「我們不再能够袖手旁觀着三十年專心致志的工作破費於與資本主義謀和平中，破費於與我們資本主義的敵人底政治哲學妥協中。」）（註）這個宣言表示工黨與獨立工黨

間意見上的歧異仍然存在，雖然獨立工黨批評麥克唐納領導下的一九二九年總選戰時工黨底中庸的綱領中曾說：「目前我們必須認爲這個綱領是表現工黨態度的，（雖然我們很願有更勇敢的政策）我們必須光明熱誠地，爲同一的目的而工作，認定社會主義只有透過勞工運動才能够實現。而獨立工黨今日的工作，如它所素行的一樣，乃是暫變那個運動，使它皈依於更勇敢的社會主義者的見解上面」。

註：詹姆士馬克斯頓 (James Maxton)，工黨內克來德派領袖，和亞搭爾科克 (Arthur Cook)，大不列顛礦工聯合會的祕書，兩人聯名所發表的這個宣言，其目的在召集全國工黨下層羣衆舉行連續的集會，以促使麥克唐納及他的同僚施行更急進的政策，如其達不到這個目的，則將領導一個折衷的運動。這個運動，因爲完全離開實際的政治，激頭激尾的只建基於感情之上，結果絲毫不起人們的熱心，各地的集會更談不到。其唯一的結果，反而使整個工黨重新表示他們對他們的領袖底信任，尤其是對麥克唐納底屢被試煉的政治家風度底信任。據說這個宣言不免多少受了共產主義者的鼓動，這或者也與其大失敗的結果不無關係。

麥克唐納對於這個批評的答覆，載在一九二七年九月 *FORWARD* 報中的一篇論文裏面。那個論文較早於馬克斯頓——科克的宣言印行之前。

「社會主義者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實在地不在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速率底結果，而在怎樣把鑿別力和熱心，忍耐和急速相調和。我爲「現在即實行社會主義」這個呼號悲觀，有幾個理由，而尤因爲：它將會延緩我們的成功，終無達到之時，它是表面上帶着山川女神的捷足而年復一年伸延至無窮的漸進主義。人不是羊，然而也鬥印

有兩個羊的特性。他們是羣居的，同時是容易受驚嚇的。但是拿這個事實來做選舉失敗的解釋，然後滿以為那種情境不會再來，另起一種政策，那真是愚妄』。（註）

註：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跟着腓力史諾登（Philip Snowden）辭去獨立工黨的職務之後，麥克唐納在*For-ward*報投文說：『大概是在去年，我接到數十封信和接見過數十位新聞記者，他們都問我，應否擁護獨立工黨新的路線。大體說來，我勸他們應予以擁護，並且希望它會放棄它底目前要佔重要地位的企圖，轉而專心致力於宣傳社會主義的工作。因為宣傳社會主義的工作，如今較已往任何時期都還需要。史諾登以為獨立工黨決不會那樣做，因之對獨立工黨絕了望。實在它底判斷中的某些批評，也似乎證實了他的意見。』

最近，麥克唐納以下述的語句，立下一些原理。這些原理，他認為是應該可以感動工黨和獨立工黨。同時可以幫助獨立工黨改進它底熱心的精神：

『工黨存在一天，獨立工黨附隸於它一天，獨立工黨決不能夠自成一個獨立的勞工政黨，自立政治的政策，或者企圖強行自己的政治政策，企圖僭奪各會員對它的優越的忠心，尤不能夠侮蔑他們底在國會的同僚之決議案和政策。意見上的歧異是會有的——而且我尤希望意見上常常都有分歧之處——然而討論它們的地方是在每星期的黨的會議裏面，是在黨允許這些分歧的意見公開發表的時候。而其討論的精神，尤須以團體的和同僚的精神出之。我們黨中團結的精神，以今日為最盛。因此各選區應該有一種不贊成那些會被壞精神團結的人們底行為的表示。』（註）



肆·Forward, December 15 th, 1928;

當麥克唐納與獨立工黨互相辯論正在進行的時候，共產主義者也乘時主持一個向麥克唐納「大舉進攻」的運動。少數神祕的無足輕重的自稱為英國共產黨者受了他們在莫斯科的同僚底鼓動，居然印行了一大張叫做麥克唐納專號的報紙，企圖藉此以窘逼工黨的領袖。

在這四頁的報章中，在穿着部長制服的麥克唐納照相之下，有一篇如下列標題的論文：「演員麥克唐納；一個沒有主義的人；專權偏執；一個卑賤的陰謀家；一個柔弱的利己主義者」。此外，還有些粗鄙侮辱之言向麥克唐納的頭上猛擊。可是當時却仍有些人說麥克唐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外交部暗通消息者」，「一個模範的社會叛徒」和「一個中等階級的改良家」。該報的編輯者，還「解釋」印行這個特號的理由說「麥克唐納和他的政策——麥克唐納主義——是在勞工運動的根本血脈中吸食血液的致命的毒瘤。他公開地對保守黨政府的政策表示忠服，對勞動階級的勇敢的領袖如科克輩底惡言的攻擊和他輕蔑勞動者的態度，這些合起來表徵他自己為一個與鮑爾溫先生一樣大的勞工階級的大敵」。

這長篇大論激烈的東西，在總選之後，原無介紹價值。因為不僅總選中，那二十一位共產黨的候選人底保證金被沒收了，而且該黨中沒有一個人能獲選，達到千數以上的選票的也沒有。但是因為他以答覆工黨（在他們的領袖鼓舞之下）不容許他們的勢力以任何方式在勞工運動中洶亂的決心為目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把它介紹出來。這時工黨中少數人一再謀修改反對共產主義者加入的決議案底企圖，既屢遭失敗，而麥克唐納又復拿出他底不畏縮

的面孔，反對與共產主義者下層羣衆中的暴徒對峙風情。

他說：「共產主義是反動的泥土上的土產，是長育於獨裁的政治狀況之下，精密政策和偵探制度，放逐檢舉和竄逼的政治狀況之下底參差不齊的矮樹。」

「共產主義在俄國，是帶着許多政治的犧牲者，和利用「赤卡」與西伯利亞的沙皇。因為假若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負起行政上實際問題的責任的時候，它必然不是這樣，只有那些統治第三國際的不負責任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祭司們才還留戀十年前推倒俄國政府時的欺騙手段不忍釋手。」

「這種俄國的共產主義底源流，無往而不根深蒂固。民主主義與它決不能併存，共產主義之下的選舉箱，報紙，審判所等等只是「有名無實」的東西，它的精神與方法和我們的相比是必然不同的。」

「共產主義和工黨間還有一個不同之點。前者相信在社會急激改造之前，必先有一個以暴力為基礎的革命，以奪取政權。而工黨却有兩個堅定的觀察。

「第一、選舉箱所做不到的，革命也做不到。第二、希望以革命獲得的，即在革命成功之後也獲不到。」

麥克唐納拿持蘇維埃政府底政治的和工業的政策理論與工黨的相較之後，他繼續說：

「那兩個政策是勢不兩立的。他們屬於兩個絕對不同的政治遺傳，我們的遺傳是民主的；他們的遺傳却是專制的，我們以理性，良知與幻想來改變輿論，他們以個人武斷之見，衝破一切障礙，以獨裁的權利建立輿論。」

「因此，這其間的衝突不是由於遙遠底目的之差異，乃是由於我們對日常工作的態度上的差異。那就是爲什

麼英國勞工運動與共產主義無和解可能的原因——這莫斯科也知道的」。(註)

註：Sunday Graphic, March 18 th, 1928.

麥克唐納在這類企圖減弱他在勞工運動中的權威底計劃中，反而增加了不少威望與力量。

一九二六年，他六十歲生辰的時候，工黨送給他一件隆重的禮物：一張六十鎊的支票和一束六十朵的玫瑰花，克來拿斯 (J. R. Clynes) 說：「麥克唐納先生的工作充滿了感人的性質，早已爲人所崇敬。如今還不是估量它的時候，因爲他的偉大的工作依然尙待開始，更偉大的工作將會在他第二次任工黨政府內閣總理時開始——這我相信快要來的——麥克唐納先生將不復只領引小數的同志去奮鬥，而是領引着大多數去奮鬥，那時他必定可以完全實現工黨大會的希望」。

他今日穩固的地位，不僅是因爲他擊退了外人對他所持的政策底襲擊。他的能力，絲毫也不是因爲年來能在沒有希望的反對黨的地位中，表現出健全的政治家的風度。

一九二八年國會第四屆議會開幕後，關於英皇的演說底辯論中，麥克唐納說：「我敢正對政府說，他們所不願的社會的重要問題，反對黨是決不會忘記的，我們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按部就班地爲它們而奮戰。社會上的重要問題是不能不解決的，總選舉快要來了，政府的大多數和擁護政府的選票將會跌落。本年三次補選中，他們的選票已跌落了一萬票，因此英皇的這篇演說，只能夠看作是政府的態度之適當的象徵，因爲他已在逐漸而不斷地向虛無中跌落了。在這種社會情況底下，政府竟發表這樣的一篇英皇演詞，是否應予以信任，我深信國民的答

『要必然是堅決地否定的。』

幾天之後，二月十三日，麥克唐納復專為失業問題發表一篇演說，指為鮑得溫政府救濟失業的嚴重狀態之失敗。失業問題，在一九二九年工黨勝選中所效的力，實較其他問題為大，工黨在其要求中，原是不斷地主張採取勇敢的政策以應付不幸區域中急切的需要，以減少當時尚在百萬以上的失業數目的。(註)

註：那些對於麥克唐納和工黨所持的失業政策或有興味的人，請研究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腓力史諾登在下議院發表的演詞，及麥克唐納在*Times*報十二月十三日和二十兩日發表的演詞，在這些演詞中麥克唐納曾把工黨對於這個國內的嚴重問題所持的意見詳盡的概括出來。

麥克唐納說：『我們在遇着一個嚴重而迫切的失業問題。政府對於雇傭，對於增至六十萬或八十萬的失業註冊的人儘可說他們想說的話，可是無論政府怎樣說，還是逃不了對於這一百一十萬需要生活的人底責任，不論政府願意還是不願意。我們今日生活在這樣的狀況和制度之下沒有被嘉納的，便只好永遠不被嘉納。當這個制度在一百年前開始時，你曾經反抗過，直至今日你還是在反抗。甚至你們自己的的士累利(D. Laing)——在一本從來最無價值的小說中——也調察這兩個陣營，這兩個陣營是今晚你們在議員休息室中準備擁護的情勢底直接的結果。』

『當你詢問政府的政策是什麼的時候，他們直至今如今還是說——「我們沒有全國救濟的政策。我們只好讓千萬的失業者自己設法」。我們曾經提議政府，請他們不要忘記總選時他們的演說——他們會說他們是注意失業問

題的，并且說決不休不眠地謀失業問題之救濟，可是截至現在為止，甚至我們中心的工業例如鋼與鐵，尤其是百萬以上的煤業失業業者，他們不曾做出一些成績來。如今時隔四五年，他們聽我們的催促了，并且承認不幸區域中的問題需要有些解決。失業與破境正在我們目前，如今這些可敬的先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是的，住宅在破壞，疾病也在蔓延，目前我們無從使破境情形明朗起來。因此，先得從事調查，三年之後我們將從事調查，看究竟有什麼可改善沒有。假如有可改善的地方，我們還得看我們的財政調整以後，地方政府究竟有什麼相因而起的改變或有多少改變」。

「因此，我們必須看事實承認事實：生於今後五十年的人，回頭看今日的日子，將會說我們在經過一個工業革命，正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一樣，造成這個革命的原因，與造成第一次革命底科學的與工業的改變一式一樣——即是動力的改變，特別是與運輸有關連的。我們既承認正在經過一個動力與運輸的革命，影響勞工的開除與騷動，我們得對政府說，——「請不要踏百年前政府的覆轍，請承認政府有應付整個國家失業問題的責任，有應付轉移與改換的責任，以求使事物的舊狀態與新狀態聯貫。」政府却說，「不，我們正以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的方法把新的工業配合於舊的工業裏面」，——換言之，就是加重英國工資生活者的負擔。我們決不容認那種事情，更決不贊成它。」

我們還得引述麥克斯納在這個時候發表的另一篇不同性質的演說。這是他追悼鄂斯福 (Lord Oxford) 的演說，在那演說中，他將工黨的禮物放在那位學生對政者底屍架上（那禮物包含着英國政治中美好的精神，這精神

勝過政黨利益底障礙）去紀念去致敬一個偉大的議員，一個可敬的仇敵。

麥克唐納說：「當他離開我們的眼界的時候，我們向他告別，我們內心祇惜別離，更無暇討論他生前的事業，他是一個堅強不屈的戰士，他那老練的思想和豐富靈亮的辭令常常把我們的注意也催眠了。在那種催眠底下，我們爲他喝采——我們不喝采者幾何？——把我們的鴻溝和（假如他的辭令底魔力失了效力的時候）我們會立刻向他發射的一切反對都「拋諸九霄雲外。」（註）

註：Hansard, February 16<sup>th</sup>, 1928.

「他是一個政黨的領袖，那在最緊急的時候，他從未用過不公正的手段也從未用過卑賤的呼籲。透過長期的國家的危難和個人的憂慮，（由於喪了愛子的悲痛，其憂慮尤爲深刻）在處理國家的事情上，愈形剛毅。他以忠心的正直之態度爲國家服役，在他晚年告休的時候，還帶着一種沉着和寬廣的威嚴。他之死，簡直中斷了現代與過去的連鎖。（這不是我們因事張大之詞）他把碩果僅存的前代底行爲，態度與精神都隨身帶到墳墓裏去。不論魄力方面，態度，頭腦和一切天賦的才具方面，他都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世界的人，在一切騷動與艱苦之中，他仍不失掉他的名望。」

「他具有的是一個何等泰然自若的人格！他用來以看世人的是一雙何等幽默的寬容的與淡泊的眼睛！當你一旦與他認識之後，他更是一個何等仁慈的人！假若我們能夠隨着他踏入「西方」，我們將可以看見他迴旋於那些榮耀的隊伍中，受他們幽默與溫和的歡迎。我還可以想像他正在一個安靜的集會中，以這星期來空虛的故事對他

們細說。此外，我們對於他的家庭，尤表示深切的同情。」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九年間乃是間斷的時期。可是在下議院裏辛勤努力的麥克唐納却不會因此得到休養的機會。一九二七年當他遊歷美國的時候，他染病了，並且扶病歸國，由此可見他爲黨努力的情形。

他很疲乏地到了美國，目的原是在休養的。可是在他未及恢復健康之前，便染了一種當時流行于美國中西部的病症。

病狀發展得很快。他在昏暈中匆忙地趕赴醫院，在醫院裏行了注射的療治。在生死之間飄搖了幾天之後，（他的一個摯友說，「真是間不容髮的機會」）他底堅強的蘇格蘭的體質才慢慢的復原。

那病使他虧損得非常厲害，當他第一次准起來的時候，他見了自己瘦弱的腳，才驚異地發覺他所經過的摧耗。當他扶着拐杖，從自美國回來掃桑波敦（Southampton）的船上底吊橋登陸時，他的朋友們看見這樣的一個老弱的領袖尤深憂慮。

病後他回到祿錫矛斯故鄉，才真正得到恢復健康的藥方。祿錫矛斯對於他常常都是最好的藥品。六個月之後，他底一切往日的氣力全部復元了，他於是又重復爲工黨工作。

麥克唐納在下議院中，每一個爲工資生活者，及那些繼續不斷地受社會罪惡的痛苦底人們求更好待遇的懇求，總是被機械的保守黨多數所不理，這像是麥克唐納的特質。結果，他把他的希望轉寄於下屆的總選中。

在國會工黨領袖的地位上，所不能不負的繁重的責任和不斷的工作之下，麥克唐納還是再次爲黨預備一個

包羅宏富并且有挑戰性的政策。這個政策足以要求全體選民廢棄一九二四年底「驚惶的」判斷，不僅擁工黨上台而且予以力量。

他利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短期的耶穌誕假期回去敲錫矛斯，他生命中許多重要的決議決定的地方，以考慮民主主義者當前待解決的問題。簡括地草擬了那包羅萬有的綱領。這個綱領後來以勞工與國家 (Labour and the Nation) 為標題，廣佈全國。

不論真的或假的，有些人會稱這個由「力量的旅行」(Tour de Force) 所草擬的方案，「七個政府七個任期也不能夠實行它的一半」，勞工與國家一書在最近的將來恐怕是工黨國的最宏富的文書了。許多人都承認：從草擬這個文書底感悟上，和親自草擬原稿底四五節上說來，麥克唐納實在又為工黨立了達到勝利底拱門的基石。那個綱領在此印出來未免太長。可是這二萬字却包括着許多要點，為理解工黨活動的基本目的的人必須作整個研究的。無已，我們只好讀一九二九年總選時，工黨印行出來的概略。這個概略以工黨告國人書 (Labour's Appeal to the Nation) 的名義發表，在本書之末，將重印出來。

這裏我只抄錄原文的末一段。這一段重中最初給予工黨以生命的道德底呼籲。也就是麥克唐納今日所最力主的：

『然而，工黨決不以僅僅把政治的民主放在一個不可攻擊的地位為滿足。雖然工黨知道那工作也屬要緊。工黨主張政治的民主底不可少的系論——的確，根本說來那才是政治的民主底生存上的惟一可靠的保證——必須是



財富上巨大的差異之廢除，和能為工人大眾獲得真實的自由底工業制度之改造。工黨決以政治力量系統地不息地為廢除社會上的私利和經濟上的專制與建立一個文化不專屬於某一階級，而為全民族所共有的社會而奮鬥。工黨的政策所注目者在於這些目的的實現。而其政策之成功與否，復以其實現的程度為斷。

「工黨毫不輕視專門學識與技術技巧之重要。反之，工黨認為惟有盡用科學之能事，才可以實現它理想中的自由。檢閱工黨過去的歷史，便可以知道它曾為擴展與改良教育的便利，反對資本主義政府對教育底冷淡及敵視而努力。今日工黨還和往昔一樣，要求以最豐饒的基金為追求學問及擴大教育與文化底傳播之用。而且，在工業上同時在政治上人民同意的管理較專制的管理，不僅更仁慈，而在實際上且更有效能。并且人類底能量與性質之不同，祇有把那些由環境產生的不平等消除了以後，才能够達到它們充份的發展。

「關於個人自由與社會不等方面，工黨相信生活的法則是互助。人類的進步，不是從個人自私自利的鬥爭中得來，乃是從整個社會的富源為社會全體的人所用中得來。工黨就是站在這些基礎之上，主張將來必需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工黨要求社會上各階級的善良的男女們，幫助它完成那不可避免的工作。」

麥克唐納之同情於那些在前十年間備受痛苦的大部份民衆，是無可置疑的。不過，他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不斤斤計較於單純屬於物質問題的貧窮與困難。他也不會忘記工黨早期的成功，大半是依賴於照耀人們腦海中的理想——一個明天較今天好的希望。

不斷的以道德為前提，是他腦海中的首要願望。勞工運動之產生不是僅為的獲取更好的工資，縮短的工時，

或者建築多些房屋。自然這些一切也是應該的。勞工運動之產生與發達乃是因為勞工宣佈了他們的意願在於改變社會的平衡，把財產所佔的重要性降低，把人類的健康與快樂提高。如今麥克唐納仍視那個目的超乎其他別的目的。

假如我們說那個綱領中有任何部份較其他為更重要的話，那末最中他的心和最緊黏這個理想的，便是那三個概括工黨政策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假如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工黨政府不失敗下來的話，他的內閣是不能不注意的。

這三個問題，第一是和平，世界一般的和解，以作軍縮的開端；第二以全國從事開發的勇敢政策，和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以謀減低失業的額數，特別委員會的範圍與權力，其性質大概同於帝國戰時會議（Imperial War Council），即是審議改良計劃的工作，和使英國的運輸與別的業務近代化的工作；第三煤業新紀元之開始，藉以實施那個「勞工」認為與煤田之將來及礦工和礦工之家庭底繁榮，均屬重要的改良。

工黨應付這些事件底更詳細的意見，包括在麥克唐納對酒成分部（Seaham Division）的選民底競選演詞中。這個演詞我們將在本章之末論及。

雖則是在野，麥克唐納也不必等待未來的總選底裁判，才再解釋他對於歐洲和平的意見。（在某種情形之下，自然在朝時說話影響較大。）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站在歷史的德國國會底演講者桌前——十四年前宣讀德國宣戰宣言的桌子——麥克

唐納爲國際的和平與友誼而呼籲。

他說：「我們以能愈早把大戰的黑影從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掃除愈好。我們必須清除戰事遺留下來的問題，解除被佔的德國領土的問題，賠款的問題，與賦債的問題。」

「我們必須把那些問題立刻作一勞永逸的解決，把戰爭和一切與戰爭相關的東西束諸高閣。假若不然，歐洲豈不能爲她自己打算？」

「世界軍縮，不僅是一個智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榮譽的問題。你們德國人不僅因爲大戰的結果而實行減除軍備，而且是因爲當你們簽字於凡爾賽條約時候，一切別的同盟國都答允了你們，他們也跟你們一起實行。這個諾言，英國必須在字義上而且在精神上履行。」

「軍縮前途的最大障礙，在於我們懼怕和平的冒險多於懼怕戰爭的冒險。所以歐洲的政治家們第一件的工作，就是改變他們國民的態度。勸他們於二者之間，寧取和平的冒險。」

「我雖然只是發表個人的意見，不是代表任何國家，但是我胆敢說，不論在何種情況之下，我決不贊同以武力強行和平條約的條款底建議。如今時候到來了，德國，法國與英國均應乘時廢棄心裏準管說着漂亮話而內心却互存猜疑的心理。」

「與別國爲一國的同盟，或者與別國爲數國的同盟都不是英國的政策。她的政策乃是要用與世界各民主國家合作的方法以促進和平。英國人民與德國人民間自然有不少根本的差異。然而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各人的差異，不讓

「牠們使我們成爲敵人，讓我們成爲朋友，各取所長以補所短。」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十日，麥克唐納在德被（Derry）演說，復論及英國的外交政策，并且下批評說：

「自保守黨政府執政以來，我們的外交已愈愈近於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形。那種外交的結果只有戰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麥克唐納正式被選爲酒成分部的候選人（衛布原爲該分部的代表）。當時的報紙說他棄去亞布拉文席而取酒成席乃是從一個不穩固的選區到一個穩固的選區。他評述那種說法道：

「如往常一樣，報紙的說法是錯的。他們只把他們的幻想刊行出來。其實我只是離開一個穩固的選區以赴另一個穩固的選區。二者之均爲穩固則一。我在南威爾斯代表的議席與英倫銀行一樣地穩固。只是多費一些時間去打算而已。如衛布先生一樣，我不是如往日一樣地年輕無事了；也如衛布先生一樣，我手上有許多事情要幹，我無暇親自去爲我的選區打算了。」

三個月之後，一九二八年底，政治上的爭論，因爲英皇病重而緩和了。英皇病重一事，使全國各部份的人都在焦慮的同情之下團結起來，各階級都向英皇表示忠服。那種忠服的表示是不易忘記的。

和各黨別的重要人物一樣，麥克唐納也表示出在那些焦慮的日子中底徬徨。在一九一七年俱樂部（1917 Club）底演說中，他致敬英皇說：

「我們中那些曾經有過與皇上私人交接機會的人，在他正行在很深的黑影中的這個時候，必會感覺得他以憲法上的君主底地位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完美何等的公正，在工作中他不以國家的元首底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與我

們密合，而出之以同屬國家一份子的態度。在一切事情上，他更勉畢生之力以履行國家的責任，以推進國家的福利。」

「前工黨內閣的人員中，我深信沒有一人不和我們聯合在一起祈禱；皇上病狀一天減輕一天以至於完全復原。」

一九二九年年初，總選之快要舉行，已屬顯然。二十一歲以上的婦女前年給予有選舉權的鮑爾溫政府在位很長，De-rating Bill 也來得及放進法典裏面，四月間復容許察爾赤提出他的第五次的預算。國會雖則在五月十日才遭解散，可是實際的競選運動已早在二月之前開始。當時三黨的領袖表面上都相信選舉的結果是勝利的。

保守黨自知一九二四年像「崩山」地降落來給他們的收穫不能完全保持，議席之相當損失已在意中。他們的估計，根據鮑爾溫在他的德魯立雷因 (Derry Lane) 開始競選的演說底公開的報告，大概在新國會中可以得到六十的多數。在喬治路伊德堅強的領導之下底統一與熱心的自由黨——拿着一個勇敢的和平政策「兩個條款」的政綱，及誓言克服失業，以從事競選——則深信最低限度也能獲一百二十席，足以維持新議會之平衡。工黨却沒有作任何輕率的預言，麥克唐納只斷定工黨必會有一個「全線的」的進步，便是自足。此外，更力勸選民予工黨以絕對的多數。

四月二十七日在亞爾培堂 (Albert Hall) 麥克唐納向廣大的聽衆演說，括述工黨的政綱。

麥克唐納在優勝杯決定之夕暗示時事問題說：「場上有三羣競爭的隊伍，但只有兩隊是有實力的。其一代表

政府，它是一隊停滯的反動力量。其一是代表工黨的，它是一隊有眼光，並且有一個從未充份實行過的社會公正的觀念的力量。

他繼續說：「我們的政綱中之第一點是失業。那是在工黨腦中，佔最大地位的問題，也為工黨政府所最先注意。」

「誰在政治上把失業問題最先提出來呢？就是哈定和工黨。我們黨從不讓失業停止為政治的問題。」

這樣把失業問題放在工黨政綱之最前部之後，他繼續言及工黨政策之別一的方面。他說：「我們將在日內瓦建立一個有力最與有權威的勞工局」，在另一節裏他又說：「我們要使歐洲得到和平，並且包括與俄國的外交關係。」

復次關於內政，麥克唐納說：

「我無庸論及住宅問題，因為你們已知道我和工黨對於住宅問題的意見。我們將繼續我們已開始的住宅綱領，直至數字上，我們補足了在目前光是工人階級方面所欠缺的大概一百萬間的住宅。」

「津貼制的試驗階段已經過去。一切的消耗和架疊與罅隙都必需剔除。比方說，工黨政府將不會以她們死了的丈夫是在某月的三十一日出生，不是在於某月的初一出生為拒絕寡婦們的津貼的理由。」

「關於教育方面，我們準備并切望實現地利維因（Sir Charles Trevelyan）在前屆工黨政府中已開始的政策。」

在一個宏富的演詞底結語中，麥克唐納說：「我希望佔得多數的議席，藉以擺脫政治的陰謀，不論是從共產主義者的左派，或者從自由黨保守黨的右派來的。工黨站在它自己的主義之上，工黨自有其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理想。我請求你們運用你們的理智，給我們以戰勝那些罪惡的力量，讓我們可以使英國和英國的人民成爲全世界底遠成，變通與羨慕的對象。」

五月十日，麥克唐納發表他對酒成分部選民底競選演說。在那演詞裏面，他括述工黨政府將致力的目前工作。

它底精末的一節，顯示出麥克唐納深信總選的結果，工黨將會勝利的觀念。

「你們逼着不得不選擇一個新政府。新政府將是反動的還是勞工的呢？它要不是反動的，就是勞工的。此外別無他途了。他們企圖擾亂你們對於勞工與社會主義的觀感和判斷，可是這樣做法，他們只是侮辱你們的理解力。英國之穩固不是像恐人們底夢魘之想像中那些把愛那地東倒西歪的。庸人自擾的呼聲，實在那是滿意於我們的一切錯誤繼續存在的人的呼聲。進步才是社會繼續存在的條件。每一代的人都遺留下一些問題給下一代的人去解決，下一代的人必須用廣闊的高尚的深刻的社會和諧的觀念去解決這些問題，才贏得人們對它的感謝。癱瘓的人，目擊着我們一切的災難和許多未決的重大問題之急切性，只好在驚懼中喘息，「平安是福」乃是停滯的使徒，革命的逼成者。英國需要一個更可靠更有鼓舞性的嚮導，工黨就是供給這種需要的。」

一兩天之後，勞工與國家的縮本，以工黨告國人書的名目發刊給一般的選民。它對於失業問題包括一個三

重的計劃，對於住宅、農業、國際和平、征稅、教育、工業、津貼、地價征稅和別的問題，更把工黨的目的詳爲剖白。它可以說是從那詳細的綱領的許多計劃中精選出來的最初的和直接的一部份。

在倫敦和在他自己的選區開始了競選之後，麥克唐納再出發作第二次的全國遊行。在那個遊行中，他從蘇格蘭北部南下直達布里斯地海峽（Bristol Channel）復北回到諾森伯蘭（Northumbria）。途經各地均大受羣衆熱烈的歡迎。每天他作六次長篇的演說，每次演說，均以失業和平開始。并屢屢重申請絕對多數的要求，使工黨可以單獨地實行它的政策。

五月十五日，在格拉斯哥的聖安德魯堂（St. Andrew's Hall）大會上，麥克唐納答覆鮑爾溫在紐味斯爾發表的批評工黨國有政策的演詞。麥克唐納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更願引我們的家世爲榮。』他更詳細地論及英國及其他各國國有化的歷史。

他繼續說：『我請求你們贊助，我希望工黨能佔多數的席位。假如你們要求我們負起重任（因爲五年來的積聚），較一九二四年還要艱難的重任——你們得要公平待我們。讓我們能夠對你們直接負責，不必與各黨一致行動爲混合政府負責。讓我們能站在直接對選區負責的地位。這樣我們決然接受你們的重負並勉力以求其實現。我深信，在國際問題如此危機四伏的時候，國內問題如此糾纏不清的時候，家庭生活問題如此困難的時候，和家宅、教育、公共生活、工業和平等問題尙待解決的時候，要全國人都得到同等公正的待遇——朋友們，在這種情勢之下，我絕對相信，一個在位而且具有權的工黨政府，必能盡力以安撫人民的心，生活與靈魂。必能盡力以英國



做基礎建立起國際的和平，使我們的影響一天天地膨大起來，以致我們所愛的國家再展開她的步舞，在一切促進善意、和平與國際正義的事情上，為世界各國景仰的可慕的領袖。」

在奧班（Osborne），結束遠程千里的蘇格蘭旅行的地方，他說：『和平的一個根本要素是英國應出來做領導。』

我們光是「步人後塵」是不夠的。卡甚頓勳爵（Lord Curzon）曾說，政府曾訓令他，不可反對任何國家提出的而為別的國家所接受的關於軍縮的建議。假如那就是你們的外交政策，你無寧把外交部的百葉窗關閉起來讓它睡覺之為愈。假如我再任政府的領袖的話，我敢保證決無這樣的訓令給外交部。我的訓令將會是這樣的，「決心罷，你自己決定你的新計劃應該什麼樣，把它弄成聰明實際與公正，使它可以適應於世界的情况。那它到日內瓦去提議，看別的代表明白不明白，和他們談判，你，他們從你的談判中接受你的建議，劃押在公文之上，然後帶着你努力的結果——和平回來。」

自由黨報紙所稱為「擠攘與熱烈的」五月二十四日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大會中，麥克唐納說：

「工黨稅失業問題為其首要的國內政綱。一九二四年它當政的時候，一兩個月之內，它便製定了它的施行綱領。那個綱領。如今（已往亦然）仍為工黨所必需實行的綱領。」

「它包括住宅、田地、排水、電力化、鐵路之重組及其規條之重訂，并根據全國的基礎以調整整個運輸的系統，新路與橋樑之改良，煤業之改組，租地造林與領地相議，補助墮移墾的人民等等，那就是我們的綱領，假如我們不常常拿它來說，乃是因為我們已把它公開刊佈出來，而且我們始終沒有撤回其中任何的一個發言。」

有一位曾經參加過那旅行中的大集會的人，曾記載說：「十字火真的燃燒起來了，只要一望北明翰（Brighton）的大集會之光景，便足以洞察整個選舉的戰場。麥克唐納本人風采奪人。說他已經去過了好幾百里的路程，已經出席過許多集會演說，似乎是不可信的事。尤不可思議者，就是在那一天，他已經出席過十二個集會演說了。他對黨的勞績甚多，尤以這回滿懷希望與鼓舞的旅行爲最。他似乎把昔日驅策社會主義的先鋒們底火焰信念完全集在自己的身上，似乎帶着他們合起來的口才，以向熱烈的羣衆呼籲。」（註）

註：J. S. Middleton in *The New Leader*, June 7th, 1929

麥克唐納最後的競選演說，乃是在五月二十八日自英國播音公司底紐喀斯爾站廣播出去的。他底帶着蘇格蘭口音的氣味底引人共鳴的聲音（或許稍爲疲乏了一點），大概爲最大多的選民所聽到。自來一個政黨領袖從未能辦一個單一的演說收到這樣的效果的。

他說：「我們不相信民貧而國家能够繁榮的。空儲錢袋不僅貧而已，而且更重疊不已地再長出貧窮來。我們自己的背負與肚子仍然最被忽視，而我們的市場却是最有利可圖的。那些相信保護關稅是幫助市場發展的人，最好研究一下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工資還是一樣的低，失業還是一樣的慣常，而貧窮甚至較英國還甚的情形。失業保險並不是一種布施，它正如人壽保險一樣，是陸續繳費才換得來的利益，這些納費必須全數爲保險目的之用，藉以保護人民不受慈善的惡風敗俗之害。我們曾集中這個政策於兩點之內，這兩點足以代表我們的目的。第一便是給予失業者以工作，假如沒有工作便維持他們的生活。」

那些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夜與特拉發加廣場的羣衆站在一起，等候着選舉的第一個結果的人們，將長久不會忘却他們那天的經驗。

第一是「鄂斯福城，保守黨沒有變換。」跟着是「柏立巴特，保守黨，沒有變換。」緊接着的是「大雅矛斯（Great Yar Mouth）自由黨勝過原日的保守黨。」頃刻間，工黨的擁護者們都不禁驚疑起來，是否他們的熱望注定了失敗呢？後來他們才記起，即使最樂觀的人都不敢希冀這些議席的。

他們以片刻的歇聲緩和了那幾分鐘之迂延底緊張的空氣。然後「北沙爾福特（North Salford）工黨獲勝」他們因為知道了工會大會的主席貝替列德（Ben Tillett）爲工黨獲了頭一個的勝利，於是便跟着一陣喧噪的聲音。

即在當時，等候全國各地起落的結果底千萬工黨的擁護者，還不敢把他們的希望提高至與實際的成就一樣。三個沙爾福特的議席都爲工黨奪去——那素日堅牢不動的保守黨衛城北明翰如今也被襲擊了，連保守黨的勞工部長也跌落於失敗之林中，張伯倫爵士只以四十三票「入選。」

兩小時之後，麥克唐納說過的工黨將會「全線的」進步的預言，在字面上完全證實了。北部的工業市邑差不多全爲工黨所勝。那還只是開始而已。在南部也大獲勝利——它把自一九零六年，甚至自政治史開始以來都爲保守黨所盤據的阿克吞（Acton）南翠麥斯密（South Hamersmith）斯文登（Swindon）等地都一舉而全收復了。

當夜終最後結果宣佈之後，工黨在二百議席中，佔了一二二席，「我們租的政府會失敗嗎？」這個問題已全

然被忘却了。那天早晨一時鐘，溫和的政府既歸失敗，現在的問題已變做「工黨能幹嗎？」意思是說，工黨會在新國會中佔得絕對的多數，還是鄉村的選區，會從他們的掌握中，奪去完全與優勢的勝利呢？

很少人以爲後來的結果能表示出工黨佔多數的席位，因爲對抗他們的力量很大，保守黨和自由黨都會盡全力向鄉村的選民宣傳固請強求他們。而大多多的鄉村從工黨消息的傳播這點上說來，還是屬於「落伍的區域。」

翌日整天的局勢都維持在平衡之上，工黨還是保持着領袖的地位，工黨從農業的區域中，也得到不少收穫——例如諾福克 (Norfolk)、諾坦普吞 (Northampton)、林肯州 (Lincolnshire)、甚至威爾斯的鄉間各地。馬肯麥克唐納 (Malcolm Mac Donald) 在巴塞特羅 (Bassetlaw) 一個完全鄉村的議席獲勝。及至最後的結果宣佈之後，尤是在倫敦，工黨已贏得三十四席，九二三年他們最好的收穫也只有二十二席而已。郎卡州 (Lancashire) 的阿本斯干克 (Omskirk) 摩茲力 (Mosley) 後者爲可敬的和普琴孫 (Austin Hopkinson) 底堡壘——均頭一次爲工黨獲勝，而國中八個二議席的地方，工黨竟全佔了七個，第八個（兩個普勒斯吞 (Preston) 議席之一）雖爲自由黨羅維特 (W. A. Jowitt, K. C.) 所勝，可是他一兩天之後却以檢事長的資格參加工黨內閣。

那天工黨在蘇格蘭勝了八個收了一個，北部兩個農業的議席騷厄比 (Swerby) 克利夫蘭 (Cleve Land) 都爲工黨的人所勝。所以工黨勝利的記載，差不多直達至末尾，末尾的最後結果來自威爾斯及北蘇格蘭的。這樣工黨便奪獲了較多數的議席。

證券交易所佈告「停止營業」，說它的會員正在忙着選舉的結果，不暇照顧他們的業務，選舉戰進行的時

候，工業也停頓了。正如得勝黨的領袖麥克唐納說那是黨內全體羣衆底「一個有鼓舞性的片刻。」

雖然工黨只缺十八席失落了絕對多數，可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保守黨懷中素所緊抱的謂「工黨決不能獲得絕對多數」，謂「工黨只能在工業區獲勝，別的地方一無辦法」的信念竟粉碎了。十小時站在路傍靜心閱讀最後報告的羣衆，正在留神英國歷史的新章之產生。

在投票期之前，工黨總部中一位最明敏最有經驗的人，曾小心翼翼地把各選區的前途細加分析，他第一次這樣的結果，工黨大概可以獲得二九一席（增加了人們反對保守黨政府的傾向。）後來當他得到新的登記冊中男女選民的總數的時候再行考查一過重新預料工黨可獲二六七席。

可是最後的結果，工黨却得到二八八席，純獲一二六席，拿一九二三年的數目與這回搖搖欲跌的勝利相比，前者未免大失色，保守黨這回僅獲得二六零席，純失一四零席。自由黨非但不能回復它原目的地位，並它的期望也達不到。他們原希望能獲一二零席，實際上却只獲得十二席，這樣在新的下議院中，它只得五八席，這如此令人失望的結果，一半是因為選舉制度不公平的原故，自由黨要拿九〇、〇〇〇張選票才能獲得一個議席，而保守黨却只需三二、〇〇〇票，工黨則更只需二二、〇〇〇票而已（註）

註：下列是各黨所佔議席的總表和與前屆議會相比較的數目：

## 新議會

## 舊議會

工黨……二八八

一六二

保守黨：二六〇

四〇〇

自由黨：……五八

四六

無所屬的：……九

七

成年男女均有選舉權以後之第一次總選各黨所得的票數如下：

保守黨

八、五九一、〇五二、

工黨

八、三三一、四八〇、

自由黨

五、二五七、五三六、

無所屬的

二六〇、七一、

共產黨

五〇、六一四、

從麥克唐納說來，這次可以算是最大的勝利了。他的政策既為全國人所同意，同時復以二八、七九四的多數票獲總選票中的最高紀錄，當時的報紙，評論他離開亞布拉文選區，轉而就酒成選區之後，他的亞布拉文後繼者，只以九、零三九的多數便勝過自由和保守兩黨的競敵，尤增添總選中不少興味。

總選結果宣佈之後，麥克唐納在酒成港對他的選民演說：

「一切事物都在變遷，我很驕傲地得在變遷中與你們連在一起，視你們為我的選民代表，你們出席下議院，工黨的羣衆，曾經歷過如此鼓舞的片刻嗎？當你們今晨讀選舉結果的數字時，你們便知道工黨所獲，多於保守

黨，倍於自由黨，你會想過你會及身得見這種現象嗎？實在的，我就不會想過，感謝上天我們已把它做成功了。

『但請不要把它誤會了，它不是愉快的，我尤其覺得它不是愉快的。你們已把選舉戰戰完了。可是在我恐怕只是負責任的開始，不過，我必欣欣地把我的責任負起來，我深知到我將得到你們的同情，你們的擁護，在排除萬難中，你們一定做我的後盾。』

工黨的秘書漢德森先生，把選舉的結果，發表了一通給選民們的通告：

『終底工黨已成爲英國最大的政黨了。就議席上說，我們所獲得的稍微超乎我自己任在總選前的暗地估計，當我們想起報界、財界給工黨以如何巨大的反對時，我們所獲得的結果底光榮，尤其顯著。我認爲國人不僅立意予工黨以證明它底統治能力的機會，而且還予它以證明誠意履行諾言的機會。這個信念，如今已爲我們所得的票數證實了，工黨的細密研究的社會改造和工業改造與發展的計劃，無疑地已經支配了國民的幻想，它的根據仲裁與軍縮爲國際和平的基礎底熱誠的呼籲，選民們尤其是婦女們，更予它以驚人的反應。』

當麥克唐納從他的選區回來倫敦的時候，人們聚集皇十字路（*King's Cross*），非常擁擠向勝利者喝采的羣衆，簡直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一時警察和鉄路的官憲，也無法應付洶湧的狂熱的同情者，麥克唐納本人，不知多麼困難才得免于擠傷，來歡迎他的朋友們都被羣衆們衝散了。

當他乘坐的火車，從北部抵埠的時候，最少有一萬二千人歡迎他，逃避簡直不可能，（即便勝利而疲乏的領袖如此希望）讓隨他的人差不多抬起他走，還有些人企圖把他抬至肩上，麥克唐納於是開始說：『很感謝但——』

因爲羣衆又再復逼近他的身邊，致無法繼續下去，就在這樣擠逼的情況之下，他被羣衆擠抬至預候的汽車上去  
了。

每一個歡迎的人，都曉得他們是在歡迎英國的新首相，從選舉結果的數字表面上看來，誰還能懷疑呢？情形  
真是這樣，因爲作了二十四小時的請鮑爾溫在辭職前出席下院提出英皇的演詞，那個無誠意的企圖，雖然據說保  
守黨內開仍予鮑爾溫以擁護，也無人加以嚴重的考慮，同時選民們送去唐寧街十號的賀電，也無可悟會。

六月四日鮑爾溫先生把他的辭呈上呈了英皇，翌日麥克唐納被召之後，也便答允了組府的上諭，這個變換在  
進步份子方面，都帶着愉快的心情，予以祝賀，——甚至包括那些曾因自由黨之失敗而大失望的人。在鮑爾溫意  
欲辭職的消息傳出之後，曼徹斯特報（Manchester Guardian）便說：『如今在英國，我們有了一個急進的政  
府，新的外交政策之新鮮的風氣，將會吹遍全球了』的話。雖然麥克唐納不再企圖兼任外長，而派漢德森負其  
責，人們還是保持那個意見，因爲人們知道關於最高政策的事件『還是麥克唐納決定的』。

六月八日，麥克唐納從英國廣播公司，公播新政府的政策，在那個宣言中，他向國人保證，他的閣員們『必  
立時從事他們被委派的工作』。

他繼續說：『多瑪先生被任爲勞工部長，他將全力調查和解決應付失業底最有效的方法，不僅用救濟的方  
法，而且用全國建設的計劃，我和我的同僚將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我會懷疑，一年內能否把失業的數額，減至常態的地位。但是一切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必全力以最迅速的



手段去做，決不稍惜我們的時間與精力，決避免一切浪費，必施用于建設的錢為發展與補充國家經濟工作之資本」。

關於外交方面，他表示希望于國聯大會下次開會時，能夠到日內瓦，幾天之後，更表示誠懇地希望英國能平靜與活潑地繼續工業恢復與發展的工作。

幾天之後，麥克唐納應有聲影片公司之請，使他能夠對多數人演說，並且為多數人瞻仰，這個在罕普斯忒內閣總理的花園裏由英國「幕帷通」新聞攝取的演詞，曾在英國各地放映，在美國也有一千以上的電影院放映過，這樣使麥克唐納從一個名字成爲一個人格爲無數千萬未聽過他的聲調的人們所領悟與「會面」。

他說：「我很歡喜我已往的工作，博得國人的信任，工黨雖沒有獲得絕對的多數，可是選民們的裁判已非常明白。

「或者在這一片刻，你們中許多人都認爲是勝利的片刻，你們能原諒我如果我追求往日不幸的日子，當我與你們的步伐不一致的時候，（即是逃及戰爭的時候）但，朋友，我確信你們必會相信我，雖然我的步伐與你們的不一致，並且覺得很難過。可是，我的步伐，却與我的良心是一致的。同時，在公共生活上，我尤其希望那個敢胆站在小數方面的人，不會被人輕視，假若我們常常甚至在國難嚴重的時候，都說同一的話，（不論我們相信它不相信它）那末，負着指導政治責任的人底榮譽與正義，便會過着很不好的日子。

「不過總選的結果，使我可以請求你們的同情，你們知道，我不得不負的是什麼重担？我希望，當你們看着

留神着什麼事情在做的時候，你們不會忘記就在這個可憐的人的背上負着那些重担。

『我的事務是爲國家的——國內的及其對外的影響，在國內我們要應付從未應付過的失業問題，這是大多數居住于我們不願居住的情況之下的國民的問題，他們沒有一定的收入，前途也是茫茫的，朋友，更請不要忘記他們的這種情形，不僅是六個月或十二個月的事情，事實上，千千萬萬的這些善良的男女，舉生都將在無變化的單調生活之下過活。

『至於國際情勢方面，（我看得更緊要），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這你們也知道的。近兩天來，使我最愉快不過的，是那些來自世界各方、各宗教、各種族、各文化程度的人民的電報。

『我可以鄭重對你們說，我的意思是要使英國基於其行動之公正，政策之開明，和幫助世界底無私上，在世界中獲得一個地位。我並且希望，當我要放下我的職務之重任的時間來到的時候，國家的地位，較我來的時候更好。

麥克唐納結束說：『我很愉快——險些兒我要說出我會見過你們——我雖未得見你們，但我想像出你們，我愉快和你們相遇，並且有機會和你們說這些話。再會！』

當時新國會於六月尾召集，『新外交政策的鮮風』也已經吹起來了，麥克唐納帶着認識『要事』的天才，曾和美國的新大使多茲將軍（General Doves）在一個連續的會議之開幕中，摒除雙方敵對的專家，善意地把兩國間的顯著問題，尤其是煩雜的海軍軍縮問題，詳加討論，也就爲秋間麥克唐納和胡佛總統之會晤開始了先路。

工黨政府底明顯的良善的意向，立刻引起美國底善意的相應，結果使麥克唐納於七月二十四日在下議院宣佈「詳細考慮過我們的海軍地位之後」，政府決議修改英國海軍建造的程序，暫停兩隻巡洋艦的建造工作，取消潛水艇底軍需船美德斯吞 (Maidstone)，和兩隻潛水艇之建造，並且逐漸減少關於別的海軍建造底造船所工作。

麥克唐納說：「我們和美國關於海軍軍備底整個不同的意見，都已考察過，而兩國政府，對於他們的解決，亦已重新開始過，我們同意均等的原則。同時在不背離均等原則的條件之下，復贊同許可一個有彈性的政策，藉以應付兩國維持國內和平的需要，我們決定不讓技術上的問題，踐踏着解決途中的大的問題，並且一俟本院許我擺脫院中日常的工作時，我擬視這件事為最主要的事務，直達到一個結果而後已。現在，在商談間的主題，乃是訪問美國總統的問題，如今只是先作準備，待訪問真足以增進兩國間熟識的關係，特別足以推進我們共同主張的軍縮和平的目的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實行。」

白宮方面，對於這個姿勢的答覆，不久也來了，同日的下午胡佛總統對於英國政府的決議，表示他的「真正滿意」，並且宣稱美國已經決定延緩中的三艘巡洋艦的建造底進一步的籌劃，這三艘巡洋艦，乃是原定該年為美海軍完成建造的五艦中之三。

每日郵報說：「麥克唐納先生對於實行上不曾畏懼，而其行事的精神復受美國一般的歡迎，其熱誠尤被視為將來更好的事情底根本。」只需四個星期的時間，同時也是在外交方面，麥克唐納便再開始收集那些「政府的功績了。」

這句話是一九二四年時英國的報紙獎勵他的。

當麥克唐納解散軍縮的癥結，和決定他底內閣之立法的程序雙重工作的時候，新外交部長邁德森先生也正從事與蘇聯接近，謀請蘇聯特派一個全權公使，以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並且爲倫敦與莫斯科間外交關係之恢復預爲準備。

隨着蘇聯駐巴黎大使多甫加耳夫斯基先生(M. Dovgalevsky)之倫敦訪問及外交部底談話之後，因爲蘇聯政府堅主以立刻互換大使，爲債款算符，及其他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任何解決底初步談判，遂於八月一日宣告中止，這種進行方法，英國政府因爲一九四二年時的經驗，是不預備接受的。

在別的方面，工黨政府也同樣的決心，謹慎進行，新「失業部長」多瑪先生日夕從事於計劃之密議，接待各種的代表團，更從一個以「不浪費」爲格言的財政部長中拿出錢來，多瑪先生播種之收成，將會由那些如沒有多瑪先生的耕耘他們便仍會「依賴失業救濟金以解決失業的人」去收穫，不過，這些失業救濟的計劃，仍然需要相當時間，才見效果的。關於住宅方面，也是一樣，衛生部長第一件工作，便是取消一九四二年惠特來住宅法下的住宅建築底國家補助率之再行低減，這種低減會由前任保守黨政府宣佈於秋間實行，同時批准了一個果敢的陋巷清除計劃。

在工黨政府未開始它的工作之前，曾決定取消政府指派的貧民救濟委員，他們在保守黨人支配救濟金有作弊嫌疑的某些區域中，代替了選舉出來的救濟委員，工黨政府曾準備在一切救濟委員的職守未移歸縣議會接管之短

期前，在保守黨人有作弊嫌疑的市鎮中，把這些權給回較民主化的選舉的團體。另外的一個決議，乃是定於一九三一年把離學年齡提高為十五歲。加爾文先生 (Mr. Garvin) 認為這個步驟為：「一個救濟失業之歷史的改革，糾正最壞的失業及製造更適宜的工人與公民。」(註)

註：Observer, July 21 st, 1929.

頭四個星期中，在政府方面其地位僅次於內閣總理的是腓力史諾登。他在院內院外都表示出他認識這個國會的命運，甚至十年後他的黨底命運，均以財政部為轉移。金錢及其使用，是古希臘勇士的腳跟，如果工黨不聰明或限制其權力，它將會使工黨倒台。但是這回史諾登的在位期間，不僅認為有提出一次預算案的希望，而且有提出二次預算案的希望，第二次預算案包含工黨政府改正目前財富不均的第一部份提議。從政略和確信二者的教訓上說來，麥克唐納與漢德森在外交和軍縮上贏得的威望，將會被財政部任何驚人的舉動（如今引起自由黨反抗政黨的舉動）所消散，那是未必然的。

時報批評麥克唐納第二次內閣的初期工作說：「關於嘗試中的政府之公正裁判是：雖然駕御得不動人，機器却還沒有出軌。」別的較友誼的批評，則謂歐洲已有一個新的希望。說至不妨一述，總選後不久西班牙社會黨某領袖對作者說的評語——「不列顛是民主的歐洲底基石。當她變成民主的時候，在情形較不好的國家的我們，便可以拿着重新希望以從事我們的工作。當她贊成反動的時候，我們便似乎失去了嚮導的希望。」

政治的戲劇迅速地隨着下議院暑期休會後起來。史諾登先生在該劇中作了主角，其主要的問題且似危及麥克

唐納爲歐洲和平的工作。

事情的起因乃是因爲賠款會議在海牙開會。該會召集目的在批准「楊格」計劃 (Young Plan)，楊格計劃是由美國人主席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草擬出來的。開會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楊格計劃志在代替杜威計劃 (Dawes Scheme)——自一九四二年以後，德國已按照杜威計劃付款——對德國財政上的讓步，和穩定支配賠款之數額與分配的協定，藉以爲英、法、比三國留駐萊茵省 (Rhine land) 的餘軍之撤退開道，並且把因大戰而起的政治問題作最後的清理。

在楊格計劃之下，照常時提議而言，英國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其連續的財政犧牲較之其他各國爲大) 每年將再損失二、四〇〇、〇〇〇鎊，其中大部份乃是爲的要對法意兩國增付款的緣故。祇獲得德國的「無限制的」賠款底微少的部份 (這些「債券」享有一切付款之優先權，六分之五却分配給法國)，而物品之賠款則再繼續十年，亦即加害於英國的重工業，英國當時重工業的失業問題最爲嚴重。

史諾登認這些提議爲「全然不能辯護的」。在大會開幕禮中，史諾登以極堅定的語調說：「關於年金的分配，下議院決不贊同英國利益之再度犧牲。各黨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非常一致。英國各政黨都贊同解除一切國際間之戰債與賠款。這，在巴爾福 (Balfour) 備忘錄中已于允諾，同時工黨在我們未執政以前也已經宣佈過的。但是在賠款交付收受存在一天，戰債存在一天，大不列顛是必力爭公平待遇的。」

光是那篇演說，工黨中道最正統強頭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貿易者，在英國各階級中便獲得了個人的榮譽。這

種令譽或竟使得那個昔日從遙遠的約克州村中紡織者黑暗的家裏，一寸一寸地爲他的信仰而奮鬥以至於擠上下議院政府席的人怔忡不安。

史諾登先生所持的見解較他的舊敵們實在強得多。雖則他們說史諾登之「皈依」愛國主義，那只是猜度的不是真實的。英國曾批准了與法意的戰債協定，那個協定取消了法國對英國債款全部百分之六十，意國對英國債款有百分之八十四。同時在英國與美國的解決案條款之下，英國曾付了美國二萬萬鎊。這一筆款在楊格計劃原定的條款之下，將無所補償。楊格計劃雖使英國從各方進款的收入中（假定德國的「有限制的」賠款完全履行）足敷對美國的未來的付款，但對於她已交付美國的款扣無處抵扣。自然英國決不反對再度的犧牲，如果那些犧牲是必要，而各有關係的國家也取一致的行動。但是英國已行的連續的大量的讓步上着眼，則凡欲以偏法、意而抑英的立場，變換從德國得來的全部賠款之分配，如一九二〇年斯巴會議（Spa Conference）所規定者，英國決不參加。

關於這件事，史諾登先生非常強硬。結果談判停頓了三個星期，雖然停頓期中，有不少提議不怕一再犧牲德國或其他小國以謀應付英國的要求。可是這樣的辦法史諾登先生是不會同意的。隨着大會最後失敗的光景日漸顯露，同時國際間嚴重的反動又復岌岌不可終日，於是國內一些人對於「鐵的財長」便不期而然的起了一種疑惑，以爲他未免有以太大的冒險以維持英國提案絕對勝利之議。

獨立工黨（史諾登先生不久以前退出的）之內，對於此事意見不一。有些是擁護他的，有些是贊同布拉斯頓

特 (H. A. Brailford) 的意見的，贊同布徹斯賴特的人却在斯賴德 (New Leader) 中著論說：

「法國將會得到「無限制的」賠款的大部份，那是真的。不過這樣的說法果完全公正嗎？他們要求的是實質的賠償，實實在在的拿來恢復被戰爭劫掠的區域。我們豈能不承認這類的要求與別的同盟國對德國的要求完全是異樣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際豈不是常常把這點劃分清楚嗎？工黨本身在它自己正式的刊佈中豈不也攻擊英國要求的整個估計底基礎嗎？這個插話尚未了的——此時還可以回復較公正的比例。即使我們所提出的財政上的理由完全無瑕，我們也未窮至爲要每年獲得二百萬鎊的緣故而使歐洲破毀無餘剩。工黨政府假若親自冒這個險，實即自絕其國際的活動而已。」

加爾文先生 (Mr. Gorvin) 在某論文中 (註) 提議麥克唐納應該做「那件光榮而實際的事」，飛赴海牙，以他底中甫的態度和無匹的個人威信防止會議之破裂。他說：「讓我們不可把事情愈弄愈僵，冒爾頭落空的危險——爲微末的錢的要求之失望而拋棄政治的和經濟的目的。」

他繼續說：「內閣總理畢生恐怕再沒有這樣一個機會以爲更好的目的而努力，較之他明天即飛赴海牙了。他可以重申更大的問題，把英國的提案放在不可變的最低度的理智之上。」

註：Observer, August 25<sup>th</sup>, 1929.

可是麥克唐納不僅拒絕這種險的誘惑，反而電賀史諾登先生，謂全國人都願爲他作後盾。

八月二十七日協定成立了。當夜正巧是幾位政治領袖出發赴日內瓦與下週舉行的國聯行政院會議的時候。



協定成立之經過大略如此：法國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十分之八地承認了史諾登先生的要求。除了這個妥協案之外，同時削減少物品賠款的數額；意大利也保證每年銷售英煤一百萬噸以三年為期。英財長這才接受了。

協定成立之翌日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說：『史諾登先生不僅獲得他出發時希望中的勝利的實果，并且恢復了英國在歐洲應得的地位』。

不過財政上的協定——英國可收獲得二，〇〇〇，〇〇〇鎊，與原來的要求只倒差了四〇〇，〇〇〇鎊——還不是在海牙的惟一榮譽。在政治方面外長漢德森先生也達到了同樣的成功：蘇蘭駐兵之撤退也立了一個協定——英軍須于一九二九年耶誕前撤退，法軍則規定『有那麼快就那麼快』，無論怎樣不能逾過一九三〇年六月。這是（和約簽字後十一年）大戰的最後遺痕和它的敵對形勢底消滅——也就是麥克唐納和胡佛總統間快要舉行的軍縮談判底佳兆。（當時人們都希望麥胡二氏間的軍縮談判，能擬出一個為各海軍國所接納的軍縮計劃，以為世界關係新章的第一頁。）曼徹斯特導報的通訊員，批評海牙協定中的政治方面說：『工黨的人和自由黨的人最感愉快的還是大會中政治方面的結果。大會中熱烈的空氣，顯示出各國對於戰事清理上有一個新的開始。自由黨兼工黨的人所持的對德法平等待遇的英國外交政策，如今可以開始達到它的目的了。同時如果萊茵法軍能更早的撤退，使協定能完整無缺，如德人所要求者，則更足以加重政治方面的信用。此外，工黨方面對於意大利允許銷用英煤也是覺得非常滿意的一件事。工黨政府的未來將被判於它的失業數字上這是不消說的，而意大利每年允銷英煤一百萬噸，也就是多鐸先生一個不勞而獲的小幫助。』

幾天之後，麥克唐納批評大會最後的成功說：

「姑不論談判進行期中，人民的感覺怎樣，無疑地，它的結果對歐洲是有利的，對國聯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凡是為和平做基礎的談判與協定，必需包含客觀的公正的要素。」

「英國政府和史諾登先生所以不辭在大會中力爭者，也就是為的要使協定中包含那種公正的要素。我們將開始的國際間的討論，也決不玩弄玄虛互為欺騙，祇是誠懇懇懇地去磋商，使達到的協定能為一切相關的人所接受。」

為着這些重大的事件在政治舞台上演得出神的時候，挨爾根（*Earl*）地方同時舉行了一個莊重的儀式，那個儀式必然酬償了麥克唐納之辛勞；挨爾根市授予「祿錫之張」以該市的市民權。（譯註）「祿錫之張」是在離該市不及五里的地方的一間茅舍裏出生的。

譯註：英國城市昔日常以市民權授予非市民或非居留者，藉表對其人為公共服務之敬意。

本來愛丁堡和加勒斯哥早已授了市民權給他，可是他的鄉人對他真正認識更是一切中最可寶貴的。因為他們認取了朝服之下的真實而向他致敬了。

市民權授予完畢之後，麥克唐納致詞，述及昔日「慈愛的回憶和那些不得不忍受的寂寞」。他比自己比擬「歸巢之燕」，說：「我返馬累州遊遊於花卉之間以休養我的精神。時而在隆冬，則荒山怒海與狂風，盡成我心中的花卉，時而在炎夏，黃雀從金雀花底或金雀花底華麗的黃金的灣曲中歌唱時，則馬累州直是我的花園。」

「時而在秋涼，農田半茂似黃金，山色輝煌似帝袍，則馬累州直是我的家園。」

麥克唐納繼言：「我深覺終局來時，晚露開始降落時人們才可以回望說聲好，如其有從頭再開始的機會也將不顯更張。惟有將虔敬與理想融和，我們才可以在目前過着合乎我們希望的生活。」

多茲也是參與盛會中之一人，在他留駐倫敦的頭幾個星期中他已很認識麥克唐納，并且以善意與麥克唐納合作以謀軍縮問題之解決。多茲在儀式舉行後提議向普羅勿斯特助爵致謝，他述及「海軍談話的進步和幾天來寬唐納發表的那種謹慎的談話。」

多茲說：「前星期二，麥克唐納關於這些海軍問題的性質發表了一個談話，他說已有一個很顯著的進步。然而不久我在報上看見一段評論，說麥克唐納的話乃是表示他無進步的事實可以報告。我想，我們應該記着海軍商談的進步，雖或未達至可供給報上討論的時期，然在此種情況之下，它是仍可以有很好的進步的。」

「目前雙方同意的為常識與公正所易了解的事，問題簡化的一部份，乃是向前進的重要一步。我們須知道對於擬議中的海軍會議有充分的準備乃是目前最不可救的事。」

八月三十一日麥克唐納離倫敦以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聯第十屆大會。他在大會上為世界和平致力第二步的工作，同時也是第二次以英國首席代表的資格對世界說話。

起程前他向新聞記者發表關於英美兩國軍縮商談的情形，他說：「我們決心要達到一個協定」，復說：「目前除此而外無可奉告，但是假如小雞不適當孵出，則我將會是世界上最驚愕的人。」

翌日加爾文先生說：

「前星期是工黨政府一個嚴重的星期，不過下幾個星期將更為嚴重。不僅工黨政府如此，美洲歐洲乃至世界無不如此。昨天美國報紙所揭載的公布，把一切別的事情都遮蓋了。（註一）雖然最後的細目尚未詳及，但英美間軍縮商談之必有好果，已屬毫無疑義。一般國民要能把握得着這事件的性質和計畫這件事的重要必需一個相當的時間。在我們方面，則很可自信地說這是世界上的一件最大和最好的事。（註二）」

註一：當時美國報章把海軍限制協定底大概條款概列出來。

註二：Observer, September 1st, 1929.

當時的預兆對於新政府很是有利。「新鮮的空氣」已經波動到世界各國的總長身上。同時麥克唐納之在唐寧街十號，則更是偉大的和平工作將必繼續的明證。

此外尚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待解決。軍縮問題，埃及問題，印度問題，失業問題等——這些問題中之任何一個均足以引起困難的。不幸隨着工黨將臨政的時候，蘭開夏的棉業又剛好同時發生停業，而羊毛與煤業又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我們可以說這些工業糾紛如由工黨政府去應付自較任何政府來得適宜。因為工黨對於工業問題和勞働者的本身之了解，均為資本主義的政黨所望塵不及。

前數年中工黨屢在國會中爭辯的「缺乏」，執政之後絲毫沒有把它忘却，這可以從七月二十四日麥克唐納的談話中看出來。他說，十月二十九日下議院開會的時候，第一件事便是要二讀寡婦津貼法案。在那個政策中，我

們只看到工黨的希望底一小片斷，可是這小片斷已足克勝負窮，同時疾病，缺乏也可以填補了。

不論未來怎樣，工黨底驚人的發展乃是麥克唐納畢生工作的真紀念碑。從下表工黨參加的九次競選的結果上看來，便可以知道工黨的發展是如何地顯著：

| 年份        | 所得的選票     | 入選的議員 |
|-----------|-----------|-------|
| 一九〇〇      | 六二、六九八    | 二     |
| 一九〇六      | 三二三、一九五   | 二九    |
| 一九一〇(一月)  | 五〇五、六九〇   | 四〇    |
| 一九一〇(十二月) | 三七〇、八〇二   | 四二    |
| 一九一八      | 二、二四四、九四五 | 五七    |
| 一九二二      | 四、二三六、七三三 | 一四二   |
| 一九二三      | 四、三四八、三七九 | 一九一   |
| 一九二四      | 五、四八七、六二〇 | 一五一   |
| 一九二九      | 八、三一三、五〇四 | 二八八   |

那種發展將仍繼續嗎？如果預言不先解答了另一個問題——「自由主義將仍生存嗎？」則那種預言是不會完全的。自由黨如果消滅或者部份的消滅，則餘下的二大政黨便可以大大地把選票重新分配。這樣或者暫時地工黨在

佔得小數選票的選區便受了牽制，不過這樣說法還是需要保留的，因為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確說，自由主義消滅之後只有保守黨能在北英格蘭增加勢力，而工黨無與。目前政治上最大的謬誤，便是以為自由黨消滅以後昔日該黨所有的選票，在許多選區中都會加增到保守黨方面。

一九二九年總選前夜，一位保守黨的作者說：「按我的意見，工黨已經過了它的頂點了。」關於這種批評的答覆，凡是熟識工黨的歷史，或者知道它在各選區的力量的人，總是不相信的。工黨在麥克唐納領導之下，必將繼續吸引英國大部份的選民，這種說法更為可靠。

在一九二九年的總選中，麥克唐納要求一千萬張選票。結果他差不多得到八百五十萬。在下次的總選中，無論它什麼時候舉行，一千萬票或許是可以達到了。雖然英國的選舉方法有了改革（選舉改革是阿爾茲窩忒子爵（Viscount Alswater）主持下的選舉調查會詳商的結果），或者保守與自由兩黨間有了若何的協定，工黨的力量仍需待下次總選時才得奏成功。

就算假設那種發展罷，可是工黨還是團結為一整體呢，還是會因那些已經顯然的黨中的派別底互相傾軋的鬥爭而消耗了它的精力呢？

這個問題我們目前尚未能完全解答。但是真正破壞黨的團結的力量，將會隨着工黨絕對統治英國政府之後迅速地起來，這是大概可信的。

工黨最大的危機，不在過去，而在它全權當政之日。因為到那個時候，黨內各別的小組織，必都拿着它各自

對社會病態的高靈藥，要求依循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去立法。那時，麥克唐納或者他的後繼者，必需運用外交的手段，和慎密的思想，以求避免黨內的「分裂」。獨立工黨的主席 James Maxton 隨着總選成功後，在格拉斯哥舉行的祝捷會上底演詞中，已先預言出意見與方法的分歧——並且及于執政者的手段——這是在工黨入中自己發表的話。他說：

『我希望我們將不畏怯地去從事統治英國的工作，以遠見與決心以解決一切重大的問題，鎮壓一切反對我們的力量。如今機會已許我們立刻去廢除貧窮。大部份選舉我的人，四年來已經沒有適當的飲食了，他們都住在許多人同居的房子裏面，一個星期都沒有兩鎊的收入。那種現象必需停止，必需立時停止。統治階級決不應該穿着破衣的。』

從那個演詞的語調看來，人們是不會以為第二次工黨政府還是要依賴於自由黨或保守黨的擁護，才能通過它的政策的。將來陷工黨的勢力於危險的，恐怕也就是這類暴富的感情。（註）

註：一九二九年四月 Mr. Maxton 在獨立工黨暑期學校演說，更進一步說：『在工黨執政的兩個月間曾有任何人得到它的好處嗎？除了兩個謀殺者得受緩刑的利益而外，我想不到任何人了。』人們問他假如那兩個月間讓牠來任內閣總理，他怎樣做，他回答說，他會使失業者有足够的津貼；允許托洛斯基來英國，立刻承認蘇聯；依照住宅補助金原來的計劃重行住宅補助金；並且提高在學的年齡，使它可在他的任內即見大效。而政府怎樣呢？它連在小數地位仍可能做的，都還沒有做』。

在最近的將來，還有一個可能的危機，那就是麥克唐納自己對自由黨的態度。「究竟效勞自由黨或保守黨，已經成了一個問題，」這個意見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常的，暫且勿論它——但目前政治思想的趨勢，却以為那個意見是對的，而回復兩黨制，也許不會再久延了。這大部份須視乎這回國會對於選舉改革的意見，和下次總選時自由黨的命運。一九二九年總選時，擁護自由黨的五百五十萬票或許仍會繼續擁護保守黨的或工黨的政綱，而擁護「中庸」的自由主義。不過，自由黨中許多有力的人物已在向左傾，或向右傾的例證，如今是愈來愈多了。威廉昭維特爵士(Sir William Javitt)的談話，並不是人們頭一次說的，也不是最後一次說的。工黨從自由黨羣衆中添補力量，是極有希望的。

雖然，自由黨之消滅底猜想，它底本身實在是一個政治的「賭博」。其賭博性正如近來歷次總選時三黨同時競選的賭博一樣地大，不論自由主義之成爲一個政黨底命運如何，我們必須承認近年來我們所行的選舉制度實在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否認民主主義。也許將來的歷史家，反觀我們的這個時代，知道了一九二九年時，要九萬張選票才選得出一個自由黨的議員，而二萬二千張選票便可以選得出一個工黨議員之後，他們必定說那個「賭博」堅持得太久了。

無論如何，工黨是以絕對獨立自負的，是避免與任何非社會主義的團體聯盟的——不管那個團體對於它底大部份的如何地同情——這似乎是不容易的了。這個決定也許是聰明的，因為英國的選民既不歡喜聯立政府，也不歡迎黨與黨間爲任何契合。假如工黨企圖與自由黨作任何「協作的協定」，則工黨之所失恐怕還會多於它的



收獲。工黨中一些最有經驗的人都持這類的意見。

麥克唐納宣稱，自由主義和非國教派中的最好的東西，都已經由他的黨接收了，假如這是真的話，那末，我們也許可以期望工黨犧牲着自由主義，自己一步一步地強健起來，直至結果「一九〇〇年的水獺反而把鯨吞了。自由主義這樣的衰微，如其結果足以使工黨的基礎大量地擴張，加強了它的羣衆，那末，在進步的英國這個觀點看起來，這大概是一件最好不過的事情。但是縱不願某些隨着來的徵候，不願自由黨中上級人物底幕後的沮喪，我們仍無法確說大羣因襲的自由黨份子，就能在有訓練的社會主義的羣衆中得到滿意。假如人們能够解答這個問題，那末，也就會易於預測工黨最近的前途。

## 第十三章 麥克唐納與大不列顛帝國

麥克唐納對於親麥教授 (Professor Zimmern) 稱爲「第三不列顛帝國」的態度，可以用幾句話表明出來，那就是他很熱望促成第四個階段，那時人們再不聽見「帝國」一字，同時地圖上紅色地方的統治權，也將盡可能地歸各該地的居民去運用。在自治能力尚未有端倪的地方，例如非洲的各殖民地，其統治權則由英國視作一種正式的委任，代表土民行使之。

要概述麥克唐納在一九〇七年註釋的工黨早期對於帝國發展的觀念，及他現在委身從事的政策，我們必須把在不列顛旗幟下的各領土底將來，和各土著的區域底將來作分別的研究。對前者的正確態度是容易闡明的，那就是只要在大不列顛聯邦帝國內保持「同等的權利義務」的理想。繁雜的問題却在未開化的人民和委托管理的區域，因爲他們的種族、宗教、血統、工業、康健與教育等問題均待解決。麥克唐納怎樣去應付它們呢？他拿一個什麼樣的模型去配嵌這不同的材料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拿你的主義來決定，你的主義將會引你的前路」，限於殖民地方面，麥克唐納自入下議院後即堅持不改的主張是：我們與落後的民族底一切關係中，我們的目的在保持他們的社會生活中良好的部份，不使全國以任何預想的模型去改變他們。尤其要緊的是，以居民的利益去管治他們的土地，不必期其與英國的任何需要相符。就目前來說，不必期其與大不列顛的商業和國家的需要相符。總之，

工黨對於英國海外屬地的問題底格言是信托，不是帝國。

這種帝國責任的觀念，今日大概已為多數進步的人所接受。甚至張伯倫派最愛用的「殖民地」一字，自一九〇六年起也不復被採用，確切的結束了「帝國主義者」政策的時期。

這種見地的改變——對於不列顛各民族之將來，不論為好為壞——麥克唐納都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原已立在一個民主的見地之上，不知有所謂國境的麥克唐納，因為一九〇六年入了國會之後，遍遊帝國各地的結果，對於民主觀念的提倡遂愈加緊而顯明。工黨對於與大不列顛海外僑民有關係的事情必須有權威地去主張，這是麥克唐納自始便決定了的；他最明白偏狹的見地對於全國性的政黨的危險。

一九〇六年秋天，當他第一次作帝國旅行的時候，他就遊歷了澳洲。加拿大與南非洲他早已遊歷過了。一九〇九年印度之漫遊以後，他對於印度底知識及其所由成的印度覺醒一書，均極豐富廣博，愛爾芬見之，翌年遂指派他担任政府印度文官職務調查的重要工作。

在一九〇六年舉行的工黨大會上，麥克唐納贊成：「工黨既必將為帝國立法，工黨的人們便應該知道帝國的需要」，他並指出那些擬與他同赴澳洲及其附近諸島的工黨議員：「只是為的要偷閒，同時以為殖民地是最宜於此道而已」。

「我們此行將會親歷那些正在實施工業上極有興味的試驗的地方。人們故作危言，說整個殖民地的勢力都將會反對勞工運動。因此我們要親自的和殖民地交接，使在自由貿易或者別的問題上，殖民地不致於與工黨作對」

澳洲旅行回來之後，麥克唐納寫了一本書，概述工黨的帝國政策。這本書表示出他當時的見解。（註）

注：Labour and the Empire, George unwin, 1907.

他說『社會主義是下次的世界運動』，並在下錄的一段中概述出他的帝國綱領：

『既是歷史的，工黨不與歷史的事實相爭辯，它以解釋歷史的事實為滿足，對於造成歷史的人們，它也只按其分而加以毀譽；可是當歷史的事實一旦過了同時代的變遷底階段時，當政治體系與思想體系一旦與事實相應時，它也不再算舊賬了。圖論工黨之不再願論及斯圖亞特應否復位及不再願爭辯我們應否毀碎帝國兩問題原無二致，可是對於帝國問題，它却一面以勤勞階級底得利為南針，一面以其本質的國際主義為南針。假如它以種族之光榮而自驕，它同時知道別的民族一樣也可以自驕。因此它的帝國主義不是侵略的，也不是矜誇的，它不相信征服別的民族的道理；也不自誇「別」族的政治。對於屬族它願以朋友的位置自處；對於自治地，它求其平等；對於世界它要求得被視為隣人』。

關於自治領土方面，麥克唐納說：

『我們期望的統一不是強求的。它必須是一種已存的願望底表示，如像限制的立法權果要成功必須不是一種羈絆，而是更廣大的自由的政策那樣。它必須從內而來，不是從外而來。那我們如今執行了。關於那一點，我們的女國無需再與我們爭辯。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洲，與英國同量地有獨立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假如他們仍奮願在帝國之內，那是他們自由的意思並且是因為有些理由足以感動他們之故；假如他們接受帝國的軌範並承

認其責任，且以英國為盟主的國家地位要求種種的權利，也還是他們自由的意志。當我們在海外的人民接受這些約束時，則對帝國的考慮底開端的困難便將會隨之而克服了。

「從這個方面以和緩殖民地底自然而然的疑惑，沒有任何一黨有較工黨更大的機會。其間雖因地理上與工業上的不同致異其國策，然在精神上，帝國內的各工黨原屬一體，他們的代表均受其餘的各工黨以兄弟的敬意所接待。在澳洲的各邦中，工黨不是在朝便一定是依法的反對黨，同時工黨的範圍長足地擴大，並且逐漸意識到它對世界政治必須負的責任，這種事實的重要性在那些（張伯倫似乎是這樣想的）依然以為帝國對於帝國關係最後要說的話是：「在我們以為你是錯的時候，你多所置喙，自非所能容忍，可是在我們以為你是對的時候，那還是同樣不能容忍的」的人底目光中是完全看不見的。這種言詞與思想，在我們工黨中人視之殆屬陳腐。其所描畫的形勢，在我們的腦海中更無蹤跡。置喙成罪尤非我們所適用。我們念念不忘者是公議。帝國的軌範不是由唐寧街去決定的，乃是由各自治邦負起帝國的責任去決定的。不是「你」——祖國——置喙的，乃是「我們」——帝國聯邦——決定的。可是就目前來說，除了工黨以外，國內和殖民地之間的各政治組織都無充分的利害相同，以為培養新信仰的準備。我覺得帝國內的各工黨間友誼的協作，對於帝國真正的統一却是重要的第一步，雖然工黨的責任尚不止此」。

關於帝國內部發展的另一方面，即是在不列顛旗幟下的土人那方面，麥克唐納以例「較發達的種族無權要求與熱帶交換品物」的擬議。他說「世界是全體人類的遺產。各部落與各民族均無權貶抑世界任何的一部份，同時

也無權分離他們，好像他們已經撤退到月宮那樣」。

「但是溫帶居民之享用熱帶產品的權利決不隨及熱帶民族受人的看待的最高權利。在熱帶從事經濟的開拓的白人民族是担承爲土人負責任的，如何去完成那個責任乃是屬領政府問題的核心。然而這個責任除掉視之爲經濟開拓的結果之外，尚可從另一個較有價值的觀點去觀察。一個社會很可以說它有一個受託的責任，要把它的文明底牽繩傳遞世界。道德原有一種宇宙的動向，較發達的民族對於低落的民族所以處于一個似乎護衛與教師的地位，也是因爲道德底絕對權的原故。

「那就是（帝國對於不列顛旗幟下的土人——譯者）底理論」，麥克唐納說。在實行方面又如何呢？這裏他發覺不列顛當時對土人的政策——一個以派送開墾者代替派送教育的與道德的人員幫助落後民族發展的政策。「他們開始便把土人的文明從根剷除，把這些文明底經濟表現破壞（例如部落土地），強使土人的頭腦嵌進不適宜的永遠也不能適宜的新的習慣中」。

麥克唐納對於英國殖民部人員底熱誠和無私的工作是稱揚的；然而却不能贊頌其結果。「在某些場合，帶着無面目的殘酷，我們殺害了他的（土人的）身體；在別的地方，帶着非常高傲的存心，我們殺害了他的靈魂。」  
「殖民部最顯著的過失之一，在它于嘗試土人政治中，沒有自覺的關係。在那嘗試中，我們對於研究土人生活的情形原有最大的機會，但我們對於這些機會的利用却未盡其利」。

麥克唐納底補救的意見概述如下：

「在土人政策中，我們根本的錯誤在於視土人爲製造中的英國人。當急進派的人假定我們對於土人管理結束之日，必須是他們自治之時，也不免陷入同樣的錯誤。我們各屬領政府的目的，該是土人們自己團體的發達，不該是我們民族生命底目標之強行。例如在某些場合，屬領政府底目的該應謀會長統治之重建，在別些場合，或者應該謀某種半民自治，使人民有部份的選舉權或有選舉部份的統治者的半民自治之恢復。總之，在一切の場合中，土人應該被保護着不受白人的資本主義的摧殘的開拓；我們與其鼓勵白人去破壞他們的部落的經濟制度無寧加以防阻；他們的道傳的法律上的行政方法，不應該拿我們的他們所不會尊重的甚且不懂的去篡替；連他們的犯罪的條目也不應該弄成和我們的一樣，因爲他們不會明白我們善惡的觀念。最後，我們愈少干涉土人的管理愈好。我們需要居留民較需要總督爲多。」

「這樣的一種改變對於國內自治的繼續實是重要。因爲一天我們視土人爲我們必須統治的人，我們便得一天企圖在國內實行民治在國外實行專制，這是顯然不可能的。結果我們自己的各民治制度也將歸崩潰，民治制度的擁護者因爲屬領統治的專制也痛心無已。『自由的民族決不能統治屬地的』。」

要完成這可以被視爲工黨第一個帝國政策的概述，必須旁及我們印度帝國底多種的與繁複的問題。

這些問題麥克唐納會即地加以研究（這我們已經說過了），當他初入下議院時，他業已成爲這些問題的專家了。因第這些問題所包括者極其複雜，所以把他對於這件曾經深長研究過的事情底見地作任何摘要，決不會公允。然而，從印度的覺醒書中某兩段內，我們也可以把他達到的結論底形跡找出來。印度之覺醒一書，凡對於工黨

這方面的政策有興味的人都宜研究。

「因此就大體上說來，我視印度之將來是屬於民族主義的。印度決不會忽然的起來。假如我們是聰明的話，那末印度以癡迷來威脅我們之期既尙如是遙遠，則我們實無掛懷之必要。惟在這個關係上，有一考慮却不能遺忘。際茲頭腦最清醒與最熱心的人，每論及印度時，均謂其政治的自由將首從地方自治中獲得之時；此種考慮尤覺必要。那就是：各地人物品類如是不齊，印度忘此而行自治，其損失必大。那也是刻道 Chinn 爵士許多重大謬誤的又一個。他念念不忘於中央集權；而印度之真正需要却是地方分權以表現其各自之特色。我們政府底一般綱領，如能稍放任一點都是好的。一方各地設負責的政府，一方各地聯盟以成印度政府——這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印度自成之道——事實上她已在如是自成」。

印度之受托於不列顛，麥克唐納認為是印度本身最好最聰明的道路，且看下錄的一段：

「不列顛是印度的保姆。印度而為她的護衛者所棄，其必為她自國內的割據分子的犧牲及為她熱誠有餘的崇拜者底犧牲將毫無二致，再不必說外來的人寇了。印度而為她的護衛者所迫，則必會成爲一個無窮的憤激與困惱。印度而為她的護衛者所顧，並且給以廣大的自由去管理她一切的內政，她也許會呈現出許多困難和造出許多恐慌，然而，那却是繼續和平與完成我們在印度的工作底唯一方法」。

這些對於帝國問題底早期觀念與工黨第一屆政府底政策，和麥克唐納近年表示的意見相較究屬如何呢？工黨對於不列顛海外各民族「不關懷」的老話，甚至謂工黨對於不列顛海外各民族判然不相容的老話是真的嗎？



罕塞德 (Hansard) 報的記載，指示出麥克唐納乃是預示帝國會議之需要底最早的政治家之一；帝國會議如今是按時舉行以交換一切對於不列顛聯邦各自治民族有共同關係的事情底意見的。早至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工黨的領袖在下議院便已宣稱說：

「終竟我們相信不列顛的國旗，不列顛的歷史，不列顛的傳統和不列顛的政策，多少總表示出各領土都該如我們一樣的使他們自己均成爲管理者，因之對於不屬地方而有關於整個帝國（無論帝國存在何處）的事情底公允與適當的批評，他們必須容忍我們如我們之必容忍他們一樣。」

於是，一九二四年帝國日，大不列顛工黨首任首相便從祖國把善意的好音分致海外各地，其觀念和情緒之高尙爲英國語文所從未有：

「我們曾以最大的快樂與痛切的關心傾聽聯邦各總理底問候，於此我們也從故鄉遣以我們的感謝與敬禮。母樹壯旺如昔高尙努力底樹液仍脹滿枝間。在過去的世代中，我們屢冒險以航行，如今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制度，我們的遺傳和我們的方法已遍環宇，然而我們底航行的日子却仍來了。因爲圍繞我們的未開發的精神與理想的世界，較我們的航海家之視此世遠爲廣大，以此祖國爲中心的聯邦仍然踴躍着以豪俠剛勇的依利薩伯時代的 (Elizabethan) 精神出發尋求自由公允與和平的呼號。」

一旦工黨的首相能把帝國的理想以如此崇高的觀念表示出來而以新穎的思想鼓舞其開拓者時，人們便無需事與麥克唐納同意，始覺得保守黨人談論間一若惟他們才是帝國的偉大底保管者之爲不智。

在第一次工黨政府底短期內，麥克唐納先生及其同僚均努力使自治領土和祖國有更密切的關係，他在帝國議會（Empire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演說中宣稱：『我們要知道互相間的問題，它們是頗不相同的。遺傳上，地位上，環境上均不相同，然而當人們到澳洲、紐西蘭、或者加拿大的時候，總覺得有一種由灌輸得來的傾心，除掉我們個人間均以最純美的心志密切連接而外，我們必有分離之虞，誤會也隨之而叢生，其實不同的角度正好用來去研究同一的問題。』

他繼續說：『所以，假如帝國的民治政府及領土政府要互保協調的連接，惟藉個人問題連接，往來觀光的事實和消息之刊佈始可以有成。而這些事情除掉帝國議會協會而外，更無別會可以担任。甚願協會前途發達以從事它的工作，在我們能團結的惟一路上把我們結合起來；在帝國的維繫中齊集於偉大尊榮的祖國。』

要詳究麥克唐納對於不列顛帝國今日的問題底意見，我們必須轉頭看看工黨正式的綱領，這個綱領可以說表顯他的意見的。

『分步進行以保證大不列顛、印度、和各自治領土底僑民及構成不列顛帝國底別的份子間之政治的經濟的更密切的關係，這是工黨的政策。它相信印度人民自治和自決的權利，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是一個與他們不斷的合作，以期於最早可給的期間內並且得到她的同意，使印度成爲一個與不列顛帝國底別的份子同等地位的夥伴的政策。』

一段復一段地主張不列顛與領土各政府間更密切的個人連接之後，縱覽帝國的土地資源之後，並謂『移住與

各種訓練的計劃是工黨政策的一部份』之後，那個工黨的綱領更進而闡明工黨對於土人問題的意見，字裏行間隱含麥克唐納先生二十年前的意見：

『工黨對於資本家在不列顛帝國屬下的熱帶和亞熱帶底某些部份從事開拓所產生出來底慘慘的罪惡，視為非常重要。它主張各土著種族的幸福，經濟的繁榮，教化與文明的進步必須為殖民地底主要對象，嚴格地置其他一切利益於其下。凡進行此義的地方，在一個較短的期間內，土人們便能達到足以決然地反證他們無能為社會的進步之說底種種成積，工黨視之異常滿意。同樣進步底最大可能的機會也將會充份地遍於一切凡屬大不列顛負責的政府的地域，這是可以斷言的。』

『工黨政府對於以暗地損害居民的獨立及其社會制度和道德結果損及他們乃至於歐洲的勞動階級的各種方法，謀加速落後地域底經濟發展的政策是不妥協的。它將盡力之所及保護他們在本地職業和快樂，絕對防止強制勞動（不論出之任何形式），確保本土工人能與歐洲的雇主自願地訂立契約，不受任何的脅迫，這種契約須由公共機關批准。其內容並須包括為工人們謀生活與快樂的正常環境底條件。』

遊巴力斯坦 (Palestine) 之後，關於『受托』問題之另一方面，他說：

『我們自己的政策是顯明的。暗地裏我們應自視為朋友，嚴防罪行，用積極的命令無寧用消極的命令，常與人民本身合作開辦有利的事情，並須視此種努力為私人的與自然的過於視之為政府的，對於愈來愈應自治的政府，尤不應『越俎代庖』。不列顛的官員應減至最低限度，並以顧問自視。……我們前路的兩大阻礙是：第一以

純粹軍事頭腦從事工作的官員，他們腦中的不列顛帝國，祇是一面英吉利人統治着各隸屬的民族的事情，他們的實效觀念除英吉利而外別無所有。這種人過分統治並且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第二種人是謀商業利益的人，他以為他的商店就是帝國，他的利潤必須由不列顛的官員，軍士與警察施行不列顛的政治統治去保證。政治他懵然不知也不理會——除掉當他把他自己的經濟的物質的利益與好政府相混的時候」。 (註)

(註) Farward, March 18th, 1922.

在上述的提要中，我們看得見麥克唐納于一九〇七年發表的意見底自然的發展。然後他寫着：「在熱帶從事經濟的開拓底白色民族是担承爲土人負責任的」，和「這個責任除掉視之爲經濟開拓的結果而外，尙可從另一個較有價值的觀點去觀察」。這兩句話，如今昔日承認的責任已經履行了（上節所述之解釋復詳言土人的權利，爲任何諒諸英國選民的政策底說明所不及）。這裏，我們復次見得到麥克唐納的忍耐；看得見他「時間助我們」的意見底證據，因爲如今承認工黨對於土著種族的政策爲公正的人，遠較他最初以「護衛者與教師」的地位（不是經濟的大君主）爲不列顛殖民政策的首要原則時爲多。

人們也可以說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要實驗的不是他對帝國的信仰或者他對帝國所說的話，而是他所行的事。一個曾經獻給「小英吉利」，以其著作的人，人們能信託他去處理，由于我們對廣大的領域及落後種族底受托統治所發生的許多複雜問題嗎？

一九二四年工黨第一次執政期內，便解答了上述的問題，雖則那十月間帝國的事情比較平靜，然而却發生了

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是特意選擇來試驗麥克唐納的工黨之關心于不列顛帝國與別黨無異的話底真實性的。於此我們引論及我們與埃及的關係，及其以自己的利益去管治蘇丹的要求。這兒本來是任何反對神聖的代管責任的人將蘇丹委諸昔日虐待過他們的人的機會。在這個微妙的環境中，麥克唐納的態度怎樣呢？

他辭職之後不久（註）在托爾波特港演說，他提醒他的聽衆說：蘇丹自一八九九年以來便由不列顛與埃及聯合管治的。

（註）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他說：「埃及說：『你們和我們將合而治蘇丹』，但是當我當政的時候，我覺着埃及不惟不幫助我在蘇丹的工作，反而故意予以防礙。每個埃及的官員都趨于成爲一個破壞蘇丹的法律與行政的宣傳中心。如今那種情形決不能繼續了」。

他繼續將蘇丹的行政，譬比爲聯合委任，說大不列顛絕對不能同意埃及以蘇丹爲自己的財產的態度待蘇丹，因爲蘇丹並不是它的財產，如其埃及不願繼續聯合委任，我們遲早將對她說：「如你真不能幫助我們，你走罷！」

麥克唐納繼續論及工黨對帝國問題的態度：「我希望大英帝國將整個情形報告國聯，并要求予我們以委任統治權，我們將繼續負責蘇丹的統治，祇有這個方法，才能證明我們的地位。由國聯委任統治，將會使這個國家與列國相安。」

也許有人提出反對寧渡任何責任給黨聯。關於這個問題，各方的意見不同。但工黨取堅決反對埃及民族主義者底誇張的要求的立場，把那種說工黨與帝國的敵人有關聯的話，打了幾個折扣。最近給予埃及人民的新建議，（包括對埃及的民族主義新的讓步），考察之後，也是與那個意見相同的。

還有兩個其他的帝國問題，在近時政治的事件中，頗佔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也得提及：其一是在帝國特惠權中表現的財政問題，其一是移民問題。

麥克唐納爲自由貿易奮鬥的熱誠，並不下于爲隨巷掃除或宣傳社會主義。在一九二三年選舉運動中，他說問題並不是「保護政策對抗自由貿易」，而是「保護政策對抗工黨的政策」。以其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而論，麥克唐納是自由貿易者，而工黨是主張自由貿易的黨。不管保守黨如何虔敬地希望工黨將有一日轉趨于關稅政策，但我們可以安穩地說，祇要工黨保持它現在的思想一天，祇要史諾登仍然是財政大臣的被提名者一天，保護政策決不會爲工黨政綱的特色。

麥克唐納站在帝國的觀點上，反對任何以經濟政策加強母國與不列顛姊妹國的連繫底企圖，認爲那是破壞它底真實道德上與精神上的基礎的。

一九二六年從錫蘭訪問回來接見記者時，他括述對於帝國特惠權的意見：

「當我們與從殖民領地來的朋友談話，我們便立刻明白帝國特惠權之不能永遠保證我們貨物的銷場。澳大利亞及帝國的其他部份，都開始以爲保護政策是好的政策，他們將以種種可能的方法，在保護關稅壁壘之後，增加

他們自己的生產，這是自然的，而且是正常的趨勢。如果澳大利亞的製造家，希望拒絕我們，他們的關稅壁壘便可以提高至足以抵賴我們的地位。某次我參與一位約克舍（Yorkshire）製造家與一位澳大利亞製造家的討論，幾分鐘的時間內，便把那種情形顯露出來。」（註）

註：曼徹斯特週報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

麥克唐納抗議使帝國成爲「專注於銅臭——開口利潤，閉口獲取不正常的利益」的政策，他說「將來如果有人要寫不列顛帝國的沒落史，必以我們今日的保守主義及其有害的政治經濟的信念開始。」

有人說工黨反對在帝國內移民，在英國工黨反對以在殖民領地創造失業，以無工作的人「傾銷」在新的地區（不顧他們適宜農作與否，或收容的準備如何）的方法，解決我們的失業問題，這點而論，那種說法是不錯的。

一九二二年在下議院論及許多減輕失業的議案中，麥克唐納說明他對移民的態度：

「有人說移民是解決方法之一。日前有人提出謂現在我們的人口過大。如果這是大戰的結果，吾人昔日在世界的經濟地位不能再保持，吾人特殊生產的國家及世界工業強國的地位已成過去，那末，移民必須應付。但這是一個非常的現象，它對於我國統治的原則及制度上所有的假設，予以嚴重的反響，而在那個方面並沒有基本改動的必要。此多還有些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的現象，許多移居的人，曾出國尋求新家庭新運氣的人，都失敗了回來而職業介紹所登記，所有的儲蓄及所有對抗貧窮的方法都沒有了，處境較未出外前加倍困難。」（註）

（註）（Hansard, Dec. 15th, 1922）

其他各黨對於這個問題有直接認識的議員們，都認為移民最多是英國人口與職位供過於求的緩和劑，不是救療劑的時候，工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如麥克唐納所表示的那樣），不再是一個黨的政綱底條文，而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一般的意見。

一九二八年九月，麥克唐納訪問加拿大回來之後，說：「移民不能救療英國的失業問題，也不能作實質的緩和。」

述及他所見的時候，他說：「移民至加拿大的範圍是很大的，經過詳細的考查之後，我深信（除別的事情都是一樣）加拿大寧取英國的移民。但加拿大是因為特別的目的才需要他們。加拿大并不是剩餘人口都可以去的救濟院。那裏的睡房也不能解決歐洲底過剩人口的問題。加拿大是一個具有天然富源正待開發的新國家。因此她自須選擇她的入口移民，她固有權如此的。」

當一九二四年工黨執政的時候，它計劃了一個家庭移民的計劃，至今麥克唐納仍贊成整個家庭移居帝國底未開發的地區政策。要實行這類的計劃，必須事先開拓土地，建築住宅。因此需要長的時間及金錢。工黨密切地與殖民地的工黨相議之後，相信這種經詳細考慮審慎調整的移民，是惟一可以保護移民的利益，防止城市無業人口的膨脹，及殖民領地工會會員生活程度之降低。因此，即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移民只能給予那些宜於願於在農地上工作的無業的人。（註）要使認可的移民穩固起來，也需相當的時間。關於加拿大西方未住民的區域，麥克唐納說：「這些荒地的移民事宜，應該有系統地進行——使千萬的家庭或任何數目的家庭，得每年派送出一



去。」

註：詳見麥克唐納著：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四二頁

要完成麥克唐納對大不列顛帝國的意見底概述，還有一點我們要加以研究。這是關於危害世界和平的，認帝國為不列顛族的經濟獵場，及努力對獨立區域（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前提）維持經濟的勢力範圍的那些資本家。

「波斯，中國及小亞細亞，都被分成許多經濟勢力範圍：熱帶各地，（為着商業上的緣故），合併於甲國或乙國。因此使國家間相互敵對。危害國家的安全，增大政府的消費，釀成戰爭的形勢，這些一切都是為的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却還供認信仰和平及安全的信條。

「貿易是國家的事，我并不反對。它與國家關係之重大，此刻還未全見到。但由那些以私利為前提的私人資本利益所指揮的這種事務，却引起戰爭，並且陷我們入一種使世世代代須求助於武力的殖民政策。資本主義實際的行動對於管理貿易的健全政治統治破毀無餘」。（註）

（註）：麥克唐納著：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三十三頁。

復次麥克唐納把資本主義在熱帶地方底近代的趨勢告發出來，並證實本章所概述的工黨政策：

「在現代生產中重要的原料都來自熱帶，例如植物油礦油之類都非常豐富，但該地政府軟弱無能，社會復不安定。因此引起土地的合併，大國經濟的競爭，排斥小國，軍備增加，以及戰爭。在強國中同時也引起政治道德的惡果。使文明的國家視『土民』的雇傭為進貢品，（如我們的帝國原料開發委員會所擬議的那樣）甚至淪為

類於奴隸的東西。資本主義第二步便以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地方建立精華的工廠，利用強迫勞動，輸出未完成的製品回國作最後的加工製造。這時便無所謂聯邦國，因為如此創造的財富及貢品乃是人民心中的嚮。這些一切並不是公共福利需要的，而是因為資本家的利益必須擴大他們的佔有及衝突。不僅以他們的貿易公司支配當地的社會，並且把政府拖入這些國外的合併和競爭中。」（註）

（註）麥克唐納著：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第八十三頁。

如果無拘束的資本主義不合於作爲帝國發展行爲的標準，那末社會主義能視爲較進步麼，下錄麥克唐納著的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麥氏對其所持的信條最有名的說明）兩段語可以作爲工黨對大不列顛帝國及其今日明日的問題的意見底出發點。

「帝國惟一可能而適宜的形式，乃是讓各邦自治而以歷史上的合作及公共利益底最有伸縮性的帶索把它們聯起來。

「社會主義不特不分裂這類團結的聯邦，它並且要努力使它們結合。一個在不列顛聯邦內的自治的印度，它所得的自由正如獨立國一樣，並且因此可以減少世界衝突的源泉。不過問題是那個聯邦的精神怎樣？如果它是軍事支配的聯合，決沒有政治的智慧可以保存它，因為它本身已與政治的智慧不相合。如果它是世界聯邦的先驅者，較任何國聯還要統一，那末，政治的智慧將指引它達到它的偉大的前途。過去的戰利品，可以變爲世界聯邦的基礎，如果民治成爲這些戰利品的繼承者。社會主義也不會拒絕對被稱爲土人的弱小民族的責任。他們不僅估

有足以滿足其他民族及世界工業必需的產品的土地，他們也是人類，對於正義與仁義的觀念也與我們一樣，而資本主義對他們如對白種的勞工一樣，則祇作為製造利潤的工具，他們不負責任他們的生命及幸福。白種的勞工可以保護自己反抗資本主義的物質主義，土著的工人却不能。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經濟，是保護土著的，因為它在享受出品與供給出品的人中，建立起一個責任的關係。祇有在社會主義統治之下，國聯發出的委任統治的基本觀念，才可以充分實行，而天然加諸高度發達的與原始的國家的人民底經濟與工業的接觸，才可以政治的保護及訓政補充。當社會主義對人類相互關係與責任的見解傳播更廣的時候，較強國家的人民，將會明瞭強力所能做的最高形式，乃是持愛惜的態度，對那些如果被任何國家侵害無力抵抗的人民行正義」。〔註〕

〔註〕麥克唐納著批評的建設的社會主義五一——五三頁。

在上錄的文章中，我們聽見理想家（實際的理想家）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由旅行及對帝國問題密接的研究中形成的。麥克唐納首認為大不列顛帝國是一個道德的責任，至於經濟的機會，祇有在貿易的利益不與人類的利益衝突的範圍內行之。

他的幻象（由遠屆四方的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底夢想所鼓舞起的幻象）看見一個不仗武力的大不列顛帝國，但所有在英國國旗下的各邦都在共同的法律，言語，目的與理想中聯合起來，作為世界和平的一個力量，一個「可靠的保護者」保護落後的種族，使之不受侵略，領導它向進步前進。

這便是麥克唐納所描摹的工黨對大英帝國的觀念。人們說這與其他各黨的殖民領地及殖民地政策並沒有多大

的分別。工黨反駁說，資本家也許口頭對這種帝國發展的意見表示好意，但他本身的利益將會防阻真正的開明的對土人政策之採用，他的物質主義將注定他的猶豫的企圖在公正的政府前失敗。關於這種爭論且讓歷史去答覆。在目前的世紀我們早已看見整套的話廢棄了。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根本原則迅速地消散了。阿木里肯爾屠殺事件 (Amritsar Massacre) 如其是在三十年前必不會引起什麼批評便悄然過去，如今却引起下議院的騷動，並且斷了負責該事件的官員底事業。

不論大不列顛帝國發展的程途怎樣，實行麥克唐納的政策並沒有可恐懼的地方。因為我們的帝國是歷史上最後的世界帝國，今後將是合作代替霸佔。將來任何對隸屬種族的壓迫或獨佔的政策，必惹起有組織的世界輿論的憤怒。

『世界是全體人類的家產』，麥克唐納的這句話，大概將是未來殖民地政府的領導原則。最少在這一點上工黨表明了文明世界的意見。



## 第十四章 國際主義

麥克唐納的思想，生來便是國際化的。從在祿錫茅斯學生時代，至一九二四年，在日內瓦為建設的和平而大聲疾呼的時候，以時間及機遇而論，其間相距似乎很遠，然而把他的生涯與事業，詳加研究，便可知這他的國際主義的思想，是自然地發達起來的。不要忘記他少時便受蘇格蘭地質學者米勒（Buch Miller）的著作所熏陶。那些書籍中，無疑地包含教義問答簡要（Shorter Catechism）。其中的名言，為蘇格蘭青年中級教育底重要的讀物。

這樣，麥克唐納少時，便接受了由地質時代的觀念所塑造成的「人底主要目的」之觀念，完全不受民族環境的限制。

他底求知慾很強，並且具有足以接受和發展智識的頭腦。他的智識範圍，常常在展開。因此少時的自傲，轉成蘇格蘭人特有的熱誠，更由此生出對大不列頌的公民權，及其一切應負的責任底充份的尊重。然而他自始至終，熱心保持他的民族主義，他認識並且發揚一切使蘇格蘭人特異於世的蘇格蘭人的品質與生活。如其他蘇格蘭人一樣，他竭力稱許朋斯（Robert Burns）及其所作的詩底影響。他曾自認當有兩種「床邊書」，其一是司各脫（Sir Walter Scott）的著作，其一是英國論文家（The English Essayists）。他十分認識他家鄉的蘇格蘭高

地，並且覺得全世界也沒有優於蘇格蘭高地底景觀所感覺出來的高興。

述及一次遊格蘭扁 (Gran Tians) 時，他說：

「誰沒有在孤寂的地方，度過風雨之夜的，誰便不知道生命的究竟。待到你向風雨挑了戰，又和它們友好之後，你才能够向人生挑戰。而最使你適當地和風、雨、雲挑戰的地方，是麥杜維 (Ben Macdui)。此外沒有更適當的了。」

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他總懷念慣熟的高地。當他隱息於高地的家裏——其地在越過彭蘭 (Penland) 的山崗，越過福斯 (Forth) 的土地的時候，他覺着最輕鬆。

麥克唐納的老同志哈定，也是這個優美民族中具有同類性格的人。雖然是低地的美麗(爲朋斯及拉母則 (Allen Ramsay) 所稱頌的) 榮繞着他，是低地的美麗引誘他的流浪的步伐，歸向休閒與靜寂。

倫敦的人事生活，增廣他的眼界。在社會主義早期運動的時候，他便結納了許多具有國際眼光的男女，並且會了許多從大陸逃避專制，托身英倫的亡命客。

一八四七年，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在倫敦成立。在這個同盟贊助之下，馬克斯，恩格斯發出了那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但這個國際中心組織的企圖，到一八五二年便崩壞了。十年之後，隨著英國各工會主義者，和各國社會黨的一些代表們以及其他工人團體之共同的努力，才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這也是馬克斯贊助的。但它猶豫地無能地存在了一些時之後，在

一八七二年法德戰爭的重壓中消滅了。

現在歷史上所稱的第二國際，是一八八九年法國革命百年紀念的時候，在巴黎成立的。它藉着小數男女底堅強的努力，協力以國際的精神，注在全歐正在發展的社會主義的團體底羣衆中。它取得德國的倍伯兒 (Bebel)，李普克斯尼希 (Liebknecht)，哥斯基 (Kautsky)，本斯泰因 (Bernstein) 的幫助。他們那時正在與俾斯麥乃至老的少的德國皇帝的鐵血政策相競爭。在戰前，贊助的人，還有曾任德國民主黨書記，現任宰相的米勒 (Herman Muller)。法國的若累斯 (Jean Jaures)，在它的計劃中，是很有力的人物。一九一四年，在巴黎，他在一個被雇的刺客手上，爲他的國際協會而死。但他底年青的門生，現任日內瓦國聯勞工局局長的多瑪 (Albert Thomas)，却跟着起來，隨着這些及其他由歐洲小國來的，還有許多俄國人，如列寧 (Lenin)，柴諾甫 (Tchernoff)，愛斯路 (Axelrod)，盧班諾維茲 (Roubanovitch)，柴愛哥夫斯基 (Tchakovsky)。他們都是從沙皇統治下的西伯利亞被逐出來，而沉着地，不斷地，熱誠地爲他們的祖國政治自由而努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作爲反對孟雪維克的布爾維克，是由這些及別的俄國國際主義者間的意見分歧中創造出來的。他們因爲對謀解放的方法，具有不同的觀念，結果分裂成爲兩個不同的團體。

第二國際的總部，在不老會 (Brussels) 的人民大廈 Maison du Peuple 裏。少年語言學教授羽斯芒 (Camille Bray-Smans) 任它的秘書。其人幹練動人，它在各大都會，舉行大會，一八九六年倫敦，一九零零年在巴黎，一九零四年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一九零七年司圖嘉特 (Stuttgart)，一九一零年在哥本克根 (Copen-



antwerpen)，一九一二年任巴塞爾 (Basel)，一九一四年正籌備在維也納開會，歐戰便爆發了。它常常發行英、法、德三國文字各種各樣的報告和文件，詳載附屬各黨派所蒐集的一般政治消息。

較先進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團體，如社會民主聯合會，獨立勞工黨，和費資社等，都參加第二國際。雖然它們各自有其不同的根本觀念。由於他與獨立勞工黨的關係，麥克唐納和哈定，加拉斯耳和海門等，與各地從事社會主義工作的男女，發生密切的接觸。他以新組成的勞工代議委員會秘書的地位，（與其同僚），努力使該委員會與第二國際同盟，作為英國有政治組織的工人底強盛的表现。當時海門與社會民主聯合會，極力反對這個提議，但結果，卒為遠大的眼光所勝。於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勞工代議委員會，即後來的工黨，在第二國際裏，成為最活動的團體。麥克唐納成為最重要的，最有勢力的份子。他在第二國際執行局服務了幾年，除直接的事務而外，他更參加在歐洲各都會舉行的會議，因此他直接獲得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和社會主義者對歐洲大陸政治的意見。

回頭看大戰前第二國際的努力，令人不勝感慨。假如那些後來在各國當權的政治家，於戰前分別當了權，則各國間的爭執，當可從詳調查，不致流血。然而麥克唐納和他的朋友們，都出非其時，戰爭卒使中歐各國，要以革命的手段，去建立民主國家。他們的政治天才，還未被他們的國人所認識。

麥克唐納如何地為國際和平而努力，在議會的爭辯紀錄中，各報章雜誌中，都可以找出充份的證據。

一九一零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克根會議之後，他極力說：

「全世界的勞動者，因為沒有組織，因此分裂為互相嫉妒的國家。暴力的統治，躁急地趨向轟裂的戰爭。我們需要一個為組織，為和平，為合作的領導。稍有識見的人，都仰望著組織的勞工，祈禱它起來。將有一個大衛從營陣中出來，手牽着鎗索，滿懷正義，把自傲的，有害的鄙俗者打敗嗎？阿，勞工們，知道了嗎？他們被喚起來，要在人類歷史上，寫上最偉大的一頁。」

此外在愛國情緒白熱化的時候，為謀英，德兩國勞工運動聯絡起見，國會工黨議員，及其家屬友人，於一九零九及一九一二年間，訪問德國。德國各地縣市的官吏，都歡迎這些和平使者，并且與民間交換思想意見，和協調的希望。

麥克唐納以在德國國會發表的著名演說，結束其第一次的訪問。當時是德總理賀域(Behrmann Holweg)做主席。一九一八年，他再被請演說，還是向他的聽眾，提議歐洲的大聯合，大戰殺戮的印象必然在他的腦海中迴旋。

戰時人們對於麥克唐納的「他的德國朋友」，有許多議論。其實都是無知的。年來他與素來在德國本國反對帝國主義和貴族黨的人來往，其中許多人，在逃亡倫敦的時候，都在他家裏窮苦地過活。他們正如他一樣，都覺得歐洲需要和平，各國國際主義者，都視歐戰為內戰，認為工人羣衆，並無責任。但事實上都在前線受災難。哈斯門當時還想保持第二國際，對各方的聯絡，結果反為人們懷疑與憎厭。在停戰宣佈之前，他們曾企圖舉行大會，結果不克成功，在其他不愉快的回憶中，麥克唐納還不忘海員工會會員拒絕他登船赴斯得甘(Stockholm)參加大會的提議。

聯盟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在很大的痛苦中，努力印行戰爭目的等小冊子，責以常識及民主的可能性。而麥克唐納希望在凡爾賽得到一個合理的和平之幻夢，却在一九一八年統選舉中狂熱的「殺海陸」(Kilgob)及「強迫德國賠償」等要求毀滅了。

一九一九年休戰後，戰時互相衝突的社會主義者，得到了在百倫 Baine 敘會的機會。會議中，他們把戰時各種不同的意見消除了，從新把一九一四年德國社會主義者，在畏懼俄國侵入恐慌之下，贊成戰爭，而失了效用的國際工具，恢復起來。

麥克唐納一面積極參加這和協的工作，一面在國內挽回失去了的地位。因為戰時的狂潮，此時已退却，而密約的露佈，使聯盟國方面所有的民主主義者，得到更深的諒解。

在前面，我們已述及麥克唐納環球的旅行，在美國各地，他以費賓社新進者的資格，作公開的演講，藉此結交了許多同樣熱誠奮鬥的志士，獲得不少足以解決當時及後來國際政治上種種問題的智識。

他屢次遊訪加拿大。第一次于一八九六年，與他的夫人作蜜月旅行。第二次一九〇六年，道出加拿大，作世界旅行。第三次在一九二八年，攜帶他的三個兒女，重遊他昔與亡妻共遊之地。每次他都得到深刻的印象。如別有的有思想的人一樣，對於加拿大，給予正當殖民的偉大可能性有深深的印象。

一九〇二年，在南非戰爭之後，他偕其夫人遊荒蕪的荷蘭共和國 (Dutch Republics) 他詳細地並用照片記述英軍在該地焚田政策，及其經行各地的殘酷。此外又與戰敗的荷軍領袖波打 (Botha) 馬利門 (Merriman)

斯門司 (Smuts) 等會晤。回倫敦後，極力贊助英荷間之諒解。後來並助成勇敢的百那比 (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給予南非以完全殖民地地位。一九一〇年，當保打遊歷倫敦，其時他已任南非內閣總理，麥克唐納亦已爲工黨議員之領袖，油然而統治英國的希望。這足證明麥克唐納有知人之明，並且顯明出歷史給予信義的正直的，和努力的人們底教訓。

一九〇六年，他遊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也有很大的收穫。澳大利亞聯邦，年來已馳名於勞工立法。自一八九一年以後，大部仿照英國工會的工黨，都已成立，并在各省大行活動。勞工作爲一個聯邦政黨，在澳大利亞聯邦，已成爲一個發展的政治勢力。一九〇四年，已由屈臣 (J. C. Watson) 一個排字工人負了工黨內閣的重任。麥克唐納夫婦，對於工廠法，都很精心研究，尤注意其施于女工的部份，對於工業法方面，所知尤廣。與接觸的工會及工人領袖，他們無一不持以極深的友誼。這些人中，後來不少以內閣總理及國會議員的資格來回訪麥克唐納於倫敦，交相以成功爲頌。

對於印度及其問題，他更關懷。一九〇九年，他旅行期中爲每日紀事報 (Daily Chronicle) 寫通訊，後來彙集此項通訊，加上其夫人著的關於印度婦女的幾章，合成覺悟之印度 (Awakening of India) 一書，解決了許多英國國會中困難的問題。

麥克唐納第二次回任內閣時，正值印度問題非常嚴重。他第一次遊印度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最後一天的回憶，此時乃更爲重要：

「我曾看見印度的美麗，她過去的光輝，她底工作，以至於日落才歸的耐勞農夫，她的新受教育的兒童，靈活的，憤怒的，驕傲的，愉快的回憶和希望，在他們的心坎裏。孟買（Bombay）工廠的煙雲，加爾各答的匆忙，恆河（Ganges）平原毀壞了的城池，和貝那勒斯城（Benares）林立的廟宇，都一一迴旋於我的腦海。西莫拉（Sind）帶着它的雄暴輕浮的空虛，爲正義而努力的良民，行於黑暗的暴民也起來。我覺得印度自身的前途將永遠留存。我們的統治，則正如深泥上的短程列車一樣，如電光之從天墮地一樣……印度生命的動力，將永遠存在。他們將於科學、美術、文學、政治、乃至於煽動各方面表現其能力。自然我們可以歡迎它，也可以阻礙它，甚至壓服它。如其我們是聰明的，則我們應去歡迎它，如此我們可以從幫助中，得到她的感激，與友誼，當她富強時（她必富強）她必不會忘記貧弱時的朋友，倘她因自己努力的緣故榮耀時（他必榮耀），她必不會忘記微賤時的眷顧者，我們不能阻着他前進。她的命運，不是我們的意志所能左右，我們只好承認它，向不可抗的力最低頭」。

關於麥克唐納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意見，有許多以訛傳訛的話。戰前新聞界，很少注意國防的集會，對於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德模克拉西對抗革命方法的爭論，成爲衝突的對舉，很少人覺着，更少人注意。其時麥克唐納便已參加這些辯論，並且爲代議主義辯護，爭辯最激烈的，自然還是俄國人，甚至今日還有不少人，不知道俄國當日原有兩次革命，其一爲孟雪維克德模克拉西派的克倫斯基所領導的，它是被俄國壯年時的屠殺及農民的飢荒，所驅動的，其目的在模倣西歐的成規，建設俄國的代議政制。麥克唐納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急進主義者，

所贊許的，便是那次的革命。克倫斯基之迅速地被刺，托洛斯基及第三國際其他的人所罷免者，原是因爲聯盟國企圖（加以克倫斯基不願意的幫助）懷策無武器的，飢餓的俄軍，繼續對抗德國的結果。列寧認爲俄國復興，惟一可能的機會，惟在立刻停戰媾和，這種發展，原無可異，許多（麥克唐納也在內）明瞭列寧權利的秘密，及其在俄國的人望的人，却根本不同情他及其同僚所欲施諸別國的哲學。

一 麥克唐納深信英國既有完整的德模克拉西，自不必用革命的方法，他根據這種見地，拚力地反抗小羣的英國共產黨在工黨的陰謀。他們第一步謀以直接入黨的方法，成立「聯合陣線」，這個計劃失敗之後，他們復在黨的下層羣衆中，確立派系，組織「左派」的小組。

在此，我們節錄他一九二〇年發表於社會主義者雜誌（Socialist Review）的幾段話，表明麥克唐納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第三國際是信仰暴力與武裝革命，爲達到社會主義的普遍方法的具體表現」。

「第三國際是俄國環境，及一種從空想的需要中，弄出政策來的武斷的論理底產物。俄國急激的政變，及其反抗整個武裝的金融的歐洲之成功，當然引起全世界民主主義者的熱情，特別影響，那些自一九一四年即已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的思想。他們對於俄國領袖們的勇氣及意志力。無適當的言詞，可以歌頌，更不能讓歐洲的反動與險險自由發展，而不贊助莫斯科的國際，但我個人，則願做前二事，却不願做第三事」。

「……我反對第三國際專制的方法，這個方法，使它與理論上的盲信主義在一起，它的精神是形而上學的，

不是科學的，它要強予各國的共產黨一種哲學，一種方法，一種口頭語，一種「濟劑」。

簡單地說，麥克唐納以其歷史的觀念，平衡着它的思想。他對於英國克林威爾革命底不斷的注意，及緩進地，但確定地擴大我們英國的政治組織，加強他為民主權利的爭辯。

一九二〇年，佐治亞 (Georgia) 之遊，使麥克唐納非常滿意。因為他知道自由的民主主義，正在那裏勇敢地應付革命後政治經濟的問題。不久當他回英倫後，聽到莫斯科指揮布爾塞維克的軍隊侵入佐治亞的消息，他更證實了他反對共產黨以武力擴展勢力之正確。

此外他曾在偶然中遊過土耳其，巴力斯丁，埃及和錫蘭，使他對世界情況，成就了一個今日在英國無可匹敵的經驗。

麥克唐納之反對那些引起世界大戰的祕密外交，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同時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及急進主義者，懷疑歐洲各大國底軍備製造的活動。他以爲除在 (Central Empires) 之外，還有準備戰爭的力量。他知道當費爾 (Lord Fisher) —— 初造海軍大臣的時候。曾促英皇愛德華七世說：「英國的海軍，應該以基爾哥本哈根爲根據地，德國海軍在納爾孫」。他悲歎着我們沒有庇德也沒有俾斯麥來發號令。

費爾說：「我覺得英國依照我皇上的方法，擢取德國的海軍，是極容易的，并且多半不需流血。」(註)

註：(Lord Fisher's Memories P. 19 Hodder & Stoughton 1921.)

負高級責任的人員的這類思想使麥克唐納不得不請一般大眾認識在和平中，他們公共的利益。

已故的摩利爵士和麥克唐納的友誼，非常親密。在他們早期認識的時候，他即對一位政治的同僚說，麥克唐納具有『政黨領袖人物的頭腦』。那是不錯的。當一九二二年，他再被選為反對黨領袖的時候，當一九二四年，他以首相的地位，重中政府席的意見的時候，下議院把他發覺出來了。由那種地利，他成為一切盼歸國際和平的人的喉舌和良心。如今一九二九年，他再回任首相，更堅信，更努力，使世界各國獲得一個鞏固的信任的合作，他由深深的譏諷中，達到世界性的政治家的高位，祇是由于他能對其所不斷地企求，在國家上國際上推進的基本原則底絕對的忠誠的緣故。這是對他的聲名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麥克唐納傳

## 第十五章 麥克唐納之性格

要了解麥克唐納，及他過去三十六年間力持不懈，貫徹始終的理想，我們必需回顧他被稱爲一個「祿錫之派」的時代。

因爲麥克唐納是一個純粹的蘇格蘭人，稟賦着其若祖若先底沉着信仰，不屈的決心，鬥爭的精神。這些是完美的特性，假如他生而爲一個英吉利人，他也許會多點了解他自己和他們，（英吉利人——譯者）。假如他生而爲一個威爾斯人，稟賦着威爾斯人底熱忱，迅速的口才，他也許會多點崇信他自己。然而他是高地人們的後裔，——冷淡，憤默，固執，尙儒——英人之所以少能絕對賞識他，視他爲一個爲理想而奮戰的大勇敢者也以

此。

一個政治家底內在的，不可見的生活，在其生前固少真評，一般人之對於這個連一些深知他的人，也責其冷淡的人底誤會，也自無可非難。

「麥克唐納的每一個朋友，早晚總會遇着這雙「視而不見」的眼睛，總會經驗着入其室之冷峻，（自然是招請的——只有二人是慣於自出自入的，幸而被視，而視若無睹的神態。」（"Iconoclast," in J. Ramsay Mac Donald 1928—29）

這是一個朋友，一個直白的景仰者對他底批評。此外還有不少人，會被這個歷歷如畫的記述，引起一種遺憾的微笑。如其是以代表團的資格，被接見的話，其接見，與其謂為談話或交言，毋寧謂為訓示給以意見，促其解釋。這種法庭上的空氣，每易於瞬間使人失察，失察一個疲乏與過勞的偉大政治家，也會無限地竭其時間，腦汁與協作。假如這樣做，能助他於一言片語中，獲得他所素持的主義底更充份的了解的話。

雖然麥克唐納確不是一個盡情吐露的人，可是他却是一個友情深摯而悠久的好友。當他榮任首相，舉行交際會時，凡會到過法學院林肯廣場，他的老家的訪客，都在最初被請之列。即在百忙的生活中，對於一般自承為無足輕重的平民，他也深致其無限的好意，從不以無暇而忽之。

一個被非難為無忍耐的人，却屢屢細論，急躁底反面的性格之需要。

他最近說：「我是沉靜的人，是那些營造，營造，復營造，沒有人知道它們在營造的珊瑚虫。但有一天，却看哪，望哪！它們的工作冲逐乎水面。沒有說話，沒有誇張，更沒有浮言，而天下已共曉其工作之完成。我們之於勞工運動，亦須如是」。一而再地，我們聽到這個深沉而穩實的聲調。他把他的信仰，除去一切時間上的限制，為後代工作，如為後天工作一樣地愉快與信賴。一切偉大的工作，他既不視之為成功，亦不視之為挫折，只視之為沿着「越山過嶺，遠乎天涯，蜿蜒以向理想而上的朝山聖道」中前進的一步。

這是個改良家的呼聲。無怪乎人們也以之頌贊另一信仰同樣精神的人——奧力味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在赤格(Chequers)的畫像陳列館中，麥克唐納對於護國主(即克倫威爾英國共和政治首領——譯者)底畫像

不倦地觀看玩味。二人時代雖不同，其視暴力爲有時而窮則一。『我們從自由方法中得來的東西，較之從暴力得來的，倍而上之。同時更確屬於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除了不用暴力，我們便無法獲得王國之幸福而外我不知道暴力還有什麼用』。

上述納斯卑 (Naseby) 勝利者之言，也許可以從今日麥克唐納的演詞中之一，抄襲出來。當無事不可以從選舉中獲得之時，爲什麼還要用昔日蘇格蘭高地人所用之闊刀呢？

而且，突然向標的襲擊，或達到目的過於迅速，反響亦愈速。天然的法則是演進，不是革命。麥克唐納對黨對國最大的貢獻是：他把我們的社會制度底潛伏的不義搜集起來，由這些不義中，造成世界上最中庸的社會主義的信條。也許他所持的『漸進』政策，（如果他得到大多數，他將會見諸實施，不待黨中左翼份子任何的刺激）。將會是現代工業國家底精巧地平衡的結構上一個嚴重的破裂。它的反對者說，實行社會主義，將會引起生產費用的增加，出口減少，失業更多。但不論贊成或反對社會結構的重造的論據如何，倘非麥克唐納，則工黨所宣佈的政策，其近於工團主義，『直接行動』，和完全的改造，遠較今日爲甚，這是無疑的。

就是他，選擇了最困難的工作，規定有限度的對象。他選擇了以『分期的社會主義』爲旗幟的戰場，計劃并展開那個運動，在追隨的人底喝彩中，馴服於智慧之下。它必要更一個高地人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勢力，試探進度，然後背著牆說：『就這樣遠，不能再進了！』

那些愛說他不由自主地受左派極端份子的影響的人，忘記了他們所討論的，原係屬於世界上（一經決定之後）

最不爲勸告恐嚇所動的種族的人。

然而我們不能單獨拿一種氣質，或一種性格，來解釋麥克唐納在黨中握權的原因。他得力在什麼地方呢？他的民主的追隨者，對他們的專制的領袖驕傲的緣因何在呢？

他的力量是多方面的：是智識、誠實、固執、奮發、和自制堅定合成的。

他在智識上的成就，是易見的。近年的英國首相沒有一個有他那麼廣遠的旅行，也沒有一個有他那麼深遠的統治學識。他是一個實際行動的學者，像他這樣能把二者合而爲一的人是罕有的。

他的誠實，即在拚死反對的人也承認——或許是勉強一點。他沒有時間以事阿諛，他也不耐煩煽動家的方法。他不忘政治應該與我們的理想相關連，（不僅與我們物質的利益相關連），較我們這代中任何的政治家更爲堅卓。

一九二四年，麥克唐納就任首相不久之後，有署名「寒微貴人」者，發表一文說：「讓讀者都確知，麥克唐納的政治風度，乃是要把基督教見諸實行。外此別無所有了。說他是『階級仇恨』的盲信者，或說他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獨斷者，這是他的反對者最大沒有的錯誤。以這些根據來攻擊他，他將以粉碎的力量予以回擊。」

大戰對他的固執給予最嚴酷的試驗。他忠於他所信的真理，從他的人極少。差不多每個人的心，都強硬地反對他，連他的同僚也如此。那時會見他的人都說他常在悲傷，但戰後帶給他們以血戰後的一切幻滅的結果，一切的反動，（當時國與國間，人與人間都迫得不能平衡），和一切和平的問題。與它們一起地，麥克唐納也「會來了」！

這是人人同情那個「焦頭爛額，却不低頭」的奮鬥者的證據，他的態度底紀念，將會使人們覺醒，他的誠實「不怕紅燄火」，試煉之後，愈堅實，愈純淨，沒有軟化，沒有污點。

著者還記得一九二四年總選時，當麥克唐納要求國人批准他的政府繼續執政的時候，和一位堅持共產主義見解的工人說話的情形。那位工人表示熱烈地希望麥克唐納得到大多數。著者指出說，麥克唐納是反對一切共產主義的東西，而閣下認爲是工黨的真理的。

他轉駁說：「也許是的，但你如與他同在一起，便知道他正如槍身一樣的率直。」

他個人的忠誠，也是同樣地沒有退讓的。當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的，在外交部的職員，關於齊諾維夫信件的事情，不讓他知道好幾天，然後在其真確性尚未大白前，被洩刊了出來，他還是不猶疑地說，他們所做的都是對的——這是一個勇敢的宣告，他原知道這足以增加他的困難。

多數具有麥克唐納的氣質的人，原是難於在講台上發出光輝，但奇怪得很，他却忘了他的沉默，他的寡言，站起來便活像生來是領袖的人物，如像昔時希伯來的預言家那樣，他站起來轟響地發出他的非難，言詞中帶着權力，雄辯，威嚴與責任。他底高的瘦癯的身材，既沒有休息，也沒有厭倦。有人記載說：「他說話起來，好像做夢一樣，好像被他的幻力帶走一樣。」

他不尤用情感動人。當代的其他演說家們，都傾向於舞台的技巧，以想像掠奪想像，以鶯語博取聽衆的好意。但麥克唐納不屑博大衆的笑聲，他要他們思考。他是向理智呼籲，即在選舉之前夜，也還不改這種態度。其

他的入愛利用困難，麥克唐納却以不耐煩的憐惜的語句，予以恕置，認為是不足齒的。

一九二四年總選，麥克唐納帶同那維臣（H. W. Newinson）出發演講。那維臣給予世界以下述的關於麥氏的描寫：

「顯然地，他有一種不可抗的力量。他具有哥德（Goethe）最先稱為「人格」的那種力量。我不能解釋那力量的來源。可以叫它做「德性」，也可以叫做「旨趣」。它是部份地有形的。在任何他出席的講台上，祇要向前行一望，當你的視線達到他的身上的時候，你必立刻說「他在那裏」！那奇異美麗的頭髮，高而活潑的體格，他那宏亮的聲音，（在這個旅程中，曾作五十次以上的演講，多半是在曠地上舉行的）有時略現疲乏，但他的聲音，常常與那內在的堅強的精神相應。每見一次新的聽衆，那種精神似乎又新生起來，聽衆愈廣大，生命愈鼓舞。

「所有這些美好的德性，都有助於「人格」的力量。但還需要些東西，我却不大知道如何去描寫它。那裏有受過訓練的智慧，有辛勤，智識上努力的記錄，對世界及其問題（不論印度的或歐洲的）底廣闊的與精確的智識。同時對於美（不論是天然的，或藝術的）也有一種尖銳的有深修養的欣賞。但他的人格最偉大的地方，還在他那種罕有的優美的同情，——這種同情，使他能視別人的愛樂勞苦，若自己的愛樂勞苦。」

從他的「每日生活中的藝術」的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見麥克唐納的哲學與政治理論的關係。他說「必有藝術家的精神，才能樂於工作。我們需要的乃是對我們的經濟文明，作智識上的與精神上的考察，看看什麼是物質的

機械的，什麼是自由的，不屬於公式的。我們最大的問題，乃是如何保持個性自由，其惟一解決的方法，在決定以生命的一部份組織起來，使其他的部份可以自由。組織是反對自由的說法，是完全荒誕的。世界上並沒有這種類的反對。自由有賴於組織，而自出的一個條件便是服從。」

我們屢屢找出他的贊頌工作的演說，而其所以鼓舞驕傲的工作者底精神的，乃是一再損虧他的身體，而無損於他的精神的那種理想。

「一個工作者對於他的工作的鍾愛，正如對於他的妻子的鍾愛一樣，這便是我對於工作者的觀念。他在工作中找出可愛的嬌媚的地方，使他的心靈得到最大滿足的地方。」

同樣的意見，在一九二五年他在歡宴席上的演說中找出來。那歡宴是為「敬重他的個人的及政治的品格，及其寫作，演講的天才」而設。

麥克唐納回答被稱為「下議院之『父』」的干那（Mr. T. P. O'Connor）他舉杯祝其健康說：「我們常聽人說，辦公繁忙的話。那是無意義的。現在正是我們應付真正的事業的時候。愛好公共生活的人，對辦公廳並不覺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報酬。工作是很多的，一天不厭做二十四小時，還做到二十五小時。那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愉快。如果覺着人生七十歲，每分鐘都有貴重的結果，那才是最大的滿足。」

這便是麥克唐納全心全意地實行的哲學，不僅在辦公廳，在任何地方都一樣。因為他是「多方面的人」，穿上學者的服裝，教師的，或著作家的服裝，都是同樣感人的。他帶着一根鉛筆，一本記事簿在口袋裏的新聞界的體



驗，不是沒有用的，那種習慣還是固執不改。由他個人的見地說，由公眾的見地說，都是一種非常寶貴的習慣，因為一個寡言的人，當他怯於在其他地方發表他的銳敏的感覺，便會在報上洩露出來。哈地(Thomas Hardy)曾勸他放棄政治生涯，從事文學。但他結果，却在政治上出名，同時沒有告別文學。他有些新聞寫作是倉卒的，但却是誠實的(不是沒有堅實的體裁和高貴)，是一個對美有敏感的腦袋的作品。諾克斯(Knox)傳，如果由他的筆寫出來，將更有興味。他原是有野心要寫的。

他的非政治的著作，見於漫遊與遠足書中。但它們，我敢說，並不及他註解他的信條那些文字那麼耐久。當他不再努力參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他分析社會主義理想的話，仍必為他而工作，引起人們的興趣，影響人們的思想。

但這些天才仍將是他在閒暇時候的業務，因為如果政治上有一定的話，麥克唐納畢生將是英國工黨的領袖。德國作家赤耳(Rudolf Kierke)在棟樑與力量雜誌中間『麥克唐納的命運將怎樣呢？』『英國許多有識見的人相信民治的將來有賴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麥克唐納凌抗過許多風波，而每個危機只增加他的聲望。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工黨政府崩潰之後，黨中一部份人向他的治績挑戰，但他辭職的問題連嚴重的討論都沒有，因為工黨明白他之為議員，為思想家，為領袖的優越，是無可詰難的。麥克唐納可以查理士(King Charles)的話回答他的敵手：『他決不會殺了我，使你做『皇』！』

他和那些主張『立刻實行社會主義』的人的分裂，一九二四年以後愈形擴大，同時黨羣衆中所謂『強烈派』的人對他深懷怨恨，這種怨恨，如拿來對付一個較麥克唐納軟弱的人，也許會使他不安，（如果不致於使他驚惶的話）。但他知道如果他的批評者一旦負責的時候，他們也會被不可抗的事實迫着，知道大會把議案通過，與把議案在沒有準備的社會，甚或敵對的社會中見諸實行，是全然兩件不同的事。

一九二四年以後，他的閒僚多以他對他們『隱瞞』批評他。這有時或許是他的政策，但大半是他的氣質。因為麥克唐納的頭腦最善於獨作思考，而他的氣質復從而幫助這種傾向。

他曾對一羣學生演說說：『一個人能否獨自過閒暇的時間，這是生命的試驗。如果他需要一個人伴着，他便未能支配自己。』這是不錯的，但如像麥克唐納那樣過度實行，也未免極端一點。它會發達至拒絕考慮別人的意見，不容別人的意見，不愛協調，不歡喜妨害他的人。

當然目前最明顯的阻礙是自由黨。麥克唐納是不會認為有改造遺傳的自由黨，是他的幸福之一的，因為一個黨的損失，差不多天然地都被另一黨獲得。工黨發達大部份是犧牲自由主義而來的，因此自由黨繼續存在之足以限制工黨最近將來的前途，遠重於任何別的因素。

由偏狹的黨見上說，麥克唐納屢說『自由主義已傳給我們』的話，也許是正常的。他相信，（如果我會說的那樣）從前與自由主義一致的道德的熱情及精神的驅策，已遺傳給工黨。在某意義上，他必須相信它，因為麥克唐納乃是現代政治的，如果他不信舊急進主義底精神的驅策在他那邊，他的熱心會發散的。他把一種宗教的偏執

介紹入我們的政治生活中——他反對任何不以良心為基礎的，而以便宜為基礎的妥協，那值得奇怪麼？

正如他的責任與成就一樣的偉大，麥克唐納有時避開政治的事情，就是在這些時候，（通常都是避開他所不能避開的公衆，被家庭環繞着）這個人底真正的優美，連敵人的心也着了迷。

要看麥克唐納在家的情形，必須跑至咸斯達（Hamstead）一條靜寂的路上那間舊的屋裏。

麥克唐納久欲遷居於咸斯達的山崗上，五年前他得到這個機會了，麥克唐納便全家遷至一所愉快的家庭裏面，那裏有美麗的花園，足用的地勢，還有一所可改為圖書室與書房的房間。呵，那大的圖書室，還不能藏麥克唐納所不能捨的書籍之半，結果相連的兩個房間也裝置起書架來。

那裏，在家庭團聚中，他仰着愉快的眼光捨去辦公的外套和繁重的責任。

他熟知本國的美景，對於常人所不同的微細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能細說在園中歌唱的雀鳥的名目和習慣，以及所有在那裏生長的花草的名目和特質。

年前一位朋友勸他裝用無線電。初，麥克唐納予以拒絕，但當一套無線電裝在他家裏以後，他對於那類的東西却成爲一個熱心家。此後他裝了好幾套，每常稍閒的時候，他最喜轉開音樂的節目。他特別愛蘇格蘭的舊歌，凡是美好的音樂會，他都不放過。聽加拉斯哥孤兒院歌詩班，是他的最大的音樂上的快樂。

在方郎奴（Fornat）每星期最有意義的時候，便是星期日午後的茶會，那些少數有權參與的人，可以從側面看見麥克唐納的性格，在別處是看不見的。家製的麥餅，及其他便飯中蘇格蘭的伴食物，一盤一盤的盛

精。

假後，親密的朋友到書房裏，麥克唐納便以鑿鑿家敏銳的智識談論着書籍及文學。因為他能以中肯的話談論文學與美術，一如國人在他的政治的宣言中所得到的那樣。

麥克唐納最快樂的剎那，在與兒女們閒談的時候，或在靜寂莊嚴的書房的時候。一次一位親密的朋友問他說：「如果沒有政治這回事，他願意怎樣過他的生活，他答說：『每日讀書四小時，寫作三小時，在我看來，那真是地上的天堂了。我以為人生最大的快樂無過於家藏許多書，並且有空閒把腦海中對各種問題的思想及人生的錯綜複雜寫在紙上。』」

偶然地，他也玩玩哥兒夫球。他大概讓十二點，但因為玩的機會太少，他從不是。也永不會是一個好的哥兒夫手，假如玩得多，他是會玩得好的。

麥克唐納在家的時候，是一位非常愛好家庭的人，他對於他的女兒們底社會的慈善的活動，以及她們正在開始的事業，異常興味。他也很驕傲，因為他的女兒依石伯，和他的幼兒馬爾康都是倫敦州參事會的參議員。二十五年前，麥克唐納學習實際的政治生活的地方。

倘使政治的鬥場不接受他，麥克唐納也許會甘於緘默。但他內心却有一種力量，準確地引領他踏入我們這一代最大的衝突中。

現代一位最滑稽的作家給予麥克唐納一個綽號，叫做「道德美」。不論他是否為的嘲笑或阿諛，却是真的。

他早期的時候便已把一種理想的美，注入他的政治信仰裏面。他把社會主義的運動從塵芥的地位舉起來，並給它以靈魂。如果工黨將來有前途的話——很少人能說它沒有——那末，我相信工黨的歷史家，將會指出這一點為麥克唐納最大的成就。

當一九二四年工黨是否在下議院得不到大多數而仍組閣的問題，尙未決的時候，麥克唐納發表一篇演說，把那鼓舞他的，給他以耐心和勇氣的理想，原原本本地說出來，較他從前說的尤為詳細。

『我要一個工黨政府，使國家的生命可以繼續：一九二四年並不是上帝的創造程序的最後一年。我們是會死，會被人忘記的，而一代復一代將會繼續來，但旅途還在向前，還有如哈定一樣的勇士為聖盃 (Holy Grail) 而尋求。愛的盾牌，公正的矛槍，還握在良好的正直的男女手上。偉大的將來理想還在我們人民的前頭。謝謝上天，我覺着這些事情是沒有止境的。我看見我自己的地平，我自己的天涯，但我深信當我的兒女，兒女的兒女到達那裏的時候，將另有一個天涯，一個地平，一個黎明，一個天上的光明招手。那是我的信念，我拿着這信念向前，我的同僚也拿着它向前，盡他們的畢生，努力使他們一代對人類的幸福快樂聖潔有所貢獻。』

這些高貴的話，由一個曾經窮苦的『祿錫之僕』對廣大的聽衆說，其必感動聽講的男女，是無可奇異的。因為在那個結論中，顯露出工黨的靈魂來，由惟一的人用言詞把它銘記，他由無有中把黨為造成今日的地位，並命它不退縮地向明日前進，明日果來的時候，他的貢獻將較任何人為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麥克唐納傳

定價國幣

元正

譯者 司徒德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中央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遽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立獨